

## 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 克里米亚专机

铁门发出了一阵吱吱的响声，我被带进牢房，随后听到关门和上锁的声音。周围一片昏暗，刹那间，我竟分辨不出这是在哪儿。我碰到一张铁床。离我半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洗手池子和抽水马桶。没有窗户，只有铁板上几个小孔透进几缕微弱的光。我仔细看了看，这原来是一个六平方米的单人牢房。我坐到床上，再次环顾这个新处所。没错，是单人牢房。这倒也好，现在我谁也不想见。腋下还夹着一些给我剩下的东西，但是皮带、领带、绳子都被拿走了，文件和钱也被收去了。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没办法，他们比我清楚。我躺在用铁条编织的床上，感到一阵金属的冰凉。大约过了五个小时，牢门打开了，来人把他们叫做午饭的东西放在洗手池子上。我没有动这东西。一小时后，我又被带到上面的另一间牢房里，我看见两双眼睛在好奇地盯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身份，把下铺让给我，帮我铺好用破棉絮做的床垫。我收拾收拾就躺下了，想暖和暖和身子，但翻来覆去就是不舒服，身上感到一阵阵的酸痛。没法子，必须经受住这一切——往后的日子只会更糟。

今天我还曾躺在医院里。早上醒来时，听到走廊里一阵窃窃私语。随后病房的门打开了，护士探头看了一眼说：“大夫看你来了。”这女人脸上露出一副惊恐的神态，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来抓我了。来人把病号服扔到一边，向我出示逮捕证，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签发的。向我出示这份文件的人很像电视连续剧《行家侦探》中的托明少校。这位“行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很有风度。我穿上衣服，很快就坐进一辆“日古力”汽车。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胡同行驶着。据说，这些司机素质很差，又不熟悉莫斯科，汽车经常开进死胡同，所以要找一栋房子需要好长时间。莫斯科地区的街道挖得乱七八糟，这里正在进行房屋和公用设施的修建。终于，我们到达“水兵寂静”监狱。

我一来到这儿就被搜八了一番，很多东西被没收了。我脑海里开始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事，回想把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引到这个“可爱地方”的那段路。

……“明天 14 点整，国防部一架飞机从契卡洛夫斯卡娅起飞，不要迟到。”8 月 17 日在克格勃接待大楼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你能走一趟吗？应该向总统讲明国内局势的全部真相。签订新联盟条约势必会加剧紧张局势，引发冲突和内战。他相信你。”

最近一周我住在医院里，每天打点滴，自我感觉很糟。但是，对濒于崩溃的国家局势的担忧使我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是契卡洛夫斯卡娅。今天是 8 月 18 日，航空节。跑道上不仅有军人，还有普通群众。看得出来，飞行员们是在搞节日庆祝活动。几辆黑色“伏尔加”驶到一架飞机旁。我们同飞行员互相问候一句，然后就顺着又窄又陡的舷梯登上“图-154”飞机。这里没有通常那样的宽敞舷梯，是飞行员帮我们进入机舱的。巴克拉诺夫、舍宁、瓦连尼科夫和我坐进了这架苏联国防部的飞机。机舱中间摆着一个大桌子，旁边是两扇开拉式门，一侧放着一个大沙发，另一侧是舒适的单人沙发，边上还有软椅。我们脱去了外衣。有几个军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从门边走过，进入其他机舱。瓦连尼科夫下达起飞的命令。

发动机响起来了，飞机开始滑动，驶向跑道。飞机笔直轻松地离开地面冲向蓝天。我看到熟悉的莫斯科郊外，丛林、湖泊、蜿蜒的河流和别墅村。经过一阵急速的升高后，飞机开始较缓慢地增加高度。一片片白云遮住了大地，渐渐地只能从高空欣赏大地了：黄绿相间的田野、村庄，莫斯科郊外的花园和菜园。我们要飞行两个多小时。我开始思考我们这次举动。我们干嘛要到这儿来？干嘛非要介绍国内的严峻局势？

从 1991 年 1 月起，与日俱增的困难是戈尔巴乔夫圈子里经常谈论的话题。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总统对局势很担心，曾委托安全会议一些成员制定实施紧急状态的方案。他听过汇报，但至今尚未下决心。他数次会见中央书记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他们都向总统介绍了经济崩溃、国家有可能解体的情况。新联盟条约草案忽视了人民在全民公决中要求保持统一联盟的意见。

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内部的离心倾向在不可遏制地增长，正走向相互隔绝。当时出现一场法律大战，各共和国纷纷通过决定，声明本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法律混乱的局面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清楚，中央没有能力控制权力和领导国家。

军队和国防综合体的形势也在恶化。需要对核武器进行监督、经常检查和及时更换弹药，否则将会发生无法控制的事件。由于对生产核燃料、制造和更换弹药的工厂不够重视，致使这些企业出现停工、科技人员外流的现象。

一些著名的核科学院士向总统报告，核工业的未来没有安全保障。军队的情况则更糟。由于裁减军队，一大批军官无社会保障，无住房。经济继续下滑。同原料、配套产品供应商的联系中断。开始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煤炭、石油、矿产和其它原料、燃料的开采和供应量在减少。

与此同时，总统考虑的则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他担心自己威信扫地，所以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且帮助夫人出版回忆录，根据合同她将靠这本书获得大量外汇，还要再版……这本回忆录还计划在国内外出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经常打电话，四处询问她的“处女作”在哪家出版社出版更好。

总统一家人也在准备过困难日子，他们储备了不少外汇。戈尔巴乔夫个人帐户上已经有 100 多万美元，是全苏著作权代理公司帮他搞到的稿酬。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贵重礼品、各种用外汇支付的奖金和其它珍品。所有这些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心：总统会关心祖国的命运吗？他还有时间处理国家大事、关心经济形势和人民的社会状况吗？

最近一个时期，各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各级代表经常来信谈面临的困难，认为必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敲开总统的门，求见总统。但是会见常常毫无结果，他通常说：

“同志们，你们想办法吧，一切合理的东西我们都会采纳的。没有人影响你们工作，干吧！”

但是，他的话常使人感到他缺乏信心和害怕采取某种重要措施。戈尔巴乔夫渐渐地只会见外国人了。他们赞扬他，同他合影，仅此而已。既没有贷款，也不提供援助。甚至连在伦敦同七国首脑的会晤，除了西方首脑表示的良好愿望外，也是一无所获。

从 1991 年初开始，总统经常感到头疼的问题是自己在居民中不受欢迎了；而叶利钦的威信却在不可遏制地上升。为此、戈尔巴乔夫多次召集少数

亲信，讨论自己的前途：以后很可能实行全民选举苏联总统，用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威信？能否赢得选举的胜利？对能否在选举中获胜的问题，很多人谈起来都吞吞吐吐，但一谈到办法时，则说得十分明确：整顿国内秩序、同犯罪现象作斗争、遏制民族主义、阻止民族骚乱和流血冲突、改善工农业状况。而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方针，要搞市场，那就赶快行动，若用老办法，那就应坚持。通过这些会见、戈尔巴乔夫似乎又活跃起来，他开始不断地下达一些任务。

这里说的都是些具体问题。总统曾委托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和政府中其他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及经济学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帕夫洛夫负责制定反危机纲领，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过各种方案。但形势依然如故。总统始终没能果断地采纳改善经济状况、向市场过渡的纲领，不论是三百天计划，还是五百天计划。他的意志已经垮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能力采取重大决策了，他的精力只够应付同西方政治活动家频繁会见、写文章、准备答记者问。

有一次，在小范围讨论苏联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时，甚至出现过用“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办法来提高他的威信的想法。

“我们这儿受委屈的人、弱者和被孤立的人总是受到爱戴的。”当时有人这样说。但是这个想法似乎一闪即逝。

形势越来越清楚了，拯救国家的斗争早已变成维护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威信的斗争。但由于他没有能力进行大的变革，所以当时不可能出现积极的结果。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了。其实当时还没有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实行向市场过渡的方针。当时搞的不过是一场复杂的游戏。

戈尔巴乔夫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1985年，他根本不接受这些词，害怕这些词，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

当时进行了多次争论，证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当然市场是受行政命令体制限制的。旷日持久的、反反复复的争论使他逐渐明白了许多经济学知识，不过他大多是在报刊发表了相应的文章后才接受某一观点的。

总的说来，刚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很吃力的。不过应当承认，他接受思想很快，而且马上就能灵活运用，只是从他的个别用词上才能够发现他缺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

他学的是法律，但从未干过专业工作，始终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农业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看来对农业还是很了解的，曾毕业于农学院的函授班。到中央工作后，一开始他相当自如地运用了在边疆区积累的知识，后来又相当快地适应了、全国性事务，尽管这种越级晋升使他在知识水平和工作经验方面出现很多欠缺。1982年，安德罗波夫调到中央后，开始让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政治局的工作，于是戈尔巴乔夫接触到更广泛的问题。但我发现，戈尔巴乔夫特别爱写文章，他认为“说”是自己最主要的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

一般情况下，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总是说：

“应该写篇文章或写本书。来起草个大纲吧。”

甚至在从福罗斯回来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还在说自己在休假期间就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有人想搞政变的问题。其实，休假前要写篇文章也并不

不是件难事。

凡是和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的人都知道他善于摇摆，都知道形势的严峻。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内战和破产的边缘，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整顿。苏联总统被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逼进死胡同，被迫接受各种条件，甚至在人事安排上也要受他们的影响。在休假前不久，戈尔巴乔夫突然问我：

“你知道我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吗？他们要求解除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职务，不让这些老头子乱插手。”

我对会见并不感到惊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会见，使我惊奇的是戈尔巴乔夫说的这番话。

“我听到的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你们在讨论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的问题。”

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赶紧说：

“无论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我都不会出卖给这些领袖们的。我宁愿同他们一起下台……”

我明白了，戈尔巴乔夫最关心的是克留奇科夫是否知道他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会见。如果克留奇科夫不知道，那么戈尔巴乔夫希望我能把他拒绝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要求的话转告克留奇科夫。但是由于我说了准备撤换克留奇科夫的事，戈尔巴乔夫便极力让我相信“瓦洛佳”同他的关系比朋友还深一层，有人散布这些谣言，是想挑拨他同战友之间的关系。他还说出了一些应该让克格勃主席憎恨的人的名字。

两三年后，我从克留奇科夫那儿了解到，他根本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谈话的内容，也不知道苏联总统背地里整他的事。

我刚一说到可能任命巴卡京为克格勃主席、取代克留奇科夫这件事，戈尔巴乔夫就忙不迭地解释，说这是谣传。他的主要论据是巴卡京在内务部没什么建树，许多有经验的干部都反对他，他在选民中也没有威信，选民知道这个人的价值。

“不，不会的，你千万别这么想。”戈尔巴乔夫劝我。

但是，他越花言巧语地辩解，我就越确信心自己说到点子上了，无风不起浪。

8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通过一次电话，当时正在积极筹备签署新联盟条约。我虽然有病在身，但实际上每天都得去监督条约文本的准备情况，还要准备一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纸、文件夹、各种盒子、笔、墨等文具和50多根旗杆。恰在这时，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他嗓门很高，怒气冲冲地询问各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开会的情况。我无法给他明确的答复。首先因为我不知道会议的情况，其次他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安全会议成员和助手。

“你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分立主义，这是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地方官来决定国家大事。这是阴谋！我绝不会放过这件事，我要立刻采取措施……”

飞机开始下降。下面是一片片收割过的灰黄色的田野，零零星星的村庄，烟尘笼罩的厂房，公路上往来穿梭的汽车。后来，眼前出现大海。12年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海。飞机在降落，起落架放下时飞机抖动了一下。

前面就是飞机场，一排排重型军用飞机整齐地排列在那里。“图—154”

接触跑道后，发动机开始减速，飞机向机场大楼滑行。这是别尔别克军用机场，离塞瓦斯托波尔不远。舷梯准备好了，我们走下飞机。一队海军和空军军官在那里迎接我们。他们向瓦连尼科夫作了汇报，同我们简短地、几乎不着对方一眼地互相问候一句。我们走进机场候机楼。这是一座新建筑，装潢考究，面积不大，两侧有很多房间，中间是一个大厅，这是专门用来迎接到这儿来休假的贵宾的。

陪同我们的军官说：“不久前，我们就在这儿迎接戈尔巴乔夫和共和国领导人。”

已经四点多钟了，必须抓紧时间。几辆黑色和亮灰色“伏尔加”开过来。我们坐进汽车，向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向福罗斯驶去。

我前一次到塞瓦斯托波尔和福罗斯是在1963~1964年，那以后就再也没来过。现在又看到了熟悉的街道。陡峭的山上有一个个凿出来的崖洞，大战时，这里是医院、仓库和指挥部。天气很暖和，但雾气腾腾看不到太阳。当大海出现在眼前时，我一时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海，海天连在一起。我们的车沿着海边又开了35分钟，眼前出现一幢红顶建筑。

这便是苏联总统的夏日官邸。我们离开大路向右拐，便驶进官邸区。大门口站着几位身材魁梧的士兵。

汽车驶向接待大楼。我们走进去。这是一座两层楼房，设计考究，建造坚固。宽敞的前厅，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克格勃九局局长尤·谢·普列汉诺夫上去通报我们的到来。但是，房间里没人，也许是不急于见我们。半小时后我们又来到别墅前厅等待。这座别墅很大，一层楼两侧都是房间。这儿有好几个宽敞的大厅，前面的一于大厅面朝大海，其余的是套房、餐厅和暖房。这儿的一切都非常豪华，完全是按照庄园的风格建造的，即使按那个时代的标准也够宏伟的了。用的全是我从未见过的进口材料，一句话，福罗斯城堡是一个“建筑精品”，其豪华程度、造价和建设速度都是创纪录的。

大约10~15分钟以后，戈尔巴乔夫来了。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什么问题？”

上面这番话是在往办公室去的路上说的。办公室不大，但很舒适。一张小桌子，座位背后是窗户，稍右一点还有一扇窗户，对面的墙边放着两把椅子。戈尔巴乔夫在桌后的软椅上坐下来，舍宁、瓦连尼科夫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其他人就坐在窗台上，普列汉诺夫不在场，戈尔巴乔夫已不客气地把他请出去了。

“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

昨天大家在商量向总统报告的问题时，谁也没料到会得到这种反应。大家都以为彼此会饶有兴趣地讨论问题，同以往这类会见一样，能够得到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可现在谈话一开始就不顺利。我站在窗户旁边，望着总统。他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不知是神经炎，还是软骨病，或是全身不适使他这么难受。不管是因病还是其他原因，反正在休假这段时间里，他的举止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许是瓦连尼科夫的到来使他感到意

外，因为瓦连尼科夫以往从未参加过讨论实施紧急状态、稳定局势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到他别墅来的缘故。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又问了一遍。

戈尔巴乔夫听到我们说来的人大都是他以前约请制定应付紧急情况措施的人后，情绪缓和了一些。

“就这些人吗？”他问。

“是的，就这些人。”

我觉得，他害怕听到来人是代表俄罗斯领导人的。他最担心的是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谈，他认为这是某种阴谋。

“那么，你们想说什么呢？”他已经平静下来，问道。

“我想先从国内形势谈起。”巴克拉诺夫开始讲。“您知道，农业和工业的情况都很糟糕，可我们却在抓别的事情。”

“你说什么？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比你更清楚。”

他没让巴克拉诺夫说下去。这时瓦连尼科夫接着说，他以其特有的果断风格谈国内和军队内的局势。他说，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人民、军官、整个军队、军队的备战能力都将面临重大考验。但是他的谈话也被打断了……于是我又讲了一些大概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的事：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们没参加讨论的新条约。

“说得具体点。”

我们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几套方案，都是根据他的指示制定的应付紧急情况。中心内容有秋收期间总统在一些地区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经济，确切些说，就是制止生产水平继续下降。这些措施由总统委托内阁或他信任的人去实施，但他对这些话没有反应。总统好像在想别的问题，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到完全放心了。

“你们提出的这些方案最好能以充分民主的方式实施，因此，我建议先做那些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便是心平气和的事务性谈话，而谈话基调变化的内涵我并未一下子捕捉到。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认真地谈了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和他为什么持这种态度。

“你们考虑考虑，向同志们转达一下我的意见。”他说。

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

“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孙子们坐在前厅里。

“带来的是好消息吗？”她问巴克拉诺夫。

巴克拉诺夫走近她，对她说，带来的是美好的愿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们只谈了些国内局势问题。作为您的朋友、我们祝愿你们家万事如意。

我们走出庄园，大家对这次谈话的过程感到惊奇。

“他不久前还认为实行紧急状态是唯一的出路，现在怎么变了？”巴克拉诺夫失望他说。

“那么你想让他这种大人物当众说‘行’吗？”

“即使对并非这样微妙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也从不说不行或不行，他通常是用一些感叹词，用沉默或转移话题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以免打击积极性。”我们对刚才的会见互相交换着看法。车来了。只好打消想游泳的念头。

头。天开始黑下来。

汽车开上公路。回去的路好像短了很多。

在别尔别克，飞机已经做好起飞的准备。我在候机楼旁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我发现大家都已经上了飞机，几位送行的军人也道别后离去了。我这时才登上舷梯。飞机滑行了好一阵，在起飞前稍停了一下，然后就在发动机的呼啸声中冲向跑道，接着是快速起飞和升高。天已经黑了，大地突然消失在暮霭中。不知是海上，还是陆地上仍闪烁着微弱的灯光。

再过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到莫斯科了，到时会有人给我们端茶和糖来，可我现在既不想吃，也不想喝。

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时，天已经全黑了，又冷又潮。等候在机场上的车一开过来，我们就赶快坐进车里。普列汉诺夫不时地催促司机：“开快点。”但是这些汽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在红村街附近有辆汽车的轮胎爆了，真是快到家了还出事。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去修理，很快又上来一辆空车把我们接走。10~15分钟后到了克里姆林宫，我们走进政府大楼，上到二层。走廊里有很多人，大多是卫兵。

我走进办公室。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中，我看到有几个人正坐在一张铺着绿毡子的长会议桌旁。我先看到亚纳耶夫，然后才看到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我在桌角旁坐下来。舍宁在报告情况，他来得稍微早一点，已经加入到谈话的行列中。服务员送来茶和面包。我开始注意听。舍宁讲话既稳重又有说服力，他谈了见总统的事。亚纳耶夫请其他人补充。巴克拉诺夫补充了几句，但是没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意见。我没什么补充的。

在场的人激烈争论起来，焦点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突然拒绝实行紧急状态怎么办，大家意见不一致。有人说：

“既然总统下说‘行’，也不说‘不行’，干脆一切还照旧吧。”

“那么你是想让他向全世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吗？指望他这样做，那可太天真了。这种事情一般都不会这么处理的。”

“但是决不能让国家继续垮下去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或许，还是不让戈尔巴乔夫出面为好，免得损害他的国际威望。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来。”

不断地有人进出办公室，不断地响起电话铃声。大家都在等待着，不停地找人咨询和商议，不断地有人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来。

时间已是午夜，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糟。我离开病房这么长时间，医院里恐怕也乱了营，我起身回医院去了。

8月18日，我所喜欢的航空节过去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究竟作出了什么决定。我一点都没料到，这会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平静的日子。我当时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一些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承担起那么大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则那么卑鄙地落井下石。

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一切，那你就永远也不要说已经了解了生活和人世。

我一向不能容忍那些阿谀奉承、投机取巧的人。我认为，拍马屁的人或者能够拍马屁的人，往往就是落井下石的人。我是否可以不去福罗斯呢？当然可以，完全可以。我已经住院一周了，而且感觉很不好，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一切活动，但是我深知国内局势的严重性，联盟眼看就要解体了，我无权对这一切袖手旁观。我经常会见拥护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有些甚至是戈尔巴乔夫最信任的人。戈尔巴乔夫委托我同他们见面，帮助他们工作，



所以他们的意见我是了解的，况且这时国内局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我是充满信心去的，并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会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奇怪，况且他自己也经常说必须实行紧急状态。当他得知以叶利钦为首的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会见时，就称这次会见是阴谋活动，打算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至于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想不顾全民公决的结果搞垮苏联，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但是当时的确必须扭转局势，阻止联盟解体。

……我从惊慌中醒来，打开电视，一切全明白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告成立，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国家安全会议的其他成员接管国家政权。播音员缓慢地、以一种忧伤的语调宣读着这一文件。

我的第一个欲望是赶快去工作单位了解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医院里要进行例行的治疗检查。我到单位时已经很晚了，街上是摩托化部队和坦克。有人对我说，亚纳耶夫找过我。我拨通他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电话。当我来到苏联副总统接待室时，看到那里已聚集了很多，不时有人被叫进去，有人从里面出来。我没有通报便走进，在办公室墙边坐下来。没有人注意我，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在经济方面要采取的措施。不知为什么，帕夫洛夫不在场。

亚纳耶夫不时地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同一些人通电话，不时地接待一个又一个人。大家都在忙，这时你去询问自己该于什么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接待室也聚了不少人，我把各部门头头召集来，告诉他们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广播和电视中时不时播放着低沉的音乐。我开始整理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文章手稿、书信、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稿，这些东西我一直没时间处理，有的要销毁，有的要存档。看来，除了克留奇科夫以外，谁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同他又一时联系不上，我很快回到医院。

我们国家的生活发生了最富戏剧性的变化。电视播放的内容也开始出现变化。

我得知，戈尔巴乔夫中断休假，正在从福罗斯赶回来。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巴克拉诺夫、伊瓦什科，后来还有俄罗斯代表团飞去“解救”他，他们演出了一幕拯救总统的戏。总统扮演的是一个可怜的受迫害的角色。他看上去邋邋遢遢，穿了一件粗布上衣，可能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谁也没把他关在福罗斯别墅的地下室里呀？他扮演可怜角色倒是很成功。但是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他已经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威信了。看来，总书记及其家人把角色扮演得过头了。在他的讲话中，在戈尔巴乔夫家人及随戈尔巴乔夫一起去休假的作家杜撰的那些离奇故事里，不自然的、牵强附会的东西未免太多了些。

有人在夜以继日地突击起草所谓的戈尔巴乔夫被囚时写给国际社会的呼吁书，据说，曾物色了一位年轻的女信使，为保险起见，她按照足智多谋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建议，将写好的文件从一个秘密地点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地点，以迷惑那些可能知道隐藏呼吁书秘密的契卡人员。还有一个备用计划，打算让一个泅渡能手把呼吁书送到雅尔塔或敖德萨，然后交给可靠的人。

世界各国人民和美国总统都是通过秘密渠道才了解到戈尔巴乔夫没有参与策划这场“阴谋”，但是，正如后来很快就尽人皆知的那样，当时人们就不太相信这些故事。

早晨，仍旧是有限的几条电视新闻，电话仍然不通。我明白了：时候到了。我在“水兵寂静”监狱又呆了几天。一天过去之后，接着就是漫长的早秋之夜。

## 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

### 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记忆中的很多事是忘不掉的。思绪万千，难以平静，记忆库中的往事不断涌现出来。过去的事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所有的细节、色彩和场景都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我同戈尔巴乔夫——这个我国历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物第一次接触的情景。我和千百万人一样，希望对社会进行变革，因此与此有关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大家都相信，没有民族冲突和流血、没有难民和贫困、国家不解体、军队不分裂、没有敌视和仇恨也能够实现美好的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同戈尔巴乔夫开始 10 年共事的那个日子，这一天一次次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一切都是从一阵电话铃声开始的我拿起听筒。《真理报》总编助手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波波夫简单地问候一句之后说：

“维克托·格里哥里那维奇请您来一下。”

我感到惊奇。刚刚开过编委会，对我们部门的材料没提出什么意见，而且阿法纳西耶夫自从当上总编后已经不喜欢聊天了，看来是有别的事。另外，这个时间也不同寻常，三点钟以前他根本不接待任何人，他利用这段时间写自己的书。自从在滑水运动中负伤后，他一直在一张斜面书桌前站着写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坐着，始终穿着治疗背心，只好站着用他那支粗笔快速地写完一页又一页。

现在突然来了这么个不同寻常的电话和邀请，我下到四层。几十年来，《真理报》总编室一直在这儿，离电梯不远。20 年前，当我还是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经济系四年级学生时，就到这儿来工作了。当时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在小报上发现了我。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人们把大学生办的报纸称作小报。我当时主持青年部，小报上绝大多数材料都是我们部搞的。我自己写了很多文章。还去学院毕业实习的企业单位采访，介绍他们的工作。在中央一级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物上也发表过文章。总之，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到自己酷爱的这项事业上了。

当听到让我为《真理报》撰稿的建议时，我既感激，又紧张，而且还有点提心吊胆：“我能行吗？”不过，我马上提出条件，不通过毕业答辩，我不能正式来工作。其实，这个想法同报社的意见是一致的，报社需要的是既有文凭又擅长写作的专家。

1960 年秋天，我到《真理报》就是在阿法纳西耶夫邀请我来的这个办公室同总编谈话的。那时的总编是帕·亚·萨丘科夫。等待接见的的时间很长，他们向我解释，总编不在，他在党中央“同赫鲁晓夫讨论文件”。午夜 12 点以后，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才回来，他立刻将我让到屋里。他时不时看我一眼，提一些问题，多半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农业和工作方面的。他翻了翻我发表的作品，简短他说：

“我知道你打算完成学业，我支持你的想法。这样吧，我们安排你到报社农业部当撰稿人，以后晚上如果有空，常到《真理报》来体验体验生活吧。”

我的记者和政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我又一次走进总编办公室，这里多年来没什么变化。阿法纳西耶夫站在斜面书桌前，桌上放着一叠写满字的稿纸，他抬起头来说：

“ 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让我放你去给他当助手。怎么，你认识他？ ”

我惊奇地望着阿法纳西耶夫：

“ 不认识。 ” 我回答说。 “ 我甚至没有在近处看到过他，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

阿法纳西耶夫疑惑地望着我，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 也许你们在斯塔夫罗波尔见过面。 ” 他猜测道。

“ 没有，我没去过斯塔夫罗波尔，我去矿泉疗养院休过假，但是没见过他。 ”

“ 算了吧，反正都一样。 ” 他皱起眉头，把灰白的长头发往后梳了梳，斩钉截铁他说：

“ 我已经对他讲了，人我是不会放的。我这儿哪还有人？他们把人都调走了，《真理报》社很快就要空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

他开始逐个数提升到其他报社和杂志社、调去干党务工作的记者的名字。

“ 总之，你要知道，我不会放你走，如果需要，我会申诉的。 ”

他在盘算谁能替他说话，米·瓦·齐米亚宁不行，他只是个中央书记。我不信他会去找勃列日涅夫，他知道这样做不严肃，因为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不佳，这一点《真理报》的人都清楚。

“ 找苏斯洛夫。 ” 他突然冒出一句。不过我知道，阿法纳西耶夫同苏斯洛夫没打过什么交道。

“ 或者找基里连科。 ” 他又自信地补充了一句，随后就不言语我很惊奇。我望着阿法纳西耶夫，琢磨着他说的话。我不认识戈尔巴乔夫。这些疗养院的书记是命运的宠儿，我根本不喜欢这种人，这些人整天围着休假的领导转，为的是得到他们的赏识。我热爱《真理报》，尤其热爱记者工作，不想去办事处工作，《真理报》的人都把中央委员会称作办事处。我知道，助手的工作不是人干的活，工作最多，挨骂也最多，而且是人家的私有财产。

“ 你给卢西科夫去个电话，这是他的助手，把我们商量好的意见告诉他。 ” 阿法纳西耶夫最后说了这么句话。

他没有再往下讲，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反正我不去打电话，只能等待，也许这个问题会自生自灭。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几天之后，卢西科夫亲自打来电话。我们认识，虽然不很熟，但见过面。有时他以中央书记库拉科夫的助手的身份，让《真理报》针对一些问题发表文章。

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 有礼貌地问候一句并询问了一下工作情况，其实他并不关心你对他询问的答复。他说，戈尔巴乔夫同阿法纳西耶夫谈了，要对我的工作做些新安排，但是阿法纳西耶夫不放人。他问我有什么考虑，答案我早就准备好了，这是许多党的工作者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我回答说：我很喜欢报社的工作，没打算换工作，但是如果中央有其他决定，那我很难坚持己见。卢西科夫不说话了。

“ 好吧。 ” 他同我结束了谈话。

东方哲人说得好：上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发现了你。

几天之后，我被叫去见戈尔巴乔夫。老广场、苏共中央大楼、六号入口、

八层，我没用等候，直接走进中央书记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顶棚很低，窗户上装着百叶窗，房间里散发着一股异味。整幢建筑里都有塑料的味道。

一个人站起身迎面我走来，中等身材，文雅端庄的脸庞，丰满的双唇，一双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但已经秃顶，剩下一圈灰白的头发，看得出曾经长过头好发，秃顶上露出几块深红色的胎痣，一直漫到前额，伸向眉宇间。除此之外，我没发现他的外表还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

我记得，他穿着很讲究，一身咖啡色西服，内穿一件进口的、大概非常昂贵的淡黄色衬衫，系着一条咖啡色领带，脚上登着一双咖啡色皮鞋，这套装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前天才缝制出来的，尚未出褶。

他像是奖赏对方似的伸出软绵绵的、缺乏力量的手。他在我面前踱着步。

“我们好像……”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话了。但是我马上接过话茬儿：

“没见过面。”我打消了他的疑虑。

我们坐下来，谈话涉及的是一般农业问题。随后，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了一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他要听听我的意见，他问我愿意抓哪方面的工作。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是阿法纳西耶夫被迫同意放我了呢，还是像对待我一样，根本就没有再征求他的意见。不管怎么样，有些要求我还是要提的。我说，我现在在国家计委高级经济讲习班兼课，我不想放弃这份工作，另外出版社在准备出版我的一部书，我还有一些文章尚未脱稿。

“这好啊。”他表示同意。“这对工作是有帮助的。”

当时我哪里会知道，他这个态度维持了不到一个月，此后他那爱嫉妒的心理就根本不容许我写文章，特别是兼课了。而且当时中央内部是严格禁止兼职的，那时的看法是，应该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一份工作。

我就要糊里糊涂地离开了，尽管我最终也未说一句同意。晚上，阿法纳西耶夫不好意思地说，给他施加了压力。但是早晨他在编委会会议上还激动地说，《真理报》的人都快抽调光了，他对这件事不会就此罢休的。不过他也没说哪些人他不放，看来，他至少同齐米亚宁商量过。但是经验丰富的齐米亚宁建议他“不要吵架”，他应该很清楚，不是光从《真理报》抽调干部，也经常有一些在中央工作过的干部被派到《真理报》来。

我在报社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我对此一直很惋惜，并希望有朝一日情况变化了，我还能再干记者工作，而且回报社干哪一行都行，因为《真理报》社的创作气氛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现在我的未来却让人感到模糊不清了。

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想到，适应新环境会如此困难，自己的一些传统习惯简直无法改变。我只清楚地知道一点，前面是暴风骤雨和无情的斗争。当时的形势和社会中聚集的不满情绪都预示了这一点，显然，狂风将伴随着大雨、甚至暴雨而降临，在急流险滩中能否保全自身、干一些对事业有益的工作呢？

## 濒于崩溃的经济

一个白天过去了，一个夜晚又过去了，我的思绪陷入一片梦幻之中。我觉得，这是在做梦，我很快会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睡醒，只不过因恶梦而受到点惊吓。我还试着碰碰墙壁和铁床架子，但这的确不是梦，就如同我不是罪人一样。我失神地睁着双眼躺在那里，往事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一幕幕地

闪过。

1981年5月，我开始到新单位上班，每天早上九点，常常更早一点儿，我就来到单位。我上到第八层楼，走进那间不大的办公室，室内空气潮湿，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用合成纤维材料装修的。在这春风和煦的5月里，空调器驱赶着似乎有数百人呼吸过的污浊空气，我也闻到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于是，我打开换气窗（尽管不提倡开窗），开始处理文件。我必须把自己已经荒疏的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再捡起来，因为我以前从事的是与农业生产联系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现在各种表格摆在我的面前，上面标有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饲料供需情况及很多其它的统计数据。这些事情其实最好由农业部及其地方机构来管理。中央农业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数十名农学家、畜牧学家、农业化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他们都在基层长期工作过，现在负责为农民提建议。

农业部由弗·阿·卡尔洛夫领导，他是一位精干的、因循守旧的人，曾被“发配到”乌兹别克，任乌兹别克中央第二书记。现在他主管苏共中央农业部，在确定农村的农业政策方面他有很大决策权。他管辖的这个机构决定着农业发展中的所有变化，负责为中央和地方农业部门及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组织中的农业主管部门选配干部。

我不知不觉被卷入这部机器的运转中，时刻关心着它的利益，在这个机构及其干部几十年来形成的文海中挣扎。我仿佛是一粒沙子，被巨浪卷起后，努力抗争，以免被吞没。

1981年。干旱。它造成的严重后果还将长期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这次干旱使农村乃至全国的经济遭到致命的打击，国库被刮空。

中央政治局、书记处、苏联部长会议面临着严重的局面：想尽办法寻找资金购买粮食。我顺从地、但并非很有信心地准备着各种材料和文件。此时，我同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什么接触，尚缺乏相互了解。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被农业部机关牵扯到农业生产的一些技术性琐事之中：作物栽培、新耕作法、牲畜饲养、饲料准备以及一些在我看来并非重要的其他琐碎事务中。在这方面我们相互间缺乏理解，我觉得，还经常出现彼此轻视的苗头。我认为他只是埋头从事猪、禽饲料之类的事，他则埋怨我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我认为处理这种事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浪费时间，更何况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呢。依我看，农村发展中出现混乱的原因在于其他方面。

有一次，中央候补委员、《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尤里·朱可夫约我就农业形势问题进行一次重要谈话。他接到许多读者来信，他问我，生产停滞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人们纷纷离开农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赞同他的看法，农村人确实干得不起劲，农民对农村工作缺少应有的关心。此外，粮农需要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短缺品。但是，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农业方面，而在于总的经济形势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并不重视生产的发展，农民有了钱也没处花费。例如，他不可能购买或建造房子，因为建筑材料短缺，农村人也不能购买冰箱或放心使用冰箱。他出售粮食、肉类或其它食品是亏本的，这是价格政策造成的。

这个观点是我通过无数思考和争论后形成的，其中包括我对著名农村题材作家费·阿勃拉莫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的思考和争论。

阿勃拉莫夫回老家——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皮涅日区走访，认为那儿的情

况一团糟，于是通过报纸“抨击”自己同乡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和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对这封针对农民的来信感到非常气愤，在编委会上要求撤掉这封来信，以免败坏了这位著名作者的声音。我说，不是那儿的人不学好，从罗蒙诺索夫时代开始他们自己并没有学坏，是我们把他们教坏了，让他们脱离土地，看不到切身利益。作家写道，不远处的芬兰人每年的收成都比我们高一至两倍，牛奶产量高出很多，肉类产品丰富，而我们皮涅日的农民却要到城里去买香肠。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只要有芬兰人那样的工作条件和利益机制，阿尔汉格尔斯克人不会比芬兰人干得差。

我当时的观点非常鲜明，编委会里许多人支持我。但是，这封信还是发表了。阿法纳西耶夫唯一能够做的是，在措辞上缓和一下阿勃拉莫夫对自己同乡的批评调子。后来，这还引起了作家和《真理报》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只不过木已成舟了。当时，我对这样处理这封信感到非常气愤。我发现，许多领导人根本不了解局势的症结所在。于是，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商定组织一组文章，明确指出是生产关系和我们那些僵化的经济观念把农村引进了死胡同。

这批文章写得非常尖锐和坦率，受到许多人的重视。

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后，新领导人上台五年来，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勃列日涅夫走上政治舞台后，抛弃了前任领导人许多没有成效的思想，所以，新总书记上任的最初几年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常言道，新官上任，新班子上马、有助于形势的改观。

这种改观的局面出现在1964年，当时推翻了很多教条的东西。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及各地都涌现了一大批积极进取的干部，他们十分了解现代化生产，愿意进行改革。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在经济部门担任要职。

某种思想在实际贯彻以前，通常要经过专家和学者的一番推敲。于是，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和自我补偿为内容的经济改革思想在柯西金班子中酝酿成熟了。这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创新的决策占据主导地位的难忘时期。尤其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1965年3月的中央全会是农业发展和农业政策新思想的一个典范。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独具特色的繁荣时期太短暂了。几年过后，生产发展速度开始减慢，又过了几年，生产完全停滞下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改革的思想逐渐被取缔。

应该公正地讲，当时远非所有地区和部门都出现生产停滞和下降的现象。这一时期，许多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住宅建设和社会生活设施建设的速度是很快的，建成了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以及一批新的核电站和水电站。在许多知识领域中，科学取得卓越成果、文化得到发展，教育事业得到完善。燃料动力部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迅速。遗憾的是，基础部门的发展并没有对经济效益指标的改善产生多大影响。

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极其严峻，相当一部分工业和建筑安装企业亏损。机器的技术状况则更糟：40%以上的机器设备的损耗程度超过50%。干部队伍不稳定，基金增值率降低，为此国家每年损失10亿卢布以上的产值。无人经营、无人负责现象十分严重。80年代中期，每年有130多亿立方米的伴生气白白烧掉。闲置的国产和进口设备数量不断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设备已失去任何保障。

劳动纪律极其涣散，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旷工。同时还应指出，产品质量也在逐年下降，大量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被浪费掉。农村得到的机器设备都是一些不经过一定的劳动消耗就无法使用的设备，为此产值的损失占生物收成的 1 / 3。

人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无人经营的局面，因此不可能还有工作热情。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购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多。国内局势极其严峻，必须采取果断和慎重的措施来扭转局势，振兴经济。

但是，当权的领导人无所作为。大家看到，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萎靡不振，一事无成。在一些大型党组织和社会阶层中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吃喝之风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影响极坏。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向客人赠送礼品总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以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参观“纪念品”。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经常提到他当时如何苦于接待无数前去度假的客人、想方设法款待客人和馈赠礼品之事。

同破坏法制的现象作斗争是极其困难的。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在开会前，发给每人一份梅杜诺夫抱怨检察院对库班人有成见的短信。书记处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我虽然知道很多书记倾向于支持梅杜诺夫，但还是天真地向戈尔巴乔夫谈了我所了解的这位疗养区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戈尔巴乔夫听我讲完后，一言未发。其实，他对所有这些事都是了解的，只是不想“插手”而已。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时形势很糟糕，可见在这件事上苏联检察院多半是对的。但是书记处成员，首先是苏斯洛夫，却并不想支持检察院。

这件事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时隔不久，边疆区滥用职权、行贿受贿之事就得到了确证。许多州和共和国都存在这些现象，这也是后来人民对党失去信任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当时的形势要求党去探索扭转局面的途径，必须制定新的工作原则，必须要有新的工作态度。

### 改革是如何酝酿成熟的

1981 年底，我同戈尔巴乔夫进行过一次坦率的谈话。那天天色已晚，他请我去他那儿准备一个报告。他一边翻阅文件，一边谈论农业和全国经济中的各种困难。我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就把近几年思考的问题，一股脑儿都同他谈了。我们谈到全面发展的新思想和新途径问题，戈尔巴乔夫也畅所欲言，让我考虑一下应该吸收哪些人参加经济发展新思想的研究工作。当时列出一个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名单，其中很多人都是我熟悉的，我还认识一些思维敏锐的企业领导人。诚然，我当时曾提醒戈尔巴乔夫，同这些人经常会见肯定会引人注目，而且，这样做是有阻力的，因为一般经济问题涉及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职权范围，他们会用嫉妒的眼光来对待这件事，不愿意让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务。后来果然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同学者和专家的会见还是开始了，而且这种做法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经常亲自或通过我邀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工资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和许多其他专家来谈话。总之，这样的会见很快形成一种惯例，经济学家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儿聚会成了一种独特的仪式，几乎所有经济研究所的



所长、院士、高等院校著名学者都参加过这种会见。这也是一所独特的学校，戈尔巴乔夫在这儿接受培训，了解情况，学会运用政治经济学术语。

当时农工综合体的形势继续恶化，戈尔巴乔夫对形势非常担忧。他在探索一条至少能够达到中央三月（1965年）全会以后那种效果的途径。此时，他已不可能研究更多问题，农业工作者越来越明确地提出制定粮食纲领的主张，筹备召开研究最重要的农业政策问题的中央全会。

这项工作很快便开始了，苏联农业部、国家计委的许多专家和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学者承担了粮食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戈尔巴乔夫委托吉洪诺夫、尼科诺夫和卢基诺夫院士对这一工作成果进行汇总。我认为，这是一项空洞的事业，是用响亮的词句显示工作成果，是一项旷日持久和耗费精力的工作。

当时能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再次向农村投放资金，勾销债务，提高收购价格。对此，戈尔巴乔夫同苏联部长会议，尤其是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对财政部长说，如果把一部分钱用价格补贴的形式发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比每年勾销他们的债务要好，这样可以促进商品产量的提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共识。中央全会险些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多亏了勃列日涅夫（当时斗争的实质已经涉及到他），他对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说：

“我绝不空着双手登上中央全会的讲台。”

这才改变了形势，但是实际生活不久便证明，对农村来说，这种做法已无济于事了。

同以往一样，到处寻找资金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购买粮食。1981～1982年，由于购买的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对此表示愤怒：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倍，还是进口大量粮食。按照当时的传统，外贸系统的工作人员由于这种业务而获得大量奖赏，有的人甚至当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与此同时，我国和外国的轮船却接连几个月停泊在那里，不能及时卸货，粮食在霉烂，有时又无货可卸。

当时根本不考虑钱，人们既然得到奖励，也就不能把那些不是用最低价格购买来的粮食在变质和霉烂、大批粮食被毁掉的事讲出去。特工机关经常向领导汇报这些情况。所以讲话是要担风险的，而不说话是最保险的，否则就有可能蹲班房。那些真正犯罪的人却可以逍遥法外。

1982年秋天。统计结果表明，本年度粮食还是不够。戈尔巴乔夫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农业问题中，他在思考如何再次从国外购进粮食，如何搞外汇。这是他担任主管农业问题的中央书记的第四个年头。他越来越清楚，他根本无法改变农村形势，无法摆脱向国外购粮的事实。此外，戈尔巴乔夫开始意识到，农业政策的失利将会永远葬送作为政治领袖的他。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摆脱面临的问题，让世人关注他的创造活动。戈尔巴乔夫热衷于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因此，当新闻社来约一部书稿，要说明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而获得的热量已超过这些国家时，我实在感到惊讶。

的确，几十年来，国内的粮食生产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世纪以来，每逢歉收，俄罗斯都发生饥饿现象。本世纪也有过这种情况。地主、大粮商把粮食卖给欧洲，而俄国人却在忍饥挨饿。这是事实，不应该掩盖真相。但是，如果说形势已经改观，粮食纲领将会把福利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至少是把愿望当成了现实。至于把我们的饮食水平同英国相对比，这类问题最好别谈。

我把这些想法部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可他仍然让我写书。我只好收集资料、研究文献，同时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多地让我参加起草会议文件的工作。

我越来越惊奇，戈尔巴乔夫工作时间那么长，他阅读大量资料和各种文件，并能记住很多统计数字。他能够自如地运用从专家和学者那儿听到的东西。那些年，戈尔巴乔夫成长相当快，即使是在自己最不内行的文化工作方面他也有很大进步。他家好像把接触文化当作一项任务，夫妇俩每月总要看两三场戏，参观莫斯科周围“金色环线”上的名胜古迹，但他很少谈这些事，通常不同别人交流观感，对演员的表演也不作评价。总之，家里的事和一般人际关系，他们是从不对别人讲的。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是9时上班、21时下班，努力工作，争取升迁，得到承认。

戈尔巴乔夫仍然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常换西服，挑选衬衣，时髦的领带和考究的皮鞋。他这么讲究衣着常使我感到惊讶：工作这么繁忙，还能每天换领带，没忘让领带同衬衣和西服相配套。透过这一切，我仿佛看到一个穷孩子因内心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渴望补偿这一切的心理。

1982年11月初，党中央内部形势紧张到了极点，国内局势也令人十分担忧。虽经多方面努力，政治局许多决议仍被束之高阁，得不到贯彻落实。人们对一切都不信任，盲目等待着发生重大变化。

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已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地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和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

岁月无情地改变着人们。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1964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的勃列日涅夫，他身材魁梧，体魄健壮，开朗，风趣，能背诵很多诗歌，爱说俏皮话，经常妙语连珠，是一位真正的乐天派。

1965年，当乌斯季诺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时，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地从自己办公室出来，下了两层楼，特意去看看乌斯季诺夫的新办公室安排好了没有。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大家看到这一切，都为总书记的民主作风感到欣喜。据他身边的人讲，当时勃列日涅夫非常平易近人，经常给自己的战友、各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打电话。他对自己身边的人——助手和秘书们非常宽容和友好。早年在哈萨克工作时，每逢到野外游玩时，总要带上助手和警卫人员的家属。直到生病前，那些战友可以随时来看他。

但是，由于疾病缠身，年老体弱，他衰老了。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仍然担任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等多项职务，但实际上这些职能都多半由他身边的人去履行。

对作战奖励的追求成为他的一种癖好。熟悉勃列日涅夫的人向我讲述过一件事：在他生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当得知准备授予他的不是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他不久前曾得到过这种奖励）而是勋章时，他竟哭了起来。于是有关人员只好临时作调整，宣读一份似乎早已拟就的最高嘉奖令，尽管此前

的决定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这对党和国家来说也是一种不祥之兆。我不敢肯定那是毒品，可有些专家说，它们的药物作用是相似的。服药后不久，他便陷入一种呆滞状态，这的确是事实。开始时，医生想借药物来改善他的自我感觉，但很快他就对兴奋剂上瘾了，且成了一种经常性的病态行为。列昂尼德·伊里奇向医务人员要的剂量越来越大，医生多次告诫他，这种药对身体有害，甚至还尝试着用形状和颜色相似、但不含毒剂的药片来蒙混他，但他竟像猫逐腥味一样追求真货。大概后来他终于识破了蒙混他的办法，于是开始通过其他途径搞药。安德罗波夫让保安人员把他口袋里多余的药都掏出来，并监视他服用什么药。可是，勃列日涅夫又开始从外交和外贸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搞药。后来，谢洛科夫、茨维贡、吉洪诺夫等对他唯命是从的人都帮他搞药。周围的人都能看到总书记这种昏昏欲睡的半麻木状态。

其实，远非所有的人都真心实意地关心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健康，他的战友们需要的是一种象征。他们联合起来拥护他，甚至处心积虑地吹捧他，提高他的威信。我在中央农业部工作的同事们向我讲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对待给他起草的报告的态度，通常同一题目的报告要起草两个，有时是三个。起草工作结束后，勃列日涅夫把写作班子召去，他先问，哪个报告写得短，然后给他读一遍。他自己不喜欢阅读，也很少提意见，一般总是最短的讲稿入选，于是总书记便拿着报告登上讲台。勃列日涅夫有时表扬讲稿和报告的起草人，并经常送些有纪念意义的礼品以示感谢。有一次，维·格·阿法纳西耶夫让我看一块瑞士手表，金黄色的表壳，后盖上刻有勃列日涅夫的赠言。人们都以此为自豪，这是对共同工作的最好纪念。

有一次，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报告的人提醒我，戈尔巴乔夫最好能见见写作班子，对他们几天来的繁重劳动表示感谢，也算是一个纪念。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于是我请他在几份印好的报告上签字，送给那些为报告付出心血的人。他不情愿地拿起四份材料，草草地写上：“……同志惠存。戈尔巴乔夫。”

很难想象有比这种做法更糟糕和更无礼的事了。当我不好意思地把小册子发给大家时，许多人不满地开玩笑说：没头没脑地惠存什么呀！好像是表示尊重，实际上并非如此，看来是对报告不满意。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请总书记在起草的报告上签字了。

勃列日涅夫在性格上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当然，他支持和提拔许多人到领导岗位上并不是根据他们的业绩，这是事实。但是，他总能讲些让人感到温暖的话。据说，他时常真诚地关心下属的家务事，人们时这种关心很重视。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拥护他，这不是偶然的。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经常不断的关怀、频繁的电话问候赢得了众人的心，人们感觉到，有人惦记自己，相信自己。梅杜诺夫因越权等严重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受到严肃批评后，勃列日涅夫很快拨通克拉斯诺达尔的电话，对他说：

“你别背包袱，不要对这些事太在意。好好干吧。”

这是我到边疆区时梅杜诺夫亲口对我说的。梅杜诺夫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受到批评和警告一事对当地大多数党员还是保密的，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勃列日涅夫给他打电话支持他的事。勃列日涅夫不止一次这样做，他知道，这样做会使领导干部忠于他。正因为如此，他的地位才那样稳固，他才能那么长时间地掌权，领导干部们才那样热爱他。不过，这一切要做得恰到好处。

我记得，1974年全国庆祝开垦生荒地20周年，所有共和国领导人、各

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都来到阿拉木图。召开庆祝会的头天晚上，人们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到来。飞机抵达前两小时，人们就来到机场，在“伊尔—62”飞机降落前，身穿春装的党、政领导人就已冻坏了，他们不时地用手搓着耳朵。3月的阿拉木图，春寒料峭，天气很冷。站成一个巨大方阵的领导人在焦急地等待着飞机的降临。当飞机着陆，滑向欢迎人群时，天已经黑了。勃列日涅夫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走出机舱，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下舷梯。他同库纳耶夫紧紧拥抱，同这位忠实的老朋友热烈亲吻。随后便是同众人的热烈拥抱和亲吻，许多人享受到这种殊荣。

我认为，我们领导人热衷于亲吻的这一细微特点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宝贵遗产，它曾像香港流感那样很有传染性。当时所有的人，中央书记、州委和边疆区委及区委书记们、集体农社和国营农场主席、工厂厂长、建筑工地负责人、退休人员和青年等都开始运用亲吻这种问候方式。就连从前只是握手问候的老朋友，现在也用同志式的亲吻来互致问候，共享这种交流带来的愉快。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这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令人难忘的事例之一。这种风气迅速蔓延，很快便席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直至东方的蒙古、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我不敢说，西方领导人的拥抱礼节不是产生于俄国这块土地，但是这种礼节已经渗入美洲和非洲。白色人种、黄色人种、黑色人种、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佛教徒和无神论者都接受了亲吻这种礼节。

戈尔巴乔夫也掌握了这门朴素的艺术，他喜欢向人们显示自己平易近人的作风。好像所有领导人都忘记了那些正常的习惯，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证明，只要有指示，他们什么都能学会。

勃列日涅夫及其家人还热衷于收送礼物，当时总书记收到的礼物数不胜数。赠送礼物的传统是通过国际交往传到我们这块罪恶土地上来的，并且立刻找到肥沃土壤，发展到顶点。况且，谢德林和果戈里时代官吏的习惯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绝迹，像亲吻一样，大家又开始交换礼品。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曾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导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手、速记员、打字员，甚至包括给速记员开车的司机，为此花费数十万卢布的经费。

我好奇地看着那个时代的各种货单和清单，不由得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远见而惊叹。既然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能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那就不能责怪地方官员了。他们回赠的是贵重的胸花、宝石项链、戒指、配有金银枪套的手枪、各种黄金饰品及其它贵重礼品。这些礼品多半没收进国库，当时也不时兴把这些小玩艺儿上交国库。相反，却从国库中按废金银的价格拿出大量珍宝。估计国库工作人员也会这样慷慨地对待人民财产，不过这只是猜测而已，要弄清实情，需要时间。

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时，掀起一阵送礼高潮。外国使团知道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需把他们赠送的字画、手表、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物一一列出，我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我想谈谈其中一件礼品的命运。这里说的是一只巧伦杯——雅库特人喝马奶用的传统器皿。雅库特人打算向勃列日涅夫赠送一个别人做不出来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又能反映出雅库特人的能力和慷慨。巧伦杯是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阿莫索夫制作的，他为此花费一个多月时间。他用一块

罕见的毛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珠宝。把五块纯度极高、总重量近 12 克拉的天然钻石送到首饰厂进行加工。莫斯科的工匠承担了这项工作，他们用五块钻石磨出六块来，还把一些碎钻石进行再加工，镶嵌成 12 朵玫瑰。莫斯科首饰厂还为这只杯子制作了一个三脚底座和精制的保护箍，用银子铸出六个漂亮的边框，每个边框上镶一块钻石。上面的三个边框还在钻石和玫瑰中间各镶两块石榴石——红色宝石。苏共雅库特州委第一书记契里亚耶夫把巧伦杯赠送给勃列日涅夫。但是，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有人见过这只巧伦杯。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

如果党中央和中央书记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不派人寻找这个贵重的礼物，那么巧伦杯现在恐怕还在勃列日涅夫家里。它现在已归国家所有，但愿它能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到处流传着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恶化、他每到一处都要收送贵重礼品的消息，舆论震惊了。只有这些传闻中的主人公还被蒙在鼓里。正如医生说的那样，他虽然活着，但已不太清楚周围发生的事了。因此，一次十月革命节过后，一位在国家计委工作的老同事打电话问我：“听说勃列日涅夫死了，是真的吗？”我当时很惊讶。首先，我不知道此事，可他却说得十分肯定。其次，听到这样的传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这一次关于勃列日涅夫死亡的传闻不是假的。1982 年 11 月 10 日早上 8 时至 10 时之间，勃列日涅夫在床上静静地去世了。当副官进去想叫醒总书记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虽然他很久以来一直患重病，但不知为什么保安人员和医护人员既没让医生，也没让护士守在他身边。于是，警卫人员开始进行急救，在勃列日涅夫宽大、苍老的胸部作胸外按摩，但已经晚了。及时赶到的急救人员只不过来确诊总书记已经死亡而已。勃列日涅夫在扎列契耶别墅那间面积不大、不太舒适的房间里去世了，这个别墅距离环形公路开车只需五分钟时间。

晚些时候，我参观了这座别墅。别墅外表很普通，房子低矮，有二层楼，内设几个小厅和一间会客室。因旁边加盖了一个游泳池和桑拿浴室，建筑物才显得长些。同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别墅相比，这个别墅是相当朴素的在一层，除前厅外，是一个 50 平方米左右的餐厅，通向二楼的楼梯很陡。二楼有几间卧室，每间约 15~18 平方米，带一个小卫生间，天花板很低。这里通常住的是他的孩子和孙子们，有时勃列日涅夫夫妇也来这儿住。

勃列日涅夫的卧室稍大些，但无法同福罗斯别墅相比。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也不算大，约 20~25 平方米，有一张很平常的办公桌，沿墙摆着书架，还有一张不太大的双人沙发。桌旁放着电话，他可以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某些领导人直接通话。

书架上放的多半是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的书籍，还有许多赠书、影集、各种印刷品、关于 18 集团军作战经历的小册子、《小地》和其它反映他生活和工作的书籍。各房间都笼罩着一股凉气。这儿的一切都说说明，主人在这儿只是临时居住。最令我惊奇的是那套公家提供的家具和冰凉的四壁，可见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从勃列日涅夫到他的孙子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迟早得离开这儿。

我在这些空房间里转了一圈后来到楼下，我在思索，在这种充满官味、冷冷冰冰、没有一点人间暖意的气氛中，一个人能感受到哪怕瞬间的幸福吗？

我得出结论：不可能。

另外，一个多年来代表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人物——他并非一贯正确，有时可能也犯错误，但他毕竟为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作出一定贡献——为什么会被后人遗忘，被人嘲笑，成了马戏团小丑似的人物呢？不错，勃列日涅夫是有缺点，存在一些让人惊讶和愤恨的方面。可那些在总书记面前欢呼雀跃、顶礼膜拜的人当时为什么不讲话呢？那些应该向年迈的领袖、向中央委员和人民讲出实情的领导人都到哪儿去了？不正是那些掌握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怯懦的佞人把我们国家引到绝路，不正是他们应该对这个大国发生的一切承担主要责任吗？现在，勃列日涅夫不在了，他们又争先恐后表白自己当初多么勇敢并且始终表现得很勇敢，开始咒骂自己的偶像。他们向人民隐瞒真相，他们多么没有原则性，精神多么贫乏呀！如果有道德法庭的话，那么首先应该审判这些懦夫和走狗、骗子和小人。

勃列日涅夫生前的战友会对我说，今天谈勇敢当然容易啦，可那时你能反对总书记吗？我同意这种观点，即能够这样做的人是勇敢的人，正直的人。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保持沉默，谢列平就没有隐瞒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叶戈雷切夫也表过态。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被逐出各级权力机关，甚至勃列日涅夫死后也不让他们接触管理工作。我不想谈反对总书记的那些人的真正意图是否都那么大公无私，但是，事关祖国命运和国家前途时，直言不讳地说国王光着身子，这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官居高位的人的义务和职责。

我当时明白了，与世长辞的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一个靠革命、战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培育起来的人支撑着的时代。作为国家的下一代人，我们现在开始否定过去的一切，怀疑当时措施的合理性，论证当时应该怎么办。当然，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历史，显然是错误的。历史不仅仅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伟大人物创造的，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生活中许多变幻莫测的因素构成的，后人感受不到，也考虑不到这些因素。这正是父子之间、两代人之间和不同时代之间永远存在矛盾的原因之一。因此，新一代人没有权利在道德上谴责自己的先辈。我的这番话当然不包括那些使无辜的人惨遭迫害的大镇压的罪魁祸首。这也不是为彼得大帝和斯大林辩护。

奇怪的是，有的人总想教训前辈，指责他们急于搞集体化。有的人总是说，应该看到希特勒在备战，不应该为攻克柏林或布达佩斯、布拉格付出那么多血的代价。很遗憾，有些人是居心叵测的。有的人今天还在惋惜，德国人怎么没有摧毁我们的国家？怎么没有摧毁人民同法西斯浴血奋战保卫的那个制度？他们也不想一想，那时他们还没出世呢。对法西斯恐怖的无数牺牲品，他们却缄口不言。

我是在中央前总书记空荡荡的餐厅里作这番思考的。当年总书记的家人和朋友曾在这里聚会，现在人去楼空。据说，这幢别墅准备送给儿童组织或退休人员组织。当时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几年之后在这里安营扎寨的是一家象征新潮流的公司或工业协会，它们花钱雇莫斯科特警来担任警卫工作。

莫斯科在同勃列日涅夫告别。各报都套黑框登载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告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书，还刊登一些官方机构发布的与勃列日涅夫逝世有关的其他资料。

与此同时，从 13 时开始，劳动者代表排着长队缓缓地走进工会大厦圆柱

大厅。我也同这支队伍一起来到这里。在高高的灵堂上，勃列日涅夫静卧在鲜花丛中。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从旁边走过，好奇地望着这位生前无法走近看的国家领袖。在昏暗的角落里，我看见勃列日涅夫的亲属身着丧服站在那里。有时一些熟人走到他们跟前，表示哀悼。11月12、13、14日都是如此。这几天是全民哀悼日，学校停课。

11月15日是送葬的日子。各地代表、各国使节前来为这位在生命最后一刻离开人民的总书记、元帅、多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人送终。

1953年3月，我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涌向安放斯大林遗体的圆柱大厅。他走时也没有指定接班人。他身后一批领袖兼战友的人物，这些人不相信任何人，只是庆幸自己仍活着，而这位可怕又可敬的人不在了。但是那时，人们真诚地为斯大林的离去而哭泣，不论在他生前飞黄腾达的人，还是受尽迫害和凌辱的人都哭了。这个奇特的现象成了我们的一份遗产，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应该去解开这个谜底。

为勃列日涅夫送葬时，除亲属外，没有人流泪。到安葬勃列日涅夫时，接班人问题已经解决。我们消息闭塞的人民早就明白，通常情况下，谁是治丧委员会领导人，谁就是死者的接班人。现在一切都大白于天下——接班人是安德罗波夫。

但是，只有那些不太了解“宫廷”内幕的人才会觉得事态一目了然。其实，在最终确定接班人之前曾有过一场短暂的、但十分激烈的斗争。勃列日涅夫生前最贴身的人物——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契尔年科及其一班人，还有那些害怕发生剧变的人曾经跃跃欲试，他们密谋推举契尔年科为一把手。但是，反对前克格勃头子、当时党内第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也是很难的，是要担风险的。安德罗波夫在关于密谋活动的传闻公开之前就得知了有关情况，因此，契尔年科的拥护者只好妥协、后退，而契尔年科则获得第二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中央全会一致选举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如上所述，他曾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苏斯洛夫死后他一直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担任多年苏联克格勃主席的职务。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在知识界和军界有广泛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国共产党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曾任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主管同这些国家共产党进行联系的部门。他同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大使、外交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苏共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把手交往甚密，任命他担任总书记并没有使人感到意外。不仅如此，许多人把这件事看成是整顿国内秩序、严肃纪律、同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次机会，但也有不少人对此心惊胆颤。选举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的中央全会开过以后，戈尔巴乔夫非常高兴，好像他当选了一样。晚上我给他送文件时，他忍不住说：

“我同安德罗波夫是老朋友，两家关系也很好。我同他多次无拘无束地交谈过，我们的观点一致。”

我想从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把安德罗波夫到高加索休假时同他的一次谈话的内容摘录出来。他们谈了许多令人担心的情况，即政治局委员，首先是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问题。这是7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戈尔巴乔夫对安德罗波夫说：

“政治局里不能都是些上年纪的人。一座大森林里总是要有些小灌木丛的。”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后来，当我被选进政治局时，安德罗波夫向我表示祝贺，并说：怎么样，小灌木丛，好好干吧。”

## 升迁

从表面看，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仍然主管农工综合体工作。但是，他对决策的真正影响力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此外，人们发现，戈尔巴乔夫正慢慢地，但却日益明显地变成中央政治局最有影响的成员，逐渐排挤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契尔年科。我是根据他经常同安德罗波夫通电话、根据通话的内容、根据总书记经常给他安排一些超越他的正式职权的工作发现这一点的。现在他越来越多地参与解决广泛的经济问题、党的组织工作和人事工作问题，这使戈尔巴乔夫同契尔年科的关系复杂起来。安德罗波夫不大喜欢契尔年科，但考虑到他背后那些人的实力，还是把他推到前台。安德罗波夫喜欢同新人共事，把社会发展方面越来越多的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交给他们处理。

应当说，安德罗波夫最不熟悉的的就是组织和人事工作。戈尔巴乔夫对工业和经济方面的干部也不熟悉，不得不经常求教于各方面人士。但是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形势要求更新干部队伍。安德罗波夫越来越信任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依赖于他的帮助。1983年开春的一天，戈尔巴乔夫问我是否知道苏共托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我本人不认识利加乔夫，60年代初见过他，但对他的许多事是有耳闻的。

他曾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在当时成立的中央俄罗斯联邦局负责组织 and 意识形态工作。据当时搞宣传鼓动工作的同志说，他是一个有魄力和好挑剔的人。我的一些托姆斯克的朋友说，他当选州委第一书记后，州内发生很大变化，这主要是利加乔夫努力的结果。他不仅关心经济问题，还关心文化、教育和科学发展问题。

我把这些情况都向戈尔巴乔夫讲了。

戈尔巴乔夫说：

“我早就认识他，我们一起去过捷克斯洛伐克。”

那时经常谈党的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问题。戈尔巴乔夫经常突然问起某个人，大概是想核实一下自己的看法，了解一些新情况。一开始我对这类问题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后来很快明白了，这些问题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大约在4月份、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利加乔夫为党的组织工作部部长。这是苏共中央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部门，因为它主管几乎所有干部，不仅任命党的干部，而且还任命许多其他部门的干部。

现在戈尔巴乔夫同利加乔夫一起负责提拔新人充实党的机构，为安德罗波夫提供各种人事安排的建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需要的、可靠的专家安排到党的关键岗位，尽管戈尔巴乔夫也经常讲没什么人可选拔。在党的中层干部中，问题很复杂，苏共州委、市委和区委的第二把手大都是由一些不内行的人担任的，而且年龄往往比第一把手还大。

“斯塔夫罗波尔的区委书记比许多州委和边疆区委领导人还有能力。”戈尔巴乔夫经常这样讲，并愉快地回忆他提拔起来的那些区委和区执委干部。

他撤换了很多干部。有一次他说，他用半年时间把苏共区委书记全换了。



当然，他当中央书记时也依靠斯塔夫罗波尔的干部。我接触过这些人，的确都很能干，有知识，有真才实学。

我到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这里工作后，又同亚·尼·雅科夫列夫恢复和加强了联系，他出使加拿大后，这种联系曾一度中断。60年代初我们就认识，那时他在中央鼓动宣传部当督导员，我在中央书记伊里切夫办公室工作。我们经常同伊里切夫接触，解决一些问题。伊里切夫很尊敬雅科夫列夫，总是千方百计重用他，让他去解决一些最微妙的问题。

他当时处理的一件事至今仍是舆论关注的中心。1963年，一位当年看守和后来参与处决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契卡人员的亲属上书赫鲁晓夫。这位契卡人员临死前留下遗嘱，把当年处决罗曼诺夫家族的两支左轮手枪交给国家领导人。一支手枪给赫鲁晓夫，另一支给卡斯特罗。

赫鲁晓夫决定让中央鼓动宣传部处理这个问题。或许当时由克格勃来处理这个问题更好，因为克格勃掌握更多的情报，有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或许当时赫鲁晓夫想了解这件事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其后果，反正不管什么原因，任务总归要完成，于是伊里切夫请雅科夫列夫来处理这件事。

雅科夫列夫很认真地把任务承担下来，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把发生在乌拉尔的这场悲剧事件的所有参与者和目击者都召集起来，当时很多人还活着。他请他们叙述事件的经过，把他们的回忆都用录音机录下来。雅科夫列夫对处决和埋葬沙皇家族参加者的行为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弄清了每个人所起的作用，各种事件的可靠性，他把有关结论和建议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伊里切夫。

1988年他对我说，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克格勃，其他所有材料、录音等都在伊里切夫那里。我见过这摞文件，阅读过记录。文件中谈了沙皇家族被囚禁期间的生活情况、每个人的性格和习惯、处决的原因、参加处决的人员、埋葬的地点等许多内容。根据我当时的记忆，这个惨案不是发生在叶卡捷琳堡，而是在彼尔姆某地，但我也可能会记错。

雅科夫列夫调查的所有材料都呈送赫鲁晓夫，但他好像对此不感兴趣，或许作为中央第一书记无暇顾及此类问题，也许是不想接触历史旧帐。

1988年，我开始对档案中的这些文件产生兴趣，因为我已预感到，许多文章和书籍的作者已了解某种事实，迟早会把它们发表出来的。可我既没找到录音带，也没找到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也许这些东西保存在其他地方，也许出了什么事。总之，难以说清。

雅科夫列夫当时经常执行一些与他的工作性质无关的任务。其实，根据工作性质他到底应该干什么，一开始也并不很明确，那时任命他为中央意识形态部广播电视局局长，为此他找到我，指着我办公桌上的扬声器，夸张地说：

“我除了知道这东西叫收音机以外，对广播和电视一窍不通。”

我们都笑了，但得出结论，认为这并不重要，他主要抓这个部门的政治和内容方面的工作。事实果真如此，他很快熟悉了新的工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他被提升为中央鼓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72年他出使加拿大之前，一直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有一次，雅科夫列夫从渥太华回国休假，我们见了一面。我们谈到国内以及农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变化，雅科夫列夫让我劝说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看看那里的农业。他认为加拿大的农业效益非常好，而且劳动方式也是

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也认为，了解这个国家农工部门的情况对戈尔巴乔夫很有益处，不久，戈尔巴乔夫接见了雅科夫列夫。这次见面后商定，雅科夫列夫同加拿大政府商量以政府的名义电请戈尔巴乔夫访加。邀请电很快就发来了，安德罗波夫尽管对出访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一再坚持下还是同意戈尔巴乔夫去大洋彼岸作一次短暂的访问。

这次访问对后来《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作者了解西方世界发生的一切，了解关于国家发展的另一种观点，了解民主化、自由和公开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戈尔巴乔夫同我交谈时说，在加拿大，雅科夫列夫阐述了自己对苏联和世界发展的看法以及振兴我们社会的途径。这次访问对雅科夫列夫后来的命运也具有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出访之前，国内并没有急于调雅科夫列夫回国。

可他早就想回国并为此作过不少努力，但是戈尔巴乔夫对加拿大的访问并没有使雅科夫列夫实现立刻回国的愿望，此事需征得安德罗波夫的同意，而安德罗波夫不知何故却对此事并不着急。一次，戈尔巴乔夫又谈起应该让雅科夫列夫回国的事，并把他夸奖一番，安德罗波夫回答说：

“不错，这个人是很有头脑，而且下只一个头脑。因此应该权衡一下，不要操之过急。”

安德罗波夫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能去猜测。10年以后，当年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克留奇科夫才向我讲了一些关于安德罗波夫不想让雅科夫列夫尽快回国的原因。

但是，戈尔巴乔夫坚持调雅科夫列夫回国。雅科夫列夫也在为回莫斯科作准备。帮他促成这件事的还有一些老朋友，尤其是阿尔巴托夫院士，尽管他们关系很一般。此事的原因可追溯到70年代初。

雅科夫列夫在可供选择的几个职务中看中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一职，这个职务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圈内始终是最有权威的。最近几年，研究所所长是中央委员。

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和当时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勃戈柳博夫（雅科夫列夫找过他）的帮助下终于回到莫斯科，接受新工作。苏联科学院考虑到他的贡献和所长的职位，很快选他为通讯院士，雅科夫列夫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因此，后来领导改革、为改革进行意识形态准备并实际进行改革的人，那时就已经联合起来了。

虽然很少有人知道，但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糕，他经常住院，身体衰弱得很厉害，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有一次，我在相隔几周后见到他时，他的外表令我大吃一惊。他脸色发灰，两颊和双眼凹陷下去，但最突出的还是他那副疲惫不堪的神态。15年俞，我经常同他见面，那时他常来找伊里切夫，处理一些他要办的事。现在他已经认不出我了，也许是说不出话了。他从办公室出来向电梯走去，两个副官搀扶着他，他忧伤地望了我一眼，消失在电梯里。我想，这种健康状况是很难支撑工作的，但我确信，安德罗波夫承提的新工作和重大的责任对他的健康状况很有影响。

我觉得，即使他能让我国经济发生重要变化，他现在也阐述不了自己的观点、使它形成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了。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建议总书记依靠雷日科夫。雷日科夫在十一月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并被任命为重新成立的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最初，采取整顿秩序措施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加强纪律性，同贪污和违法现象作斗争、那时经常在影剧院、博物馆、商店进行检查，发现有些官员在工作时间干私事。这种做法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在当时相当有效。开始处理一系列贪污受贿的大案，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和苏联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被撤职，后来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被撤职。

但是这股热情没有坚持长久，而主要是没有触及造成经济停滞的内在因素。安德罗波夫准备在这方面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大家都明白，时间对安德罗波夫是不利的。

戈尔巴乔夫曾说：“他在集体的帮助下制定了解决迫切问题的正确方法，但是总书记既不懂生产，也不懂金融，而且不太熟悉经济问题。但一切又都取决于经济。”

当时，苏共中央书记雷日科夫刚刚接手新工作，像通常说的那样，“尚处在积累资金的阶段”。

1983 年底应该召开中央全会，按照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传统，全会要总结一年的工作，提出今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安德罗波夫积极准备发言，助手和顾问们经常到医院来。这本来应该是他的一次最重要的讲话，即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今后的任务，但是健康状况使他无法作这次发言。开会前几天他彻底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对戈尔巴乔夫说，他写一封致全会的信，让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安德罗波夫实际上是让戈尔巴乔夫代替自己在全会上发言，这是向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者发出的重要暗示。

实际上，身患重病的总书记把权力的接力棒交给了自己这位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学生，所有了解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内幕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不过当时夺权斗争只是刚刚开始。

1983 年 12 月的一个早晨，戈尔巴乔夫紧急约见我，后来又请来雅科夫列夫，让我们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我们俩立刻像常说的那样，找来“一块铁”，开始雕琢。文章写得不错，但是，这时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完全入道，还缺乏信心，十分紧张。他读了一遍发言稿，觉得不满意。我们作了修改，加进一些话，但是戈尔巴乔夫把我们觉得很不错的方案一个个地否掉了。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焦急，失去信心，他曾试图自己去修改和重写，但后来终于明白，一稿不如一稿。夜已经很深了，他让我们最后定稿，并说早晨一定要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干了整整一个通宵，发言稿终于写成了。戈尔巴乔夫作了发言，他突出强调了后来在国内改革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那些问题。这次中央全会后，拥护他和反对他的人都增加了，很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好出风头的人，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知识，另一些人则全心全意地支持他。

无论多么惋惜，安德罗波夫的日子毕竟屈指可数了。他实际上已经起不来了，只能长期卧床。

1983 年 2 月，安德罗波夫的肾脏几乎完全停止工作，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但人工肾也只能允许他每周工作二至三天。请来国内外优秀专家为他治疗，但是病情已无法控制。1984 年 1 月底，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并出现连锁反应。

戈尔巴乔夫整日愁眉不展，他感到安德罗波夫快不行了，同时心里也很清楚，任何一位新领导上台都可能使他那些希望和计划落空。那时他经常说些心里话，回忆自己在斯塔夫罗波尔开始从事共青团工作的情况，回忆那些

一起劳动的同志。他还常常谈起他为边疆区，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专业化和集体化方面所做的工作。

有一次他坦白地说：

“我甚至以这个题目写过一篇副博士论文，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当时不知为什么对任何事都没有信心，国内各种各样的困难越来越多……”

我对这个时期也记忆犹新，那时一些党的干部看到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不佳，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为了在日后严厉的新领导上台掀起的波涛中不被吞噬，于是使自己坐下来或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开始写论文。

这些想法又回到戈尔巴乔夫的记忆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恐怕没有人比戈尔巴乔夫更了解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真相的了，用他的话说，他是安德罗波夫请来就国家发展的当前和远景问题进行谈心的少数人之一。他经常回忆同利加乔夫一起去见总书记的情况。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的那些老战友们无法理解，安德罗波夫为什么如此器重这两个新人。而所有这一切又如同火上浇油一样，使戈尔巴乔夫同其他人的关系紧张起来。

当然，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关系，我主要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和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来判断的。后来，在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工作过并受到器重的同志向我讲了其他情况，他们的看法同戈尔巴乔夫关于他同安德罗波夫的关系的说法有出入。他们说，首先，安德罗波夫并没有特殊重视这位斯塔夫罗彼尔的农业工作者，而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能力去解决一些复杂问题。对其他中央书记他也同样给予信任并委托他们去落实自己的想法。安德罗波夫的战友们认为，这只能表明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和好的组织者的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总书记像对待戈尔巴乔夫一样，也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会面和讨论问题。这里我想引用一下同安德罗波夫熟悉多年的叶·伊·卡尔金的话。1994年6月他在《独立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指出：“真是安德罗波夫帮助戈尔巴乔夫登上政治顶峰的吗？他死前真的留下政治遗嘱，指定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接班人了？对这些问题，我可以谈些情况。在州一级党的干部中，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比较突出的，引起了经常到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安德罗波夫的注意，这是事实。但是我不想这样简单地地下结论。选拔党的高级干部有一个复杂的多级程序，一个人的意见，哪怕是安德罗波夫的意见，也不能决定问题。当然应该指出，戈尔巴乔夫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天赋，善于给人留下印象。

“我会让那些认为安德罗波夫有某种遗嘱的人感到失望的。无论我，还是安德罗波夫‘班子’中的其他成员，甚至安德罗波夫多年来特别信任的拉普捷夫、克留奇科夫和沙拉波夫，都不知道有什么口头或书面形式的遗嘱，尽管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前他们一直在他身边。

“报刊上说安德罗波夫去世前不久对戈尔巴乔夫感到失望，不过我从未感觉到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有什么特别亲近的关系，我只知道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要求很严，像对待其他领导人一样，经常因工作中的疏忽而严厉训斥他。我可以举一个事实：安德罗波夫去世前不久在医院里最后一次见政治局委员时，戈尔巴乔夫不在场。”

对此我要作些补充，我不知道安德罗波夫有什么遗嘱，这种传闻如果不是误会，那就是有意“放出来”的，为的是给渴望得到权力的戈尔巴乔夫以

精神上的支持。这个谣言到底是内部传出来的，还是外部造出来的，难以说清。在各种政治力量积极抢班夺权那个大动荡年代，经常冒出些荒诞的神话，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所谓遗嘱之说，只不过是杜撰出来的谣言，这从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顶峰后极力贬低安德罗波夫的作用的表现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而当时安德罗波夫确实已心力衰竭。

1984年2月9日16时50分，安德罗波夫逝世。他走了，后人对他的评价虽然有矛盾，但总体上是肯定的。没有人批评他，但是也很难说他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至多可以说安德罗波夫有过良好的愿望，树立了改革的里程碑，但却无法实现这些转变，还应该指出，总书记的突然逝世震惊了全国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又一位年迈多病的苏共领袖逝世也使党内很多有威望的人对此提出疑问。一些中央委员找到我，不解地问道：

“难道当初不知道安德罗波夫患病吗？为什么政治局要把中央交给他？我们会失去人民信任的……”

我能说什么呢？要是看到当时表决的情况就好了。但是大家，尤其是中央委员们知道自己领袖的健康状况吗？当然不知道。这是医务人员和特工人员严守的最重要秘密。而且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考验，一个更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全会、全党和全国人民。

### 令人担忧的时刻

红场上再一次默哀，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所有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领导人、各国代表再一次聚集到这里，向这个大国领导人告别，同时向即将接替安德罗波夫掌管国家的人表示敬意和哀悼。

送葬的炮声惊飞了伊万大公钟楼上的鸽子，那些衣着单薄的外国客人不适应俄罗斯的严寒，站在那儿不时地跺跺脚，搓搓手。时过不久，又将有令人迷惑不解的一页历史翻开来，又提升一位患病的领袖，又是夺权斗争，又是很快地过世。

我常想，一个人难道在死神就要降临时也不能节制自己的野心，不能为国家的宁静和繁荣放弃力不从心的担子吗？我考虑这些问题时，对推举新总书记的复杂斗争的所有内幕尚不十分了解。对契尔年科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这件事，大家觉得很自然，因为他当时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人们不敢相信，这个同样体弱多病、言语迟钝、呼吸困难的人会成为苏联共产党和一个大国的新领袖。

当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萦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选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根本不是在中央全会上解决的。在这类问题上，全会只不过是中央政治局“领导集团”通过的某项决议起装饰作用的。我所以用“领导”二字，是因为党的最高决策班子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威信、权力和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权提出新总书记候选人，许多人只不过是在选举领袖时参与对候选人的讨论而已。

当时在政治局起主要作用的是乌斯季诺夫。那时他是领导机关中人事安排的主要导演，某人能否进入中央政治局，能否领导国家管理的某个关键部门，主要取决于他。

我了解乌斯季诺夫，早在1956年，我就应他的邀请同他共同工作过一段

时间，尽管那时我已经准备报考社会科学院。他请我帮助他“适应新工作”。他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主管国防工业和化学工业。我看见过他工作的情况，那时他身体相当好，工作能力很强，这大概是战时锻炼出来的素质。乌斯季诺夫每天早晨8点钟上班，常常夜里12点或更晚才离开。他的办公室里经常不断有人来，召开大型会议，邀请大科学家、部队首长、设计师来商讨问题。那时我有幸见到过图波列夫和米尔、科罗廖夫和切洛梅、巴尔明和扬格利以及航天和国防工业的其他许多杰出的设计师和组织者，苏联人常常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知道他们的名字。

在研究最重要的国防问题的会议上，对专家的与会是有严格规定的，决不允许一个没有接到邀请的专家留下来参加下一个问题的讨论，或者提前与会。有专人监视这项工作，我多次看到“多余的国防专家”被人从会议室请出来。

当时的制度很严格，保密是工作成功的条件。而且当时在航天技术、飞机制造的某些领域，苏联科学家确实超过美国，我们也确实担心有些东西被人窃去，至少我当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很多设计师来时都带着大型图纸并把它装在一个铅封好的包装筒里，有人还带来飞机、直升机、坦克、火炮和导弹系统模型。

乌斯季诺夫主持会议既严厉又务实，给所有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但要由他来作决定或请人准备决议案提交国防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审议。这样的会议一般要持续开好几个小时，会后乌斯季诺夫常常留下一些设计师，同他们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他还经常给各地打电话，有时不顾莫斯科已是午夜，还往遥远的远东打电话。正是这些大量的工作奠定了现代国防能力和军工综合体发展的原则和基础。乌斯季诺夫后来到国防部工作，得到了军界和国防工作者的敬重和支持，使他实际上成为政治局、政府和国家的主要权威人物。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去世后，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

就这样，当时正是乌斯季诺夫，以及吉洪诺夫和葛罗米柯支持契尔年科出任党的领袖。或许当时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参加中央全会的人还是遵守纪律，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其实，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第一书记来说，这是当时最容易接受的方案。安德罗波夫短时间的统治使许多人感到害怕，害怕他的激进做法，害怕他改变和修正勃列日涅夫方针的尝试，因此选举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契尔年科是一位与现存的党和国家权力制度血肉相溶的人物。

不言而喻，政治局的权威人士都明白，契尔年科年纪太大了，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乌斯季诺夫在拥护他当选总书记的同时，又附带谈了另一个问题，即让戈尔巴乔夫起二把手的作用。

乌斯季诺夫安慰戈尔巴乔夫说：

“米哈伊尔，你干吧。我已经同他们商量好了，由你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契尔年科将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这个建议。”

契尔年科确实提出了建议，尽管吉洪诺夫和中央政治局有些委员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

登上大国政治权力的顶峰对契尔年科来说只是个人的胜利，是当时具体形势使这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愿望得以实现。很难理解，一个73岁高龄、体弱多病的老人竟决定迈出这么不明智的一步。他成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政党的领袖，成为这个大国危难之时的领袖，用正常心理是无法理解这种决定的。

对于契尔年科同意当选总书记的这个举动只能解释为缺乏现实感，有太强烈的、甚至在垂暮之年还这么强烈的权力欲望。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契尔年科是在战友们的劝说下才占据这个职位的，以便不让那些有可能改变力量对比和当时政治局许多人制定的传统方针的人上台。

不管怎样，契尔年科成为新政治领袖对于那些害怕安德罗波夫采取的行动的人来说是一件令人欢快的事，因契尔年科上台而欢欣鼓舞的人不仅是他身边的助手或勃列日涅夫思想的信徒，许多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和经济工作者、著名文化活动家和意识形态机关干部也对这个结局表示满意。这些人中有一些是大把大把往自己袋里捞钱的影子经济的代表人物。

契尔年科开始领导苏共，很快又开始领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明白，应该有所作为。他试图尽量采取积极的立场，但是由于没有自己“成熟的”纲领，当时政治生活又回到老路上，契尔年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继续充当勃列日涅夫的影子，落实中央、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各部和主管部门提出的决议。契尔年科尽管职位升高了，但仍然只是他人建议的执行者和传达者，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创造者，即使在年轻时他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契尔年科的理论修养不高，工作经验也局限在意识形态部门，他从未领导过州党委、苏维埃机关或经济机关。当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任职时，契尔年科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助手的帮助。勃列日涅夫到莫斯科后，契尔年科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因此对勃列日涅夫周围的人来说，他即使当上总书记也仍然是“科斯佳”。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政治局决定把他的助手们留在中央机关，为此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专门顾问组。这个顾问组没有什么特别任务，也没有人向他们请教和咨询，但是由于这个顾问组的地位是独立的，加之他们又了解许多人事任命和职务升迁的内幕，所以，勃列日涅夫助手们的处境日益不妙起来。我是这个顾问组解体的目击者。1985年底，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契尔年科，有个助手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和安葬的日子里曾在莫斯科郊外一个狩猎场寻欢作乐。

契尔年科建议：“我看应该严肃处理这种荒唐行为。起草个决议，让他退休算了。你看怎么样？”契尔年科问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

“我同意。应该结束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了。”

其实，事情过去快两年了，还提及此事并进行处罚，这未免不合情理。但是总书记的决定是不容争辩的。于是，这位曾帮助契尔年科升迁的人被毫不客气地打发退休了。随后又有勃列日涅夫的几位助手步其后尘，顾问组随即被解散。现在中央机关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新总书记和其他领袖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了。

契尔年科在当上总书记后的几个月里曾表现出积极性，召开会议，会见党和经济机关的领导，准备发言，接受采访。从1984年2月13日到12月份，契尔年科发表80多篇各种材料和讲话，后汇编成文章。这里有悼念安德罗波夫逝世的讲话，获奖时的讲话，节日贺词，同政治活动家的谈话。这也是他工作的最主要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人们是在他就任总书记一年之后才知道的，而从一开始人们就期待着他的行动却一直没有出现。

契尔年科上台后，戈尔巴乔夫变得沉默、忧郁和不安起来，大概他内心深处是想当党的领袖。这是可以理解的。戈尔巴乔夫比契尔年科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虚荣心强。现在他又得排队等待，为他人火中取栗。

与此同时，任命戈尔巴乔夫为第二书记的问题则进展缓慢。好像契尔年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将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就意味着他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是，中央政治局并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因此中央政治局开会时他仍然坐在老位置上，他没有被邀请坐到总书记的右侧、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对面。戈尔巴乔夫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忍不住在小圈子里说些关于总书记和所有政治局老头子的风凉话，他对这种含糊糊地承认他为第二号人物的做法感到非常生气。他经常同乌斯季诺夫长谈，发泄自己的不满。乌斯季诺夫支持他并劝他说：

“好好工作吧，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同契尔年科再谈谈。”

但是契尔年科对他的态度仍然含糊糊。吉洪诺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极力反对任命戈尔巴乔夫，他们把他看成是对宁静生活的严重威胁，千方百计地、有时甚至用卑鄙的手段贬低他。他们不能容忍戈尔巴乔夫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地位上升的事实。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乌斯季诺夫忍不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坐到新位置上。契尔年科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也跟着批准了这件事。仍持不同意见的葛罗米柯和许多其他人看到任命第二书记的事已成定局，只好随声附和起来。只有吉洪诺夫没有改变立场，他在结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治局委员任职前，始终对戈尔巴乔夫很反感。只是一年半以后，他退休时，才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悔过书，说明自己的立场并表示歉意。大概他后来对自己的这个做法又感到懊悔。

戈尔巴乔夫向党的领导干部介绍了这封悔过书，他对这位几乎断送他前程的人的忏悔非常满意。

总而言之，一直令戈尔巴乔夫担心的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他甚至面目表情都发生了变化，增添了几分滋润。戈尔巴乔夫又开始更加精力充沛地工作起来。

但是还有些令人不悦的限制，书记处会议日程仍然由契尔年科办公室确定。并非所有问题都拿出来讨论，总书记常常在许多文件上写上意见，决定了问题的解决办法。戈尔巴乔夫把所有这些不快都归罪于契尔年科的助手，他没有宽恕他们，这些人后来不是被逐出苏共中央机关，就是被安排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岗位。现在就剩下一个不顺眼的人了，他就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助手沃尔斯基。戈尔巴乔夫虽然不打算把他赶走，但总不善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其他会议上，他经常以挖苦的语调批评他，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同他讨论重要问题，把他派到热点地区，指望他完不成任务。我想，沃尔斯基对所有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以用亲身经历对戈尔巴乔夫作出评价。戈尔巴乔夫拒绝接见沃尔斯基，在卡拉巴赫工作期间不让沃尔斯基休假，而且这些都是以粗暴的、有时还带有侮辱性的方式干出来的。有许多次我不得不为沃尔斯基工作受到的评价鸣不平，为他的请求受到拒绝而做些工作。

当时还存在其他困难。契尔年科上台后，忠于勃列日涅夫的势力活跃起来，许多因行为不轨而名誉扫地的年迈领导人又企图卷土重来。有些近来在全会上一直坐在后排的人开始挪到前排来了，其他一些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失去影响和权力的领导人也活动起来。



有些新闻记者把自己的前途同“某个人”联系在一起，指望靠这个人得到提拔和任命，于是得到契尔年科支持的人开始频繁在报刊上出现。机关中的官吏们也兴高采烈，有人竟然在机关党的会议上公开主张勃列日涅夫的方针不能改变，政治路线要保持连续性。一些搞艺术的知识分子追随契尔年科，把自己的事业同他紧紧连在一起。总之，一切又好像回到“美好的过去”。新总书记首先搞的一项工作是召开苏共中央机关会议。会议于1984年3月6日举行。契尔年科和各部负责人一起在五楼会议室召集了这次有150人参加的会议。契尔年科在发言中表示他既是从这个机关出来的人，也是这个机关的靠山。为感谢这些党内官吏的鼎力相助，他发挥了这些官吏的作用，开辟了机关工作新领域。当时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恐怕是党的领导的最强有力部门，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基层上来的，了解生活，非常能干，而且忠厚朴实，但是现存制度把这些人变成了执行领导决议的机器。共产党员大军中，大多数人都是以真诚的态度加入苏共的，对于领导这支大军的全部奥秘只有再过若干年后才能作出真实的评价。通常这是一些有才干、忠厚朴实的人，他们并不了解“上面”发生的全部事情。

3月底，契尔年科参加农工综合体问题经济会议，4月在中央全会上讲话，后来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并当选为主席团主席。晚些时候，他接见了莫斯科镰刀和锤子钢铁厂的工人、作家和人民监察员，这实际上就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其他会见均在颁奖、各种访问和招待会期间进行。

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影响、但是他感到同总书记的隔阂越来越严重，他很少参与解决重要问题，也感受不到同安德罗波夫工作时已经习惯了的那种信任。为此，戈尔巴乔夫很着急，他努力改善同总书记的关系，但是效果不佳。我上面谈过，戈尔巴乔夫同苏联部长会议也缺乏相互间的理解，戈尔巴乔夫经常讲自己受到孤立、他逢人便说他是忠于契尔年科的。

时隔不久，我了解到，利加乔夫受戈尔巴乔夫之托同总书记谈了一次话，他是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忠心的。不知是由于这次谈话，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契尔年科的冷淡态度有所缓和，戈尔巴乔夫开始经常同总书记见面。尽管还有许多限制，但是他开始坚决地贯彻契尔年科的“思想”。他当时曾向我表白：

“昨天见了契尔年科。我同他说了，不管有人怎样诽谤和挑拨我们的关系，我都会积极支持他，竭尽全力帮助他工作。”

“党内不能闹纠纷和散布谣言。我会同总书记很好合作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这番表白是一张王牌，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认为他想夺取最高权位的人。我不知道他说这番话有多少诚意，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全力支持总书记，也不可能尽全力去支持总书记，因为这里冲突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条路线，走契尔年科的路线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自我毁灭，那等于说他们理解和处理问题的水平是一样的。

我把这个想法同戈尔巴乔夫讲了，他像通常一样没有说话。听而不闻，问而不答是这个人的特点。有时他说“不”的时候，往往是同意采取行动。我时常发现，他虽然对有些建议或思想不表态。但并不是不重视，过一段时间，这些建议或思想往往在戈尔巴乔夫的行动中反映出来，不过已成为他的思维成果了。有些思想往往要过一两年后，直到他意识到了的时候，才以他个人意见的形式反映出来。戈尔巴乔夫利用他人思想的本领简直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但是没有人因此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大家都清楚，他这种地位的

人大概就应当如此。

戈尔巴乔夫管辖的工作范围又开始扩大，除农业外，他还主管化工、轻工、商业，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他参与安排党和经济工作干部。他想控制所有新干部的任命，我是从他的一次讲话中发现这一点的。戈尔巴乔夫对利加乔夫经常越过他直接同契尔年科解决干部问题从内心深处表示不满。

他曾痛心地说：

“也不商量商量就往‘那儿’跑。我真没想到利加乔夫会这么为事。”

但是他很善于克制自己，一开始还努力同利加乔夫搞好关系。他把一切都埋藏在内心深处，一旦有机会就立即剥夺利加乔夫对许多人事问题的决策权，把这项工作交给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执委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但这是后来的事。1984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在中央机关开展了相当积极的工作，他自己做的工作很多，并且也强迫其他人这样干。他自己决策的事情越来越多，他工作态度粗暴、严厉，常常不讲究方式方法和语言措辞。

这个时期，契尔年科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家都清楚，他的生命维持不了多久。契尔年科讲话越来越不清楚，说话句子很短，经常气喘吁吁，并憋得面红耳赤。他越来越难以同人交谈和会见领导人，尤其是会见外宾了，更何况解决社会提出的那些复杂问题！他对许多文件看也不看就签上字，听来访者谈话十分吃力。人们同他会见后走时都非常沮丧，越来越多的党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去找其他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解决问题。有时也有熟人到我这儿来，当然总免不了要进行一番坦率的交谈。

中央委员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分成两个阵营。最守旧的那部分人仍然追随契尔年科，他们知道只有同契尔年科在一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因为他的立场符合他们的愿望。而另一些有工作能力和惯于看风使舵的干部则向戈尔巴乔夫和其他相对年轻的领导人靠拢，他们中许多人围着戈尔巴乔夫转，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是围着他“跳波尔卡”。在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干部队伍的这种分化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败坏了本来就已跌入低谷的党的威信。经济情况再次恶化，农业又一次滑坡。大吃大喝之风又时兴起来，这很像末日来临前的寻欢作乐。

## 巨变前夜

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仍然不明确、不稳固。契尔年科周围的人非常害怕戈尔巴乔夫地位上升，千方百计贬低他在党内的作用。契尔年科患病期间，仍然不让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按理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领导人也可以主持政治局会议，党内许多年来一直有这个传统。而现在政治局会议一拖再拖，拖得时间太久时，契尔年科才在最后一刻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让他主持会议。这种做法使戈尔巴乔夫非常气愤，他没有做好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所有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所以他认为这是成心安排的，为了让他难堪，证明他没有能力。但是，戈尔巴乔夫能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最终他还是满意的，因为他终于能够主持会议并坐到主席的位置上来了。

当时哪些问题拿到会议上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契尔年科的助手和中央总务部部长勃戈柳博夫确定。考虑到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政治局会议议程

一般都不长，重要的问题不提出讨论，或者不展开辩论，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样，会议一般开 30～40 分钟，通过一些准备好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当时主持政治局会议也没有改变惯例，不过他已经在努力强调问题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难度了。

很快就到了 1984 年 8 月。烈日炎炎，医生一再建议契尔年科去休假。负责最高领导人健康的医务组负责人恰佐夫同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他经常向戈尔巴乔夫报告契尔年科、政治局其他成员、中央书记的健康状况。我多次听他们讨论这类问题。那年夏末，恰佐夫报告说必须让契尔年科休息和治疗，他同戈尔巴乔夫商量契尔年科休假的去处。契尔年科最后一次去海滨很不顺利，他吃熏鱼中毒，险些丧命。从那以后，他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实际上成了残废。

戈尔巴乔夫作为地道的斯塔夫罗波尔人建议这次去基斯洛沃茨克休养。这的确是一个休养的好地方，空气清新，具备散步和治疗的各种条件。基斯洛沃茨克修建了一个专门别墅，茂密的树林和丘陵挡住了无数在那儿休假者的视线。他们决定契尔年科去那里休养。

但是医生们大概不知道，基斯洛沃茨克傍晚的清新空气到了夜晚会变得凉爽，从山顶向山谷吹来一阵阵凉爽的、有时甚至是冰冷的气流。几天以后，契尔年科因感冒而病情加重。8 月的一天中午，契尔年科给戈尔巴乔夫来电话，我当时正好在戈尔巴乔夫那儿，听到了这次通过政府专线进行的谈话。契尔年科声音很弱，讲话时断时续，他讲几个字就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再讲，语速很快，吐字不清。整个谈话内容令人十分不安，契尔年科毫不掩饰地述说自己感觉很不好，要商量后事。戈尔巴乔夫劝他说，病情会很快好转的，不要匆忙行事。

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再劝说他等病情稳定了再说，但医生们会诊后还是决定立刻让总书记回莫斯科，由莫斯科医务人员进行更可靠的监护。情况表明，这样做的确非常必要。病魔使契尔年科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起床困难，无法站立，更不能行走。医生和警卫人员要解决如何送总书记到机场并飞回首都的问题。谢天谢地，细心并富有远见的医疗部门和克格勃领导人曾下令为勃列日涅夫设计一个专门的升降梯，用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将重要旅客送到飞机上。勃列日涅夫晚年没有这种升降装置很难出访各地，尤其是在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那场事故之后。当时想一睹总书记风采的众人爬上脚手架，结果由于好奇的人太多，脚手架支撑不住，倒了下来，使勃列日涅夫肩部受了重伤。这件事没有谈起，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当时也没有人认为这是反对派蓄意谋害领袖。

当时专家们加紧为我们的领导人制造这种自动升降梯，不知是设计需要的时间太长，还是缺少零部件，反正安全部门为避免承担风险决定从国外购买这种设备，决定将这种进口的稀奇设备迅速用专机运到矿泉疗养院。一切还算顺利，最主要的是赢得了时间。政府的专车一直开到待命起飞的飞机旁，这种装置立即起动，将契尔年科升到一定的高度，医护人员随即将病人抬进政府专机。

数小时后，契尔年科已经躺在医院接受紧急治疗。两三周后，他感觉好些了。他经常给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打电话，询问工作情况，提意见和下指示。但是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仍很冷淡。

契尔年科的病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总书记出院时仍很虚弱。

据说，当时开政治局会议，契尔年科经常在其他与会者未到之前就由人搀扶进来，坐到主席位置上，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然后再让其他人就座。他气喘吁吁，说话时脸涨得通红，由于吐字不清，别人听不清他说什么，他只是把助手们为他准备好的材料读一遍。开会的时间更短了，我从未见过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情绪这样沮丧，他们预感到契尔年科疾病的最终结局，意识到自己向中央全会推荐这位候选人的责任。那时他们之间的谈话非常坦率，许多人对前途很悲观。

戈尔巴乔夫则在这一时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作为中央第二书记，他想在安德罗波夫在世时的中央九月（1983年）全会上决定召开的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对确定戈尔巴乔夫党内第二号人物、苏共意识形态领袖人物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以前召开这样的会议都是契尔年科讲话，但是现在无论是他的健康状况还是新的职务，都使契尔年科无法在这类会议的讲台上作报告了，戈尔巴乔夫适时地利用了这次机会。他认为，国家二把手应该控制党的意识形态，苏斯洛夫时期就是这样，应该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

当起草报告的决定最后确定下来后，戈尔巴乔夫叫来助手，对他们说，应该组建一个意识形态工作班子，开始起草报告。这个班子很快便组成并得到批准。班子成员有苏共中央科学部顾问组组长H.B.比克宁、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亚·尼·雅科夫列夫、中央科学部部长瓦·安·梅德维杰夫、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格·卢·斯米尔诺夫、苏联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斯·阿·西塔良以及意识形态部的一些专家和顾问。这个班子于1984年秋在谢列勃梁森林第十九号别墅开始工作。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起草的报告，可以说它包含了党的二十七大提出的对我们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的哲学思想。我始终认为，我们困难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当时经济发展的方针存在缺陷，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的框框太窄，30年代形成的对不太发达的短缺经济实行计划的方法在国家发生巨大变化后还继续通行和使用。这个方法不符合新形势，没考虑到科学技术进步，甚至阻碍科技进步。战后形成的并在党的20年规划中得到具体体现的经济发展原则的结果是，我们一直不停地促使钢、水泥、煤炭、石油、化肥产量直线上升，按照这些指标，1980年我们确实完成或接近完成既定目标。

假如世界经济中的主要指标确实是这些产品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完成了所提出的任务，但是，时间、科学技术成果、西方国家经济中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如果用图解来表示的话，那么1980年苏联预计应该与美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而我们确实已经接近这个水平了。但是，美国和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跳跃到更高水平上去了，他们不再追求产量指标，甚至利用劳动分工缩减了许多产品的产量，如煤炭、石油、金属、水泥，而到国外购买这些产品。与此同时，他们大力发展电子和化学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尤其在机器制造业等许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优势，使我们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他们却因此而保证了经济的低消耗和高效益，按节约资源的原则来组织生产。

苏联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实行全线出击，而美国则依靠科技成就跑到了前面。我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处在经济困境中，还有一批畸形发展的部门需要大量投资，经济同科技进步相脱节。从经济效益角度看，我们的发展模式是没有前途的。因此，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计划机关、经济学家们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经济工作领导甚至在发现这条道路没有效益后仍然没有勇气

放弃原则、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由于对过去的经验作出了这种批判性的评价，所以才产生了对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改革计划原则、转向科技进步轨道的思想。应该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是报告中所包含的思想之一。报告中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扭转局面的办法，同时还提出更积极的利用市场机制的方法。应该指出，报告起草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思想持谨慎态度，尽管不断有人对他讲，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不应忽视它们的作用。但是，当时许多教条在人们的意识中仍根深蒂固，要克服掉是极其不易的。

戈尔巴乔夫清楚地记得 60 年代中期围绕市场机制问题出现的一切波折，清楚地记得采用锡克 方法的后果，他谨慎从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戈尔巴乔夫在准备就任新职务的时候不想让那些从未讲过“市场”好话的人感到害怕，或许他自己也不了解这个问题，真诚地相信发达社会主义不需要任何市场。对此，我说不清楚，不知道当时戈尔巴乔夫头脑中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认为，在对市场的态度上他有许多考虑，其中就有对自己前途的考虑。

报告中还有其他一些观点。报告已公开发表，内容尽人皆知，但是人们未必知道因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而引起的波折。按当时的惯例和例行手续，在把文件分发给中央书记以前，戈尔巴乔夫同契尔年科进行过一次谈话。首先，契尔年科对开这次会议的意图持警惕态度，他说，中央当时已就这些问题开过全会，没有必要再开会了。但是，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说法已有思想准备，因为他事先已经知道契尔年科周围的人（包括契尔年科本人）反对他在会上讲话的理由。戈尔巴乔夫当即回答，他是在执行中央全会的有关决定。接着又建议总书记在会上作个开场白式的讲话。戈尔巴乔夫很善于劝说别人，更何况像契尔年科这样不坚定的人。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后来在苏共中央工作时了解契尔年科，知道他这个人优柔寡断，不愿意也不会当面拒绝别人。

这一次他也很快地屈服了，尤其又谈到让他发言的事。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契尔年科显然无法发言，而对向会议致贺词一事他也犹豫不决。此外，他在看过报告和听了助手们对报告的解释后十分坦率地表示对报告不满意，报告没有引用契尔年科在九月（1983 年）全会上的讲话。但是，戈尔巴乔夫对此也有思想准备，他说，必须引用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以后的讲话，而不是他担任党的意识形态战线领导人时的讲话。戈尔巴乔夫还对其他一些问题作了说明。戈尔巴乔夫打算做一件事时，总是千方百计去努力，去进攻，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粗暴。这种方式在碰到性格温和、讲究礼貌的人时特别有效。总之，一切都明朗化了，会议将如期举行，戈尔巴乔夫将在会上作报告。他看了看契尔年科对报告提出的意见，采纳了一些非原则性的提法，然后就登上会议讲台。

通过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内容以及外部影响进行的反复分析，我得出结论，这次会议对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党内和经济战线的精英发现了他，同时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位农业工作者。

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人登上讲台，作了一个非常内行

---

锡克：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主张采用市场发展原则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

的报告，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从事创作活动的人，他们在经历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后，突然发现党的领导层中还有能够扭转局面的新生力量。报告的哲学—经济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被采纳了。

总之，听众对讲话很满意，尽管也有人当时在讨论报告和后来在报刊上试图歪曲和贬低报告的意义。戈尔巴乔夫牢牢记住这件事，几年后他还时常点那些当年不太支持他的那些人和报纸的名字。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报告的态度决定了许多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命运，有些人尽管后来做过各种努力，还是无法改正错误。戈尔巴乔夫很记仇，而且也不饶人。

开会前夕，德·费·乌斯季诺夫逝世了。戈尔巴乔夫倍感孤单。乌斯季诺夫的逝世对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他痛心失去这样一位人物，担心自己的前途发生变故。但是由于契尔年科重病在身，会议又开得很成功，想搞掉戈尔巴乔夫已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会议结束几天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飞往伦敦，在那里举行了他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这位夫人当时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这位客人是未来的领袖。当然，事情不仅仅在于她有远见卓识，还在于她消息灵通。我觉得，西方某些势力当时就已经把戈尔巴乔夫当成国家领导人的可能人选并尽可能地支持他了。

我为报告的公开发表作编辑工作并准备其他材料。戈尔巴乔夫经常询问事情的进展情况，不时地下达各种新任务。这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很快就要进行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了。准备这项工作需花费很长时间，我必须坐下来起草各种讲话稿。戈尔巴乔夫同意作为斯塔夫罗波尔的代表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可在俄罗斯联邦他的处境就不同了。由于他是党内二把手，所以应该在莫斯科参加选举。对此他感到不安，他周围的人也表示担心。同莫斯科人的会见是很重要的，这就好像是首都在相亲，看看“这位有出息的外省人”。当然，斯塔夫罗波尔之行也相当重要。

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他的讲话要占《真理报》大半版面，而当时一般政治局委员只能占三分之一版面。这意味着可以把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所积累的许多思想都传达给读者。会见选民的讲话稿写好了，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行程也已确定下来。

而这时的“宫廷”阴谋和相互倾轧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契尔年科身患重病，大部分时间躺在医院里。他觉得越来越无力，而眼前又老是晃动着一个令人琢磨不透、同他和许多人格格不入甚至敌视的年轻的身影。聚集在患病的总书记周围的势力在做最后的努力，不让戈尔巴乔夫成为领袖，不让他接契尔年科的班。乌斯季诺夫虽然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坐到了应坐的位置上，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搬进二把手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的对手们仍让他呆在原来的办公室里。了解党内隶属关系的人都知道，这说明中央第二书记还没有得到充分承认，这严重刺痛了戈尔巴乔夫的心。拖延搬办公室的理由是，契尔年科的东西尚未拿出来，他现在生病，没有时间清理，不知哪些东西应该拿走，哪些东西应该留下。在出发去斯塔夫罗波尔的前一天才突然同意让戈尔巴乔夫搬到五楼新办公室，这是党内主要思想家苏斯洛夫多年来一直办公的地方。戈尔巴乔夫下令立即搬家，随后便放心地去斯塔夫罗

波尔了。但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并没有获胜，戈尔巴乔夫走后，有人曾试图阻止他继续上升，不让他正式成为党和国家二把手。

我们在边疆区政府官邸——位于市中心的一栋二层别墅下榻，戈尔巴乔夫决定再看一遍发言稿。他很紧张，不时地在稿上删改，我真担心他把讲稿改得面目全非，无法补救。一般来说，发言前五分钟匆忙改动的内容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反倒常常会造成一些错误和误解。

正当我们紧张工作时，塔斯社的一位代表来了，说决定在报上发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所占版面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一样。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表明斗争的天平已经转向戈尔巴乔夫的对手。他让我往莫斯科他的接待室打个电话，了解一下那儿发生的事情，是否搬新办公室的事停下来了。得到的回答是，东西在继续搬，一切平安无事。

我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这些情况，他神经质地听着，每句话都能使他紧张一阵，他不时地向在场的人发泄不满。我早就发现，他不高兴的时候会令他谈话的人感到难堪，哪怕就是在对方谈得很有道理时。戈尔巴乔夫不喜欢顾问，总想占上风的思想使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不能立即接受“别人的”想法。有时别人向他提出某些建议，他却说他正准备这样做，不用别人提示就已经考虑到了。有时他又借题发挥，开始阐述和论证这个题目，以显示他对问题的了解。许多人对我说，戈尔巴乔夫这种态度使大家不愿意提建议，也无法与他愉快地共事。

后来，在新奥加廖沃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戈尔巴乔夫可能对讨论的问题不太熟悉，不能归纳大家的意见，总结发言时分不出主次。他常常附和某个发言者的想法，打断人家谈话并强调自己也这么想，说这个想法是正确的。有一次，叶利钦忍不住说了一句：戈尔巴乔夫，请别打断别人的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说完。他说话时声音很大，很严厉。可是到1991年时，这种侮辱已经不使戈尔巴乔夫感到难堪了。他立刻不再说话，瞪着那双水汪汪的褐色大眼睛，惭愧地望着自己的政敌。戈尔巴乔夫，一个不久前大家还得对他唯命是从的人，越来越失身分，讲话结结巴巴，论述自己的思想时前言不搭后语，没有说服力。看到这一切，真令人痛心。

可1984年春天时，他因缺乏信心和心情烦躁，经常责备讲稿写得不尽如人意，不过每次讲稿他都采用了。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个人也容易消气，情绪变化很快，从不把他对别人的无礼和粗暴放在心上。虽然如此，我当时还是努力向他讲些自己的想法，提些建议。在准备去斯塔夫罗波尔时，我同他在视察计划上发生严重分歧，他想去那些最遥远、最偏僻的农村，去从未去过的小农场。我则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同大企业见面，走到工业企业的工人中间去，因为农村已了解他了，所以他最好应该去看些研究所之类的单位。我同他谈自己这个想法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穆拉霍夫斯基这位聪明过人、经验丰富、忠厚善良的人也赞同我的意见，但戈尔巴乔夫仍固执己见。两天的时间，他在遥远的村落只见到40~50位从几十公里外赶来的畜牧工作者和牧羊人，这时他才明白犯了错误。首先，召集不来许多人；其次，由于地域偏远，会见选民的消息不可能迅速发表。材料一耽搁下来就失去了现实意义，行程改变后，事情才顺利起来。

戈尔巴乔夫视察边疆区时，决定顺便回家看望母亲。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住在红色近卫军区普里沃里诺那村，房子不太大，但整理得很好，均匀

地涂过灰，上过颜色。房子周围有一块地，路上铺了柏油，另外还有几间生产用房。为迎接客人，家里备好晚餐，应邀就餐的有好些人，亲朋好友和区党委书记。区党委书记长得颇像戈尔巴乔夫，简直可以乱真。我和侍卫长也应邀就座，其他陪同人员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就餐。

这是礼节性的晚宴，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农家饭菜，虽很普通，却很可口。

大家举起盛满伏特加的酒杯，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也与我们碰杯共饮。她显得很健康，很有活力，从她身上还能看到昔日的风姿。

村里来了很多人，他们同客人打过招呼后便朴实地坐到桌旁，开始回忆往事。我发现一个细节：他们在戈尔巴乔夫面前都不拘谨，也不说什么恭维话。农民都很朴实，不会阿谀奉承，尤其是对那些自己看着长大的人。

我们就餐的这栋房子是不久前盖的，戈尔巴乔夫大概是在另一栋已经倒塌的房子里长大的。但是可以感觉到，这块土地是戈尔巴乔夫家族、他们的亲属以及亲属的亲属的故土。通过这次出行、访问故乡以及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及许多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讲述，使我对这个“神圣家族”的生活习惯、喜怒哀乐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

当我从报上读到关于这栋房子和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后来的命运时，又想起这次普里沃里诺那之行。戈尔巴乔夫丢掉一切职务、退休以后，对她母亲生活造成的影响最大，地方当局不再像过去那样关心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许多邻居对她也敬而远之。而她又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关系紧张，无法在一起相处，所以她不能也不想到大儿子那里去。80年代末，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患重病时曾拒绝去莫斯科治疗，她不愿看到儿媳妇。大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玛莉娅·潘捷列耶夫娜才被迫接受“温柔的五月”音乐学校校长A·拉律的监护并把自己的房子卖给该学校。但是孤独的老人生活上还是很困难，很快她就搬到小儿子亚历山大那儿去了，尽管那儿的居住条件同前苏联总统的条件不能比拟。

1994年，戈尔巴乔夫或许是受到良心的谴责，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或许是因为损失不动产的缘故，又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据斯塔夫罗波尔人对我讲，这次故乡之行很凄凉，边疆区领导人既没有迎接他，也没有见他。许多老熟人也都不愿见他，认识他的人都躲到路边去，免得控制不住自己对他的愤怒情绪。戈尔巴乔夫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在城里转了一圈，很快就去普里沃里诺耶。他给“温柔的五月”学校领导打电话，谈话中还是用以前那种口气。不知是这种语调用得不是地方，还是使用这种语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正前总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于是打了一场“戈尔巴乔夫告‘温柔的五月’”的官司。

戈尔巴乔夫对选民发表讲话，当时他很紧张，因为是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等于向全国发表讲话。讲话后举行告别晚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随后我们登上飞机，希望能稍微休息和放松一下。警卫军官、医生还有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一个机舱里，喝着茶。在此前后，我再没有产生同戈尔巴乔夫夫妇坐在一起，与他们圈子里的人共进晚餐的愿望。这通常是一种很折磨人的活动，当然我不能说他们中有谁不好客。赖莎总是尽力招待大家，但她这样做恰恰让人觉得不轻松，使人感到拘束。我也常听别人讲，这对夫妇和客人之间总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一种不友善的气氛，一种生疏感，缺少人与人关系中应有的质朴。

突然，我被叫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座舱。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



夫娜请我坐下并用茶点招待我。接着，谈话开始了。这次谈话令我难忘，也令我厌恶，尽管当时我竭力控制着，以免这种不满情绪流露出来。他们对我说，我没有辜负他们夫妇的希望，他们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当助手。他们又问了一些履历方面的问题，并提了一些建议和希望。但是我内心深处感到极其愤怒，并没有认真去听，也没有听懂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找个机会便退出来了。

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我们在从事共同的事业，现在倒好，他们不过是在延长我的雇用期。我到戈尔巴乔夫这儿来，不是来求官的，因为我清楚，干不好会被轰走，干得好会不放你走。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尽其所能帮助这位精力充沛的人改善国内的状况，加强国家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始终为自己、自己的先辈和亲朋好友所生活的这个国度而自豪，我为自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有许多朋友而自豪。我不仅在莫斯科有朋友，而且在各共和国里都有许多朋友，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哈萨克人。我真诚地热爱和尊敬那些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同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并肩作战、抗击法西斯、保卫我们共同的伟大祖国的各族人民，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对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和塔吉克等民族怀有崇敬的心情，他们在战争年代给从国家西部许多地区疏散去的妇女和儿童提供食宿，收养和培养孤儿。我本人也曾在疏散地住过，我认为没有任何力量会使我们忘记苏联各族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兄弟情谊。

我到党的一位领袖那儿工作，是想帮助他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变得像它的精神一样强大，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去从事的是繁重的工作。但是不论在性格上，还是在信仰上我都不能变成某个人的私有财产，更不能容忍由一个家庭来决定我的命运。如果把工作中的忠于职守理解成俯首帖耳，那是极大的错误。好像是试用三年，然后郑重宣布同意我留下来继续干每天 16 小时的活，这种做法是很可笑的。我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能继续同这种曲解我的合作、把下属视为仆人的的人一起工作。我曾试图为他这种行为寻找解释，我觉得，这位农村青年之所以能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文化水平提高得快。我早就发现戈尔巴乔夫有点傲慢，有一股老爷作风，不尊重下属。总之，还是一些熟知此人的斯塔夫罗波尔人说得对：只要你对他有好处，他就会用你。M. 米哈伊洛夫就这样说过，他对戈尔巴乔夫很了解，而且 60 年代初就同我一起工作过。

但是，为了祖国的利益，我克服了自己的委屈情绪，努力摆脱因戈尔巴乔夫不善表达自己愿望（当时还以为是这样）而使我碰到的难堪局面。当时及后来，我始终真心实意地、毫不动摇和全力以赴地为改善国内形势而努力工作。1988 年是我醒悟的一年。我突然发现，国家的前途和强盛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的，从他那得意洋洋的举止中开始暴露出领袖至上、自我欣赏、自私和平民主义的倾向，事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信号，促使我更认真地分析形势，但是我同以往一样努力工作，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1985 年春天即将来临，大国另一位领袖演出的悲剧就要收场了。契尔年科病情严重，身体虚弱，实际上已经站不起来了。这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已经开始。契尔年科应该作为莫斯科的代表参加选举，首都党组织领导人考虑到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承担了所有与组织选举有关的工作。苏

共市委第一书记维瓦·格里申亲自负责总书记的竞选工作，召见莫斯科舆论界代表。这种举动没有安抚人民的情绪，反而滋生出许多关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传闻，说契尔年科已经不能动了。这种传闻与事实基本相符，只能在医院里拍摄契尔年科发表电视讲话和接受代表委托书的场面。旁边站着格里申和莫斯科党和苏维埃的其他有关人员。“圣尸”（当时有人这样诽谤他）在电视上露面使一些人感到恐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般的竞选演说，而把它看作是契尔年科的遗嘱，是权力交接，是新领袖格里申的亮相。这令戈尔巴乔夫和厌恶老家伙、憎恨年迈领袖的那些人尤其不安。

戈尔巴乔夫以前也知道，政治局、中央机关中有一股影响颇大的势力不接受他，现在他认为这个场面是政治局某些权势人物批准的有组织的行动。但是，如果有人打算推举格里申为一把手，那么这个想法也是不现实的，莫斯科头头在去年夏天就已威信扫地。他被指控同首都商业系统揭发出来的贿赂案有牵连，同时住宅建设中存在虚报浮夸的现象。这些问题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大众传媒作了报道，于是，首都党组织和居民群众都知道莫斯科领导人手脚不干净。

虽然契尔年科健康状况很糟糕，但是不知是迫于家庭压力，还是那些马屁精鼓动的结果，契尔年科突然张罗起个人私事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古拉·克鲁奇纳——我们是多年的老相识——多次忧心忡忡地说，有人非要给总书记及其子女换新居。新住宅是位于秀谢夫街的一幢楼，是当年给勃列日涅夫盖的。我没见过这幢楼，但是听到许多传闻，说勃列日涅夫的住宅非常宽敞豪华，设计考究。戈尔巴乔夫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在这幢楼里住过。克鲁奇纳担心，又要对现成的住宅进行重新装修，配备用卡累利阿桦木做的家具，这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材料也难以搞到。但任务总归是任务，他只好抓紧办理，因为给他规定的期限很短。戈尔巴乔夫得知克鲁奇纳干的事后，对中央办公厅主任热衷于此事表示不满，他多次生气地说，克鲁奇纳在给契尔年科拍马屁，极力满足家属提出的一切离谱的要求。

他时而讥讽地说：

“我看到了，尼古拉真卖劲，真了不起！”

可是，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下令让他给总书记装修住宅，他有什么法子呢。克鲁奇纳是一位忠实的执行者和墨守陈规的人，他看到莫斯科领导人的那些行为后，曾非常生气。他参加垦荒好多年，几乎从一开始一直干到切利诺格勒开始生产大量粮食。他以忠诚朴实、大度而著称，他长期担任党内职务，但始终两袖清风。他自己生活俭朴，并且用这种作风教育子女。他唯一的爱好和最为关心的事业是农业。在莫斯科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期间，他仍然每天“日出而作”，还经常往切利诺格勒打电话。他熟悉当地所有国营农场场长，经常向他们询问收成情况，下没下雨，磨了多少麦子，随时都能从那儿了解到各地区的农业情况。他也经常来找我，主要是交流看法，谈谈农业和干旱的情况，分享某地区下喜雨带来的快乐。

现在他肩负着党内经济的财务工作，负责完成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下达的任务，当然，这些任务是需要完成的。克鲁奇纳没有说装修契尔年科的住宅花了多少钱，但这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这笔钱曾使他感到为难，因为这用的都是党内预算，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历届总书记的别墅和住宅都是用党的经费来修缮的。

经济工作者加紧修缮住宅，但是契尔年科已经不可能住进去了。春天一

到，世界就听到又一位苏联领袖逝世的消息。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契尔年科去世，享年74岁。

这是一个星期日，恰佐夫向戈尔巴乔夫通报了刚刚发生的噩耗，他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他回忆说，他是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散步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当时对赖莎说，看来他要担起国家领袖的担子，为国家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了。戈尔巴乔夫请苏共中央总务部通知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紧急到克里姆林宫开会。

政治局委员在胡桃厅开会，其他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室和接待室等候他们散会出来。对契尔年科的去世，没有人感到意外，但是大家都没有做好选举新领袖的准备。乌斯季诺夫和契尔年科逝世后，拥护勃列日涅夫国家发展方针的人的统一联盟解体了，现在再推举一个年迈的领袖是危险的。而且合乎条件的人也寥寥无几，只有葛罗米柯和格里申可以竞选这个位置，但是他俩都已70多岁。剩下的就只有戈尔巴乔夫了，不论从年龄，还是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政治局里再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可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委员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当党和国家领袖。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老人不愿意让他来掌握国家的命运，是因为他缺少党和经济工作经验、在领导层中威信低，还是因为这些饱经沧桑的政治家从戈尔巴乔夫的言行中发现了他的不真诚和权力欲望，对此很难说清楚。可以猜到，这些因素都存在，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上层权力机关中是没有他们位置的。

与此同时，这些人懂得，如果非要从年迈的领袖中推举出一个人来，他们也得不到中央委员和人民的支持。舆论当时也倾向于较年轻、较有朝气的总书记，于是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也许正因为如此，据戈尔巴乔夫讲，格里申经过一番权衡之后，第一个建议让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也许事实就是如此。由于首都盛传格里申是契尔年科的接班人，所以格里申想排除人们认为他要夺权的猜疑，这件事必须当着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面来做，因为格里申向契尔年科颁发推举他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文件一事在电视中播放后引起不良影响。这就像垂危的父亲向儿子交待后事。应当说，这次转播掀起了一场反对格里申的浪潮，首都又开始盛传格里申与商业界各种肮脏勾当有牵连的事。当然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即当时只不过是处世秘诀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没有想到，虽然支持了戈尔巴乔夫，但也未能使自己摆脱厄运。他是在区社会保障处办理养老金手续时不幸逝世的。这位为莫斯科作过很多贡献的老人的心脏承受不住这一切打击，终于停止了跳动。

当时，1985年3月10日，格里申的建议并未得到响应，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这种沉默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我当时回答说，不要急于解决，先放一放更好。需要认真考虑和权衡一下，我们明天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建议换到政治局会议室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因为在中央书记中他的拥护者还是占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们的沉默使他异常紧张，失去信心，虽然他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但却又向旁边挪了一点，结果也说不清他到底坐在什么位置上。他鼓起勇气，说了一些赞美契尔年科的话，请大家默哀悼念他。恰佐夫报告病情和死因。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他们选出的总书记患有这么多病：肺气肿、肺部硬化病变、支气管不畅以及由此引起的心脏和许多

其他器官的功能性障碍。

会上讨论了首先要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个话题很不具体，很模糊，甚至当戈尔巴乔夫想解决在场许多领导人都要参加的治丧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时，政治局委员们也都一言不发。戈尔巴乔夫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于是他提出第二天，即3月1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敌们可以接受的建议，因为这可以使他们联合力量，提出另一位领袖人选，不过，没有合适人选是他们阻止这位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工作者野心的最薄弱的环节。但是，拖延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发动自己的拥护者，分化反对派阵营。以后我还要谈政治局内的力量分布、权力形成机制以及在苏共和我国生活的这个转折时期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方式。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他的政敌，主要是政府圈子里的政敌，同意拖延解决契尔年科的接班人问题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犯了同马林科夫一样的错误。马林科夫以为，他领导苏联政府、主持政治局会议就是拥有了绝对权力，因此，他轻率地同意由赫鲁晓夫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主管书记处庞大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关。这个机关同地方党委和其他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形势不明朗和困难时期，这些地方组织总是跟中央及其机关走，而不是追随政府和国家领导人。

这一次，新总书记的命运也掌握在接近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控制各种联系包括密码联系手段的人手里。不论是政府，还是最高苏维埃，实际上都发不出一份密码电报，因为所有设备和密码都在中央大楼并由中央系统控制。地方上的这些设备则由苏共区委、州委和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控制。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以及总务部和党务部的一些工作人员留下来，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准备所有必备的文件，给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发密码电报，通报总书记逝世和要召开中央全会的消息，还准备了与契尔年科逝世有关的其他文件。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员彻夜未眠、这个夜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共中央新总书记选举的命运。

早晨，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去说：

“17点召开中央全会，需要作一个简短而有份量的讲话。你坐下来起草讲话稿，给雅科夫列夫去个电话。”

当时商定，讲话可以不谈已故者的优秀品质和事业，但要向前看，提出新目标。讲话稿就是按这个思路写的。

从得知契尔年科逝世消息的那个难忘之夜起，党的领导层内就开始进行一场政治游戏、斗争和妥协。以前恐怕没有为任何一个总书记的任命做过这样的准备和讨论，也没有这样的组织保证。当时未必有人知道，这种准备是苏联生活的一个新时代——神话破灭、国家和军队解体、大国的各族人民之间出现不和睦的时代的序幕。

## 登上顶峰

红场上又是人山人海，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悲痛的表情。主席台上又站满来自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贵宾以及外国使节。撒切尔夫人仍旧穿着一双时髦的鞋，由于不适应我国的寒冷天气而不停地跺着脚。列宁墓下，有人给少数客人递上热酒，大家争着喝上一口，以暖和身子。

葬礼已经成为传统，仪仗队也已经谙熟各种程序。这次追悼会唯一不同的是，几十年来最年轻的新选出的（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此事）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走上列宁墓的讲台。他怀揣简短的悼词，悼词中没有谈已故者的丰功伟绩。讲话中也不只是谈世界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早地失去一位领袖而悲痛万分，还谈到对未来的看法以及使国家摆脱困境的途径。我当时一再建议他在讲话稿中加进这些思想，立刻提出改革、改善国内形势的必要性。这样的思想终于讲出来了，会听的人马上就明白了，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国家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

葬礼结束了。我从红场步行去老广场的中央大楼。三天来第一次有时间思考问题，事件像雪崩一样突然降临到大家头上，使人无暇考虑眼前发生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我自己不相信戈尔巴乔夫已当选为总书记，即实际上的党、人民、国家的主宰者。现在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了，我当时和后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此人能挑起肩上的重担吗？以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从未想到戈尔巴乔夫会被选到这个位置上，我心目中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缺少一种豁达、踏实的精神，总是爱忙忙碌碌，小题大作。当然，地位可以改变人，积累经验是需要时间的。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即在哪些人中选择，当时我对许多领袖人物都有自己的看法，政治局中，仅从年龄上看就没有合适的人选，当然，下一个层次中有这样的人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缺少知名度。反正，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戈尔巴乔夫也是费了很大劲才当上总书记的。

3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没能解决契尔年科接班人的问题，于是，整整一个晚上，加上第二天午饭前的时间，有人一直在戈尔巴乔夫拥护者中间做策反工作，但是，不管对地方领导人进行怎样的煽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葛罗米柯。他当时实际上是唯一在国内知名度高、在人民中受尊敬的领袖，他的话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他说让戈尔巴乔夫当总书记，大家都会支持他的意见，没有人敢在政治局搞分裂。显然，应该同他谈，并答应让他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有外交家的丰富经验，了解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这个位置给他很合适。而且这样做也很有必要，因为戈尔巴乔夫还不太熟悉国际政策问题。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密使带着这个建议去见葛罗米柯，很快便得到答复：葛罗米柯有兴趣在新的水平上搞国际问题。事情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现实希望，于是，除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以外，葛罗米柯也开始为戈尔巴乔夫积极活动。

现在的任务是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和州委第一书记以及其他中央委员拉过来。中央政治局一位足智多谋、消息灵通的委员弗·瓦·谢尔比茨基在这个他不清楚的形势中，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他正在美国访问。虽然航空界人士认为他完全可以赶回来，其实，戈尔巴乔夫也不希望他回来，因为不知道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会站在哪一边。中央书记将根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总书记的人选，但是一部分中央委员准备不顾最高决策机关的意见，主动提出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这些战斗队员只等一声令下，就采取行动使戈尔巴乔夫当选。他们中间有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鲍·尼·叶利钦。但是，也有人把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身上表示怀疑，这些人或是了解戈尔巴乔夫的人品，或是受过排挤，或是支持尼·亚·吉洪诺夫和政府及各部其他领导人的观点。

1985年3月11日终于来临，早晨和白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苏共中央内部在积极筹备召开全会。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接见中央委员、党的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经济部门领导人，公开对他们说将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因为15时以前要搞清楚全会参加者的意见，保证这位年轻的候选人得到支持。15时整，克里姆林宫内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一切都已在幕后安排妥当，现在的任务是避免出现意外。会上，葛罗米柯请求发言，他是政治局资格最老的委员，是在党和人民中最有威望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他毫不怀疑。通过秘密协商，戈尔巴乔夫已经得到葛罗米柯的支持。葛罗米柯没有失信，他提出让戈尔巴乔夫作党的新领袖候选人，并且请求允许他在中央全会上第一个发言。葛罗米柯的发言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绪，外交部长的建议实际上得到所有与会者的支持。政治局委员们就是带着这个决定去参加全会的。

这时，中央委员都集中在全会大厅里，许多人会前很早就来了。他们在豪华的大理石前厅走来走去，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聚在一起，小吃部餐桌旁也坐满了人。大家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政治局会议能出现什么问题？提谁作候选人？会前许多州委书记同中央书记见过面，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再选年迈的领袖了。党组织不了解内情，但过后总要责问的。不能选举不能工作的短命的总书记，现在需要的是坚定的、有魄力的领导人。

我听到了这些坦率的议论。许多人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也有人反对。不错，这个人是有能力，但是经验丰富的州委书记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经验不足，对经济只有粗浅的了解，不了解生产，不了解劳动集体。

全会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铃声响了，通知全会开始。中央委员纷纷就座，我在靠近门的地方坐下来，必要时可以从这儿很快离开会场。会场越来越静，很快便鸦雀无声。台上左侧门开了，戈尔巴乔夫低着头，第一个走出来，其他领导人按照进政治局时间的长短和在党内及国家的地位依次跟随其后。戈尔巴乔夫走近主席团席位的中间，沉默片刻后说，政治局委托我宣布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开幕。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戈尔巴乔夫念着发言稿。

我却觉得，这句话已经使人习以为常了，党接二连三地遭受不幸，可党内的人还认为年迈多病的领导人长生不死。

“昨天19时20分，我们党的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戈尔巴乔夫继续用沙哑的嗓音读着讲稿。

他的脸上带着一副因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而表现出来的悲伤和痛苦的表情，他谈了契尔年科走过的路程，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功绩……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这样一位同志、朋友、领导人的逝世，要求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共产党的崇高目标，为了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更加坚定地把我们的共同事业继续下去。”

大厅里为悼念契尔年科静默致哀。

戈尔巴乔夫用响亮的声音说道：

“全会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现在请葛罗米柯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

大厅里十分寂静，静得只能听到与会者的呼吸声。全会参加者的脑海中涌现出无数问题，为什么让外交部长讲话？发生政治剧变了吗？是不是葛罗

米柯要担任新的职务？这时，葛罗米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讲台，他仰着头，不看发言稿，慢吞吞地说：

“我受托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问题的议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政治局一致同意推荐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

他还没讲完后面的话，大厅里就响起了掌声。对许多人来说，这番话使他们一天一夜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中央委员们的目光集中到主席团，戈尔巴乔夫低着头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目光，示意掌声停止，但是掌声反而更响了。

大厅里安静下来后，葛罗米柯介绍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会上的气氛。葛罗米柯的讲话不同寻常，生动形象，而且出人意料的修饰语和非同寻常的论据用得恰到好处。葛罗米柯说，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当之无愧的，他具有党的工作的丰富经验和领导人的宝贵素质：有原则性，善于说服人，具有列宁的坦率，掌握分析艺术。葛罗米柯还列举了新总书记的其他优点，他过去和现在的成绩。大家认真地听着。

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先后发言，讲的内容无非都是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无愧做党的路线、列宁事业的继承人。全会的高潮时刻到了，表决开始。与会者一致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新总书记。掌声过后，戈尔巴乔夫走上讲台。他重申继承和不改变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方针——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改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在计划经济、发扬民主、提高苏维埃的作用的基础上改造物质技术基础和各种社会关系，保证今后仍将实行维护和平、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同各种革命力量积极配合的方针。他感谢对他的信任。

“同志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

新总书记讲完话，这次著名的中央全会就结束了。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从此划上句号，一个新的破坏时期开始了。他登上了党和国家权力的顶峰，宣誓要为人民服务，关心祖国的繁荣昌盛。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也未必能够想到，几年以后总书记会违背自己的这个诺言。

全会参加者开始退场，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应该再一次向新总书记表示祝贺。戈尔巴乔夫在一片赞扬声中容光焕发。我到他的接待室看了看，听到这些人毫不掩饰地在表白选举的巨大胜利，大谈新的计划和事业，提出必须把勃列日涅夫的仆从全部赶走。接待室里，党的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们期待着再一次同新总书记握手，以示支持并听取教诲。

我明白了，他今天不需要任何人了，于是我很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再一次回顾发生的一切，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滑稽表演，大家都扮演着呆板的角色，连那些憎恶“越级提升”的人也在祝贺、恭维。当然，让年轻领袖当总书记是一件有前途的事，至少，这件事让莫斯科流传的关于政治局委员都想在总书记位置上死去的政治笑话结束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能否胜任肩负的担子。我知道，他有许多优点，但我也了解他的许多严重缺点。这是些小节问题，他讲话口齿不清楚，发音不纯正，有点把俄语同乌克兰语混杂起来的味道，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即使不能克服也无伤大雅。人们会很快习惯大人物的腔调，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模仿他们，当年几乎全体人民，甚至连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都学赫鲁晓夫讲“共产主义”一词时的口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模仿戈

尔巴乔夫的创新，把“阿塞拜疆”读成“阿拜塞疆”，并随意读词的重音呢？这没什么可怕的，并不是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有足够的文化修养，他们几乎都是第一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决心和魄力。我当时正是在这方面表示怀疑，然而，我还是半信半疑地想：1985年3月11日会不会是历史和政治上的偶然机遇呢？

但是考虑这些问题已经为时太晚，而且也用不着去考虑了。当时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新上任的领导人会比他的前任们更加意志薄弱，四年多来一直让大国的航船摇摆不定。

我走到老广场，看到的第一个人是雅科夫列夫。我们一起上楼进了办公室，要了一杯茶，半天谁也没说话。

“工作刚刚开始。”雅科夫列夫终于开口讲话了。”会忙得头昏脑胀的。我不羡慕你。”

我回答说：

“有什么法子呢，我是自愿上这条船的，因为我看到我们正在滑向深渊。应该扭转国内局面，为此我将不遗余力，只是我不知道要让我干什么工作，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前面的路很长，很艰难，但是我会认真去干的。”

“现在需要好的思想。只有形成一条路线，我们才能立得住，否则将是灭顶之灾。依靠旧思想不会支撑太久。”雅科夫列夫沉思道。

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就这样结束了，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大家都在谈论美好的思想。但是没有想到，善良的思想铺就的却是通往地狱的路。



## 探索改革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新办公室——苏共中央大楼第五层6号，总书记办公室。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对他来说，这间办公室是权力的真正标志，就像俄罗斯帝国历代君主的王座、权杖和金球权标一样。总务人员用一夜时间就把房间整理好了：更换地毯，给地板打蜡，将全套胡桃木家具重漆一遍。布置休息室要多费一些工夫，不过这并未妨碍总书记搬迁，他已经在新套房中接待客人了。

办公室很宽敞。苏共中央大楼的第五层与其它各层不同，这一层的办公室都很宽敞，而且都在走廊的一侧。入口的右侧是一排朝向苏共莫斯科市委大楼的大窗户，总是挂着用细亚麻布做的“法式”窗帘。窗旁摆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和“总书记”的皮转椅，正对着门口。按苏共中央的惯例，墙上依然挂着列宁的画像。

转椅旁是一个敦实的胡桃木制的通讯控制台，台内布满电子通讯系统和纵横交错的电线。台上摆放着几部用于城市间联系的保密和绝密通讯装置，还有与国家领导人进行联系的通话器的按键。这个控制台可接通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还有许多极为重要的、由总书记直接控制的国家部门——克格勃、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总参谋部、军事工业委员会、《真理报》的负责人，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顾问。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助手和其他许多人的通讯联系是双向的，这些人可以随时与总书记通话，所以总书记实际上总是不停地打电话。在总书记的写字台前有一张不大的桌子和两个转椅，这是为客人准备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张宽大的会议桌，会议桌的一端是总书记常坐的位置，左手一侧有两部政府专线电话。在会议桌的尽头，靠墙立着一个大书柜，里面排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百科全书、参考书和其它常用书籍。办公室的地板选用柞木铺成，并用深色木料镶了边。从门口到写字台铺着淡绿色的条形地毯，会议桌的四周也铺这样的地毯。办公室里还有几张用来摆放水瓶和书报的小桌子，窗户的对面有一排椅子。离写字台不远是通向休息室的门，休息室里有一张摆着几部电话机的写字台，一张餐桌，一张沙发床和一面供理发师给总书记整发用的镜子。墙边放着一个又高又大的书柜，还有一个国产的保险柜，里面放着一些十分重要的文件和一些个人物品。

办公室和休息室的所有家具、门、窗台都由深色胡桃木制成，而门框和窗框则由浅色柞木制成。墙壁上贴着漂亮的木纹壁纸。戈尔巴乔夫很适应新的环境，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他喜欢这套房子，喜欢那个通讯控制台，它使他能够同我国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享有通讯服务的人联系，能够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联系。后来他经常在这间办公室与法国和美国的总统、与社会主义各国的领导人通话，祝贺他们的生日或他们国家的国庆节。

不过，这间办公室并非完全让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满意。在这里，他那奔放的个性受到了限制。我曾几次参加讨论增加总书记用房问题的会议，他提出将第五层整个划归他个人，设一个“自己的”电视演播室。当时尼·叶·克鲁奇纳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经常来找我，他不知道这样一来该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设在哪儿，该把利加乔夫从第五层的办公室搬往何处。但不久便作出决定：将相邻一座楼里的电影厅改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室，把利

加乔夫安排在第三层一间新装修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又成为苏联总统）时，整个改建方案已经制定好了，但总书记这时又迁入克里姆林宫了。不过这是后话，而在当时，在 1985 年春天，大家都在满怀希望地盼着情况好转，因为还有许多工作等待人们去做。

处理完当选总书记后的一些必要的例行事务和一系列紧迫问题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认真思考为改变国内局面并证实他那些设想的重要性而必须采取的步骤，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之前对将要实行的变革曾进行了无数次的讨论，但生活表明，它们一接触实际，便都成了难以实现的方案。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大致知道该做些什么，但他们谁也说不出口“该怎样做”，又从何做起。应当说，新领袖的出现本身并不意味着将要进行的改革是重要的，也不意味着他已经有了一套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改造的较为周密的办法，他必定要进行摸索，或许要犯错误，这一点使总书记非常不安。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对国家命运的重大责任，幕后活动和宫廷密谋再也不管用了，人们等待着实际的变化。变革的条件也是极为有利的，不过，看来夺取权力要比保住权力容易。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便请来了几位中央书记、他的助手和他所信任的其他一些人，共同商讨新的领导班子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议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尽快更新干部队伍，撤换那些曾与前几任总书记关系密切、又不能胜任所在部门工作（这些部门都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工作状况）的领导者。其实，这显然是随意任免干部的一种借口。第二，继续贯彻执行加速国家科技进步、优先发展一切生产改造的基础——机器制造业的方针。戈尔巴乔夫早就认为，我国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机器制造业不发达而造成的，他当时就下决心更新生产设备，将全部机床实行二至三班工作制，使用叶轮综合装置。第三，总书记到全国各地走一走，视察一些劳动集体。当然，还讨论了农业和建筑业等问题，但讨论这些问题只是为了作进一步研究和提出建议。戈尔巴乔夫决定首先走访首都一家工业企业。他请我来安排这次出行，还要求尽量不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总书记想去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还想去一所区级医院、一所学校和一家商店。我照此安排了路线，可结果这次暗访还是成了明访，因为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维·瓦·格里申。自然，在总书记到来前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如果说在几天内工厂里很难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医院里的情况同我事前所见的相比则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院中的大小道路和医院门口处的街道重新铺上了沥青，那沥青还散发着热气。我们所到的那层楼，不允许病人走出病房。总书记卫队的人后来告诉我，当时领我们看的那两三间病房里躺着的都是安全部门的人，这些两颊红润、留着短发的年轻人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伙食赞不绝口，只是难以说清自己的病情。他们谈起自己的病来语无伦次，害得医生们不知如何是好。还让我们看了几处虚假的地方，比如，请我们来到工人新村里的“随便一个”住宅，一个“普通工人的”住宅，“刚好赶上”他们家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还有糖果、饼干等，可以看出，许多东西是从保卫部门的食品特供车间弄来的。此外，就连墙上的挂毯以及其它一些用具说不定也是借来的。戈尔巴乔夫亲切地与这位工人交谈，询问他的工作和家庭情况，然后同他亲切握手，祝他幸福并在工作取得成就。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这种欺骗做法，而在于戈尔巴乔夫肯定感觉到了这些造假之处以后竟然接受了这种做法，允许记者们拍摄这些虚假的场面，同意

在这出戏中扮演角色。时隔不久，在一次总书记出行返回途中，我在飞机上想起了这件事，便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讲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听，我以为，他们知道真情后会好好想一想的。我内心当然希望他们能坚决反对这种欺骗的做法，严厉追查那些千方百计地蒙骗总书记的人。但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反应令人感到意外：

“您认为该怎么样？难道您请人来作客时不把家里收拾一下，不把所有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吗？”

对此我很难反驳。的确，家里如果要来客人，我也总是要把房子收拾一下，但我家里来的不是这样的客人，而且住宅毕竟不是医院或国营企业。这里说的是政治性访问，而不是老朋友聚会“喝茶”。当然，我当时还想说，总书记不是客人，而是主人，是国家的领导者。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怕他们误解。不管怎样，事情已经明摆着了：这种表演已得到肯定，今后还会重演。不过，我当时并没想到整个生活不久就会变为一个演员的戏台。

在安排党和国家的新领袖首次出行的另一个地点——莫斯科汽车制造厂时，我曾认为，要是戈尔巴乔夫确实想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他就应当像工人们一样乘公共汽车、地铁、电车到厂里去，这样的话，从一开始就能看到劳动者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我还提议从工厂到区医院、到新建住宅区也乘公共汽车，党的领袖是工人的，是全体人民的，用不着害怕与他们直接见面。可是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我的所有建议，大概还以为我这个人不正常或者不严肃。我知道，坐在专用的“吉尔”车里是比较安全，可是隔着防弹玻璃又能看到什么呢？总的说来，总书记在第一次出行过程中所看到的都是当地领导人想让他看的东西，他们希望总书记看到：莫斯科是一座模范城市，市领导们在为首都的繁荣和居民的幸福日夜操劳。不过一切都是相对的，昨天还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往往今天就会被许多人欣然接受，再说总书记当时也未必想了解什么情况，重要的是通过报道告诉人们，他到首都工人中去过。

在那次由戈尔巴乔夫召集的小型会议上还就政治和经济方面首先要采取的措施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贯彻，不过它们都是些即兴之举，没有涉及必要的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而人们还在等待变化。

有多少个家庭渴望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盼着过上更有保障的生活，享有更多的自由，住上更好的房子，谁也不知道 1985 年初春开始的这场试验将会给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过多数倡导和支持改革的人都真心希望尽快改善状况，尽快取得良好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走上新岗位后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他给雷日科夫（还有我）布置的头一项工作就是确定人民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同雷日科夫关系不错——他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和他很快研究出一系列最紧迫的问题，并指出应首先解决这些问题。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当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给人们土地，保证所有希望得到土地的市民有一块地，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意见一致，而且我在《真理报》工作时一直主张这样做。当时我负责农业问题，又认识莫斯科市的领导，便给编辑部争取到一块地搞园圃合作社。地不太好找，后来还是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国营农场分出来一块儿。这个合作社至今还在发展，《真理报》的许多工作人员常去那里劳动，自己和家庭都得到了实惠。

我还在报纸上宣传给所有希望得到土地的人分地的主张，建议将没有耕种的土地分给企业劳动集体，把所谓的“无人”村转给它们，事情曾有些起

色。可是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许多事情又变回去了，开始追查浪费土地、违法建造别墅等做法，后来便禁止给任何人分土地了。现在雷日科夫和我又提出了这个想法，我们还提出改善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等建议，后来这些建议都形成了具体的决定并逐渐得到落实。除了采取旨在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满足居民诸多迫切需求的措施外，中央政治局和政府还制定并通过一系列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其中包括关于生产集约化，关于提高生产效率，关于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和能源工业并提高其技术水平，关于改造钢铁工业，关于改进设计工作和基本建设工作，关于采用新工艺和计算机技术等决定，并开始落实完善行业管理及利用劳动资源的决议。

如果仔细分析当时那些决定的标题和内容就不难发现，它们与从前那一套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一切措施无异于给一条四处进水、正逐渐沉入漩涡的破船堵漏。每当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一些地区走了一趟之后，总要作出发展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的经济的决定，决定越作越多。这样一来就分散了资金，降低了投资效益。尽管“改革”一词已流行全国，可是还没有进行社会改造的总体构想。在经济改革方面最初十分冲动地走了几步，很快便遇到障碍，受到限制。国民经济发展优先项目的选择具有偶然性，我们曾多次对总书记说，不制定统一的发展构想，不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取得局部的积极效果。要有严肃的理论作为实现转变的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地一步步进行改造。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况且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不能忘记，社会上多年来积聚了一股强烈的不满情绪，它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许多人都十分清楚这一点，尤其是那些社会先进分子即学者、经济部门和管理机构的专家、军事指挥员及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就是所有知识界的精英，他们总是倡导并具有进步思想。在 80 年代中期之前，这些人就已经对改善社会关系、实现国家民主化、为沿着科技进步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创造条件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

我国早就有了不少改革的构想，但一直没有付诸实现。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出现，消除了人们对因叛逆思想而遭受镇压的恐惧，从而使我国大批的社会学学者站了出来，使社会改革方面的种种措施得以提出。当时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收到了大量有关实现国内转变方面的建议。柯西金在 60 年代中期进行的许多经济改革就是在这些人以及较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倡议下开始的。他们的思想基本上也是 80 年代开始的各项改造活动的基础。

我与各学科的著名学者、文化和教育活动家及作家进行过频繁接触，这些人具有非常进步的观点，看到了我们的制度的弊端和管理社会方面的缺陷，在那些年里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大家深知，使许多思想无法实现的障碍就在于领导者的因循守旧。党和国家上层人物是那样的衰老，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向前看，没有能力思考祖国发展的前景。苏共二十六大之后已经可以看出，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可能活不到下一次代表大会。一部分知识分子更是深知这一点，因为他们早就在不安地关注着领导层内力量的配置，了解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实际情况。

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才引起了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当然，人们最初将他视为农业问题专家，这样的看法对他的前途是不利的，因为国内对这类人物早就不满了，认为他们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的粮食问题。但人们渐渐地又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些能给人以希望的特点。

戈尔巴乔夫属于比较新的一代人，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魅力，尚能鼓起那些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位在实现社会上的改革思想的过程中可以依赖的领袖的人们。于是这些人（其实并非大家一齐也并非毫不犹豫）便把宝押在了戈尔巴乔夫身上，帮助他扬名，帮助他在曲折的仕途上步步升迁。

新总书记的当选激发了社会上一部分受进步思想影响的人的创造性思维，他们实现转变的共同愿望十分强烈，学者、专家、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愿意向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幕僚们提出自己对国内改革的建议。他们一连几个月坐在党和国家提供的秘密别墅里，提出了一个个关于经济改革、社会民主化、完善政治制度、改善国际关系的新构想。

在起草调整经济关系的建议的过程中，尼·伊·雷日科夫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工作。总之，建设性的思想已提得相当充分，其中有些还被新的总书记拿去到处讲演。但是整体构想仍未形成。因为戈尔巴乔夫竭力反对这样做，他认为、按部就班只会把事情搞糟。今天看来，他不愿这样做显然另有其真实原因，许多人曾一再要求（包括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要求）讲明我们在走向何处，而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1988年之前，戈尔巴乔夫一直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这位新领袖的行为中以前从未出现过逃避、悲观和善变的情况。后来，思想的泉源逐渐干涸，许多学者不知为什么开始回避总书记了。于是戈尔巴乔夫只好不断地给自己那班人马鼓劲，并经常撤换助手和给他起草报告、讲演稿和对记者谈话稿的人。

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制定改革的种种方案，为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选配干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他就具有从事这类工作的超人经验。我记得，他在加拿大从事外交工作期间就搞了一个涉及我国各个主要方面的改革计划。在主持戈尔巴乔夫智囊团工作后，亚·尼·雅科夫列夫吸收了许多专家，经过综合各方面材料，确定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概念，还确定了为实现国内的转变而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他长期领导“写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除他之外，智囊团中还有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如瓦·安·梅德维杰夫、阿·阿·阿巴尔金、阿·格·阿甘别吉扬、安·伊·安奇什金、斯·阿·西塔良、比·克宁、斯·谢·沙塔林、尼·雅·彼得拉科夫和莫任等。各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部、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以及其他各部的许多专家也常参与工作，改革的主要思想在这个班子里不断产生，有识之士为改善国家的状况而提出的建议也在这里得到总结概括。在报告和讲话稿的起草工作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一些助手才参加。总书记自己选定几个人，然后，要么在他的办公室里，要么就在新奥加廖沃或沃伦斯科耶的国家别墅中，和他们单独商讨。

尽管有一个由诸多高水平专家组成的庞大的班子，他们能够提出一套实行国内改革的连续性构想，但是却从未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我曾几次试图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均遭到反对，所以只是分析了一下80年代中期党内和国内的形势，时间都白白浪费掉了。许多事情都是凭一时心血来潮盲目地去做，而没有考虑后果。人们在完成总书记交给的任务时，总是天真地以为他知道首先要做什么。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一直认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加快发展速度。

我已经谈到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多次听说以前曾打算召开一次有关科技进步的全会，于是便决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认为，国家的

所有不幸都是由于机器制造业不发达而造成的。他想抓住这个环节来带动全局，因此也就格外关心机器制造业方面的问题。当时决定于1985年6月就这个问题在中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而且很快便开始筹办这件事。需要搞一个内容相关的报告，一个由专家、生产部门的人员、思想家组成的班子马上去往沃伦斯科耶2号别墅，在那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准备好材料。

会议在中央全会会议厅举行。这个会议厅是不久前建成的，与苏联最高苏维埃大楼相连，也算得上是个建筑杰作，尽管它并不实用。工农兵大理石群雕装饰着墙壁，整个建筑用的都是大理石，据说是从意大利运来的。其它设备来自世界各地。所有的桌椅都用美纹桦木制成。座椅装有增音器，而且很舒适，宜于休息，所以开会时常常听得到阵阵鼾声，在听那些内容陈旧保守的报告时更是如此。还有地面和墙壁都用大理石装修的豪华休息厅，宽敞的餐厅。整个建筑设计精巧，与克里姆林宫内的建筑群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参加这个会议厅的设计和建设的获得了列宁奖金。

现在，学者、工业企业的领导者、各部部长、中央委员第一次聚集在这个会议厅里。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准备得不错，大家听得很认真，发言热烈而又尖锐，这些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这次电视转播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看到，与会者就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许多人根本没有发言稿。新总书记也与前几任不同，讲话好动，眼睛不时离开讲稿（尽管这次他还不太敢这样做），给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在党内，在人民中间，相信新领导精明能干、思想解放的人越来越多。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前几年里说话根本没人听。

我还想重申一下，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7年间的讲话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大业，应该继续建设它。社会主义的原则没有改变，而且将来还要实现主要目标——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最初，这些公理就是戈尔巴乔夫所有构想的基础，而且我认为，他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的态度无疑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愿，国内所有的人确实盼着转变，而且是彻底的转变。他们期待着经济、外交、社会民主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希望有新的刺激办法，希望解除对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活动的束缚，但又不想失去早已享受惯了的种种社会保障。党是支持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工作的，况且他说过要保留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和已取得的各项成就。

但是不久事情便有点儿走样了，头一年的工作实践已经表明不会很快取得成果。而戈尔巴乔夫却提出，一旦我们为农业松绑、给人们以采用各种租赁形式的自由，那么一两年内我们就会实现粮食市场的繁荣，这表明他已远远地脱离了现实生活。

当他决定把这一提法写进报告时，我曾试图劝阻他，说这样做不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听后勃然大怒：

“你根本不了解农民的特点。看人家中国发展得多快，而我们不比他们差。”

不过，他在自己的讲稿中把繁荣的时间推后了两三年。

在对改革的可能性的如此幼稚的认识支配下，他作出了一个个仓促的决定，在管理经济、刺激和组织生产方面采取了种种不可靠的方法。最主要的一点是开始逐步撤换干部。这项工作在各个领导层进行，也涉及到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戈尔巴乔夫往往不按专家们的建议去做，却采纳另一些人的主

张。从思想上和人员上的这种不断变化中可以看出总书记内心的慌乱无措。为了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构想，但每一次转变都使人感到，这明明是要转而采取资本主义发展的方法，而且还是资本主义在最不成熟的初始形态时的方法。虽然还在一本正经地大谈建设社会主义，大谈共产主义远景，但这些都是空话，如同一块遮羞布，在掩饰见不得人的思想和放弃党的全会和代表大会所确立的方针的做法。

理论上的摇摆不定也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决定的。从很早时候起，从中学时代一直到上大学、做团的工作、做党的工作，他就习惯于遵循中央制定的路线，认为自己的工作取得成绩、得到赞扬和掌声是应该的事。他 16 岁就获得了政府的奖励。在中学，他是团组织负责人，毕业成绩优异；接着又免试进入莫斯科大学，在那儿仍然是团组织负责人，并再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些年来伴随戈尔巴乔夫的一直是表扬、扶持，也不乏对其能力的赞赏。这些在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也可看出来，当时戈尔巴乔夫没有去当检察官、去做那难以自我表现的日常法律工作，而走的是一条从做共青团工作到做党内工作的升迁之路。在社会组织中工作使他总能抛头露面，但他没有经受过生产实践的锻炼。也许戈尔巴乔夫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就在于他一生从事的都是机关工作，这便给他造就了一副“ 柔软的 ” 脊柱，而不是坚强不屈的性格。所以，当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在实际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便失去了对改革的兴趣，而去改做其他事情。他的主要活动范围自然很快便局限于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或在电视上讲讲话，再有就是出访西方，因为在那里他作为国家的代表受到了尊重和欢迎。

可是，戈尔巴乔夫从主持政治局工作时起就担负着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对千百万人的幸福的责任，人们期待于新领袖的不是夸夸其谈——这些他们早就听够了。他们期待的是制定明确的方针，指出前进的目标，实际地改善生活，而绝不是使生活变得更糟。

改革之风已吹遍全国，人们企盼着发生变化，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和公开性，希望能公开说出最困难的问题。人民急于要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他们把戈尔巴乔夫看成了自己的保护者，看成了自己的希望。党的机关、经济部门和苏维埃机构的戒心都被普遍的兴奋之情所淹没。从全国各地和国外寄给总书记的信一封接着一封，人们纷纷写诗，把戈尔巴乔夫比作救世主。

我浏览着这些来信，不时地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信的内容。他喜欢看这些信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还时常将他喜欢的地方重新念诵一遍，或是从来自国外的反应中引证几段话。

“ 这儿还有，你听！ ” 他说着便拿过一份单独为他准备的塔斯社内部消息念了起来。“ 俄国正在进行的由它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建设性改革在东欧联盟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恐怕还应付不了本国日益高涨的改革浪潮。 ”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戈尔巴乔夫爱看那些称赞他的报道，大概不是西方的情报部门就是我国的驻外大使们。不过可以说，总书记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消息都是吹捧新领袖的，我们的每一位驻外代表都把从西方的报纸或杂志上谈到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伟大事业的文章剪下带回来视为自己的义务，还要亲口对总书记说，外国的领导人和“ 老百姓 ” 都喜欢他。

从国外寄来的邮件也增加了好几倍，许多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了纪念

品、家传宝物、钱和贵重物品。各国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纷纷制作金、银、白金纪念章和纪念币。总书记收下了很多东西，他真的相信得到这些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甚至当人们认识到戈尔巴乔夫真正关心的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自己的名声，纷纷离他而去的时候，他还在相信这一点。

我已经感觉到，一些事情越来越令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烦恼。从1988年即开始广泛的试验时起，经济方面的实际情况越来越糟，所说的事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政治局、党、人民都看到，总书记正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戈尔巴乔夫也知道这种状况，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他拼命地琢磨着种种奇思怪想，提出越来越新的达到目标的办法，千方百计地要扭转局面。在这一时期，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些据说是在许多国家验证过的建议，开始是匈牙利道路，而后是瑞典道路和奥地利道路。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资本主义就成功的效仿了社会主义的许多东西。但是我们尚未实现整个体制的深刻变革，因此很难采用人家的管理方法。所以只取个别方法加以采用的做法使经济工作者们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失衡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并面临着失去权力的危险，为了清除那些不赞同他的路线的经济工作者、党的领导者，他急急忙忙地开始筹划在生产领域实行“民主化”。最初是建议选举产生厂长和企业领导者，这样就可以除去一部分固执已见的经济工作者。随后戈尔巴乔夫又建议打击“司令部”，惩治党和政府中不服从他的经济领导音，撤换各级管理机关的官员，但是换人的做法仍然无效。

这使戈尔巴乔夫感到很不安，他明白，全党和中央已有所警觉，于是总书记变得垂头丧气起来。他已经不能再采用以前的工作方法了，因为实现转变根本没有指望。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又不敢转向市场的轨道，摇摆不定是1988~1991年间他的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既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勇气后退。党的各级领导者看不到实现转变的道路上的明确目标，也看不出进展，他们已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他们知道，和他一起会走上死路。有民主意识的人也一下子都离开了总书记。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悲剧，但这也是党的悲剧，是我们全民族的悲剧。他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党看不起他，社会上那部分民主人士嘲笑他，只有西方国家在为他唱赞歌，他们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为他们做的事，千方百计地支持他。

所有这些事都是在四年以后才发生的，而当时还只是在确定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的办法。

### 追根溯源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我几乎不去注意同我一起囚禁的人，所以一时没有发觉少了一个人，他又被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第二个年轻人叫季马，两年多来他一直在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有文化，讨人喜欢，看到我的状况便尽力帮忙，为维护我的权利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在这里你要是不争辩，你就会倒霉。”他说，“其实就是想法子做无罪推定。大家都知道你是罪犯，把你当成杀人犯、施暴者、人民的敌人。所以要自己为自己开脱。没有人来为你说话。”



康·乌·契尔年科刚刚开始为参加莫斯科市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活动做准备，西方国家使馆和情报部门的分析家们便纷纷发回通报，说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还列出了几个有可能得到总书记职位的人。这几个人中就有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不是排在第一位。排在前面的是几位经验和阅历都比较丰富的政治家，不过，戈尔巴乔夫这颗星在天边刚一出现就十分引人注目。人们仔细分析的不仅是他的道德面貌，还有他的爱好、工作能力、受教育程度、职业修养、家庭关系、长处和弱点。

当新总书记开始以他那迷人的微笑征服国内外人士的理智和心灵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记者们却在打听：戈尔巴乔夫是在什么地方成长起来的，他是从哪儿走上了这决定克里姆林宫政策的顶峰的？这或许是对这个农民的儿子曾经出生、生活和劳动的地方的赞美，或许是对戈尔巴乔夫本人——一个能从遥远的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升上高位、获得显赫权势的人的钦佩。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和道德观念、决定了他的工作能力和行为方式呢？

我同他一起工作了10年，因而得出了一些结论，而且总书记本人也谈到过是什么影响了他的性格的形成、使他成为一位政治领袖。首先应当谈到的是遗传影响，这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从住在切尔尼戈夫的母亲家庭和住在沃罗涅日的父亲家庭得到的，他认为这很重要。很难说出这个家庭的祖辈们经历过哪些事情，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时常遭受不幸，曾经带头参加集体农庄运动，也同苏维埃政权对抗过。这一切无疑对米哈伊尔的性格产生了影响。

他的祖父安德列·莫伊谢耶维奇是个性情忧郁孤僻的人，曾拼命反对取消个体经济，抵制生产集体化即成立集体农庄。大概是因为这种对新生活的不满，他也被送去流放了，有的资料说是去西伯利亚于了几年代木，还有的资料说是去了马格尼特山。回到家乡后，他从不与人来往，还是那么孤僻、固执，一直在离家很远的农场干活。

他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则完全是另一种人。新政权很合他的心意，使他的组织才干和能说会道的本事发挥了出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安排集体农庄生活方面。1937年他被逮捕，坐了一年多的牢，但不久便获释，恢复了党籍并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战争拆散了这个家。在农机站当机务员的父亲应征参了军，外祖父潘捷列伊和农庄的人一起去了高加索山区，祖父安德列留在村里。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常常回忆起那个艰苦的年代，不过有一点他不太愿意讲：德国入侵者曾到过他的家，强迫他给他们做饭，米哈伊尔一连几个小时给鹅、鸭、鸡褪毛，烧给德国鬼子吃。戈尔巴乔夫没有谈过法西斯的暴行，而有一件事——一个给德国人干事的卡尔梅克人用马鞭抽了他一下——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他时常记起这次对未来的苏联总统的不友好行为。

米哈伊尔从祖辈和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种矛盾的性格，缺乏信心，心慈手软，组织才能和口才，农民的精明和吝啬，这些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戈尔巴乔夫在农民家庭里成长为一个勤劳能干的人，他天生头脑清醒，记忆力强。他善耍手腕，这种本事多年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尽管对于那些比较熟悉他的人来说，他想出的计谋并不高明，很容易识破。他不仅善

于战胜对手，而且无论事情如何变化，他都能想方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对生人来说，识破这些计谋就相当困难了。他能够左右论敌的思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使其陷于被动防守的境地。

早在日内瓦会谈时里根的助手们就摸清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性格特点，于是他们竭力劝说美国总统在会谈中不要接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谈话提纲和讨论题目，要避免它们，或者经常变换话题。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他的这种手段已称得上是精湛纯熟了，但要追根溯源的话，这无疑是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的那几年里，即在他政治上的成熟时期打下的基础。

早在青少年时期，戈尔巴乔夫就表现出了领袖才干。他在学校中担任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组织青少年的各种活动，参加业余文艺活动并亲自登台演出。戈尔巴乔夫在回忆那个时期时讲到一件事：有一回他带领全校学生旷课，去参加引水进草原的通渠庆祝活动。对于久旱无雨的地方来说，得到水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这也是他不惜旷课去参加庆祝活动的原因，可见他当时的政治嗅觉恐怕已经比学校的老师还灵敏，因为老师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在当时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戈尔巴乔夫干的许多事都得到了校方的原谅，因为他是一名优等生，是一名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的学生，而且在后来几年里还成了在农机站工作的父亲的好帮手（这个农机站负责整个集体农庄的机械化作业）。

和当地的许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很小就开始在田里劳动了。不过，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就是如此，因为村里已没有什么人了，战争使村子遭受了重创。它也在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经常回忆那个时期，给人们讲述他如何为避免被法西斯驱赶到德国而在远离村子的农场里东躲西藏。当然，这同德国人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许多地区的暴行相比算不了什么，但它还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产生了影响。

在战后的几年里，米哈伊尔常帮助父亲开联合收割机，他不光得到了同龄人的称赞，在 16 岁那年，他这个联合收割机副驾驶还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劳动红旗勋章。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直到父亲退伍之前，他始终是凭自己的能力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所以他的劳动素养是相当高的，是经受过饥荒和经济破坏时期生存锻炼和检验的。

原本不错的遗传素质经过战争时期艰苦环境的磨练后，如同一座发射台，使他得以青云直上。

米哈伊尔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凭借着这枚奖章他可以随意选择学校。根据斯塔夫罗波尔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的讲述，可以判断出他为什么单单选择了法律专业，尽管他并不想把所学知识用于这方面。最初他很向往铁路部门的职业，甚至准备去罗斯托夫上大学。当时，卡冈诺维奇管辖下的运输业被人们称为国中之国，在那里工作不仅挣钱多，还发制服。铁路部门有内部的商店、医院、疗养院，并提供其他许多福利，住房条件也比其他部门优越。然而家里人却劝他去首都上大学，这是出于好心。当时报刊上发了许多有关在沃罗比约夫山上建莫斯科大学新技舍的消息，还纷纷登载新校舍模型照片，介绍大学生们优越的生活条件。

总之，大家都认为应该进莫斯科大学，可是上哪个系呢？为什么这个中学毕业生选择了法律系？对此人们说法不一，但记得那个时期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当时除了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尽管米哈伊尔也十分想去，但因

外语不好而没能去成)之外,护法机关——国家安全部、内务部、检察院的工作也是令人羡慕的。当然,在那个时期人们对拥有无限权力的内务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不无恐惧。在这些机关工作的人,别的都不说,单是身上的制服就不比铁路职工的差。

应当说,一个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有出人头地的愿望是无可指摘的。年轻人往往都是先看到形式,而后才看到内容。于是米哈伊尔进了法律系,开始了他大学阶段的辉煌旅程。

是的,没过多久米哈伊尔便不再醉心于自己未来的职业了。戈尔巴乔夫在他家乡的一个区(当时这个区以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检察院实习时,接触到了侦察人员那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审讯那些违法的小人物,记录口供,办理形形色色的案件。这些使他的热情有所降低,也使他明白了,平坦的道路并不是通向目标的捷径。不过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职业的重要性,所以他常用区检察院的公文纸给心上人写情书。可见,他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顺便讲一件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曾经决定发表一封这样的情书,想以此来说明丈夫对她的热烈感情,她让我把这封信复印一份。我当时建议把公文纸上的单位印记遮住,以免给人以“用公物办私事”的口实,我想,就连当年的法律实习生都知道这是件不体面的事。按照那个时期的法律,这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不过这种事情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可笑的。然而,不知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不了解这其中的讽刺意味,还是她觉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会因这件很久以前的事受处罚,我的建议被否定了,也许她认为保持原样好。于是,莫洛托夫区检察院的公文印记便随同当年的法律实习生——戈尔巴乔夫的信赫然出现在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名义出版的书中。该书是由散文作家格奥尔吉·普里亚欣写的。书名令人费解:《我希望……》。这部作品于1991年夏天出版,很难说当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究竟希望什么。

信是寄往首都的,密密麻麻地写满一整张公文纸,信末工工整整地写着日期——1953年6月20日。

当时正值拉·巴·贝利亚下台,整个护法系统都已经垮掉。国家需要纯洁的新生力量来充实安全部门、内务部和检察机关。应届毕业生们前途广阔。其实米哈伊尔在那个时期是难以被安全部录用的,因为他在德军占领区呆过,还有几个亲属被镇压了。

在那个年代里,在德国占领区呆过的人是很难晋升的。1986年,有人说苏共中央一个部的副部长的父亲在战争时期与德国人有来往,戈尔巴乔夫便下令立即将这名副部长调离中央机关。后来此人被调到别处工作,尽管总书记本人与他相识多年,也赏识他的工作能力。我得知此事后,便同总书记的农业问题助手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卢希科夫一起去找戈尔巴乔夫,请求他撤消这个不公正的决定。这个同志我们早就认识,我们对戈尔巴乔夫说,指控没有核实,再说该同志当年才10~12岁,他不能为自己的亲属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戈尔巴乔夫态度很坚决。一年期间,我找过总书记好几次,也给克格勃的领导打过电话,请他们核实各种情况,可是都没有结果。最后情况终于搞清了,这个同志的父亲当年留在敌后是为了做地下工作,他为我们的胜利做了不少工作。但曾经给他下达任务的人不是牺牲了就是已经去世,后来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才搞清真相。我把调查结果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并提

议让人家官复原职，然而总书记已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拉不回来了”。

“你不要再劝我了，决定已经通过。他现在又担任了新的职务，我看他没有必要再去干以前的工作。”

只是在政治局委员维·彼·尼科诺夫来中央工作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向我了解了详细情况，批准这个遭受诬陷的人重回中央工作，因为他也早就认识这个人。戈尔巴乔夫对此只好默认。所以，戈尔巴乔夫很清楚有被怀疑的亲属、有在德国占领区的生活经历意味着什么。

也许在当时，在 50 年代中期，他就了解首都和国家的常规，明白以自己的经历在护法机关工作是没有前途的。他没有被安全机关录用，不过，作为共产党员和优秀生，他被推荐到苏联总检察院，当时总检察院正大批撤换那些在斯大林时期作恶多端的人。但他在这里也不走运，总检察院没有他的位置，大概还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种不幸深深地刺伤了戈尔巴乔夫的心，他当上总书记之后还对这件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耿耿于怀。有一次他说，70 年代中期苏联总检察院曾有意要他，但他回绝了。

年轻的法律系毕业生不得不回家乡去。在这一点上他是走运的，因为当时大学毕业生都被派往国家东部地区，往往是那些正在建设的城市和开垦生荒地的地区。他是共产党员、共青团的领导，当然更应该到边远地区去。不过，看来上帝那时就很关照米哈伊尔，他没有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或是采林内边疆区，而是去了斯塔夫罗波尔。

米哈伊尔回到家乡后才发现，这里根本不需要他，在边疆区首府他没有得到一个体面的职位，而到外省去，既埋没自己的天才和丰富的知识，又实在不值得。

莫斯科大学还给了戈尔巴乔夫某种比法律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在这里，他检验了自己作为青年运动政治斗士的能量，而且在大学生中担任领袖当然是件有诱惑力的事情，它可以满足人的虚荣心和野心，和不少年轻人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有强烈的虚荣心和野心。他在大学里结识了不少有识之士，这些人的思想后来曾对社会舆论产生很大影响。在大学里，他与自己的同窗，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68 年之后又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的兹杰涅克·姆利纳日交上了朋友。兹杰涅克去过斯塔夫罗波尔，是到戈尔巴乔夫家作客，我想，戈尔巴乔夫能在那个时代邀请一个外国人作客是要有一点勇气的。他们之间的友谊相当牢固，戈尔巴乔夫总是充满深情地回想起这种友谊。他经常谈到斯大林去世的那段日子，当时不仅我国，而且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兄弟国家都为斯大林的死感到震惊。

“米沙，我们大家的命运将会怎样？”姆利纳日问道。“这下我们全完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尽管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所走的道路和所持的观点一时不同。昔日的友谊被“布拉格之春”时期的冷淡关系取代，当时他们分别处于两个敌对的营垒。戈尔巴乔夫依然信奉传统的共产主义模式，姆利纳日则另有追求并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不过他们并未公开断绝关系。

戈尔巴乔夫升任总书记后，姆利纳日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苏共新领袖的文章。有一回，戈尔巴乔夫搞到这篇文章，便谈起了姆利纳日，并提到他们曾是好朋友。戈尔巴乔夫又看了一遍这篇文章的译文后说，文中没有说他一句坏话。他们的友谊很快又恢复了，姆利纳日常去戈尔巴乔夫那里，给他提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不能急于毁掉业已形成的结构。今天看

来，很难说这个人在同戈尔巴乔夫相识期间对其产生了哪些影响，不过他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在莫斯科大学做社会工作使戈尔巴乔夫认识了许多人，了解到大学中青年精英们的活动，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可以让人看到走向权力的途径，虽然这只是共青团组织内的权力，可它是首都的共青团组织。

戈尔巴乔夫感受到了首都生活的美好，他曾为自己未卜的命运而担忧。现在，年轻的法律系毕业生更加为此而不安。1953年9月他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生赖莎·季塔连科结了婚，想必那时他就考虑工作问题了，这也是为了妻子。既然边疆区检察院系统也没有合适的位置，他就很可能要去边远地区，而这是这位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值得骄傲的莫斯科大学文凭的年轻人从未考虑过的。戈尔巴乔夫早就懂得，要想不靠命运的恩赐应该去敲哪些门。当时党的机关中的风气还不像70年代中期那样差，边疆区党委会不仅马上接待了他，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帮他调整了工作。他想当一名共青团工作者，干一阵子社会工作，因为他在这方面有着在首都积累下的丰富经验，而斯塔夫罗波尔的共青团员们还的确缺乏莫斯科的经验。

命运又一次对戈尔巴乔夫发出了微笑，他马上被任命为共青团边疆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位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看来，这是个十分体面的职位。

戈尔巴乔夫一头扎进繁忙的共青团工作之中，那段时期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直到担任总书记后，他还时常回想起那些年的情况，讲述他如何在村村镇镇间来回奔波、召开团员大会、组织辩论会、回答种种问题。当时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冰雪开始消融、到处充满生机，举国上下发愤图强，工业迅速发展，农村的状况不断改善，新兴城市四处崛起，科学中心纷纷建立。火箭飞上了太空，苏联人征服了宇宙，时代造就出一批天才。物理学家与诗人展开了争论——世界有多大、精神与物质哪个更重要。

变革的春风也吹到了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这种转变时期当一名组织者和宣传者是再合适不过了。时代推动着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政权机关内不断升迁，他终于在1970年春天登上了这座金字塔的顶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说到这里还应该谈到一个因素，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是决定命运的因素。

如果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么他的未来是什么样就很难说了。这也许使人感到奇怪、但是妻子的观点、性格确实对戈尔巴乔夫命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党和整个国家的命运。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性情倔强、严厉、有支配欲的人，她善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善于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很快当上了国家第一夫人，这种感觉肯定要比戈尔巴乔夫真正感到自己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来得更快。她经常毫无顾忌地给总书记的助手和国家某些领导人，尤其是她认识的人打电话，让他们干这干那。作为大权在握的主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立刻成为党的领导人的夫人们的头领和组织者。她在苏联文化基金会担任领导职务，说得明确一点，就是这个基金会的头。按照她的吩咐，许多文化机构、群众性宣传机构都安装了政府电话。她的汽车以及克格勃卫队的护送

车队都装上了和总书记一样的通讯工具。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极快的速度同各国外交使团的夫人们建立了联系，每逢“三八”妇女节都要接见她们。有一天夜里12点左右，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当时我还在工作。他经常在很晚的时间打电话，交待一些他突然想起的事情，而他的这类想法往往都是在傍晚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散步之后产生的。这次谈的是关于在“三八”妇女节安排接见的问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接见来宾，具体工作由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去做。事情定下来了，不过决定是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戈尔巴乔夫要求把它改为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这次活动给予必要的推动。中央有关部门立即照办，这项决定很快便出台了，它在当时高于任何法律。

接见于3月初在列宁山上的一所国家别墅举行。那天到场的有领导人的夫人，各国大使夫人，党和国家的有地位或有实权者的夫人，以及著名女演员、文化艺术和科技界的妇女。许多参加者认为，这次接见活动的场面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能走上前去问候总书记夫人，同她握握手，女宾们排起了长队。第一夫人看上去彬彬有礼，热情周到，以准确的眼力评价着来宾的服饰，在这方面她无疑是个行家。然后，女宾们走到摆满各种食品的餐桌旁，耐心地听完第一夫人的祝词。那时候，每次接见活动都搞得十分排场，还请一些著名演员来表演，被接见的女宾每次都得到鲜花和礼品。这一切肯定花掉国家不少钱，不过谁也没去算过这笔帐。

我知道，许多人是厌恶参加这些接见活动的，他们去参加是为了不使第一夫人难堪，而她的记忆力又很强（这一点女宾们很快便知道了），况且还有一本本签到簿，可以随时了解谁对总书记夫人不尊重。我厌恶这些接见活动主要是因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每次都要提前几个月让我为她准备讲话稿，她有自己的助手，也算总书记办公室的人，但不知为什么助手写的东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总看不上。她这个约稿人好耍性子，十分挑剔，如果她觉得稿子中有疏漏，便会毫不客气地训斥人或挖苦人。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她这样批评人就是表示稿子必须重写。作家格·普里亚欣就有过这样的遭遇，他曾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受命执笔写一本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名义出版的书。总书记夫妇轮番地骂他，说他不会写东西，思想幼稚，政治上目光短浅，所以必须全部改写。不过据我所知，该书最后还是照原样出版的，当然，肯定作了某些修改。此事过后不久，我曾提出由格·普里亚欣提任将要创刊的《红场报》（戈尔巴乔夫想出版该报）主编，可总书记大笔一挥，便把这位在他看来没有远见的人从候选人中勾掉了。就连让格·普里亚欣当副主编他也不同意，这使我非常为难，因为挑选人员、确定报纸的结构和基本办报方针等工作是我和格·普里亚欣两人干的。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受的教育和在高等院校讲授马列主义哲学课的工作经历来看，她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忠实信徒，她多次公开表白自己的信仰，她给成百名学生传授过这种信仰，教育他们忠于马列主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家，除年纪尚小的孙子们外，都曾是苏共的忠诚党员，他一谈起自己的家就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我们这个家庭党支部”。其实不光是领导，还是它的核心和思想旗帜。她不仅确定这个家庭党支部的政策，而且常常做出某些决定，想方设法让家庭党支部成员戈尔巴乔夫将制定好的路线拿到整个苏联共产党内贯彻执行。这样说并不十分夸张。

我经常见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重复她的同一

个想法，最后终于得到丈夫的认可。戈尔巴乔夫性格十分软弱，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因而总是受到妻子的种种决定的影响。有时我也会直接听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这样或那样的新想法，她常常通过我来检验某个想法“能否行得通”。情况就是如此。我知道，戈尔巴乔夫以前就一些问题做决定时，总考虑到实际情况，并得到他的顾问或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逐渐改变了。当总书记要采取某种新措施时，我会意外地从他口中听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曾对我谈过的同样理由。总书记对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和广播、电视上的讲话中种种观点的看法，以及他对人、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看法，往往都是这样形成的。

我不想说出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帮助才有了各自地位的那些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及某些部长的姓名，这些人可能并不知情，不过在忠诚与服从这一点上，他们都经受了严格的考察。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不仅要别人按她的意思去做，而且还要求给她以应有的重视，每次和丈夫出行，总要求为她作一些必不可少的安排。

“不，你们听听州党委第一书记的妻子对我说了些什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古比雪夫期间抱怨道。“她本该陪我在城里转转，可她却说不能去，因为她的狗没人照顾。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暗自发笑，心想，这要么是对总书记夫人的到来不欢迎，要么是人家对家里的狗不放心，再不然就是不知道什么人大驾光临。不过，许多人得知这件事后都同情当时的州委第一书记叶·费·穆拉维约夫，这个人没有太多的想法，整天被繁重的工作拖得疲惫不堪，还要应付当时州里那些头头们对他发起的攻击。不久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马列主义思想进行过相当充分的研究，因而对她的意见不能不考虑。许多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都感觉到总书记夫人的这种日益增强的影响。我记得她曾频繁地参加某些剧团以及其他许多文化团体的活动。

许多人都了解总书记夫人对这一领域的政策的影响，因而常常利用她来解决自己的、往往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

诗人、演员、画家、社会团体的领导人纷纷给戈尔巴乔娃写信，向她提出种种请求，他们抱怨自己的境遇不好，要求对博物馆、学校、图书馆提供帮助，还请求帮助他们个人出版专著、改善居住条件。令人吃惊的是，向戈尔巴乔娃反映的问题都很快得到了解决，写信人都如愿以偿。总之，大多数问题都得到圆满解决。如果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意见不起作用，总书记的批示便会随之而来，并且得到认真贯彻执行。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总书记的夫人不单单是他的顾问或者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影子内阁，不，这是个独立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出访国外还是在国内，她总是占据显要位置，将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挤到一旁。这一点也不可忽视。

几乎每到国内一个地方，戈尔巴乔夫夫妇总要一起向纪念碑、墓碑献花或花圈，尽管有时礼仪上不应该这样做。对他们的出行，传播媒介要作大量报道，于是人们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的不仅是总书记夫人，而且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因为她的讲话具有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她身边总有一些保卫部门和外交部的人，她毫不客气地支使这些人，随随便便地使用总统的通讯工具和专机。一些外国领导人也很了解这些情况，对她

的行为感到吃惊。

南希·里根在讲述同赖·马·戈尔巴乔娃的几次会面时，谈到了她那说教式的谈话习惯和对身边人的傲慢态度。南希·里根通过几次短暂的会面便了解了她的性格和习惯，她面前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好像是一个要把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公诸于世的人。南希·里根回忆道：“如果说我在第一次同赖莎·戈尔巴乔娃会面之前有些不安的话（我确实有些不安），那么她在同我会面之前恐怕更加不安。我不知道将同她谈些什么，不过我很快便发现这并不重要。从一开始她就一直在不停地说，说了很多很多，我好不容易才能插上几句话。也许这是由于她缺乏自信，但是经过在三个国家的上几次会面之后，我对赖莎·戈尔巴乔娃有了一个基本印象：她从来都是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

“准确地说，她是在讲课。时而讲共产主义制度的辉煌成就，时而讲苏联的文化艺术，而最常讲的是马列主义。偶尔也给我讲讲美国政治制度的弊端。

“我对此没有准备，而且我也不喜欢谈这些。我原先的打算是，我们能一起谈谈各自的生活，谈谈丈夫和孩子，谈谈大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最后再谈谈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还想给赖莎讲讲我国的反毒品斗争计划。可是我刚一开口，她便赶忙转移话题，口口声声说苏联不存在毒品问题。真是这样吗？

“第一次在日内瓦见面时，我们一起去喝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她竟公然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样子。她不喜欢她坐的那把椅子，于是使用手指嗒嗒地敲了几下。克格勃的警卫人员马上就给她换了一把。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见过一些第一夫人、公爵夫人和女王，可我从未见到她们当中有谁这样做过。”

我认为，南希·里根通过上述事实抓住并说出了一个人的本质特点。这些不大中听的话说明了前苏联总统夫人的真实性格。她完全可以为这些话而生气抱怨一番，但她不是那种常常忍受不了委屈的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忍受住了这次委屈，而且在1992年5月跟随丈夫访问美国期间，她还亲切地拉着南希·里根的手，就像我们国家的小学生那样，一起穿过马路。

尽管善于穿着打扮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着外在的魅力，但不知为什么大多数人对她没有好感。也许人们已直接感觉到实际上是谁在我们国家发号施令。他们在大量的来信中显示了自己的态度。这样的信越来越多。最初只是个人来信对总书记夫人那莫名其妙的行为表示疑惑，后来各级党委书记也开始写这种信，有时在信后签名的是一些大工厂以及地区的整个党组织。

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这些信，是否明白这会给他的威信造成损失，而且是无法挽救的损失呢？说他明白这会给他的威信造成损失，只是我的猜测；而他知道这些信则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把来信情况报告给戈尔巴乔夫的是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的阿·伊·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曾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他。除了自己的备用品外，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开了句玩笑。

当时卢基扬诺夫并不知道；还有某些东西可能失去，比如自由。不过这



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也很认真地把这类内容的信呈送给总书记。有一次戈尔巴乔夫看过信后十分不安，甚至有些害怕，他当着我的面拨通了葛罗米柯的电话，说道：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经常要出去走一走，所以需要有一个关系亲近的人来帮帮忙。我已经习惯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出去，可是我看到，许多人来信对此表示不满，而且其中还有党的干部。这可怎么办呢？”

葛罗米柯（我想象得出，他一定是努了努嘴，理理思路）说：

“从国际惯例来看，这种事是正常的……”

但戈尔巴乔夫对国际惯例不感兴趣，他在等待答复。

“而在国内，这个问题当然就显得微妙了。”葛罗米柯慢条斯理地讲下去，不过他已感觉到对方要听的不是这个，于是便说：

“如果您工作需要的话，那就根据需要去做吧。”

“您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是吗？”总书记急切地问道。

“当然，我看可以继续这么办。”葛罗米柯迟疑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戈尔巴乔夫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然后把信还给我，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处理这类来信，所以依旧认真负责地把它们归入总书记的邮件，不过我非常担心——万一它们被送到别墅去就糟了，但愿不要……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些害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发火的人有同感。

夫妇两人继续一同出行，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排场也越来越大。不久，赖·马·戈尔巴乔娃提出需要一张专门的地图，上面要标出她访问过的国家。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搞到这样的地图，便给专门从事绘制地图工作的人打电话。该部门负责人亚先科答应帮忙，而且是一次一次地（我这样认为）、准确地将第一夫人在我们国内和世界上走过的路线标了出来。地图上，一条条红线从莫斯科伸向世界各国首都，伸向我国的各个州、边疆区、共和国。莫斯科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戈尔巴乔夫夫妇出访过的国家比所有前任总书记出访过的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总书记夫人在国内、国外以及在莫斯科的频繁外出活动是离不开克格勃的专门警卫的。给她提过各种各样的方案，可她都不满意。曾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前负责保卫其家人的那些小伙子，在一天之内都被赶走了，理由是他们不适合这项工作。或许是他们知道的事太多了，或许他们还有别的缺点，可总书记对我说：

“他们变懒了，散步时都快赶不上我了，而且都习惯于老一套。我已吩咐尤·谢·普列汉诺夫把他们都换掉。医生也一起换掉。”

我很了解这些身强力壮、忠于职守的小伙子，所以不能同意这样的解释。每当换总书记时，警卫部门总要忙乱一阵子。克格勃九局局长由总书记直接领导、接受他的各项指示并无条件地执行，有时将有关情况向克格勃主席通报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警卫部门就更忙了，要为总书记的卫队重新挑选一批年轻、魁梧、身体健康的人，于是赶紧确定人选。选上的多半是一些业务熟练、勇敢而又可靠的军官，论经验，他们不比任何外国领导人的保安人员逊色。只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卫队出了问题。她除了卫队之外还要一名贴身随从，曾经推荐过几个人，但都不合总书记夫人的意，只好从全国各地的克格勃部门中找人。总算在索契找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讨人喜欢的小伙子，然而他只干几个月便无缘无故地被赶走了，因为第一夫人对他不满。

意。这并不奇怪，她对许多厨师、女服务员、清洁工也不满意，戈尔巴乔夫还未当选总书记时，在他的别墅中工作的上述人员就不知换了多少拨儿。由于他们都是军官，便被分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别墅，他们公开谈论戈尔巴乔夫家人的品行，那些风言风语传到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机关工作人员耳中，后来又传到那些专好打探这类消息的莫斯科居民耳中。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一改我以前的做法，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经常调换服务人员会影响他的威信，应该适当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他什么都明白，只是一句话也没说。

我不认为我的劝告能对第一夫人的坏毛病有多大的抑制作用。戈尔巴乔夫一当上总书记，仆人的尤里节便结束了：逃是逃不掉的，而且也很危险。不过给服务人员的月薪定得倒很高，和院士一样。而困难只有一个，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总想挑一些不大漂亮、年纪较轻的姑娘来当服务员，看来她这样做是有某些道理的。这种“人事”政策常常使卫队长陷入困境，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说：

“我上哪儿去给他们找那么多不好看的姑娘？分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些漂亮女孩儿。而重新培训、授衔得花多少时间啊！”

戈尔巴乔夫当然了解夫人的所有坏毛病，可是他无法抗拒她那无坚不摧的力量。

我已经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渐渐成为一个经常参与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文件起草工作的人。我想，她也经常审阅其他文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我有时感觉到，当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尼·雅科夫列夫和瓦·安·梅德维杰夫的稿子因总书记夫人作了修改而不能通过时，戈尔巴乔夫有多难堪，于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便想方设法缓解这种窘况。每到这时，雅科夫列夫就气呼呼地小声嘟哝着什么，不时地朝我看上两眼；梅德维杰夫则左右环顾着，一面寻求同情，一面竭力坚持自己的方案。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保留下来的往往是“家庭”稿，如果所涉及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问题，那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多年来不光操持家务，而且也主持改革这场大舞会，参与制定政策和人事安排。但主要的是，她培养了总书记一总统的性格，帮助他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海洋中寻找航道，指望着把国家的航船驶向预定目标。对于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评价，可以说她是想分担丈夫的责任，也可以说她是在干涉总统的工作，或许还可以说是在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和权力（他甘愿如此）。

不知为什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提起他成为党和国家领袖的原因时就说，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刚参加工作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他影响很大。这个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边疆区曾使许多斯塔夫罗波尔人得以施展才干。国内一些有名的人都在这里工作过，其中不光是大企业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组织者、工业的领导者。这里的青山秀水早就成了高知阶层聚集的地方，他们对边疆区的文化和科学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学者、军事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对这块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当地各民族勤劳的人们为那些有才华、有事业心的人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戈尔巴乔夫常常讲述一些天资聪慧的普通农民如何成为出色的生产组织者，如何在事业上表现出巨大的工作潜力。他感谢这些曾教他懂

得许多生活哲理的人。

斯塔夫罗波尔的巨大潜力，它 20 年来的迅速发展，为领导者开展各方面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这里地处各个不同的自然气候区——从高加索山区到顿河沿岸草原，从里海到黑海，农业相当发达。边疆区种植除热带作物以外的所有作物，具有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的良好条件。水渠建设为干旱的土地引来清水，农作物的人工灌溉为蔬菜、瓜类、饲料等作物的集约化生产创造了条件。

工业也不断发展壮大。最近几年，边疆区的电子业、电机业。机器制造业迅速发展。当地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发展规模更大，已形成网络，医疗保障进一步完善。当然，边疆区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在壮大，居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边疆区具有的潜力为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提供了保障。

边疆区的党团组织人才济济、充满活力。斯塔夫罗波尔人以精力充沛、有工作能力而著称，很早以前就有许多人被提拔到党和国家机关以及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生产部门的各级领导岗位。当然，也不能把这个地区说成是独一无二的人才摇篮。我国有不少边疆区和州在许多方面并不比斯塔夫罗波尔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远远超过它。

此外，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在这个疗养区工作，不被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知晓，如果党和国家的实权人物没有发现他、支持他并扶着他走上一个个权力台阶，那么他也就不会成为总书记和总统。这些实权人物包括尤·弗·安德罗波夫、米·安·苏斯洛夫、费·达·库拉科夫、叶夫列莫夫等人，他们都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和生活过。

人的年龄越大话就越多，就越爱谈论过去，回忆那些令他们难以忘却、使他们感到自豪的事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也有这个毛病，自从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经常在自己周围那些人面前回忆同前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等人见面和交谈的情景。而且同党和国家某些领导人的见面通常是在矿泉疗养院，即他们领着家人在那里休养期间。

同许多“疗养院”书记一样，他迎来送往着一个个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让他们在这里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这种见面当然都是非正式的，常常是在野外，在高加索山麓，在风景秀丽的河谷，这里是打猎的好去处。叶·伊·恰佐夫和中央管理局在这里建造了豪华别墅，草地上铺着一块块台布，上面摆满丰盛的食品，客人们解开衣扣，懒洋洋地席地而坐，由衷地感谢和夸赞着主人的盛情款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我见过戈尔巴乔夫夫妇接待政治局委员时的照片，看得出他们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关系。不过，他们也有为难的时候，赠送礼品作为高加索之行的纪念，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礼节。有一次，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回忆那段时期时说：

“许多人甚至都不感到难为情，就连领导人的夫人也纷纷提出她们想要什么样的礼品。”

她——点出了这些领导人妻子和她们希望得到的种种礼品——高加索压花，用细瓷制成的高档工艺品以及其它珍贵工艺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接着说道：

“这样一来我们就太亏了，所以只好想方设法搪塞过去。”

谢天谢地，这种搪塞总算没让人家识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久便被调到苏共中央工作，这种整天提心吊胆地搪塞客人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无疑促进了戈尔巴乔夫的成长，他得到了照顾、支持和培养。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那些保护人也一往情深。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年里，虽然他曾在正式讲话中批评过勃列日涅夫在停滞时期所犯的错误，但谈及勃列日涅夫本人时他从来没有言语不恭，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总是称他列昂尼德·伊里奇。显然，他们之间的交往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仍然感谢勃列日涅夫为他所做的一切。

1982年1月的一天傍晚，戈尔巴乔夫又陷入回忆之中，深情地谈起了苏斯洛夫。

“这个人真了不起，很聪明。现在还承担着政治局和书记处那么多的工作。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应付得了这一切……”

我对话题转到这个人身上感到奇怪，不知道他要谈什么，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而主要的是，我不知道对他的这些话该作何反应。

从60年代初起，我对苏斯洛夫就极其反感，当时他一步一步很老练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文化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不过令我吃惊的是这个清心寡欲的人身上的别的东西。在赫鲁晓夫70岁生日那天，苏斯洛夫为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大唱颂歌，用尽种种赞美之词吹捧他，可是几个月后他又把赫鲁晓夫说得一无是处，他在中央全会上作报告，口口声声他说必须撤消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对此我非常反感。我觉得，一位党的领导者采取这种做法是有损党的威信的。我幼稚地认为，政治局委员不可能是两面派。

我说过，苏斯洛夫的整个外表、他讲话的口气及穿戴使许多人反感，他谈话的方式令人感到恐惧。他搞阴谋的手法在中央机关中尽人皆知。我曾经遇到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我记得，1963年中央机关来了一位叫克·的年轻有为的电影评论家，是从一家报社调来的。这个人现在名气也相当大。他被调来担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的局长，按当时政治局的分工，文化部由苏斯洛夫主管。克·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不过，可能是由于年轻或是缺乏经验，他在工作中采取了中央机关中从未采用过的一些方法。这个人心直口快，讲起话来从不考虑表达方式，所以很快便遇到了麻烦，经常同局里的同事以及部领导发生争执。

我认为，当时的文化部部长A.波利卡尔波夫是个作风正派、待人和气的人，他与很多人都相处得很好，同克·之间也没有什么隔阂，关于克·不胜任局领导工作一事也许是别人向苏斯洛夫报告的。于是，曾经向苏共中央推荐克·的苏斯洛夫想出一个只有极其卑鄙无耻的人才想得出来的办法，他提议创办一份电影工作者的报纸并对克·大谈该报的发展前景。对于既是记者又是评论家的克·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办报更有吸引力。

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很快就起草出来了，克·被确定为该报主编，他感到很幸运，全身心地投入创办报纸的工作。可是，苏斯洛夫在下达文件之前却提议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一下新报纸的问题，说是“要和所有的书记商量一下”，于是便演了一出戏。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认为创办该报不合时宜。结果，报纸没办成，克·在中央机关的局长职位也丢了。

多年来，中央机关有一个惯例：在人事问题上不允许犯错误，对任职不满三年者不得调动工作。而现在这个惯例被打破了。但是当时并未给克·安

排工作。我记得，他心情非常不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只是在同志们努力帮助下他才回到原来的报社，在那里他又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归来者，因为在一些观念正统、嫉妒心强的人看来，他辜负了党中央的期望，给编辑部集体抹了黑。或许这是对米·安·苏斯洛夫个人的一种主观看法，不过许多了解他的人都是这样看的。

60年代初，我经常从地铁“列宁图书馆”站穿过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去上班。我经常见到前面有一个身穿长大衣或灰色呢外套、个子瘦高的人，后面跟随一个为他拿着暗红色公文包的警卫——这是苏斯洛夫在踱着方步去上班。从沿路两侧楼房中出来的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的几十名工作人员跟在他后面，总是保持一定距离，谁也不敢超过他。这中如大碓飞行似的人字形队伍和那件长大衣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从性格到爱好一点没有改变。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领导党和国家方面也是个因循守旧的人。后来，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我又得经常跟在这位当时权势显赫的人物后面，他总是乘一辆高级轿车从别墅沿明斯克公路去上班，车速一般为每小时40~50公里。成百辆汽车以同样的速度远远地跟在后面，没有一辆敢超过苏斯洛夫的防弹车。

对许多人来说，如果被他堵住了路，那可真是太不幸了，但人们知道前面是苏斯洛夫，只好默默地忍着。在他的车前面有警车开道，禁止叉道上的来车通行。他那辆车在一长串小轿车、公共汽车和电车伴随下，像灵车一样缓缓地行驶在宽阔而又清静的公路上。现在戈尔巴乔夫又以十分尊敬的口吻谈起了这个人：

“要论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谁也比不上他，人家总是那么有条不紊，充满信心。”戈尔巴乔夫接着说。

我想，就书记处的工作而言这话没错，苏斯洛夫那套办法左右着书记处的工作，其实整个党都受他摆布。即使在外出休假由安·巴·基里连科代理他的工作期间，这位阴险的红衣主教也心存戒心，关注着书记处作出的每一项决定，回来后便把一些与他以及他周围那些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决定撤消掉。不过这并不奇怪，苏斯洛夫对列·伊·勃列日涅夫有一种神奇的影响，他常常能够不顾总书记已作出的决定，说服列昂尼德·伊里奇改变主意并按照他苏斯洛夫的建议去做。

戈尔巴乔夫在1月份讲这番话是有原因的。我当时还不知道，苏斯洛夫已经住院而且病得很重。1982年1月25日他因中风去世，终年80岁。斯大林的世界观的传人、英明领袖的遗训的又一个捍卫者就这样离去了。

随着那个时代的激情的消失，我有时想：也许国家需要这种清心寡欲的人？人们害怕他正是因为他与众不同。难道今天还能想象得出有这样的人身居国家主要领导岗位吗？假如出现这种人物，他也会立刻死亡，或者身败名裂，很可能是在铁窗之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游戏规则，玩游戏的人也各不相同。如今特殊人物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发财吧！”的号召根本不是号召人民发财。

年轻的边疆区委书记戈尔巴乔夫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但这最初带给他的只是大量的工作，而不是进一步升迁的机会。要得到升迁还应当再经受一番机关工作的锻炼，应当在莫斯科各种机关工作中“磨合”。在这方面他具备有利条件：许多部长在高加索山麓休养过，他时常与一些用得着的人“在矿泉池里”私下会面，当然，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特别看不起那

些与他共过事的州党委书记，而那些入往往不等他约见就直接给他打电话要求见面。早在 70 年代中期我就听到过书记们的意见：

“他是让上面的人给宠坏了。”书记们这样说他。“真该让他到我们这里，到外乌拉尔的任何一州或是到外贝加尔来清醒清醒，收收他那股子傲慢劲儿。到那时他就会对我们亲热点儿了……”

我认为，这样指责他未必合适，因为他管辖的地区客人太多，且都要求他给予照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知道该同谁见面，与谁搞好关系，对谁亲热。戈尔巴乔夫被调到莫斯科后，这些关系给了他非常重要的帮助，所以他才能比较快地在官场中站稳脚跟。

了解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部中以及各社会团体领导人之间的各种力量对比情况，是登上权力金字塔顶端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不掌握交际艺术，不争取所谓“自己人”的支持，就别想“向上爬”。戈尔巴乔夫没用几年工夫就具备了这方面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人们开始注意他，用种种方法考验他，而人们的看法也恰恰在这时形成。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很快便掌握了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妙法和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的本领，而且十分精通（看来我没有说错），很可能在边疆区时这种本领就已具备了。他还较快地掌握了在首都上层社会、在各级权力机关玩弄阴谋的基本要领，学会了口是心非和装模作样、满脸堆笑地去博得别人的好感。

对于初来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引起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十分重要。他常去看戏剧，是个出了名的戏剧迷和文化活动爱好者，他亲热地、近乎谄媚地与记者交谈，尽管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在不如意时也会呵斥他们。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始向最后的高度冲锋时，还是一个相当“稚嫩的”政治家，连讲话都没有头绪。在一些大型会议上，他显得很紧张，发言稿也念不好，不过，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他进步很快。

为了改善自己的仪表和风度，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没有天赋的话，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显然不能忽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那较好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对列宁思想遗产的了解是他得以升迁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他非常熟悉党的历史和列宁的著作，常常运用这方面的知识，这使他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许多党务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中显得极为突出，而且不光是斯塔夫罗波尔，在莫斯科那些领导人中也是如此。许多政治局委员，首先是勃列日涅夫，虽说读过列宁的著作，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已经回忆不起多少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于长期在领导岗位上工作，考虑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所以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对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淡忘了”。他们当中有些人除《资本论》第一卷外一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至于列宁著作，他们也只是引用一些用得着的语录。不过，戈尔巴乔夫也不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当然，中央书记们有自己的助手，这些人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都很高，但助手不可能代替书记们理解马列主义学说的原著，而党的领导者是要依据这一学说去建设新的无阶级社会的。

戈尔巴乔夫身上的这类缺点大多已经克服，在改革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他忽然对列宁的著作发生了浓厚兴趣，从中寻找对自己有教益的段落。我常

去他的办公室，总看到他那宽大的桌子上摆着几卷《列宁全集》。他经常当着我的面拿起一本书，把列宁的观点读给我听，然后同今天的情况加以比较，不住地称赞列宁有远见。有时他感到这还不够，想表明他读过的书很多，便让我从书柜里拿来某卷书，找出某段话，如果我的动作慢了一点，他就会很生气，说我对马列主义的创始人缺乏了解。其实我并不认为熟记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段落有什么必要，也不认为断章取义得来的东西能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我更感兴趣的是马列主义学说中的辩证方法和逻辑关系，更关心的是各种力量和党派之间瞬息万变的斗争。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才找来了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和格·霍·沙赫纳扎罗夫，任命他们为他的助手，这两个人都是很有才能的社会学家，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在大学中教过马列主义理论课，发表过学术专著并编写过一些适合中学生和成年人学习的教科书。由格·霍·沙赫纳扎罗夫编辑并参与写作的《社会学》一书曾是一代又一代中学生的必读书。该书再版近 20 次，它也适合青年人阅读。据我所知，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就是根据这本书来研究社会科学的。总书记的其他顾问和助手也具有很丰富的理论知识，他们当时都对戈尔巴乔夫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在 1986—1987 年，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受到列宁著作很大影响，这使人感到，他是想提出一个发展伟大领袖思想的构想，而且是比列宁当年所做的一切更令世界震撼的构想。戈尔巴乔夫作报告或发表文章，总要从理论上论证自己的许多建议，竭力表明它们同马列主义创始人学说的密切联系。从总书记的大量著作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他非常热衷于著书立说，这是他的一大嗜好。在短短的时间里别人为他写了许多东西，这些著作被编成一卷又一卷书，而书皮不知为什么都是浅蓝色的。

早在上大学时，尤其是在斯塔夫罗波尔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工作时，戈尔巴乔夫就十分喜好通过报刊——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同群众打交道。有一次，他让我把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写的文章都收集起来，若将这些文章收齐装订成册，一个人是很难搬动的。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在斯塔夫罗波尔写的所有文章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他认为把马列主义思想、党的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以及勃列日涅夫当时向全社会提出的种种建议和结论变为现实是苏联社会发展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他在担任边疆区委书记、中央书记以及后来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实现着这些思想。

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在列宁诞辰 113 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时，首先对列宁作了评价：“他的名字已成为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象征，他的学说被进步人类所掌握并且正在变为具有全世界规模和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列宁永远是他的学生和拥戴者的榜样。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那些认为列宁主义有地区局限性、说它‘已经过时’的各种论调早已破产。列宁的思想没有过时并在不断取得胜利。”

1987 年，在十月革命 70 周年纪念日那天，他仍像以前那样相信列宁的思想和教导。他在为纪念这个日子而作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1917 年十月革命那难忘的日子距今已有 70 年了。社会进步、真正的人类历史的新时代正是从那不平凡的日子开始的。十月革命无愧为人类‘胜利的时刻’、黎明的曙光。十月革命是一场人民的革命，它是为了人民、为



了人、为了人的解放和发展而进行的。

“70年，这在世界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是十分短暂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国家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这段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却是前所未有的。沿着革命先驱开辟的道路前进、为胜利实现十月革命的目标和奉献出全部力量、精力、知识、才能，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的确，我在这里引用了不少戈尔巴乔夫的话，不过从这些话中恐怕还不能搞清总书记后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在政治和思想上彻底转变态度的。

或许他在打算进行改革时没有切断同过去的一切联系，用总书记的话说，因为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或许他尚未搞懂顾问、助手、专家们向他提出的种种改革构想的实质。反正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作报告时向全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舆论界所谈的仍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

“我们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它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就，雄辩地证实了马列主义学说的生命力以及在苏联社会进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我们有权为在这些年紧张的劳动和斗争中取得的所有成就而自豪！”

我反复阅读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讲话、文章中关于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章节，以及关于我们的社会成就、我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论述，于是我发现了他的观点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他1988年以前的著作明确主张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一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者、普通党员以及许多关心政治问题的公民也都清楚地看到了。

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生活和工作了，可是，如果将几十年的成就统统抛掉也是巨大的损失，因为许多国家的劳动者所珍视的正是我们所取得的社会成就，许多国家也都尽量采用我们的正面经验。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全体苏联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反映的是他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则立场，所以他们在国内的社会形态开始变换之前一直是支持改革的。

历史学家以后会搞清楚戈尔巴乔夫的立场骤然转变的时间和原因并对此作出解释。那么，总书记是如何从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前途的拥护者变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构想的推崇者的呢？

我想，时间会使戈尔巴乔夫将他的观点、原则发生急剧转变的原因向世人作出解释的。当然，一个人不能像风向标一样随风转，我只同意一些分析家的结论：他当时已经身不由己。总书记受制于国内外某些势力，他们为他设下了圈套，他被迫带领党的羊群走入那精神的和肉体的屠宰场、只有他一人从那里走出来，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发了财。也许这是为了一切从头开始……

在八月事件前夕出版的赖·马·戈尔巴乔娃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父亲通过认识我丈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党产生了信念。虽然两人年龄不同，但对于我父亲来说，他是一个代表真理和正义的共产党人。”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没有活到共产党被取缔的那一天，他永远也

---

《米·谢·戈尔巴乔夫讲话和文章选集》第3卷第181页。

赖·马·戈尔巴乔娃：《我希望……》，1991年莫斯科版，第23页。



不可能知道一个“代表真理和正义的”人干的这种事。但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乡亲们对此一清二楚。戈尔巴乔夫少年时代的朋友、曾与他同时获得劳动红旗勋章的亚历山大·雅科文科认为自己这位同乡的行为是背叛行为，他说：

“要是谢廖沙大叔知道他的儿子对国家、对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所做的那些事，他一定会亲手把他……”

人往往会忘恩负义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给他们带来自由，还答应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就算有些事没有办成，但这也不能怪他，常言说得好：并非条条道路通天堂。请记住为正义而战的伟大斗士堂吉河德对桑丘·潘沙说的话吧：

“是的，桑丘朋友，你受苦受难，经常挨打，可你用不着做一个勇敢的人。”

### 巡视全国，为改革呐喊

戈尔巴乔夫早在1985年春天，在准备参观莫斯科的一些企业时，就提到打算以后去全国各地走走。

“当然应该尽量多参观一些工业中心和重要的农业地区，”他说，“要了解国内情况，了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过，应该从国内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开始。在莫斯科，我去过许多工厂，现在又要去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然后我想去基辅，以后再去哪里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决定。”

后来他的确是按照这个打算去做的。1985年夏天，他在列宁格勒稍事参观后便去了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每到一处他都向党的干部和经济工作干部以及工人发表演讲，这一次次见面给许多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干部和工人们头一次见到一位不用别人搀扶、“有口才的”总书记，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着人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时常离开讲稿、凭着记忆并根据听众的兴趣、结合自己参观各地企业和社会设施后的感受滔滔不绝地讲着。

他十分欣赏自己在列宁格勒的演讲，甚至下令在电视上播放这次演讲的实况录像。从那时起他便自信能够不完全依赖稿子讲话，于是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到处讲，而他又不能完全离开稿子，因为即兴讲话时间较长，内容较零散，偶尔还会漏掉一些关键问题，往往显得枯燥乏味。不过他的这种做法是不同寻常的，是向过去时代的一种回归，那时的天才革命者讲话根本不用稿子，却能用话激励人们去做许多事情。然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需要的不是演说天才，而是组织天才。

1985年初秋，戈尔巴乔夫去了秋明和哈萨克斯坦。之所以要去这两个地方，是因为国家的石油开采量开始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外汇收入。这次出行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光派了不少人到那里去，其中有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政府成员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飞往秋明，当时，这种共同出行恐怕是这对夫妇的行为中唯一令人们不满的方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穿着华丽人时，她的用品当时都是在国外购买或订做的，只见她一身珠光宝气，十分惹人注意。然而对这一点，秋明的工人和全体居民、尤其是妇女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对总书记夫人的穿戴感到气愤是因为那时候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者的妻子和孩子生活十分简朴，常常住在木

棚或活动房里，穿着很朴素，所以每当打扮入时的戈尔巴乔娃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大家总是气愤地报以沉默。

人们这种气愤的情绪越来越大，因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夫人”活动计划，实际上无论到哪儿，从钻井台到会场，她总是和丈夫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到来还是很欢迎的。大批大批的人涌上街头，车子刚一停下就被人群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想挤到总书记身边是不可能的。人们没见过这样的贵客，纷纷赶来“观看”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苏尔古特、扬堡，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总书记，州领导没料到居民们竟会如此踊跃，他们不知所措地左顾右盼，只希望一切都平安地过去，戈尔巴乔夫夫妇在油区的活动计划圆满完成。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一次有影响的出行，由于电视作了转播，在全国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必须依靠人民。”总书记重复着早已向我谈过的观点，他对出行的结果、与劳动者的会面感到满意。“人民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

在执政的头几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相信人民”的，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后盾。后来他开始发觉，人们对他的种种推陈出新的做法不感兴趣了，他们已经落后，不理解他所提出的各项改革，于是他越来越不相信他们了。

当时秋明有许多石油和大然气开采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在会上，技术设备、管道及各种物资供应部门的人报告了情况。会上还研究了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如加快住房建设，提供更多的日用消费品，特别是防寒用品。但是戈尔巴乔夫坚决不同意关于必须在“大地方”即在国家的中部和南部扩大合作社建设的主张，北方人向他提出了这一请求。

“应当在这里生活，”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围在身边的一大群人说，“在这里生儿育女，退休后也要留在这里。”

这当然是些考虑不周的话，人们不光是默默地听着，而且争先恐后地、有时气愤地说：北极圈地区不是斯塔夫罗波尔，更不是彼尔姆州。北极圈内的冬季十分寒冷，日照时间短，而且这里空气稀薄、缺氧，孩子们经常生病，老人受不了长期“折磨”。但总书记已经听不进去了，他满怀热情和信心地说，应当开发北方并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生活，因为这里条件很好，房屋设施完备。我当时心想：我们还回不回莫斯科呢？既然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何不在这里定居呢？

然而我们很快便悄悄地从北极圈地区飞到秋明。戈尔巴乔夫要在秋明发表长篇演说，他想对演说稿作一些修改，于是他让我和雅科夫列夫连夜修改稿子，当我一觉醒来时，发现稿子已不见了。原来是戈尔巴乔夫提前上来把稿子拿走了，他在亲自修改。

报告中谈了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量的问题，对野蛮开采、石油行业推行集约化方法不力、行业技术装备程度差、设备缺乏等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报告阐述了秋明以外地区即西伯利亚和远东所有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还谈到一个微妙的问题，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刚通过不久的反酗酒计划。

我已经谈到，有一批比较年轻、胆子相当大的人走上了国家的领导岗位，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人。遗憾的是，这是初生牛犊不怕死式的勇敢和鲁莽。那些年，一些医学专家、妇女、作家给党中央和政府写了大量的信，认为酗酒

现象遍及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的狂喝纵饮风气不可容忍，于是戈尔巴乔夫下令制定措施来消除这个“小小的”弊端。当时提出几项十分严厉的措施：降低果酒产量（主要是廉价的、有害健康的果酒），逐渐减少白酒的产量。这些措施不涉及白兰地、干葡萄酒和香槟酒。然而，当这一革命性法令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时，恨不得立刻消除这一恶习的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委员们经过一番慷慨陈词后作出决定，不仅要坚决采取已拟定的措施，还要尽量多制定一些措施。当时责成米·谢·索洛缅采夫对这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我马上便意识到：人们今后不仅喝不到酒，恐怕连酒味都闻不到了。不幸的是，我的种种不祥预感往往都会应验。苏联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加工工业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自己对“酒”的态度，他们说，这样一来国家在预算方面要损失几百亿卢布，葡萄种植园也会遭受损失，许多葡萄酒厂的机器设备将要报废。但是，要唤起那些自认为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人的理智是不可能的，当时那些聪明之士提出了那么多理由和意见，再争论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主张逐步降低酒类产量的人自然被斥责为保守派，说他们故意教唆人民喝酒。这是一场颇为激烈的斗争，不过政治局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可以想象，有了这一胜利，再加上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米·谢·索洛缅采夫那里进行的几次开导性谈话，拟定的计划得到超额完成，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减产的不光是白酒，还有白兰地、干葡萄酒、香槟酒。进口酒类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这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酿酒业面临经济破产的危险。

如同我们以往常做的那样，在这场反对恶习的神圣斗争中，我们忘了把我们要采取的减少酒类购买量的措施预先告诉那些向我们出售酒的兄弟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苏联人民再也不愿当酒鬼了！

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加工业和酿酒业的衰败，使国家预算受到冲击，金融部门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人们试图放慢一下解决问题的速度，至少遵守决定中规定的数字，然而这件事主要由党的监察委员管，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过应当说一句，当大家肩并肩地坐在政治局会议室里时，都慷慨激昂地主张根治酒害，而当我私下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个别交谈时，他们却一个劲地咒骂那些决定，反对降低酒类生产的速度，据我所知，他们自己的嗜好都没有改变。好在当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我们的做法，走私现象那时就已经存在。

但是对其余的人来说，作出的决定仍然是有效的。

戈尔巴乔夫在秋明时曾说：

“在戒酒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动摇，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无条件地完成这项任务。”

在那个时代，我们是能够坚决地、无条件地禁酒的，因为我们有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当时已由苏共中央书记处负责监督决策的执行情况。

如此轻率地作出的决定给国家的经济和领导人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民不理解也不接受这些仓促采取的措施。

1985年11月，在禁酒后的第一次招待会上，来宾骤然减少，人们愁眉苦脸地看着满桌的菜肴——喝矿泉水和饮料根本就用不着它们；外国人则以老练的目光看了看改革的初步成果，热情地握握领导人的手，向他们致以国庆的祝贺并祝愿他们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然后赶忙溜走。这是

一次值得吸取的教训，于是在以后所有的招待会上，领导们不顾自己作出的决定，总要摆上一些葡萄酒，在某些人的桌子上还摆上了白兰地。

很明显，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别出心裁”态度冷淡，而且不理解。许多人后来认为，禁酒令是改革计划中唯一实现的决定。但这种看法不对，这项决定并未贯彻到底。中央委员会收到数千封愤怒的来信，那些当初呼吁同酗酒现象作斗争以挽救自己濒临离散的家庭、使丈夫和孩子免受病痛折磨的妇女们，这时却请求增加白酒销售量，因为男人们又改喝香水和牙粉了。在国内，人民同政府和执法部门展开了一场地下斗争，最主要的是，国家的酒类专卖权被破坏了，而且简直无法恢复，到处都有人私自酿酒，而酿酒原料主要是糖。从那时起，酒和食糖的问题成了居民最紧迫、最头疼的问题，同时对党和戈尔巴乔夫也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领导们这时已经惊慌不安，在政治局会议上，许多人怒视着那些倡议禁酒的人，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戈尔巴乔夫和索洛缅采夫。然而这些人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又有好多年未改变既定的方针，他们经常念叨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的确，在最初一段时间里，犯罪率下降，受伤者减少，“小偷小摸”的事也不多了，当然，核电站的锅炉爆炸、船只沉没、火车相撞一类的事还时有发生，不过这也许和长时间不喝酒有关。

总之，戈尔巴乔夫到秋明时，酒的问题刚刚开始被人理解，妇女们纷纷发言，称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明智之举，说他使人民避免退化，使一个个家庭得以巩固。男人们则冷冷地一言不发，心里盘算着，那些新章程对北方人行不通，好在过冬的酒已经运来了，总不能把它再运走吧。他们也不会答应这样做的。

总书记当年的油田之行给人留下的正是这种矛盾的印象。

接着我们又飞往切利诺格勒，在那里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不过同许多类似会议一样，没有对农村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主要谈的是提高面包类食品零售价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已经考虑得非常成熟了。可是我非常担心，如果不经细致的讨论，仓促作出决定就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

还有一点也令人不安，谁也没有认真研究这一措施会对其它产品的价格产生什么影响。正如《真理报》一位同事所说：“普通百姓当然不会因黄金价格的提高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常买首饰，但是每当黄金价格提高后，不知为什么连市场上一把小萝卜的价格也会改变。”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当时认为，对提高面包类食品价格的问题尚缺乏周密考虑，便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不同意见并陈述自己的理由。戈尔巴乔夫默默地听完我的意见，什么话也没有说，然而价格问题已作为一个马上就要解决的问题传得沸沸扬扬了。

那时我并非主张把价格保持在原来水平上，价格早已不能反映实际经济状况。可当时人民还信任我们，还有大量的商品，卢布也坚挺，正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过，应当综合考虑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慎重作出决定，草率行事很容易破坏货币金融体系，只会造成新的、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时，在 80 年代中期，人们还不太敢放手解决这个问题，总盼望出现奇迹，因而失去了时机。我们国家在解决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问题方面几乎总是在等待奇迹的出现，过去我们曾把出现奇迹的希望寄托于革命、集体化、改革、扩大玉米播种面积、土壤改良、生产的集中和专业化，而今天我

们仍在等待货币主义化、军转民、民主化、农业农场化等诸多方面的奇迹，却很少为改善生活做些实际工作。

第二天傍晚，戈尔巴乔夫动身返回莫斯科。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是我 50 岁生日。雅科夫列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告诉戈尔巴乔娃那天是我的生日。于是，在飞行中的飞机座舱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请人拿来了一瓶葡萄酒。应当说，她自始至终是反对那个不切实际的禁酒令的，她说过，连葡萄酒都不让喝——这真是极其荒唐和愚蠢的做法。

我常常赞同她的一些观点，对她的这一看法我也曾在适当的场合给予支持，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嗜好。

高脚杯中倒上了“穆库扎尼”酒。戈尔巴乔夫稍稍抿了一下，不知是在下属面前感到难为情，还是由于别的原因，他没有接着喝下去。话题很快转到这次出行的成果和印象上来。

忽然赖·马·戈尔巴乔娃说：

“来，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忠诚十杯，宣誓吧，说你们一定忠于他。”

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使在场的人有些尴尬，雅科夫列夫转过身去看着舷窗外，拉祖莫夫斯基一下子笑了起来，而我则尽量把一切都当成玩笑话，我还不相信这些话是真的，也确实不明白凭什么要宣誓效忠一个人。我们是在为事业、为祖国工作，而不是为某个人或某对夫妇服务，把祖国与总书记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这毕竟不是君主王朝。可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并未就此罢休，她要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意思。戈尔巴乔夫举起了高脚杯，而她仍然不依不饶：

“不，不，你们都要说：‘我发誓’。”

这有些过分了，而已这分明是要向她宣誓。尼·雅科夫列夫悄悄地把话题转开，讲起了其他国家的某些经验。这件令人难堪的事总算过去了。

几年之后再次提起这次喝酒的事时，戈尔巴乔夫的老熟人拉祖莫夫斯基已经离开中央委员会，雅科夫列夫也不明不白地被解除了总统委员会成员的职务。

效忠宣誓的要求尽管是在 11000 米高空提出的，但它的基础无非还是那个老套子：每个人要对长官忠心耿耿，长官则把人们视为自己的仆人——他们不应根据事业的原则和利益行事，而应服务于那些大人物，哪怕这些人物是政治上的变色龙。臣民必须根据君主的穿戴来更换自己的衣服。

那几年时间过得很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会见活动很多，还常常发表演说，这些都需要准备相应的稿子，而且这些稿子往往要修改几次。当时在沃伦斯科耶中央别墅已经有一个常设的“写作”班子，他们为总书记起草报告、发言稿或演讲稿。那里还有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国外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9 月 7 日在切利诺格勒发表演讲后，又于 9 月 20 日在苏共中央接见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老工作者，他只是讲话，又是致结束语。9 月 30 日他还准备在法国电视台发表演讲。10 月份他共有 15 次讲话、演讲、报告和会谈，未公开的那些还不算。有几个月他讲话、致词和发表文章多达 22 次，不过问题还不在于数量，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逐渐开始自己起草讲话稿子，他常常将准备好的稿子重改一遍，有的稿子经修改后内容丰富了，但也有不少稿子被改糟了。他改的稿子往往是篇幅过长，内容重复，这样做是

要花不少时间，然而这样一来，稿子就成了他的劳动成果。

由于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局内协调发言的制度被破坏了。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得知的。这里还应当说一下，戈尔巴乔夫接见的国外来访者非常多，实际上他没有多少时间来仔细地研究国内的问题，也没有时间同部长们、同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苏共边疆区委和州委的书记们交谈。

这一切加深了总书记同中央委员、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和经济部门领导者之间的隔阂，他们始终积极地帮助戈尔巴乔夫而且准备继续帮助他，可是他们与戈尔巴乔夫的联系中断了。总书记对地方的情况不感兴趣，很少打电话过问，于是相互之间关系疏远了。不愿保持联系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大弱点，没过多久，会见和电话对地方领导者来说已失去意义。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不再同部长和企业的领导者促膝交谈，尽管他们有种种建议和请求。同被邀请者的会见越来越少，会见时他常常进行说教或是言词激烈的、侮辱性的批评，而且这类会见时间也不太长。人们感到同总书记格格不入，尽量不去找他，除非非去不可。谈话变得太正式，每次都由秘书安排，往往是 10~15 个人一起谈。谈后时主要听戈尔巴乔夫讲。

“你知道，我不喜欢那种政治性谈话 / 有一次，我的一位老熟人、西伯利亚一位州委第一书记这样对我说。“我想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可人家却同你进行政治谈话，就像是州委宣传员讲课。要谈就面对面谈，可是不行，没办法，我们命该如此……”

戈尔巴乔夫的接见活动由秘书安排，我不能也不想调度此事，因为我不能当总书记的看门人。当然，遇有紧迫的、重大的问题时，我也会把请求意见、希望汇报情况的州委书记的便函通报给总书记或转给接待室。但是这样的请求一年比一年少，到后来想见戈尔巴乔夫已不是什么难事了，恐怕随时都可以见，可人们却极少敲他的门。越来越多地走进这个门的是国外报界的记者，外国的来访者，还有一些抱有个人目的的入——想借戈尔巴乔夫大的声誉抬高自己的身价，或是在同事面前提一提自己同苏联总统长谈过、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总统的支持、总统答应帮忙……

我是在 1985 年 3~4 月间被任命为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的。1984 年 12 月代表会议的报告起草工作结束后，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让我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我知道这是一项临时性工作。他还任命阿·帕·卢希科夫为他的助手，这是个经验丰富、头脑清楚的人，能解决许多问题。为了处理同西方之间的国际事务，他最初留用了曾连续担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助手的阿·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此人知识渊博，但由于种种客观情况总是用老眼光看待当前问题。BB 沙拉波夫负责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事务，他后来担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中央总务部部长由阿·伊·卢基扬诺夫担任”他精通文牍工作，据他自己说，先后与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共过事并熟悉错综复杂的机关工作。

很难说这个班子中的人对工作的想法和观点是一致的，好在我不久又干上了我比较熟悉的工作——经济工作。

这时雅科夫列夫已提任中央鼓动宣传部部长，我一时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调动我的工作，只是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新任命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助手是格·卢·斯米尔诺夫，这个人我在 60 年代初就认识，他在苏共中央讲

过课。这个人选是经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意的。她总认为，应当找个院士来帮助戈尔巴乔夫处理意识形态问题，斯米尔诺夫符合这个要求。他这个人很有学问，做事四平八稳，甚至有些迟钝，确切点说，常常磨磨蹭蹭。雅科夫列夫虽然向戈尔巴乔夫推荐了他，却又说他好似大象进了瓷器店，去了个不该去的地方，这话看来不假。就是这个“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班子”在给总书记出谋划策。

戈尔巴乔夫夫妇继续在全国巡视。总书记视察了一些工业中心、机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大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还计划去古比雪夫州了解情况。这个州有一些机器制造业企业，在陶里亚蒂有汽车工业骨干企业——伏尔加汽车制造厂。但州领导工作不得力，州委第一书记威信不高，这一切可能影响该州未来的工作。几个月后，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而当初戈尔巴乔夫还曾希望他的到来能改变这里的局面。

总的说来，总书记的古比雪夫之行相当引人注目，人们热情地欢迎戈尔巴乔夫夫妇，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电视转播不满意。格·卢·斯米尔诺夫对这一切负有责任，他把事情放手交给了电视台的人和雅科夫列夫手下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副部长——A. .弗拉索夫。

有一次吃午饭时，赖·马·戈尔巴乔娃谈起了这件不愉快的事。

“这儿的人好极了，对我们真热情。”她温和地说，“就是舆论部门的报道太不像话了，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拍的尽是背影。还总把他同欢迎的人群分开。当时很多人在场，有报社记者、电视台工作人员、中央来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以及专门派去的助手，可竟然出现这种事情。”

这番话使我一下子想起我曾经遇到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从戈尔巴乔夫口中也听到过这些话，他抱怨舆论部门对他的第一次出行——参观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报道得不够。那次出行是我安排的，并且经戈尔巴乔夫同意作了简单而又实事求是的报道，这些我已经讲过。此行属工作性视察，目的是了解这家工厂和首都无产者区一所医院的情况。既然是工作性视察，所以请来的记者很少，戈尔巴乔夫当时对此也表示同意。

我觉得，这类活动本来就应当是事务性的、工作性的，否则就成了广告了。当时我国人民对总书记在电视屏幕上频频露面十分反感，也特别不愿听他的讲话。我想，这种抛头露面的事该停一停了，过一段时间观众和听众就会对总书记的话感兴趣的，总书记也同意我的这种想法。

然而第二天我才知道，我不仅仅想错了，而且根本没理解对总书记的视察活动进行报道的意义，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头一天亲自挑选给电视台准备的片子，今天却又说报道搞得不像样子，片子拍得不好。我记住了他的话，可是在另一次活动后我又受到了训斥：为什么拍党的领袖的后脑勺。我对这种拍摄手法无法解释清楚，不过我曾关照让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专业人员来做这件事。雅科夫列夫也知道出了差错，这时他已身居高位，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问题并不在于拍戈尔巴乔夫的后脑勺。顺便说一句，总书记的后脑勺长得非常漂亮，这一点谁看到都会承认的。与许多人不同的是，总书记的头发每天都由理发师修剪一次。况且对大部分男人来说，要是能每天在电视上展示他们头上的这一部位的话，那准保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仔细地琢磨雅科夫列夫的话，终于明白了，问题就出在没有把领袖夫人的全部魅力表现出来。我后悔当初没理解展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穿着

打扮的必要性。不仅如此，我在了解了人们的意见、读了一些来信后还曾认为，过分突出总书记的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事业不利，对党和改革不利。而当我终于明白应当把摄像机镜头对准何处时，我已被调去干别的工作了。原哲学所所长、经验丰富的格奥尔吉·卢基奇·斯米尔诺夫接过这项工作，这时的他大概可以不必为“后脑勺”而担惊受怕了。

专门负责提高苏联领袖威望的卢基奇（我们总这样称呼他）坐在桌旁，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又谈起（不是针对他谈的）人民群众对总书记的热爱，这话一点不错；还说电视不能使全国各民族和全世界都充分了解这种爱，对此也不能否认。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因为记起了我曾受到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训斥，我说道：

“依我看，不光总书记的视察很成功，对活动的报道也很全面。”

这话并未起到宽慰作用，反倒引出一大堆话来，总书记夫人谈了许多有关宣传工作的想法，包括她对意识形态问题和苏联摄影师专业技能的看法。话越说越激动，斯米尔诺夫扔掉餐巾，急急忙忙地离开桌子给他做报道工作的班子打电话，他那哲学家的平静心态有些波动，他吩咐那些人只能正面拍摄总书记，而且要连同夫人一起拍。

第二天早上，我和卢基奇坐在厅里等候招呼我们去吃早饭——早上助手们常常被叫去与戈尔巴乔夫夫妇一同进餐。时候已经不早了，卢基奇问：“也许把我们忘了吧？”我对他说，这种事还从未有过，看来他们还在休息，马上就会仟饭的。

格奥尔吉·卢基奇胃部做过大手术，他从来都按时吃饭，就像吃药一样。我终于也有些耐不住了，到走廊看一眼并向警卫人员打听总书记在哪儿。原来根本没开早饭，戈尔巴乔夫突然一个人到工厂去了，既没叫上我们，也未通知卫队，看来夫妇俩就报道问题讨论了一个晚上，改变了第二天的安排。

斯米尔诺夫懊丧地看了看我，我则尽力安慰他：

“节食对身体有好处，卢基奇。没关系，我们悄悄到工厂去，午饭时多吃点儿。”

没过多久，格·卢·斯米尔诺夫愉快地调走了，这样一来双方都满意。对他来说，这种折腾是绝对受不了的，他体弱多病，习惯于有规律的生活，受不得刺激和委屈。而总书记认为，这位哲学家助手慢条斯理的作风无助于提高党和国家领袖的威望。

助手换得越来越勤，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也走了，戈尔巴乔夫问我们该让谁来接替他。我当时推荐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因为我认为他是个有学识、有能力的人、笔头儿也不错，但当时这个人选没有被接受。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工作时，一次出国归来休假期间接触过这个人，而且不知为什么下大愿意接近他，所以他认为切尔尼亚耶夫“不配”当他的助手。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国际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雅科夫列夫也推荐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时，这个人选便定下来了。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对这个人选各方面都不满意，正如一位诗人曾经说的，这是一对孪生兄弟。

接替格·卢·斯米尔诺夫的是伊·季·弗罗洛夫，他也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对生活有自己固定的看法。但他身患严重疾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他与周围的人交往时，总有人拆他的台或对他悦些刺耳的话，不久他便被调到《真理报》工作。拆台的事仍不断发生，在《真理报》社，主编与一部分人之间有矛盾，最后这个问题只好拿到苏共中央会全上讨论解决。另外还



有一些人员变动，格·霍·沙赫纳扎罗夫也被换上来了，我说过，此人是个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建立世界政府的思想。

尼·雅·彼得拉科夫调来没几天就因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而离开了，向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还有其他许多在编或不在编的顾问、助手、助手的顾问、顾问的助手，总书记身边这群人之间常常产生磨擦和冲突，大家都在争宠。他们激烈地争执：谁的位置更重要——是助手还是顾问？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曾给总统写信，说在电话号码簿上助手排在了顾问的后面。而顾问们得知后则说自己的作用本来就很重要，不能与助手相提并论。总之，这种争执往往不是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而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非是抱怨一些人遭冷遇而另一些人受宠罢了。例如，为什么这个人坐新车而那个人坐旧车，为什么我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的电话装置，等等。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知道这些无谓的争吵，不过他总是达观地对待这种事，从不为此分心，还吩咐我别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1985 年的夏天和秋天，戈尔巴乔夫是在出国访问和国内巡视中度过的。他在这段时间里很少考虑我们的国家、国家的经济潜力、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想所需，所以他想弥补这一不足，打算好好地考虑一下面临的任務。眼前的一切令他震惊。他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知道它幅员辽阔，具有强大的生产潜力，他当然觉得面对的问题很棘手，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缺陷，必须加以完善，但又不能使经济瓦解。

人们依然要求改革。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改革的规模会有多大，不过他总是对身边的人和听众重复一句据说是拿破仑的话：“必须投入战斗，然后再考虑怎么办。”

拿破仑当然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可是并非需要一下子摧毁所有的生产和社会结构。戈尔巴乔夫毕竟是宣布进行改革，而不是进行一场使国民经济遭受破坏、使忠臣命丧沙场的毁灭性战争。只有拿破仑才会在没有制定出明确计划的情况下“投入”战斗。当时，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要由政治局、中央全会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于是筹备苏共二十七大的工作开始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制定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调动一切资源解决新的、不同寻常的重大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一个负责起草总书记的工作报告等文件的写作班子，责成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雅科夫列夫领导这个班子。我们都集中在沃伦斯科耶 2 号别墅，这所别墅坐落在明斯克公路旁一片不大的树林里，距胜利纪念碑半公里。这里离市中心很近，旁边是斯大林过去的别墅。沃伦斯科那院内有几座新建的宾馆式楼房，每个房间可住一至两人。不远处是一所漂亮的食堂，里面有宽敞的餐厅，二楼有电影厅、台球室和图书馆，周围是大片的园林。

改革以来的首次党代会的文件起草工作就在这所别墅里开始了。首先要做的是对报告进行构思，确定各个部分的结构。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常常发生争论，不知道从何处下笔。按传统做法可以从国内问题写起，可是现在提出要把国际问题放在前面，阐明党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任务。改革的基本思想主要由亚·尼·雅科夫列夫和瓦·安·梅德维杰夫来写，戈尔

巴乔夫的所有讲话实际上都是以他们两人的理论观点和许多具体的设想为基础的。当时他们承担了主要部分的起草工作，对报告其他部分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

报告中讲完国际问题部分便转入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改革的各个方面，当时需要明确改革的内容。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名词和概念准会把人们搞得莫名其妙，谁也不会明白改革是怎么回事、改革将如何实行。后来的结果就是如此，有许多关于改革的政治笑话，改革一同渐渐成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盲目变化的代名词。

当我们认为报告稿可以送去初审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雅科夫列夫和我去皮聪达——他们一家人正在那里休假。时值深秋，在皮聪达仍可以出去散步，而且用不着穿得太多。戈尔巴乔夫提议到海边的小亭子里读报告。海水在旁边（5~10 米外）轻轻地拍击海岸，湿润的海风阵阵吹过，我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雅科夫列夫和我身披毛围巾，读着报告稿。我带着一台便携式录音机，由于没带耳机听不到所录的话，引得大家开了一通玩笑。当时录了很多意见，比报告本身还多出一两倍。这些意见需要压缩提炼，充实到报告中去，报告的原有内容基本保留。

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多地直接插手确定提纲的工作，他对所要阐述的问题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能很快地搞清楚种种提法的含义并对内容提出较深的见解。大约从这时起，他频频参与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的起草工作，还经常让自己的亲信参加这项工作，不过他们不起决定作用。但是他对第一手材料和原则思想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让人们反复地写，不断地修改。

在皮聪达时工作很紧张，每天回到附近的宾馆（或者叫疗养所）后，人已筋疲力尽。戈尔巴乔夫夫妇住的别墅是克格勃的，由三座单独的建筑物组成，坐落在举世闻名的松林之中，周围是一大片自然保护区。这真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没有外人，非常安静，只有海浪轻轻拍击沙滩的声音，在这里可以很惬意地散步和休息。

夫妇俩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内部都是木装修，有宽敞的客厅、卧室和办公室。每当下午天阴或风大时，我们就到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去，在那儿继续工作，有时他会留我们用晚餐。晚餐很简单，这里的饭菜做得不好吃，而且总是那么几样，与莫斯科的伙食没有什么区别。在总书记这里不能久留，10 点左右他们夫妇肯定要出去散步，没有特殊情况这项活动是不会取消的。

工作一点一点地进展，终于到了我们收拾行李的时候了，我们带着一大堆补充内容和修改意见回到莫斯科。起草苏共二十七大报告的第二阶段工作开始了，到第二年年年初，文件已起草完毕，只等总书记作最后加工。为了修改好文件，戈尔巴乔夫提出去扎维多沃，那是当年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们喜欢去的一处休养地。扎维多沃是一个军用狩猎场，距莫斯科 150 公里（沿列宁格勒公路可直达），我国一些上层人物和外国客人常到这里打猎。狩猎场临近一座水库，离科纳科沃火车站不太远。

近几年，这里建起了一些漂亮的别墅。当年勃列日涅夫在这里住的套房是用标准预制板（这种预制板在 60 年代用来盖五层楼房）建成的，如今这里盖起一幢豪华别墅，内部用名贵木材装修，屋顶挂着沉甸甸的水晶吊灯，看上去既有竹篱茅舍的质朴，又具有意大利现代建筑的奢华。

戈尔巴乔夫夫妇就住在这幢房子里。亚·尼·雅科夫列夫、瓦·安·梅德维杰夫和我被安置在 100 米外的一座五层楼里，楼房附设一个大游泳池和

桑拿浴室。这里设有宽敞的餐厅、电影厅、台球室，还有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客人们留下的猎物标本和一些纪念品。

不远处还有两座造型优美的二层别墅，里面的设备和装饰材料都是进口的。那里暂时没有人住。

每天上午 10 点左右，我们都来到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别墅那间“农舍”办公室。屋子中间有一张宽大的、未涂油漆的松木桌子，周围是一把把巨大的圈椅，上面铺着野猪皮或熊皮。大家坐下后便开始工作，在坐的一共五个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早就同我们样参加文件起草工作了，而且非常细致，几乎对每句话都要发表意见。她既是工作的组织者，又是在思想上把关的人。工作进展缓慢，往往一个部分要反复修改、不断补充，对文字要加工润色，某些观点还要充分发挥。

12 点左右，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宣布稍事休息，这时便端来热牛奶、咖啡、糖果、奶油蛋糕、饼干、炼乳等。于是大家开始喝咖啡，而给总书记夫妇端来的是专门配制的饮料。然后打开窗户透透风，稍稍活动一下身子，接着又开始伏案工作。

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工作能力和执著精神令人吃惊，他们总能迫使我和雅科夫列夫让步，对我们竭力坚持保留的某段文字进行修改。我们只是在知道总书记夫妇究竟对什么地方不满意之后，才对文字进行修改，不过最后还要由他们拍板。如果我们仍然保留某些说法，那么几天后就会看到，这些地方已按总书记的意思改动了。只有瓦·安·梅德维杰夫愿意对他自己写的那部分改来改去，他干这种事常常很主动。我和雅科夫列夫常常怀疑，他恐怕忘了他在沃伦斯科那时坚持的正是现在这种提法。瓦·安·梅德维杰夫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今天觉得这样改好，便会毫不犹豫地大改一通；而到了明天，他又会觉得那样改更好，于是一切又推倒重来。

报告的起草工作总算结束了，今天午饭后我们就离开这里。我们来到外面，看到田野、树木、池塘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天气冷得让人无法站在原地。我们一圈又一圈地跑着，随时准备上路。在总书记的房间里，服务员已把行李收拾好，警卫人员在招呼车辆，我们都在等戈尔巴乔夫夫妇出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终于出来了，接着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热情地握握他们伸过来的手，真想说声：谢天谢地，你们总算出来了！不过这类小事不值得计较。

头天晚上举行了“告别”晚宴。桌子上摆着白兰地、威士忌、葡萄酒，但大家都没有情绪，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大概谈的都是 1985 年春天的事。回忆的内容无非是当时一些人如何阻止戈尔巴乔夫上台，如何想方设法要把他赶出政治舞台，总书记清楚地记得一切，还叫得出一些人的名字。是的，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12 点左右，我们各自回到房间。房间里黑着灯，我的心情很不好，对一切都感到厌烦。我收拾着文件，这些文件是专门送到这里供修改报告用的，有的直接送给戈尔巴乔夫，有的通过我转交。中央总务部部长阿·伊·卢基扬诺夫了解我们这里的工作，总能及时地把文件送来。他的这种作风恐怕是在整个工作环境中，在长期为总书记、为中央政治局服务过程中养成的。

总书记的车开走了，我们也坐上车向莫斯科驶去。到莫斯科后，我先去了趟中央委员会机关——必须归还文件，此外还要把报告送去打印，明天就要把报告稿复印出来，分发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

一天的事总算忙完了，我记不得有多少日子是这样度过的，也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我现在对工作越来越不满意，总觉着我们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不该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文字上，花费在起草报告、讲话稿上。社会上人心惶惶，因为党的指导思想不明确，经济状况非常糟。领导者仍在探索究竟什么是改革，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空话、指责自己的前往，而人们却越来越多地思考着：领导者究竟要把我们领向何处，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时确实没有人知道具体应做什么。当时正处于理论上混乱不堪、组织上软弱无力的时期，今天说一样，明天说一样，而干的又是另一样。

再过一天就要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大家都已得到报告草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认为可以对报告中阐述的思想加以补充。讨论开始了。看上去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是平等的，可是发言还得按级别来——谁坐得离主持人近谁先说。我那时已经不无担忧地发现，人们对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对他的思想的赞誉之词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在这次讨论中也是如此，一上来就大谈报告中某某观点如何如何好，接下来只是随随便便地提几条意见，在措词上作些修改，并未涉及什么重要的问题。倒是葛罗米柯一开始还能积极地提一些实质性意见，但很快便不那么积极了，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转弯抹角、口是心非地说上几句。

会议即将结束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像往常一样说道：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报告中所谈的肯定还不够全面。”

既然他这么说，大家本可以随便发表各种看法，但我们还是尽量谨慎地谈一些确实可以使报告增色的意见。又经过两天的工作，报告稿准备停当。会期逐渐临近，各地的代表已经动身。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关在家里读报告，定时休息一下，还不时打来电话问：有什么新的意见？

“我又修改了一些地方，”戈尔巴乔夫说，“有几页需要重新打印。”

过几个小时又会打电话来要求重新打印几页，而且往往是他刚改过的那几页。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还要和叶·库·利加乔夫和 . . . 拉祖莫夫斯基一起拟定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这是整个代表大会工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大部分政治局委员根本不知道谁会入选、谁会落选，这个秘密（它是领袖至高无上权力的基础）使戈尔巴乔夫能够随心所欲地左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命运，很少有人知道，这项极为重要的决定是根据个人的考虑作出的。总书记决定谁可以进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们则以选他当领导作为回报。在某些候选人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会征求一下意见，比如他会问葛罗米柯：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让某某大使进中央委员会会不会有人反对吧？

葛罗米柯对此能说什么呢？不，我不反对。这就够了。领袖们是可以讲民主的，但前提是别妨碍他们作决定。不过，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多年来一直受旧传统的影响，而且对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记忆犹新，他们不会对候选人提出异议的，顶多是偷偷地、战战兢兢地把某个人的名字从选票上划掉。但他们因此会极为紧张不安，下一次投票时，他们在拿笔去划某个人名之前定会反反复复地思量一番。若是代表团领导有指示，他们会胆子大一些，可是领导的指示只会下达给那些信得过的人，这对选举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些招待所住满了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住宿是按等级、按代表团安排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在忙自己的事情，他们要给自己、给家人、给同事和朋友购物，要买的东西非常多，恐怕一火车都拉不走。中央管理局设了个邮件专递处，负责把大家购买的物品寄往全国各地。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出席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得到一份简单的礼品，仅这一项开支就 100 多万卢布。每份礼品包括手提箱、皮制公文包、手表、钢笔以及一套专为大会出版的装帧精美的政治书籍。此外，代表们还可以在招待所里购买其它东西，国营百货商店和一些食品店里也有特设专柜，这里有来自各个共和国的美味食品。总之，代表大会的物质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为代表们创造优越条件的代表大会，在下一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吃早餐时领一份小灌肠都得排队。

戈尔巴乔夫仍在家里阅读他的报告，代表们则在琢磨着自己的新领袖。尽管他当时已经享有盛誉，然而他那闪闪烁烁的谈吐、虚与委蛇的做派、难以揣摩的心思却像一堵墙一样把他同人民隔开。这便是最初的裂痕。这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终于使整个党土崩瓦解，使各民族断绝往来，使国家四分五裂。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来到了。1986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的领导人出现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宫那气氛庄严的大厅里，这历来都是很隆重的场面。全世界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全都聚集在这个被苏共党旗映红的大厅里。代表们起立欢迎走上主席台的人。

戈尔巴乔夫走到主席台中央的麦克风前，先通报说应出席代表大会的 5000 名代表中有 4993 人到会，然后宣布代表大会开幕。

他作为总书记第一次主持有这么多人出席的大会，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代表们的关注。

这次代表大会来宾特别多，还有一些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他们也都在关注着代表大会和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同寻常的事件。代表大会按照过去的惯例即已经多次使用过的“脚本”开幕，并按计划闭幕。

许多人认为，报告很成功，发言也很务实，大会的文件全部一致通过。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作了适当调整，戈尔巴乔夫提名的人全部当选，不过也保留了许多以前的领导人。

还有一件事也令总书记感到得意，他对谢瓦尔德纳泽打算颂扬他的做法作出了明智的反应。不知是一时激动，还是旧习未改，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像格鲁吉亚人经常做的那样）“突然冒出了”一串吹捧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话，那些话他只在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说过。大厅里立时沉寂下来，这令人尴尬的几分钟对戈尔巴乔夫的威信能否树立、他的种种想法能否实现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他当时沉默，人们肯定认为，原则和工作方式并未改变，而只是领袖更换了。戈尔巴乔夫很清醒，他打断了谢瓦尔德纳泽的话，坚决表示不该对他如此吹捧。大家当时对勃列日涅夫所受到的吹捧还记忆犹新，当然，戈尔巴乔夫能这么做也不容易，当他还是共青团员的时候他就与谢瓦尔德纳泽成了好朋友，他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一直保持着联系。戈尔巴乔夫在皮聪达休假时谢瓦尔德纳泽常到那里去，和总书记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难怪谢瓦尔德纳泽后来成了外交部部长职位的首选人物。

“我打算任命爱德华为外交部长。”有一次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使人感到这个问题已经决定了。

我那时对谢瓦尔德纳泽以及他在格鲁吉亚的工作印象不错，只是担心他缺乏外交工作经验，而这可能会给人造成不太好的印象。

“当然，我们已经有过一位格鲁吉亚人。”戈尔巴乔夫继续说着。“但我知道爱德华是个有能力的人，是个正派人。我相信他会遵循我们所制定的路线的。”

我明白，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是一个既有才能又听招呼的执行者，所以他才这么相信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后来把谢瓦尔德纳泽的这段话从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但人们已经听到他的话了），于是喜欢讨好戈尔巴乔夫、为他歌功颂德的人少了一些。在后来的几年里，总书记—总统倒是很需要这样的人来支持他，但那时他们已经有其他考虑，不再讲话了，而那些想提他的名字的人常常遭到别人反对。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要求戈尔巴乔夫同那些讨好他、吹捧他的人划清界限，但他一言不发。

代表大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许多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入选。戈尔巴乔夫在人选问题上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中央全会还改组了政治局。新当选的人有原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列·尼·扎伊科夫、中央书记鲍·尼·叶利钦、苏联元帅С.А.索科洛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尼·斯柳尼科夫、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弗·塔雷津。当选为中央书记的有中央科学部部长瓦·安·梅德维杰夫、俄罗斯农业部副部长В.В.尼科诺夫、中央组织部部长Л.Л.拉祖莫夫斯基和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

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一批年轻人，他们相互信任，忠实执行新的方针，愿意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人与党过去所犯的 error 无关，而且也不太了解那些错误，但是许多人缺乏从事大规模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经验。

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的职责作了分工。叶·库·利加乔夫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戈尔巴乔夫不在时也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为苏共的第二号人物，他不仅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还主管党的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他十分熟悉这项工作，早在60年代初他就领导过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鼓动宣传部的工作，利加乔夫积极而又坚决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他一向如此）。新当选的苏共中央书记亚·尼·雅科夫列夫也部分负责这项工作。这一安排有其道理，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修养上讲，雅科夫列夫都是个彻头彻尾的思想家，其实他是在苏共中央宣传部内成长起来的，5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在那里工作了。他精通此项业务，熟悉意识形态干部，可以说对宣传马列主义十分在行。让两位中央书记负责同一项工作，这在客观上使苏共的两位领导人发生了矛盾，过去，在60年代，他们彼此关系不错，而现在却吵得不可开交。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现在还难以说清，很可能是对同一问题持有不同看法所致。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两个人自尊心都很强，都好发号施令。不同的是，一个做事直率果断，不懂得迂回婉转，也不善于随机应变；而另一个生性优柔寡断，惯于深谋远虑。这种“争吵”对党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思想问题上观点不同的不光是两位领导人，思想战线上的各个部门和所有干部也分成两大派，一派依附于雅科夫列夫，另一派则投靠利加乔夫。无谓的吵闹

往往造成矛盾和冲突，如果利加乔夫召开一个会议、对舆论部门下达某些指示，那么雅科夫列夫第二天就会在他召集的报刊编辑会议上（或通过同编辑们的私下接触）对那些指示作一番指摘。

一个星期后其他地方又要发生这类情况，内部矛盾极其尖锐。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争吵，并影响到其他问题的解决，当时经常无缘无故地取消对某些决定草案的审议，几乎所有中央书记都卷入了冲突。我记得，没有哪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或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讨论意识形态部门、舆论部门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总是持一种非常奇怪的态度，他尽量不去干预冲突，居高临下地观看着两雄相争。他没有意识到这场争斗的后果吗？当然没有。总书记甚至还无用意地为这场争斗推波助澜，他的用意就是让他们在这场争斗中两败俱伤，以后他们就会听话了。最初他并未意识到，在政治角斗场上进行的不是党的领袖人物的权欲之争，这是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巩固苏维埃国家联盟还是瓦解这一联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是戈尔巴乔夫能马上明白所发生的一切的话，他也就不会自食其果，不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总书记天生不具备战略头脑，他围着自己燃起的篝火起劲地忙碌着，不时地添上一把干柴，为那燃起的火苗高兴不已。有时他问我：

“怎么样，叶戈尔和亚历山大还在吵吗？”

“是的，已经开始短兵相接了，而且每人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平静而又惬意地笑了笑。

政治局、中央机关乃至全党工作的不协调使利加乔夫感到不安，他常去找戈尔巴乔夫汇报这些不正常情况。总书记听了利加乔夫的抱怨后总是那么几句话：

“沉住气，叶戈尔。去干吧，你有的是办法。”

当然，他仍然支持雅科夫列夫，不过有时也会说：

“要按商量好的去做，萨沙，注意点儿，别让他们乱写一气。跟编辑们说说，要坚持路线。”

总书记也经常发火，要是政治领导人对报刊的意见多了，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摆出一副气愤的样子，把报刊编辑们大骂一通，然后让雅科夫列夫整顿纪律。不难猜测，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政治局委员几乎都支持他。在整顿纪律方面，雅科夫列夫总是让利加乔夫冲锋陷阵，而利加乔夫总是认真履行职责，结果他付出很大代价，舆论界把他当成靶子批来批去。总的说来，80年代后半期的舆论界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争吵不休，那时埋下的祸根后来导致许多工作瘫痪。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了一个重要而又微妙的位置上，他经常召集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作家、记者、演员、画家等开会，让大家发表意见，他自己也谈些看法。但人们不久便发现，这种会见毫无意义，知识分子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作家们反映出版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而实际上毫无改进；人们纷纷倾诉自己的职业需求，但这些不过是旷野里的呼声；他们畅谈自己对改善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的种种想法，可一切依然如故。

一些作家和记者有时也来找我，他们最初都谨慎地说希望参加这样的会

见，后来胆子大了，便抱怨这种会见没有意义。我自己当时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是让创作界人士发泄心中的怨气还是没有能力解决具体问题？我的结论使人感到可悲：二者兼而有之。

可惜时间不等人，许多保证和许诺仍旧停留在口头上，人们当初那种相信新领袖上台会产生奇迹的乐观看法开始消失，开始出现抱怨和不满情绪。戈尔巴乔夫是根本听不得批评的，的确，还从来没有批评过他。一方面，从他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他还不值得人们批评；另一方面，他在边疆区拥有绝对的权力，可能中央收到过一些匿名信，即使有的话也都转给他本人了。所以，当表明他的威信开始下降的社会调查结果首次见报后，戈尔巴乔夫为此暴跳如雷。我记得，他对《莫斯科新闻》在列车乘客中搞的一次调查反应十分强烈。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当着雅科夫列夫的面指责报界太放肆，说调查不具代表性，关于总书记的支持率降低的结论是错误的。雅科夫列夫连忙采取措施扭转事态，于是总书记的威信又上升了。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论据与事实》也登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又是一件不成体统的事，结果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从事创作活动的知识分子时忍不住当众斥责该报，声称要撤编辑的职。编辑回答说，他是要让总书记一下子清醒过来。其他报刊也纷纷为该报鸣不平。当然，戈尔巴乔夫本来也不会把那位编辑怎么样，他做事从来都优柔寡断，现在他甚至害怕了。此后他很久没再为这类事发火，并开始巴结报界。

记者、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很重视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但也知道他们在和谁共事。人们对领导越来越不尊敬，出现许多政治笑话、讽刺小品、漫画。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在乎，似乎已适应了批评和讽刺，能够对这类小事情安之若素。当实在忍受不了时，当失去耐心又没有理由反驳时，他往往会以辞去某个职务相威胁。不过我知道，他只能吓唬那些神经脆弱的人，他根本不会辞职，因为他对自己的职位非常满意，当然，他也清楚他对国家分裂所应承担的责任。

也许最着急的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经常打电话询问知识分子的情绪如何，某某作家、文化活动家对总书记的态度怎样，演员们在说些什么，谁靠得住，等等。其实我对这方面的事什么也说不上来，因为我知道得很少。现在这些事情由伊·季·弗罗洛夫和其他助手负责，他们的任务是把住思想方向、了解知识分子的情绪。

所有这些冲突都是在代表大会后逐渐展开的，冲突的激烈程度在一年年、一月月地加剧。苏共二十七大刚刚闭幕时，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尚好，人们的工作热情很高。代表大会提出了旨在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改革的计划，改革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人们很快便发现，不进行深入改革，很难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此外，还有一股势力对我国沿着科技进步的道路快速向前发展根本不关心，他们更想做的是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含义模糊的“改革”一词被各种势力用来大做文章，谁也搞不清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搞不清改革道路上那些难以辨认的路标会把人们引向何处。在祖国的词汇中这个词并不是什么新词，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也许还要早）这个词就已在我国广泛使用。我还清楚地记得，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对我国的管理结构的震动，那时的官员们常常就此开玩笑：“站稳点儿，改革开始了。”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在意，他也许根本就不知道，革命后国内进行的种种改造的全过程其实就是改革。总书记现在又把这个词搬了出



来，一开始这个词只是偶尔用一用，渐渐地越用越频繁，它的意思显然就是在国内进行全面改造。总书记是在最初巡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时开始使用“改革”一词的，起先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演时用了两次。顺便说一句，在那里他看上了在边疆区工作的德·季·亚佐夫。后来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又对国内改革作了全面阐述，当然，他当时所说的改革是指加快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戈尔巴乔夫在整个执政时期一直在琢磨改革一词的含义。改革的基本观点是雅科夫列夫提出来的。关于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范围和改革持续的时间，不同时期有不同解释。由于各项改造迟迟没有产生结果，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过程的思想。如果当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许多关键部门没有被搞垮，这个提法也许还是合理的。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样，人民听到的仍是一些通俗易懂、但又不负责任、毫无实际意义的话。生活越来越糟，党只顾为过去的错误而自责，却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这使得人们渐渐地与苏共疏远，把它视为万恶之源。权力结构渐渐瓦解的同时，新生力量开始兴起，他们大张旗鼓地、无所畏惧地批判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可是摆脱危机的办法却提得含含糊糊。形势极为紧张，从改革到革命只有一步之差，就缺一根导火索了。1991年8月，导火索终于找到了。

在国内困难日益增多、社会冲突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减少了到全国各地巡视的次数，外出已经不太安全了，再说看到那一张张愤怒的面孔也会使他感到不快的。他的兴趣逐渐转到国际关系和出国访问方面。国内的形势愈紧张，国外的赞誉之声就愈大。西方国家对总书记一总统的所作所为依然赞不绝口，把他当作伟大人物来接待，因为他做了他们用任何武力和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戈尔巴乔夫的西方崇拜者对他的称赞补偿了他在国内遭到的冷遇，当然，他们不仅仅是称赞他……

## 出国访问

又响起了哗哗啦啦的钥匙声，牢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有人走进来说：“赶快收拾东西到另一间牢房去。”接着就是搜查，所有东西都翻一遍，衣服、用品都要摸摸看看。一小时后我们转移到了新牢房。墙壁还是深蓝色的，墙面上浇筑有密密麻麻的碎石，不要说往上面写东西，就是靠近它都使人不寒而栗。室内有几张铁床，桌子固定在地板上，同样有一个监视孔，总有人在监视房内的动静。不过每当晚上当官的不在时，年轻人总要嬉笑吵闹一阵子，笑声、争论声、跺脚声使我无法入睡。实在熬不住时才迷迷糊糊打个盹，根本睡不实。

生活中经历的事情是忘不掉的。而我经历的事大概只有一件——繁重紧张的工作。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往往还要搭上星期日。星期六和平时一样，星期日也常常加班。我像火车头一样不停地东奔西忙，承担着几个人的工作量。为了什么呢？因为我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当然，是为了使国家尽快繁荣起来。这些年来，我没有什么积蓄，像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为了添置点东西还要向人家借钱。市场经济即将开始时我就明白了，即使我自己能幸免，我的子孙们也难逃为那些头脑灵活、能挣大钱的人去打工的命运，而这时我正在为戈尔巴乔夫起草关于向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远景目标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篇篇讲话稿。

戈尔巴乔夫过得挺好，他有外汇存款。一次次的出国访问使他收入颇丰，

而他又喜欢出访。

早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戈尔巴乔夫就携夫人去过许多欧洲国家。到中央工作之初，戈尔巴乔夫安排了一些出访活动，如访问加拿大，1984年又访问美国。我国驻各国大使都想方设法让这位政坛新秀到他们的出使国转转。当改革刚刚起步、新思维政策和爱好和平的倡议开始实施时，来自各国的邀请已应接不暇了。他在频繁出访过程中见到了各国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出国访问同在国内巡视一样，总是带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常常是距出发还有很多日子他们就开始认真地准备旅行了。改革的头几年，出访的事都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为此，通常要把国外的邀请信以及外交部和中央国际部关于出访是否适宜、能否达成某些协议或开始进行有实际意义的谈判的意见分送给参加会议的人。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就访问可能获得的结果阐述自己的看法，然后由苏联外交部长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表意见，结果都是认为有必要出访。然后责成各部门和机构提供有关出访国的政治状况、与我国的经贸联系以及访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有关材料，国防部、克格勃、大使馆、从事有关国家研究的研究所也要就出访提出各自的意见。戈尔巴乔夫责成自己的一名助手专门处理这类问题，一开始是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后来是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和B.B.沙拉波夫，他们的任务是归纳材料，通过外交部和使馆商定出访计划，包括安排同出访国的领导人、商业界人士、学者及社会各界代表的会晤。

还得专门为赖·马·戈尔巴乔娃制定一个计划，她通常要会见科学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代表，参观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她还经常自己安排一些会见或应邀参加座谈。

这是访问中最麻烦的事情，在礼节方面常出现失误和差错。

外交部礼宾司和警卫部门对每次出访都要认真准备，他们同出访国有关部门磋商，为保证访问期间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做细致的安排：会晤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谁担任苏联领导人的警卫，警卫人员带不带武器，是否让接待方承担全部警卫工作，等等。这些问题都要经过细致的讨论，还要商定陪同人员的数量，不过有一点是从来不变的，这就是把我们的车运到要访问的国家，一般是“吉尔”车，车上装有专用通讯设备，这样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同莫斯科进行联系。这些车样子很漂亮，十分安全。当然，按现代汽车制造业的观点看，它们已经过时了，车上的发动机常常不听使唤，有在关键时刻熄火的“习惯”。

一次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时，我看到美国人对我们的“吉尔”车很感兴趣，他们得意洋洋地问道：“这是英国车吧？”他们难以相信停在他们面前的是苏联车，不停地摇着头，那意思大概是：得啦，得啦，别糊弄人，我们可不是笨蛋。在德国倒是没有怀疑这是苏联车，特别是在它们一下子发动不起来的时候。警卫人员千方百计为“吉尔”发动不起来寻找借口，每当发动不起来时，他们就说，天气太热，汽油挥发得快，要等一等。有时也会找出其他一些原因，不过我仍然觉得这些车非常漂亮，内部装饰豪华，车体十分坚固，即使敌不过坦克，起码也能抗得住一般步兵战车的攻击。

戈尔巴乔夫在为出访做准备时不仅对文件和讲话稿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对这类工作一向很认真，尤其是在刚上台时），而且也很注重自己的“外

包装”，根据出访国的地理位置订做西服，颜色视活动安排而定：深色的在正式场合穿，颜色较浅的在外出时穿。仔细地挑选各式各样的皮鞋、领带、衬衣。我说过，在这方面，总书记一总统要比他所会见的人精神得多，可我并不认为其他国家领导人身穿比较简朴的服装就有失风度，并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愿意打扮得像模特一样，略微随便的穿着要比过于古板的打扮更能使人增添风度。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穿着打扮一向得到特殊的关照，她总是穿着漂亮雅致的服装，身上香水的气味也比别的女人浓。她有一个大衣柜，因为她穿衣服不喜欢重样，这也是一种打扮方法。不过我发现，她后来总戴同样的、沉甸甸的白金手镯、耳环、戒指，她能搞到只有西方国家商店里才有的皮鞋来配她的服装。她有几件非常漂亮的皮大衣和其它一些毛皮制品，我说不上来这些东西是用什么兽皮制成的，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精美华贵。也许有人觉得这些服饰极为昂贵，要花很多钱的，但他们显然想错了，因为总书记一总统的薪金并不很多，至于赖·马·戈尔巴乔娃是如何搞到那些东西的，这只有她自己 and 上帝知道。总之，每次出访飞机上总装有大量的衣箱、衣柜以及专门用来放外衣的袋子，我常常以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出去几个月。

夫妇俩操心的另一件事是礼品——官方的和私人的。苏共中央有一个礼品库，在主楼的第三层，里面摆满各式各样精美昂贵（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无价之宝）的物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宝库一样。这个地方不是谁都可以去的，我第一次参观这个礼品库是由尼·叶·克鲁奇纳和他的一名副手领着去的。那里有著名艺术大师的绘画和雕塑，帕列赫风格的精美漆画匣，手工制作的镶嵌着花饰的土拉枪、猎具、瓷器、水晶器皿、珍贵画册、大量的手表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国内专门订做的。还有珠宝首饰、首饰盒和其它用比较名贵的宝石制成的物品，最多的是金银饰品。

我仔细地看这一切，发现有些东西来自国家贵重品保管局，那都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于是我劝尼·叶·克鲁奇纳把这些东西“物归原主”。我清楚地记得，他后来把一个上世纪的银制茶炊，大概还有一些茶杯还给了国家贵重品保管局。令我吃惊的还有：大部分礼品的价格都非常低。从来也没有人对它们重新估价，一块老式金表的价格只有30~50卢布。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出访的前一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便会把准备送给外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其他国务活动家的各式各样的礼品摆到总书记一总统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夫妇俩经常过来看一看。两人一起仔细地边看边挑，商量出访时送哪些东西合适。最初他们挑选礼品要花很多时间，总是拿不定主意，后来就比较快了。戈尔巴乔夫夫妇心里有数，一来就直接说：这个可以，那个合适。有一次我看到准备的礼品中有些十分贵重，就问总书记：“是不是把这些礼品撤下来？因为在其他国家礼品是要上缴的。”戈尔巴乔夫听后微微一笑，说道，那是指官方礼品，而私人礼品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仅要给官方人士送礼，他（她）们的夫人或丈夫也要送。

“好吧，我们不给撒切尔夫人送礼了，就给她那位性格开朗的丈夫挑点儿可心的东西吧。”戈尔巴乔夫吩咐道。

我们的总务人员了解“铁娘子”丈夫的嗜好，经总书记同意后一般给他挑选一套猎具，包括一把带银鞘的短剑，镀金银质酒杯，镶金的斧头，显然还要送上几瓶酒。有时会送一份男人都喜爱的东西：国产优质伏特加、鱼子

酱、蟹肉罐头。

送给总统夫人或总理夫人的礼品有做工精细的水晶器皿或瓷器，各种首饰和宝石制品，帕列赫风格的精美的漆画匣，等等。有一次尼·叶·克鲁奇纳讲，戈尔巴乔夫要送给里根的私人礼品是一副按古老的传统方法制作的皮马鞍，他劝总书记不要送这件礼品，说送马鞍不合适。但据我所知，他没能坚持住自己的意见。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加入世界各国统治者的行列是件非常荣幸的事，他常常谈起各国总统、首相、国王的性格、习惯、弱点和爱好，评论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人，讲述关于他们的趣闻。他最爱讲的是里根如何对俄罗斯俗语和笑话着迷，每次讲完总要让人给总统先生找本这方面的书。赖·马·戈尔巴乔娃喜欢对夫人们评头品足，从她的话中得知，许多国家的第一夫人不会穿着打扮，她们不能认真地谈论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涉及各国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但我又不能不相信总书记—总统夫人的话，当她谈到其他第一夫人对哲学一无所知时，我简直深信不疑。

在互赠礼品的仪式上有许多情况无人知晓，我方赠送的是什么，对方回赠的是什么，这些情况连议会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人民了。这种自古就有的相互取悦的做法由于某种本能的驱使而沿用至今，尽管总书记是个具有新思维的人。实际上总书记—总统的所有随行人员都能收到礼品，当然，由于每个人的职务不同，礼品也就有轻有重——从钥匙坠、手表、照像机到那些根本无人知晓的东西。然而据我所知，把这些礼品交公的只有尼·叶·克鲁奇纳和我。每次访问后所剩的礼品也没有几样能归还礼品库。

我认为，在许多国家里送礼只是象征性的，那里见不到大手大脚的做法。国家越穷，送的礼品反倒越重，我们在这方面“领先于”所有国家。应当说，同勃列日涅夫时期相比，现在的礼品花费毕竟少了一些……

接下来，出访的准备工作又进入一个新阶段。赖·马·戈尔巴乔娃了解出访计划后，便埋头阅读有关出访国情况的书籍。她看该国的电影，阅读该国古典作家的书，研究文化、艺术，了解博物馆、展览馆情况，等等。我曾见到她兴致勃勃地给接待国的陪同人员讲述该国的情况和各种文物古迹，或许是出于礼貌，或许是真的不了解情况，反正主人们都认真地听她讲，偶尔还提一两个问题。很难说这样做好还是不好，不过总比许多客人什么也不知道、带着一副惊奇的面孔站在文化古迹面前要好一些。

主要的事情已做完，该拟定（确切地说是最后确定）随行人员名单了。戈尔巴乔夫夫妇出访时总爱带上一大批随行人员，包括艺术家、作家和记者。为他们夫妇写传记的乌拉洛夫通常都会跟去，他每次都要用摄像机拍下出访的全过程。阿·谢·切尔尼亚那夫出访前很久就开始拟定随行人员名单，一般分为两部分——主要随行人员和为出访者出谋划策或起陪衬作用的人。前一部分人是代表团成员，通常有外交部长、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亚·尼·雅科夫列夫、某些共和国或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和我国驻外大使。此外还有那些为戈尔巴乔夫帮忙的人——助手、顾问、速记员和打字员，以及由尤·谢·普列汉诺夫率领的卫队，代表团正式成员的助手、翻译也包括在内。这部分人都乘坐总统专机。

后一部分人总是提前出发，这些人包括作家、学者及其他各界人士，都是常围着总统转的人，他们在出访中起陪衬作用。当然，这只是最初时的情况，后来我发现，有些人总想以种种借口回避出访。这大大地刺激了戈尔巴

乔夫夫妇，尤其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因为总统的随行人员是她确定的。顺便提一下，随行人员常有变化，名单总是改来改去——划掉一个名字，再添上另一个名字。要是发现有人说了什么不恭敬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再也别想随同出访了。有些人从来就没被邀请过，因为他们不是过于孤傲就是不想参加这种活动。有些同我很熟的人打电话问我：不去合适不合适？我知道，有人真的托病未去。

准备工作到此全部就绪，接着是确定起飞时间。戈尔巴乔夫夫妇喜欢让一大群亲信为他们送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定了一条规矩：送行时全体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助手、各主要部门的领导必须到场，站在前面的是他最信得过的人——普戈、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卢基扬诺夫，或者是这些人的前任（不论他们在党内是否任职）。起初在国内出行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还要求电视、报刊报道送行场面，结果中央收到几百封信，指责一些人成天泡在机场，不是为总书记一总统送行，就是迎接他归来。

戈尔巴乔夫不久便定出新规矩：只有在出国访问时才要求上述人员全部到场送行。但是出国访问也很频繁，所以仍不断有人来信提出同样指责，然而这个仪式是雷打不动的。没过多久，送行人员中又加进了总统委员会成员，随后是安全会议成员，不过中央委员会的人少了些。送行人员总是由戈尔巴乔夫亲自确定，他或者往名单上加上某人，或者把某人的名字划掉——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未经他批准的人不能参加送行。有些人他亲自打电话通知。

飞机从伏努科沃2号机场——贵宾专用机场起飞，大家提前赶到那里等候。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常常觉着他们是在继续开什么会。有些问题就是在那里决定的。过了一会儿，总书记一总统来到机场，如果还有时间，他就和人们一起聊聊，谈一些希望，交待一下任务，然后大家一起走向飞机舷梯，在那儿举行送行仪式。送行人员排成三列横队，第一列有阿·伊·卢基扬诺夫、瓦·谢·帕夫洛夫、弗·伊瓦什科；第二列是全体政治局委员或安全会议成员；第三列是所有助手、部长和其他人。戈尔巴乔夫与大家一一握手，同第一列的人握手时间很长，第二列稍短，第三列则一扫而过。

总统和夫人登上舷梯，在进入机舱前转过身挥一挥手。送行的人一齐举起手，不停地在头顶上挥动着，微笑的脸上显露出一种依依惜别的神情——面对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只能如此。过去在飞机起飞前大家还要相互吻别，后来就很少这么做了。领导层人员的频繁更换显然使这原本充满亲情的送行仪式受到了影响，在举行送行仪式的过程中是不能戴帽子的，要等到飞机滑入跑道后才可戴上，大家急不可待地盼着这一时刻。随后人们走进机场候机厅等待总统专机起飞。在飞机起飞前离开是不礼貌的，赫鲁晓夫在世时出过专机因故障突然降落，而送行者已无影无踪的事。从那以后，只有当机场方面报告说飞机已经升空并且一切正常后，送行的人才开始相互告别，似乎还有点儿依依不舍，尽管他们都知道，也许再过几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他们又会在某个会议上或是别的活动中见面。

就这样，地面上的人都各自离去了。

这时在飞机上人们正紧张地忙碌着，头半个小时是忙着落座。在第一个座舱即总统座舱里，总统夫妇开始安顿座位，更换衣服。这个座舱大约占飞机的一半，设有办公室、休息室和一个宽敞的客厅，厅里有两张桌子和几把软椅，还有电视、电话和其它设备。所有家具都是用贵重木材制作的，与座

舱相连的厨房里备有各种美味佳肴。

厨房后面是一个窄小的座舱，里面有几张桌子。这个舱里可坐八个人，舱里很不舒服，尤其是难以入睡（在长途飞行时）。坐在这个舱里的一般是切尔尼亚耶夫、外交部长、几位随行人员以及总统卫队的普列汉诺夫和梅德维杰夫。

第三个座舱里是卫队、医生、服务员和打字员，这里的座位挺舒服，这些人在代表团到来之前就上飞机了。

坐下来以后，有人拿出文件，有人翻开报纸和杂志，其他人则等着送来茶水和各种甜食。40~50分钟后，戈尔巴乔夫便会请来外交部长、助手，有时是其他随行人员。工作开始了。不过在那儿很难正常工作，因为发动机的噪声很大，再说文件已经讨论过多次了，所以往往很快便转为一般性谈话。

我每次去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就像是一只皮箱，人家想带走就带走，这话恐怕很少有人相信。这种状况常常令我感到痛苦，有几次我曾试图委婉地推辞掉，理由是工作太忙，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不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显然以为，这对我来说是某种赏赐或好处。雅科夫列夫的境遇也是如此，谢瓦尔德纳泽决定所有问题并参加谈判，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和国务活动家们在一起时常常会感到很不自在。

总统座舱里的工作在继续进行，有时被请来的人会留在那里吃午餐，其他人都在各自的座舱里吃。在卫队、医生、速记员等人的座舱里，吃午餐同在普通客机上一样，前排的椅背上有个桌子。午餐很丰盛，端来的凉菜有鱼、肉、鱼子酱、蟹肉罐头等。随后有两种汤——肉汤和鱼汤供人挑选，热菜有鱼和肉，接下来是咖啡或茶、牛奶、巧克力糖、甜点或蛋糕、冰激凌、水果。还可以得到一杯酒，不过我从未见到有谁贪杯，至少在第二座舱是这样。当然，回国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达出访国后，总统和夫人通常住在大使馆，或住在接待方提供的官邸。不过我不记得总统夫妇在大使馆以外的地方住过，这只能说明一点：我随同总统出访的次数比较少。

然后开始正式谈判、会晤、宴会、工作早餐。这些事情令人厌烦，只能使你感到不自在，你不得不学着“板起面孔”，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去讨论这个或那个协议，尽管我已经知道，一切都是商定的，也就是说只差签署文件了。如果还有分歧，则由两国领导人亲自解决或由外交部的全权代表解决。

我清楚地记得在美国的一次访问，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同里根会晤并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夫妇俩住在我们的大使馆里，为此使馆对总统住的房间进行了改建，重新摆放或更换家具。每当有高级访问时都会进行这种“更换”。我们的驻外使馆都很关心国家领导人的出访，他们可以借此机会申请一大笔钱来“更换”用具，“装修”房间，成套成套地添置新东西。那些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次访问中就能解决，申请来的钱往往被用来购买访问中用不着的东西。

其余随行人员被安排在“麦迪逊”饭店，其实它就在使馆对面。我也住在那里，不过只有在睡觉时才回房间。

楼下设有“瑞典式西餐”，是为代表团、可能也是为住在饭店的其他人提供的，还可以品尝许多自己所喜欢吃的其它食品。但实际上我们没有享用过这些食品，因为所有时间都被各种官方活动——工作早餐、宴会、谈判占用了。

1987年12月8日，也就是谈判开始那天，我第一次来到白宫。我们代表团的人走进一座不太大的楼房，它看上去很像古代俄罗斯地主的庄园，里面有许多不大的房间，只有二层上有一个大厅，大概可容纳100人。

白宫的图书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室以及总统的办公室都很小，顶多也就坐得下15~20个人。

会谈开始前，两位总统单独待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其余的人分散在各个房间。

我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弗·米·卡缅采夫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室聊天，谈了对白宫的印象。我们一边看着委员会成员的桌椅，一边判断着这是谁的位子、那是谁的位子，我们一致认为，只有传统才能使两国领导人聚会在这一间设在一层、迈步窗外就是草坪的会议室里。我们还对里根总统表示同情。要知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比里根的办公室大一倍多。

戈尔巴乔夫仍在同里根单独谈话，其他人还分散在各个房间里，一些美国人在来回走动，想必他们也是来参加谈判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看来谈判不会举行了，因为下午要在白宫举行宴会，而剩下的时间恐怕只够回一趟官邸、换一换衣服，结果真是这样。戈尔巴乔夫不喜欢有很多人参加会谈，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一头钻进汽车，于是车队向官邸驶去。

下午先举行中短程导弹条约签字仪式，接着，19点在白宫举行正式宴会。出席宴会的有美国社会各界名流，既有官方人士也有商人，既有学者也有演员。座位的安排很奇特——丈夫和妻子分座不同的桌子。我所在的那一桌都是些挺可爱的人，其中有民主党的几位领导人，还有我的一位女同胞——娜塔莎·赛姆斯，她早年来到美国，已经在这里结婚。大家随便地交谈着，美国人纷纷把菜单装进衣兜，然后请邻座的人在這些小卡片上签名。我也保存着这样一张卡片，那上面列出了我们在宴会上尝到的美食。

宴会同我们的相比不算铺张，但也很丰盛。凉菜有鲑鱼肉、大龙虾、沙拉，并配有各种调料。接下来是小牛肉和水果，吃凉菜和肉时上低度白葡萄酒，吃冰激凌、喝咖啡时上香槟酒。与我同桌的人讲话都很风趣，他们说，美国人讲究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以防发胖。的确，他们的身材都很匀称，肚子不突出。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相互致辞，大家频频举杯，或对讲话报以掌声。

宴会的时间不很长，外面已响起了音乐声，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休息厅。人们在休息厅里愉快地、大声地交谈，相互说着祝福的话，不时发出一阵阵开心的笑声，葡萄酒使人产生了飘然而又兴奋的感觉。随后人们在一个不太大的厅里欣赏万·克莱本演出的独奏音乐会，他演奏了勃拉姆斯的间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练习曲，以及舒曼、李斯特、德彪西的作品。他最后演奏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演出十分成功。

戈尔巴乔夫临回国前在我国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出席的都是美国最著名的人士，有的甚至是从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很远的州赶来的。我们按照自己的传统习惯举办宴会，桌上摆着伏特加，服务员送上了鱼子酱，并用勺子分给客人。客人们一下子没有品出鱼子酱的味道，要求再尝尝，显然，我国的鱼子酱比当地产的味道好得多。他们非常爱吃我们的黑面包，这时也顾不上保持体形了。随后端上来的是腌鲑鱼、熏鲟鱼，接着是用肉、蘑菇和蟹肉等制成的凉菜。客人们品尝着伏特加，许多人对这种酒的质量很满意，不过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他们从不认为只喝一杯就能品出酒的好坏来，于是便

一杯又一杯地品尝下去。

稍后端上来的是鱼汤、肉汤、红菜汤，然后是鲑鱼肉、煎牛排，再往后是甜点心、冰激凌、巧克力糖、葡萄酒、香槟酒、咖啡、白兰地。

我看着客人们的吃态，心里感到好笑，他们显然喜欢吃我们的菜，尽管这种吃法对健康不利。各桌的座位是按美国人的方式安排的——夫妇不同桌，只有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与夫人同坐一桌，因为——按我们的叫法——那是主席团。

席间还演奏了音乐，叶·奥布拉兹佐娃还唱了一首歌，客人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喝够了饮料和咖啡后，大家便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不时开上几句玩笑，谈笑声常常盖过了音乐声。

在结束对这次出访的叙述前我还要简单提一下，宴会结束后在我们的新馆址（美方始终未准许搬入）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戈尔巴乔夫在招待会上概括地谈了访问的情况，回答了报界的许多提问。两小时之后，代表团已经在飞机场了。经过一夜的艰苦飞行、飞机在柏林降落，戈尔巴乔夫向华沙条约国的首脑们通报了此次访问中文件签署结果以及同里根会谈的某些情况。

戈尔巴乔夫一般每次回国后都要把主要随行人员请来聚一下、备上几桌菜，斟满一杯杯葡萄酒、亚美尼亚白兰地，喜欢的话还有威士忌。大家举杯庆贺一番，再回忆回忆谈判时的某些场面。酒喝得并不多，有时只是碰碰杯，因为大家都非常疲劳、非常困倦，时差还未倒过来。要是从欧洲国家回来的话，餐桌旁的气氛就会活跃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这些聚会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是如何为登上总书记的位子而奋斗的，并且总要提到那些曾经妨碍过他的人，有些人至今提起来还会令他歇斯底里地发作一通。

又回到了伏努科沃机场，前来迎接的还是那些送行的人。一张张微笑的面孔，一声声祝贺的话语，每个人都想说：我看了电视转播，一切都很成功。我们这儿好心人多，他们不愿刺激别人，不愿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某种步骤、担心其后果，一把手说了算的制度使这些上层人物养成了只能服从和恭维的习惯。

我经常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私下里都说总书记采取的许多步骤值得怀疑，认为他的做法是轻率的。这使我想起了亚历山大·亚申的一个短篇小说：几位集体农庄党员前来参加党的会议，由于人未到齐，他们就边等边聊。大家都说生产状况很不好，饲料不足，粮食减产，如果要超额完成上缴计划，那就得把牲畜杀了，而这样一来第二年就无法进行生产了。这本是人们出于对集体农庄生产状况的担忧而说出的心里话，可是当大会开始时，同样是这些人走上讲台，口口声声地说，超额完成上缴计划是对祖国的光荣义务，集体农庄必须履行这一义务，向国家上缴更多的粮食。

看来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存在着这种矛盾心理，只有出现紧急情况时，他们才会清醒，才会觉悟。不过这是现在的反思，而过去人们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总是一个劲地说访问非常圆满，说我们灵活地解决了我们的前任多年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

戈尔巴乔夫夫妇还经常去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在那里他们总是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待，卡达尔、昂纳克、雅鲁泽尔斯基、胡萨克、日夫科夫、齐奥塞斯库都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我知道，他们过去彼此非常信任，过从甚密，经常通电话，遇有一些喜庆事包括私事，还会相互祝贺，互赠礼物。我总觉得，虽然他们中的某些人对戈尔



巴乔夫的上台略感突然，但他们毕竟早就认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所以一开始还是支持他的路线的，并为提高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本国的知名度做了大量工作。

当然，保持友好交往的不光是国家的领袖们，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与东欧各国的居民有着情同手足的关系，我们有统一的防御联盟、相互依存的经济、城市和企业间的牢固关系。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这些国家的访问组织得很好，进行得很顺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曾多次谈起他们所受到的令人感动的接待，谈起一个个热烈欢迎的场面。

“你知道，我还从未见过那样的欢迎场面。”他出访回来总这么说。“真是倾国出动。人们随时都可能把我们托起来……”

我仿佛看到欢腾的人群高举双手，托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向前行进，他们在望不到尽头的人流之上缓缓地漂过大街小巷，为全世界的公民指示着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

“您号召他们做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做什么？当然是进行改革。”

“那么他们打算如何进行改革呢？”

“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不过还可以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样做的。”

“这话说得对，这样做是明智的。”我表示同意。的确应该看一看……

“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搞好了，但过程已经开始。他们也没有必要跟在我们后面。难道我不知道并非大家都喜欢我开创的事业吗？”

戈尔巴乔夫不仅打算在苏联实现大规模的转变，而且也想在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这样做，让全世界都按新的方式思维，不过各国人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这一打算。

戈尔巴乔夫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与齐奥塞斯库进行过多次私人会晤，每次他们的夫人都参加，在其中的一次会晤中两人谈到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说可以改变政治方针，但应该先在本国搞，可以把种种革新意图通报给别国，而决不能要求它们也这样做。其实倡议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是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是苏联。正是它战后需要在东西方之间建立缓冲带，正是它需要军队、军事基地……以便在冷战时期同西方抗衡。

关于那次会晤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大致就是这样讲的。总之，那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他大概同东欧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进行过这样的会晤，不过当时大家都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为改革的思想激动不已的戈尔巴乔夫在一个个邻国播撒着变革的种子，却没有想到收获季节很快就会来临。

没过多久便有了结果。80年代末，东欧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温和的革命”，党被赶下台，所有管理机构都失去了作用。最后一个变的是民主德国。在柏林，戈尔巴乔夫夫妇曾向成千上万的游行致意，实际上他对这个国家的垮台和与联邦德国的合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专家认为，苏联没有从整个东欧的剧变中得到任何益处，甚至还要为保护苏联在民主德国的财产而伤脑筋。当然，要继续维持德意志国家的分裂状态是很难的，但是在它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忽视我们的许多利益也是不妥的。许多苏联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纷纷给中央写信询问撤军的条件。

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的死使戈尔巴乔夫夫妇感到震惊和害怕，同时也使他们感到难堪。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经常地乘坐防弹“吉尔”车，大力加强并严格控制卫队，给在他身边的人和保安人员加薪，增加保安人员。但这些未

必能起多大作用，因为给一个人加薪，马上就会得罪另一个人，他虽然不在总统跟前，但左右着别的部门的工作。

邻国的事态急剧发展，戈尔巴乔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朋友、他的那些好同志转眼间被罢了官，失去了工作，许多人在等待接受审判。令人极为痛心的是，总书记没有向任何人伸出援助之手，没有站出来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说话。这使许多人感到不快。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领导人一起陷入困境的有军人、情报工作人员（他们也为我国的安全做过许多事）、党的各级领导者、各部部长、大企业负责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我国学习过，是我们真诚的朋友，出卖他们不仅意味着抛弃朋友，也意味着抛弃做人的准则。过去不仅我们，就连美国人也从未如此对待过自己的朋友。他们不顾种种危险把自己的朋友从一个个热点地区解救出来，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谁也不会再同背叛朋友的人打交道，这不仅仅是政党的道德和伦理，这是思维健全的人的道德。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果是复辟资本主义，尽管苏联曾经给它们不少援助，而且苏联还欠下了它们的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比我们过得好，其实做得也好。虽然谁都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好，可在这些国家里农庄和农场却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粮食，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还限制本国合作社的食品产量。现在有些国家的农庄和农场仍未解散，尽管曾经打算解散。总之，我们再没有朋友了。由于我国的背信弃义，许多朋友不再同我们往来了，他们的心中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仇恨、蔑视和厌恶，甚至打算推倒曾经解放这些国家的苏联士兵的纪念碑。

这个问题使我一直无法平静，其他许多人也在寻求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一个曾经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存的、十分强大而又十分牢固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顷刻之间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垮掉了，仅仅在两三年之内东欧国家便由苏联的盟友变成了它的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苏联读者关心，所有对国际事件的发展稍感兴趣的人也关心。当然，这个问题同苏联解体有共同的原因，不过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变化早就开始了。80年代初，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开始下降，苏联的外债不断增加，包括欠社会主义各国的债务。于是我们的东欧盟友开始日渐频繁地向西方传递秋波，秘密地或公开地建立起经济联系、金融联系，而后是政治联系。他们背着苏联签订了一个个破坏大家庭的统一、侵害我国利益的协议，他们把最好的产品大批地供给西方，换取硬通货；而向我们供货的原则是：我们不要的都给你。苏联的高技术开采方法原本是我们与这些兄弟国家共享用的，这时却传到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社会主义各国的领导人与西方的政治接触越来越广泛，就连昂纳克也在同联邦德国领导人“谈情说爱”，西德的资本逐渐控制了东德那些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苏联领导后来采取的种种做法最终造成了大家庭的瓦解。

为什么实际上各级领导者谁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的瓦解感到不安呢？

这首先是因为，在我国人们早已习惯于什么事都由领袖替他们“操心”，连政治局和政府中的人也清楚地知道，有权决定国际政策问题的只有两三个人，首先是总书记。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插手国际关系方面的事务，除非戈尔巴乔夫要求或吩咐某个人专门解决某一问题。

说到这里还应提一件事：实际上只有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掌握关于世

界上、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以及这些国家中党的领导状况和人民情绪变化的情报。这方面的情况同斯大林时期一样，今天的总书记根本没打算改变它。不仅如此，情况甚至还恶化了。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谈话的许多记录根本没有传阅过，外交部和克格勃把最重要的密码电报只送给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在有些问题上知道的人可多一些，有的电报除总书记外还会送给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必要的话也送给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般政治情报（有点儿类似各国报刊的综述）送给全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往往也能收到。因此，就连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也并非都知道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事情。

当然，要想不让人们知道这些国家发生的事变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比较全面地报道了苏联的盟国发生的种种剧变，党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也知道事变的情况。但是他们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这首先是因为大多数居民，包括那些忙于自己事情的苏共党员，并没有感到不安——他们对此无动于衷。而中央委员和党的书记们都在忙于国内事务，他们因国家、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忙得焦头烂额，他们不得不在动荡中挣扎，努力保住自己的位子。此外，当国际上发生急剧变化时，中央和地方正在为最高苏维埃选举做准备，同时在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根本顾不上关心邻国发生的事情。结果没有经过认真讨论就取消了经互会，解散了根据华沙条约建立的军事同盟，如此等等。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领导者不了解真实情况，或是只顾解决国内问题，国内当时没有一支能够有组织地阻止我国和盟国变革的强大的力量，即所谓“保守派”力量。我已经说过，绝大多数党员以及社会上大多数人仍在期待改革的结果，当然，人们也希望看到他们的邻国的改革。

这种愿望与来自官方、首先是来自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消息刚好吻合，戈尔巴乔夫善于用虚假的消息来掩饰糟糕的事实及其后果，他多次公开地向社会各界通报情况，说苏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各国得到积极的支持。另外他又说那些国家的改革比苏联进行得更快、更有成效，这与邻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下台的事实也不太矛盾，但这并非全部真相。

我说过，戈尔巴乔夫夫妇对许多国家的访问曾使当地人兴奋、激动。夫妇俩每次出访归来都很兴奋，对访问的结果很满意，不过与其说满意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不如说满意同人民的交往。有一次我同总书记去波兰，亲眼看到该国居民欢迎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情景，尤其是在什切青，总书记声称，这个城市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波兰的。代表丈夫与矿工见面（大概是在卡托维兹）的赖·马·戈尔巴乔娃也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波兰人确信出了一个能够创造条件使他们摆脱穷困生活，帮助他们找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新途径的领袖人物，那时他们当然还不知道，他们将要走回头路，重过那种他们尚记忆犹新的生活。

戈尔巴乔夫经常在社会主义国家向人们发表即兴讲话，讲述苏联改革的成就以及苏联的新方针为全世界展示的光明前景，这一切在我们的电视上都能看到。在这种新闻报道的影响下，那些知道或者感到兄弟联盟将要瓦解的人思想麻痹了。

许多政治领导人已不再为又要发生的“温和的革命”而不安。新思维、不干涉别国的事务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这个“不干涉”的提法挺管用，它能使人们都成为“民主派”，跟着戈尔巴乔夫重复一句话：让人民自己选择

他们的命运。因此，当人们有一次听到从柏林回来的戈尔巴乔夫说昂纳克政权气数已尽，应该考虑德国的统一时，谁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连德国实现统一、我国军队撤离的条件也不了解。应当说，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确没有和任何人详细谈过，政治局会议也未深入、全面地讨论过，它还不如《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尼·安德列那娃的信重要，政治局就那件事争论了两天。国际政策问题早就控制在戈尔巴乔夫、切尔尼亚耶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手中了，尽管后者不能（据他自己说）参与许多决策工作。在起草裁军文件时曾邀请外交部、国防部的一些专家参加，最高苏维埃及其各委员会显然不十分了解所拟定的各项协议的主要内容，一些很重要的决定有时未经代表们细致和全面的审议就通过我想再说一遍，苏联人清楚地知道，让德国继续分裂下去并不是巩固欧洲和平的最佳办法，问题迟早要解决。当时还有时间对问题进行全面考虑，因为以前的反希特勒同盟国并未急于行事，其中有些国家即使不反对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也非常怀疑这种匆忙做法是否合适。即使像戈尔巴乔夫认为的那样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应先同社会各界以及全体人民商量一下。我认为，无论是外交部、政治局还是总统，都没有资格私下决定这个问题，更何况统一和撤军的条件既未经过细致的分析研究，也未同以前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交换意见。

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发生的剧变从未在有关会议上重点讨论过，我记得，无论是政治局还是总统委员会，无论是安全会议还是苏共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从未认真地提过这个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总书记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只有两三段谈到这个问题，这表明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我们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问题上不存在特别的反对意见。所有的批评都集中于一点，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代表大会上所说：“人们都在指责我们，说我们一仗未打就从那里撤走……”仅此而已。

戈尔巴乔夫每次出访归来只是简单地讲点出访印象，而从未进行过认真的总结。

这段时间里，出国访问、会见西方国家首脑成了苏联总统的主要工作，西方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具有新思想、不按照自己前任的教条行事的人，他很快成了西方人崇拜的偶像。他们不断地塞给他各种名目的奖金，向他颁发金质奖章，授予他种种荣誉称号，在电视、报纸和杂志上为他作宣传，巧妙地满足着他的自尊心。西方国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批判过去、打破现存结构要比搞建设容易得多。他们不明白苏联人民为什么对这个人持冷漠态度：他开创了一项多么好的事业，却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种批评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并非无缘无故。自1987年起，经济、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已经从粮食制品越来越少、糖和肉类等食品日益紧缺的状况中感觉到了这一点。许多日用品经常脱销，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很多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理性，怀疑领导者使国家摆脱危机的能力。还有很多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共产党到底把国家引上了绝路。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内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出现了与总书记观点不一致的现象，甚至出现了深刻的分歧。

## 民主改革

从 1989 年开始，党内和国内形势像雪崩一样急剧恶化。毫不奇怪，戈尔巴乔夫知道国内形势的变化，也知道人们情绪的转变。他们昨天还曾赞美自己的偶像，今天却渐渐冷落了总书记。那些不久前吹捧过他的人，如今都在指责他、唾骂他。原来，人民的爱是会变的，这一发现使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安，于是他开始进行斗争，不过对手已经不是保守势力，而是那些心存疑虑的普通人。我与戈尔巴乔夫多次谈过这个话题。总书记每次阅读来信、尤其是那些让他不高兴的来信时，只能自我安慰地说这些信证明已选择的方针是正确的。

“不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就不可能实现重大转变，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要把这些信拿给大家看看，发给政治局传阅吧。”他在国内巡视的次数少了。有一段时间，总书记在国外访问的时间比在国内巡视的时间还长。有关国内形势恶化的消息越来越多地传到 he 那里，这些消息来自统计部门、克格勃、苏共中央各部，有些是他在会见人民代表时，或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代表大会期间得知的。国内形势问题实际上成了中央政治局每次会议都要讨论的问题，大家说，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没有得到执行，一些本不难解决的问题竟然也解决不了。他们要求严肃纪律，加强对代表大会决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还一再建议采取那些在三五年前曾经有效的措施。很少有人知道，党内情绪、整个社会的情绪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严肃纪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党的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越来越不把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威放在眼里。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总务部除处理往来文件外，又担负起监督决定执行情况的责任。我经常接到报告，说政治局的决定没有按时完成，有关部门往往不汇报执行情况，而是进行敷衍，甚至公开撒谎。我只好不断地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但总书记对这种事情毫不关心。起初他还常把总务部的情况通报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后来顶多是抽空看上一眼。大家都已感觉到总书记的这种态度，不久他们就明白了：监督决定的执行过程是毫无意义的。

下发的文件没人重视，这些文件也用不着监督执行，因为文件的内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

党的最高权威的丧失表明裂缝已经出现，它后来迅速导致整个苏联领导结构垮台。尽管还在高谈阔论，还在不停地作出一个又一个决定，但是人们已经明白，新领袖、中央政治局不能控制局势，不能切切实实地负起责任。许多人清楚地知道，需要寻求新的途径和新的工作方法来发动群众，解释失败的原因，让所有的人都参与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总书记—总统与执行机构之间的隔阂已无法消除。

戈尔巴乔夫对报纸上的消息，对代表们的意见已经厌烦了，他不愿同中央机关、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的工作人员见面，对他们很不客气。要是他想骂谁，就忿忿地说：又冒出一个官老爷。他的这种责骂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在共青团机关和党的机关以外的什么单位工作过。他在这一点上与中央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很大的不同，那些人都是从工业企业、建筑工地、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科研所、新闻单位来到中央机关的，他们所了解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要比头号官老爷——中央总书记多一百倍。不过戈尔巴乔夫使唤起机关人员来还是驾轻就熟、颇有效率的，让他们起草各种文件、他的讲话稿和报告、中央决定，等等。然而他内心对他们的

反感却无法克服，他常常回忆往事，比如，已经是中央委员、党的边疆区委书记的他却要坐在“学监”——中央的督导员或某个局长的办公室里听他们的教诲。他不能让自己“降到”督导员水平，所以在担任总书记期间，他从来不愿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当中有许多知识渊博的专家）发表讲话，尽管他常常让人转告党员们，他将在党员大会上讲话。

他好几次对我说：

“我曾让卢基扬诺夫把所有‘共青团员’都赶出总务部，可是他干得不彻底，你在这方面也没采取什么措施。”

也许总务部的工作人员中来自共青团中央的人是多了点儿，但是，我对这些人进行过观察并在工作中考验过他们，我认为这些人工作勤恳、业务熟练、精力旺盛。我不能也不想草率地毁掉他们的前程，当然，我也尽力从地方机关中往上调人。

戈尔巴乔夫也不愿意会见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甚至不愿意给克格勃主要部门的领导们讲话，担心人民群众怀疑他偏爱克格勃。他这种自我孤立越严重，他的苏联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能“消亡”得就越快，这不是偶然的。

1987年1月底举行了一次苏共中央全会，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谈戈尔巴乔夫面临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总书记首先批评了意识形态部门和学者，说他们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没有理论建树，仍在翻来覆去他讲30~40年代的那点东西。他指出，社会学家没有及时地对国内形势作出建设性的分析，也没有提出摆脱困境的新思想。计划部门、机器制造业以及那些负责解决精神和物质刺激问题的机构也受到严厉批评。

但主要的还是作为发展的决定条件的社会民主化问题，他提出了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企业中实行民主、让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等任务。报告中还提出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论点，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积极地运用民主原则创造了条件。中央委员们都支持报告的主要论点，也加深了对改革条件下的民主化的认识。这是总书记、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一大功绩。

不过，这次全会还开辟了一个战场，这一点恐怕不是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戈尔巴乔夫发现人民对现行方针没有取得效果、生活状况不断恶化有不满情绪，他觉得不能光在学者中寻找失利的责任者，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各个“司令部”，指向了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助手们召集起来，给他们大讲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是官僚。总书记回忆了中央委员在苏共中央机关那些督导员和局长面前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的情形，并且说，这些人总是指示别人该怎么做，这种情况在立法机关和其他机关中也有。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打破这个体制。当他发现为他起草报告的人对这个话题没有太大的兴趣时，便亲自动手把这些话写出来。

我不怀疑戈尔巴乔夫得出上述结论的理由和他要消除这种现象的愿望，也许这个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问题专家当年有过这种经历，不过我认为，公正地说，应当明确两点。我了解作出决定和将决定下达给执行者的程序，我可以肯定地说，机关工作人员不可能中途篡改决定，也从未自作主张、越权行事。机关工作人员传达给执行者的决定均由包括中央全会、政治局、部长会议、主管部在内的上级机关作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未有人就选谁当总书记或政治局委员、确认谁为政府总理等问题征求过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见。

见。这通常是有表决权的中央委员的事，而戈尔巴乔夫当了 20 年中央委员，这意味着他曾参与选举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以及他自己为总书记的过程，参与任命一任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过程。无论是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还是其他人，从未公开反对过已经形成的机关工作作风和方法，以及中央委员或各级苏维埃代表毫无权力的状况。他在主持中央书记处这个培养国内所有党的管理机关（不光是党的管理机关）工作作风的主要机构工作期间，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如此看来，恐怕不应该诿过于人。

不管怎么说，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了牺牲品，“机关干部”一词成了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最难听的词。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那些来帮助总书记、给他提供种种思想的专家当时更多研究的是国内民主化的发展进程，而不是同官僚势力、同执行机构那超越民选机构的巨大影响进行斗争。我当时甚至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令人厌恶的机关，而在于是谁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向社会提出什么目标。有了好的领导人，即使最糟糕的机关也可以履行起码的、有益的职能。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民主化应当从最高领导层的组建开始。只要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国家总统还是用以前的方法选举产生，而且不管年龄多大都要一直留任，直到去见上帝才卸职，那么国内任何民主化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各项改革的框框，他在全会上说：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破坏我国的政治制度。”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关于社会民主化重要性的那些热情洋溢、头头是道的讲话都是有限制的，都不能违背总书记个人的意愿。而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想过放弃自己的职位，这一点我十分清楚。我理解他的心情：不能把国家搞垮了就一走了之。可是要使国家重新强大起来并非易事，就算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知道如何去做，他这辈子恐怕也来不及做到了。

也许，戈尔巴乔夫说现存政治制度不可动摇是为了安抚那些反对总书记的方针的人。不论怎样，从 1987 年 1 月起，开始了斗争的新阶段——将民主原则推广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许多人认为，重要的不是工作，不是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争取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公开性使人感到兴奋，可以大声说出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话，可以指责任何人，包括以前不敢指责的那些人。没过多久，人们几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种无限的民主化就连西方有关专家都感到吃惊。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充分的条件，党放开手脚搞无限的公开性，无限制地批评自己过去和现在的错误。

然而公开性常常被扭曲，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是因为舆论部门经常发表严重失实的消息，甚至故意进行歪曲。

伟大的十月革命 70 周年快到了，当时要起草一个重要的报告。在经济日益崩溃的情况下，这个报告中应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思想，戈尔巴乔夫决定在这个报告中全面阐述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他是经过犹豫之后才作出这种决定的，于是为国内民主化创造基本条件、完善社会政治制度的长期而又十分紧张的工作开始了。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民主化问题，它被当作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来。

要想真正解决这些不同寻常的问题，就要得到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大力支持。总书记是否相信中央委员和各级党委书记会支持将要进行的革新呢？从总书记一次次的演说、讲话以及人们同他谈话的结果来看，他不相信自己的路线会得到大家的支持。

苏共二十七大开过几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到后悔：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变动太小了。他当初拟定中央委员名单时考虑的是路线的延续性和以渐进的、稳妥的办法发展改革，而现在他感到老干部碍手碍脚了。这不仅仅是感觉，许多中央委员认为，在经济日渐崩溃的情况下以那样的方式和速度实行民主化是危险的，这只会加剧工业和农业已经开始的崩溃和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中某些社会阶层的分立主义情绪。但是当时总书记首先看到的不是人们对民主化的方式和速度的担忧，而是自己的威信受到的威胁，因此需要在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异己。早在起草党的二十七号文件期间就有了要举行党代表会议的打算，现在他想利用这次会议来实现对中央委员会的改组。

“你都看到了，这些人都已经不中用。”他说道。“他们甚至不知道党在当前条件下该往哪个方向走，现在该如何工作。你注意一下，人们之所以批评党，主要是因为现在搞改革的是那些在停滞时期当权的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话基本上是对的，其他人也在报刊上和发言中对中央政治局的组成提出批评，认为政治局里“以前的人”太多了。当然，他们当中思想进步、才能卓越的人也不少。一般说来是不能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人统统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况且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在“以前的人”之列，所以他就要想个办法来除去他不喜欢的那些人。

当时中央委员中有不少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他们曾帮助他巩固地位，支持并贯彻他的一切主张。但是他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而且他们还常常妨碍总书记工作，败坏总书记的声誉，于是他决定劝说一部分人公开宣布自愿退出中央委员会。当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始认真地为此做准备。

他首先让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整理出已经退休或者虽未退休、但年事已高的人员名单，这份名单摆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他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拉祖莫夫斯基的任务是找某些同志谈话，让他们带头退出中央委员会，并说服那些可能对这种做法产生怀疑的人。戈尔巴乔夫也同一些人谈过话。这项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当那些“敢死队员”——为保持党的统一而甘愿引退的中央委员聚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厅里时，竟没有出现什么麻烦，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说明他们引退的理由。

戈尔巴乔夫向参加会议的人发表讲话，喋喋不休地论述当前的局势，解释改组中央委员会的必要性。大家都相信了他，服从了他，作出了符合他心愿的决定，只有原子能工业部部长 E. 斯拉夫斯基除外，他不愿来参加这次会议。其实戈尔巴乔夫后来回想起他这次的做法时，心里多少也有点儿过意不去，他知道，他赶走了自己的战友，他们虽然不年轻，但都是些正派人，一直支持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支持他。

随后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人，这些人总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还常常批评总书记，给戈尔巴乔夫带来许多不快。我似乎觉得他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了，反正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跟你们说，我们的班子换得不成功。再换一次班子你就控制不住中央委员会了。”

应邀参加第一次会议（总共开了两次会，因为决定分两步走）的是那些肯定会顺从地退出中央委员会的人。第二批是那些可能出现麻烦的人，但是麻烦并没有出现。这些一向遵守党纪的人异口同声地表示自愿退出中央委员



会，并就这个问题联名致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苏共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我想在其他政党内也没有出现过。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有中央委员以及许多以前的部长参加的大会上发表讲话，答应保留他们的社会保障待遇：退休金、医疗保健等，总之，不应降低这些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的人的生活水平。可惜没过多久，这些曾为国家工作多年、经历过战争、除了债务一无所剩的人被赶出了别墅，他们的许多其他待遇也被取消。

总书记身边的许多人都为他不能履行诺言而感到不安，因为不仅他的威信受到损害，而且也明显地暴露了他的为人——不愿帮助那些刚刚失去作用的战友。我曾想方设法加以补救，并向戈尔巴乔夫谈过此事，但他根本不想改变决定。他对那些用不着的人失去了兴趣，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干脆把他们从逢年过节应致祝贺的人员名单中去掉了。大概总书记也把这些人忘掉了。不过他还有另一个奇怪的性格特点，如果一个人重新得到提升或被调任别的工作，戈尔巴乔夫马上就会忘掉自己对他的恶感，对人吩咐道：你向他转达我的问候。

我一直感到很吃惊，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竟然如此变化无常。他能很快变换面孔，改变自己的看法；如果战友们受到猛烈批评，他会抛弃战友。

他也不能原谅那些顶撞过他或曾坚持自己看法的人，更不用说那些曾经有意无意地让他难堪、或者（如他所说）侮辱过他的人。这种人根本没有出路。例如，有个叫B.K.的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是个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精通农业问题，25岁时就获得了国家奖金。B.K.在苏联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戈尔巴乔夫抓农业工作期间曾请他参加一次会议，这次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戈尔巴乔夫颇为得意地告诉人们，农业在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农民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就业人员总数中占有根高的比例，他还对农产品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高比重赞不绝口。早年毕业于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经济系的B.K.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不应当为农村就业人员数量多、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而沾沾自喜，因为这只能证明国民经济不发达、结构不合理，证明国内生产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任务在于要让工业起主导作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不应占人口的20%，而应像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那样，只占5%~7%。

这个发言表明戈尔巴乔夫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幼稚的，因而使他非常恼火。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把B.K.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通，而且对他在会上说的话一直耿耿于怀，想方设法阻止他晋升。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任命B.K.为一个委员会的领导后，戈尔巴乔夫态度马上变了，一次次地让我向B.K.致意。可是他当上总书记以后，又开始了对B.K.的“折磨”。他要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并把B.K.大骂了一顿，而且一直也没有让他晋升。后来这个委员会要撤消，中央委员会经济部负责人B.莫任提出让B.K.到该部任职。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意。我曾一次次地为这个有才能的人（他的错误就在于讲了实话并显露出比总书记还要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说情，无奈戈尔巴乔夫对B.K.的强烈仇恨根本无法消除……

戈尔巴乔夫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渐渐地甩掉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包袱”，并打算不断地让积极支持改革的人充实进来。而眼下的情况是，中央全会大厅越来越空——老的中央委员所剩无几。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采取如此淘汰

的做法是否收到效果？它是否满足了批评者的要求？我认为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反对派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坦率地说，根据我对决策过程的了解，决定的深刻程度和进步意义并不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人数的多少和成员的构成。我相信，如果当初把改革的最终目标、采取新方法的必要性解释清楚的话，原来那些人也会一致地投赞成票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早就看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第二，他们十分信任中央政治局，绝对不会怀疑它所提出的各项方案。后来的情况是：选拔年轻的党务工作者担任中央委员并未使中央委员会变得更加忠顺，这些人常常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方案，毫无顾忌地反对他向党和国家提出的种种建议。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严厉批评了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越权行为、对中央委员和人民代表指手划脚的工作作风，撤换了那些年迈的中央委员，然后便开始在党、国家和社会组织工作中广泛推行民主原则，公开表明要给持不同观点的人更多的自由。当时提出了苏联宪法修正案，取消了苏共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权。该修正案其实是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提出的。出版法的制定和通过为公开性创造了宽松的条件。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管理国家的传统方法，为社会发展开辟了新路，尽管谁也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作出了必须实行社会民主化和改革政治制度的重大决定，实际上总书记和整个报告就贯穿着如下思想：让人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为每一个民族今后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划分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能。

## 领导党和国家的是什么人，他们是如何进行领导的

是什么人领导着 2000 万共产党员和 3 亿人口的国家呢？

近 70 年来这个职能实质上是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担负的，正是它们决定着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并通过苏联部长会议、各部及各地党和苏维埃机构控制着国民经济，直接领导着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它们的参与，苏联才能够成为一个强国，但同时它们也犯了一些错误，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人民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我想详细地谈谈这些机构的工作情况。由于职务的缘故，我最了解的就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因为负责安排这两个机构工作的是总务部，首先是该部的领导人。

### 中央书记处从事哪些工作

明天是星期二——中央书记处召开例会的日子。16 时，中央书记、各主管部门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集中在一起开会，解决一些不仅关系苏共活动而且关系整个社会生活的问题。

书记处的职责形式上应该包括：研究各组织和委员会在党的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检查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这些机构通过的决定的执行情况。但是书记处常常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代行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职能。从形式上看，它有条件这样做：党组织活跃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军队、民警局、克格勃、大众传媒、剧院、博物馆中都有党组织，而且中央书记处还常常讨论铁路运输部门、建筑企业、油田党组织的工作。

多年来，中央书记处会议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以及常常被邀请来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总编辑、苏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他们都集中在主楼五层书记处会议室里。这个会议室能容纳很多人，而且装修得很漂亮，墙上贴着灰驼色印有图案的壁纸，会议室中央的大桌子是桃木制的，转椅是皮制的，窗框、窗帘架和门上都镶着桃木框。沿墙和窗户摆着一些小桌子和一些椅子，这是为各部门负责人准备的。书记们围着大桌子坐下，应邀与会的人则坐在会议室四周的椅子上。

书记处会议一般由党内二把手主持。赫鲁晓夫时期是弗·罗·科兹洛夫主持，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斯洛夫。接下来是安德罗波夫主持书记处会议，再后来是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最后是伊瓦什科。他们根据报送给书记处的材料来确定会议议程，通常都是讨论党的组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但正如我上面谈到的，也研究一些经济问题。我记得，早在 1984 年原子能机器制造厂建设中的问题就提到了书记处的议程上，设计马虎、车间地基不牢固等问题及这些项目建设中的其他不合要求的现象被揭露出来。那时在罗斯托夫州（这些企业就建在那里）已经盖起了一些建筑物，由于车间地基遭到毁坏，致使机床不能进行精确的工作，车削出的涡轮轴都是歪的。当时邀请地质学家、建筑师、设计专家参加书记处会议，总之，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认真的审理并采取了一些极其严厉的措施。尽管如此，检察院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查清这起玩忽职守事件的症结。

会上研究什么问题还取决于书记处主要领导人的爱好。安德罗波夫偏重行政机构的问题和国际事务，这是他比较精通的方面。契尔年科特别注意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注重农业和整个经济及青年问题。1984 年对国际青年组织“伴侣”的工作进行的审查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发现滥用职权的现象很严重，这使共青团中央领导人的地位发生动摇，有的人因此而丢了官。

书记处讨论的很多问题都远远超出了党团组织工作的范围，实际上它成了第二个部长会议，而且是更有权威、更有实力和更加严厉的部长会议。

书记处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当然要引起苏联部长会议的不满。比如，吉洪诺夫一旦得知中央要讨论某问题，便立即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并就这个问题采取一些措施。雷日科夫不止一次地抱怨戈尔巴乔夫，说他插手自己主管的工作。

但这都是以后的事，而在 1985 年以前，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时，他遇到的是另一种困难。会议议程都由总书记契尔年科和他的几名助手决定，很多为书记处会议准备的文件也不发给中央书记们，这些文件由总书记或书记处两三名成员来决定，而且不公开，不进行讨论。因此，主持会议的人无论想做什么，他都只能在确定好的范围内和按照给他规定好的议程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中央书记处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比政治局的更重要。当然，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必须解决这些重要问题的目的，他不止一次想向全党和中央机关表明，他可以达到一把手的水平，解决社会生活的所有问题。此外，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还解决一些契尔年科已无力解决的问题。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中央书记处同以往不同之处是开会时间长，能持续开几个小时。实际上每个想发言的人都可以发言，参加会议的人很多，他们通常从研究干部问题开始，批准任命中央书记处主管的干部——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报刊杂志和其他意识形态部门的总编辑。在批准这些干部、特别是州委书记时，要进行广泛的讨论，党中央组织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候选人情况。会上对州或边疆区的情况作出详细评价，指出缺点的根源，提出改进的办法。通常一开始对新任领导人都给予大力支持，为地方提供物质技术支援，千方百计地使提出的候选人得到党组织的支持并在共产党员和州、边疆区或共和国全体居民中树立威信。

有时中央书记处在研究某个问题和州或边疆区的情况时得出结论，必须撤换领导人。这类问题经中央书记们秘密讨论后，提交总书记决定。之后，把州委或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召到中央并建议他提交一份退休申请，如果年龄不到，所犯的 error 也不算太严重，就可能调他到某个部或驻外的外交代表机构中，甚至可能任命他担任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使。

按现在的规定，党的组织部门掌握一批州委第一书记的后备人选。组织部门负责人要到州或边疆区去，在积极分子中间征求对候选人的意见，但这只是最近才这样做的。过去，州委或边疆区委书记候选人由中央批准并在州全体会议上通过，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就“当选”了。这种“选举”程序后来变成中央书记处的正式任命，再后来是中央政治局的任命。

既然谈到中央的主管干部，我想对这方面谈一些看法。首先，所谓主管干部——这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主要是置于党委监督之下的行政管理部門、生产部门和意识形态部门的职务系列。无论怎样称呼这个系列，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下去。另外，对党利害攸关的这些职务的数量非常之大，

区委、州委、共和国党中央都有自己的主管干部，连工厂厂长或国营农场场长的任命都要由区党委会批准。如果工厂是国防性质的厂矿或对某一部门的发展有决定意义，那么它的领导人则要由国家机构、甚至党的部门直至苏共中央来考虑决定。

这种状况在所有行政管理部门都存在，苏共州委和中央主管部门在整个人事变动中任命干部时，只是把候选人召来见见面和谈谈话，无需提请中央书记们决定。因此，党、苏维埃和意识形态很多工作人员的职务任命只不过是履行登记手续。而中央书记处任命、批准某个工作人员的职务时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们同意并形成正式决议。对中央主管干部的任命也分两种情况：有些职务需要把新任命的有关人员叫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对候选人进行广泛讨论；有些职务则无需让候选人参加会议，但需对决议进行表决。在批准政治局主管的干部的任命时，除书记处外，还邀请各州和边疆区党组织领导人参加会议。政治局主管的干部包括州委、边疆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各部部长、《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意识形态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高级军官、克格勃各部门领导人、军工企业领导人、苏联驻外大使及其他一些职务。

中央书记处主管的干部更多，干部的任命和任命干部的表决给中央各部、特别是中央书记们带来非常沉重的工作负担，这早已变成一种形式，因为中央书记们不仅对大多数人，而且对一些职务也并不了解，他们总是相信各部领导人的签字。

从技术观点考虑，登记监督干部变动情况的现行制度无疑值得重视，这项制度运转几十年来已经很完善，计算机的出现又使它能够很快发现在工作经验、文化程度、年龄和很多其他方面符合要求的人才。但从政治上看，这种登记干部的办法显然不适应今天的形势，因为它是为包罗社会所有关键职务的行政命令体制服务的。

苏共中央机关高度重视国家生活关键岗位上党员干部的配备，实际上没有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不研究这些问题。此外，每次大约表决批准 30 ~ 50 名新工作人员的任命令。曾经不止一次地尝试减少干部任命的名单，正像不止一次地试图减少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数量一样，但最终的结果只能使它更加膨胀。被人们称为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国家机构中的不倒翁式领导人，从伊里奇（列宁）到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以来既没有患脑血栓，也没有半身不遂，始终尽心尽力工作的米高扬曾谈到精简干部的特点。他说，这就像树上的乌鸦一样，一吓唬它们，它们就飞跑了，但过了一会儿，你一看，那个树枝上又有一群乌鸦，而且数量更多。在精简行政管理部门人数时，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精简干部，有些也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大。

干部的任免是影响各州和边疆区。中央各部门及大众传媒形势的有效手段，不执行书记处的决定会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而这是纪律和秩序的保证。

如果说书记处几乎所有会议都是从讨论干部问题开始，那么会议结尾时讨论的问题则各不相同，经常还提些会议议程之外的问题。这时，会议室里通常只剩下中央书记，有时还有一两名各部负责人。这个时候一般是研究些较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某些中央委员、州委和边疆区委领导人的品行、违反党内道德规范、滥用职权等。很多问题同滥用职权有关——请客送

礼，在住房分配中违反规定，还有其他一些类似问题。当时就要作出决定，而且常常是极其严厉的决定，虽然当时并没有特别大张旗鼓地这样做。

有些比较复杂和重要的问题，经书记处会议讨论后要提交中央政治局研究，并由政治局作出最后决定。这大都是一些涉及苏联部长会议和国家其他权力部门管辖范围的问题。

书记处会议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和主持方式也各不相同。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时据理力争，可当问题复杂时，他往往又摇摆不定，向后退却，通过一些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决定。在他当选总书记之前，有一回讨论是否可以把土地，特别是那些人烟稀少地区的土地划给城市居民的问题，我把资料收集起来交给戈尔巴乔夫。根据资料分析可以看出，国内有多少人愿意从事园艺业和蔬菜栽培，有多少空地和无人村庄。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应该支持划拨土地的想法，其他发言的人也是这样讲的。戈尔巴乔夫在辩论中激动起来，他说：

“应该这样做。应该让人们有机会在土地上劳动。难道我们的土地少吗？很多地在荒着，没有利用。”

但这时中央农业部的代表发言说，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农业领导人反对这样做，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城市居民在星期天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躺在吊床上休息，而农民这时（星期六、星期天）却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我们这样做是在瓦解农村，应该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未来着想。

结束会议和通过决议的时刻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声调已经变得柔和起来，嗓音和言词更加深思熟虑。他在进行思想斗争，如果突然有人指责这样做是破坏社会经济怎么办呢？而且反对别墅建设的还有安德罗波夫，但对城市居民也需要安抚一下。于是最后作出结论：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划出土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道。“但不能侵害经营者的利益，不能忽视农民的情绪。”

这番话代表了他固有的特点，这种妥协的结果是使问题悬而不决，好像没有讨论过，自然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遗憾的是，当时作出不少这样模棱两可、没有信心的决定，而后来作出这样的决定更多。

利加乔夫开始主持会议后，其处理问题的办法也带有他这个人的特点。他喜欢把问题“处理干净”，全力以赴去完成中央书记处通过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认真而又忌妒地注视着利加乔夫的工作，他想知道中央书记处的运转情况，讨论什么问题、通过什么决定，他常常把某些准备研究的问题单独划出来，说这些问题最好拿到政治局讨论，但却又下把这些问题交给政治局。戈尔巴乔夫常常把我或某位中央书记从书记处会议上叫出来，虽然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或许是他不愿意独自呆着，或许是他不愿意让我们参加某次书记处会议。他经常做手脚，目的无非是不让别人干涉总书记的事情，使大家明白，他是主要人物，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问题。

我已经讲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关系越来越糟，很快他们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冲突的原因很多，主要反映在对大众传媒工作的不同态度上。雅科夫列夫大力支持《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和其他一些文学杂志，同时极力压制《我们同时代人》杂志、《青年近卫军》、《真理报》和其他一些刊物。而利加乔夫则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所有这些矛盾反映在事业上，表现为意识形态工作管理薄弱，无论利加乔夫，还是雅科夫列夫都把这种情况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过，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时正需要这种斗争。

当冲突由内部争斗转到政治局时，事情就十分复杂了：没有一次会议不批评思想家。有时利加乔夫率先点名批评报刊上刊登的文章，有时雷日科夫这样做，而且很多人跟着一起批评，认为意识形态部领导人软弱无力。《莫斯科新闻》和《星火》杂志及其他一些出版物发表批评戈尔巴乔夫政策的讲话后，雅科夫列夫的命运就明朗化了。总书记看到政治局和苏共中央大多数委员都对意识形态领导持否定态度，于是开始寻找新的苏斯洛夫。雅科夫列夫失去必要的支持和信任后也感觉到，应该换个工作了。他不止一次地说：

“你们替我想想，为什么从来不给我提供能够独立处理问题的工作岗位。让利加乔夫抓农村好了，那儿的情况也不好。为什么要把‘两只熊’都放到意识形态这个巢穴中？”

但是，戈尔巴乔夫喜欢让两个人抓同一项工作。戈尔巴乔夫把雅科夫列夫调去搞国际活动后，又把他同谢瓦尔德纳泽拴在一块儿，让他们一起作出所有重要决定。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对所有人都这样，想方设法地限制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并常常让他们去解决一些不得人心的问题，使他们“挨骂”。比如，雅科夫列夫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次也不让他在纪念列宁诞辰的大会上或十月革命的大会上作报告，尽管他很想这样做并请我促成这件事。我总是提醒戈尔巴乔夫，谁在这样的场合讲过话，谁没有讲过，应该轮到雅科夫列夫了。但戈尔巴乔夫总是不做声，有时抛出一句话来——“还早呢。”结果，他始终也没有让雅科夫列夫作报告。

依我看，对这件事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戈尔巴乔夫不愿意让雅科夫列夫作报告，不愿意看到雅科夫列夫在讲话内容和形式上超过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害怕有人“遮住”自己，成为反对总书记力量的一面旗帜，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即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以后，曾建议雅科夫列夫担任自己的助手，但雅科夫列夫拒绝了。我想，戈尔巴乔夫是不会忘掉这件事的，实际上，无论雅科夫列夫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是充当“笔杆子”的角色，起草讲话，提供思想，充当助手或顾问，这些角色后来就变成了正式的职务。在总统委员会解散后，他担任了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

而这时书记处的情况也令人不安，主要是中央书记们看到，他们的决定已不像从前那么有份量了。虽然通过了各种决议，但是下面不是无法执行，就是不想执行。从1989年起，书记处从一个有影响的机构变成了论坛馆。伊瓦什科当选苏共中央副书记并主持书记处工作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改变局面了，因为，从前党施加影响的完整体系被打破了。高楼倾斜，开始倒塌。党依靠原来的力量已经无法影响国民经济事务，公开性使大众传媒摆脱了党的监督，差额选举实质上使党无法对于部政策施加影响。有好多次，书记处批准一个人担任州委第一书记，可党员在代表大会上和全体会议上选出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地方上对此很清楚，因此执行书记处的决定只不过是按照传统和出于对从前有影响的苏共机关的尊重。

### 主要的“政治厨房”

中央书记处——虽然也处理党委抓的很多经济问题，但它首先是处理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事务的机构。而中央政治局则是苏共和整个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和中枢神经，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由政治局决定

的。政治局决定军队进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批准边境和裁军协议草案、宇宙飞行、开垦荒地、建设贝阿大铁路、降低和提高价格、发行货币、出售贵重金属和矿石等。

政治局委员传统上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处理国际问题的权威人士。这是由一些不太年轻的、常常年事已高的圣贤们组成的最高法庭。但是，这个最高法庭往往使很多人感到惊骇，在国内外都引起人们的敬重。

政治局的人员构成和数量是经常变化的，有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不进政治局，克格勃和苏联国家计委的领导人及共和国领导人也不一定都进政治局。近 20 年来，政治局的人数保持在 11~12 人。苏共二十七大大选出 12 名政治局委员和 7 名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有米·谢·戈尔巴乔夫、盖·阿·阿利耶夫、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安·安·葛罗米柯、列·尼·扎伊科夫、金·阿·库纳耶夫、叶·库·利加乔夫、尼·伊·雷日科夫、米·谢·索洛缅采夫、维·米·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弗·瓦·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彼·尼·杰米契夫、弗·伊·多尔吉赫、鲍·尼·叶利钦、尼·尼·斯柳尼科夫、尤·菲·索洛维约夫、尼·弗·塔雷津。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政治局委员的变动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各种不同情况。

苏共二十八大大以后，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构成是没有先例的。当选政治局委员的除一些中央书记、经济部门领导人外，还有所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些人绝大多数还担任着共和国主席或首脑。

按惯例，政治局每周四上午 11 时开会。每周这个时候古比雪夫大街上都有“吉尔”牌大轿车，车上坐着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人物，还有警卫车队。警察清理道路，30 分钟之内只准参加会议的车辆行驶。

政治局通常在克里姆林宫政府大楼三层（斯大林工作过的办公室上面）开会。总书记那间又大又阴而且不舒适的办公室也设在这一层。总书记的办公室大约 100 平方米，一侧是窗户，另一侧是挨着走廊的墙。办公室宽 8 米，里面有一间休息室，但不可能在那儿休息。戈尔巴乔夫说，他从来也没有在那儿休息过，因为他感觉不舒服。总书记的办公室经过重新装修后，摆放着从意大利购进的新家具：一张漂亮的深红色大写字台，旁边是两把皮坐椅，坐在皮椅上，从下面往上看总书记，你会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靠门的一侧放着一张会议桌，但只有 6 把椅子。在角落里还有一张小桌子和几把沙发椅，戈尔巴乔夫喜欢坐在这里喝咖啡。靠墙摆着一个不太大的书柜，地上铺着红地毯，一个大水晶吊灯照亮整个办公室和圆顶形天花板。

进办公室必须经过接待室，接待室由戈尔巴乔夫的私人秘书值班并设有警卫。接待室面积不大，光线很暗，像这栋楼里所有房间一样。接待室还有一个出口可以进到另外一间有桃木墙围的房间，这间房子叫“胡桃厅”。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开会前都集中在这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及其他人都不得到这间房子里来。在“胡桃厅”讨论的问题是绝对保密的，限制在领导层的极小范围内。政治局委员从这儿再经过一道门才进入会议室，他们常常已经为“胡桃厅”讨论的问题准备好了决议。

但是，大部分问题还是要在政治局会议室里研究决定。会议室能容纳 80 人，中央是一张大会议桌，桌上铺着绿色呢绒桌布，并排摆着一张主持人桌子，桌上放着文具、表、铃、地图操纵台（地图挂在一面专门的墙上）。政治局委员严格按照职务和进政治局的年限落座。

戈尔巴乔夫的右侧是利加乔夫，这是党内二把手的座位，当年戈尔巴乔



夫曾为争夺这个位置努力过。利加乔夫的对面是雷日科夫，接下来的顺序是葛罗米柯，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老政治局委员，然后是索洛缅采夫、谢瓦尔德纳泽、斯柳尼科夫、亚佐夫。再接下来是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克留奇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也按照这样的顺序落座。他们的后面是被邀请来的政府成员，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偶然”坐到别人的座位上。戈尔巴乔夫左面还有个桌子，桌旁坐的是总务部负责人和第一副手，他们负责会议记录，确定邀请谁参加下次会议。

沿着墙和靠着窗户摆着一些椅子，在那儿坐的往往是总书记的助手和经常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人。他们是意识形态部的负责人、《真理报》主编、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

会议室后面是接待室，被邀请来政治局研究问题的人在那里等候。接待室不太大，所以，很多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只能在走廊上溜达。

筹备政治局会议的工作是从确定会议议程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得到文件后，把文件分发给政治局委员，这些文件是苏联或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外交部、国防部或其他主管部门报送上来请政治局解决问题的。政治局委员对分发到手的文件进行认真研究，他们的助手从解决问题的政治合理性和某个部门的利益出发对文件作出评价。通过对各种建议进行全面研究，政治局能够在多数情况下对问题作出客观和深刻的评价。大家在提交讨论的很多决议草案上写出书面意见，改动文件中的一些提法或使提法更明确，补充文件的内容，总之，对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通常在会上提出一两个需要进行广泛和全面研究的重大问题及一些无需讨论、政治局委员看看草案就赞成通过决议的小问题。

但是，一些主要问题要“反复揉搓”，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给提问题的人一些讲话时间，但一般只有10~15分钟。等他讲完话以后，戈尔巴乔夫让其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发言，特别是让那些有意见和持反对态度的人发言。有时这样的问题要讨论3~5个小时，这样做弊大于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政治局会议一般开30~40分钟，可后来要开10个小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曾自豪地说，现在我们才是真正干事业呢。但人们疲倦了，工作能力下降，而且事情也没有进展。

我不明白长时间坐在那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些政治局委员也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如果问题已准备好，就应该通过决定，如果没准备好，那么就应该在会下把问题准备好。这种开会办法使葛罗米柯、斯柳尼科夫和其他一些“心脏病患者”吃了不少苦头。戈尔巴乔夫怕感冒，让关掉空调。在狭窄的办公室里，连续几个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使空气又闷又浊，就连健康人在这儿都觉得不舒服。有的政治局委员转过身来给我打手势，要打开空调。我刚让人打开空调，总书记就说吹他后脑勺了。

当然，最初是有问题可讨论的，也没有必要怜惜时间。戈尔巴乔夫掌权后，通过了一些完善国内社会关系的新决定，政治局不得不认真地研究大量的决定。不久，政治局会议议程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国内突发事件的问题，这些问题像厄运一样伴随着总书记的工作。

这一切都是从切尔诺贝利悲剧开始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4月26日夜里。这一天是星期六，很多人上班比平时晚一到一个半小时。凌晨，戈尔巴乔夫得知，离基辅不远的核电站发生重大意外事故。政治局开始长时间地讨论事故的预报、范围、后果和应采取的措施，当时我就感到，对这一事件的

影响估计不足。虽然采取措施调查事故的原因和后果，但在基辅及其他城市里生活仍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在筹备五一节前从乌克兰首都出发的世界自行车比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大惊慌，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鲍·叶·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坐飞机去调查事故原因，谢尔比纳将在星期一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上汇报调查结果。

担心逐渐变成警报，最后人们确信发生了大灾难，西方的报道也证实这一点。星期一政治局会议上，亲临出事地点的专家们作了第一次报告。只谈机组爆炸、电站被毁的场面是不够的，更可怕的是核辐射的后果，水源、土地、植物被污染。我不知道，一开始为什么对事故及其危害和后果没有作出客观的评价，是想掩盖灾难的危害，希望一切都会过去，把消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害怕承担责任，我不好说。但我记得很清楚，学者们既有使人担心的发言，也有使人放心的讲话，至少，灾难的原因并没有全部揭露出来，关于事故的新闻报道要经过仔细审查、严格筛选。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有好几次坐在 . . . 斯拉夫斯基和阿·彼·亚历山德罗夫这两位国内核事业泰斗身边，当时他俩都 80 多岁了，但还能同年轻人一样努力地工作。他们评论某些人的发言时，责备他们危言耸听、无知胆怯，并说他们多少次遇到这样的险情，结果“什么事也没出现，都过去了”。

在政治局第一次研究灾难后果的会议上，成立了以雷日科夫为首的委员会，此后开始做大量工作，控制反应堆的泄漏。至于事故的原因，还不太清楚。

一些专家试图把事故的全部责任推给核电站的操作人员，也有人指责科学家，认为事故原因是设计人员在设计方案上有差错。虽然气象学家作出了令人放心的预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核污染的区域在日益扩大。在离切尔诺贝利很远的地区也发现了不易消散的放射物质，受污染的不仅仅是乌克兰部分地区，还有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 and 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有报告证明，大片领土被污染，其中有些地区几十年内（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人是无法生活的。对这样的材料也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

应该说，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情况下，只有这样的强国才能够集中大批物质技术资源并提供援助，减轻灾害的后果，如果灾难只落在乌克兰或白俄罗斯身上，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后果。当时，风把放射物质吹到很遥远的地区，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种植蔬菜和水果遭到污染的国家向我们提出了索赔要求。风将切尔诺贝利尘埃吹到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及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这是世纪性灾难，它表明，核武器的使用即使对那些远离冲突地区的国家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

以雷日科夫为首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委员会成立以后，戈尔巴乔夫把切尔诺贝利的所有包袱都从自己肩上卸下去。看来，几百万人的悲剧、大量的物质损失——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在总书记心里引起应有的悲痛，他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没有到出事地点，他也不愿意马上赶赴其他热点地区，而那里的人们在等待着党和国家领袖的声音和帮助。他不愿意去第比利斯、卡拉巴赫、苏姆盖特，不愿意去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发生民族纠纷的地方，不愿意去死了数千名无辜群众的哈萨克。但公正地说，后来，一年半到两年以后，他去了紧挨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些地区，去了亚美尼亚的斯皮塔克和离乌法不远的两列客车出事地点。

政治局会议曾专门研究鲁斯特飞机事件，他竟然从波罗的海边境飞到莫

斯科并降落在市中心的红场附近。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景，我看见一架轻型小飞机盘旋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近年来在莫斯科市中心经常有直升飞机和飞机拍摄各种历史片和纪录片。那天阴沉沉的，我以为又是在拍什么片子，但是过了几分钟，内务部和克格勃给我打电话通知说，一架德国运动用飞机降落在克里姆林宫附近，驾驶员是德国籍，联邦德国公民，他说是飞到俄罗斯来作客。这个消息令人难以置信，于是我让部队证实这件事。事件的政治内幕相当清楚。戈尔巴乔夫当时不在莫斯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在柏林，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在机场上，戈尔巴乔夫刚一下飞机就同前来迎接总书记的政治局委员们讨论这一事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认为，这件事是冲总书记来的，是军人想贬低他的威信。戈尔巴乔夫就这个问题召开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并让国防部长报告事件的所有细节。

德国飞机降落在莫斯科中心、克里姆林宫附近这件事在国内如同晴天霹雳，这一令人难堪的事件使人民感到震惊，他们身为我国对空防御系统感到自豪并为此耗费了数十亿卢布，这件事确实降低了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使苏联人民在国际社会中丢了丑。总书记把这一事件看作是军人对他本人的有预谋的行动，如果说过去戈尔巴乔夫对军人持鄙视和怀疑的态度，那么现在他对军人则采取极其敌视的态度，他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个“玩笑”，千方百计诅咒军人，让大众传媒和苏维埃代表大会“随意骂”他们。从这时起一直到最后，戈尔巴乔夫始终同军队明“争”暗“斗”，为军人制造不友好的气氛，他还同军队最高领导人展开了全面斗争。

政治局会议上，军人的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大概确实很难发现速度很慢、低空飞行的单引擎飞机。在雷达上曾看到一个飞行物，边防军人首先测定出它的位置，报告给对空防御部队。但它立刻又不见了，不久又出现在雷达上，不过看不太清楚，据航空人士说，它像飞行中的一群鸟。歼击机飞上天去查看，但因速度不同，它很快从视线中消失。而主要是在著名的朝鲜“波音”飞机事件后不敢轻易击落它。另外，鲁斯特常常变换高度和方向，在莫斯科附近几乎是沿着铁路线飞行，所以，实际上是看不到它的。不过对空防御指挥中心一点都不知道不明飞行物这件事。

当时，很多政治局委员对这件事发表意见，而军人们则很难解释清楚这一非常事件。结局是很残酷的，一些人被送上法庭，一些人辞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被撤职。这大概是戈尔巴乔夫采取的唯一一次果断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因为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军人们反对他本人的行动。

提到会上讨论的还有建设贝阿大铁路，开发新油田，向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购买食品等问题。实际上，正如我已经谈到的那样，没有一个重要问题能够超出政治局的视野。

最初确实是集体认真讨论问题，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仓促和表面化。戈尔巴乔夫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限制发言时间，甚至限制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时间，有时不客气地打断发言人的讲话。戈尔巴乔夫越发自信一贯正确，在政治局会议上越来越武断、专横。

戈尔巴乔夫羽翼丰满后，常常轻而易举地就把同自己意见不一致或对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有妨碍的战友抛弃掉。总书记在各种会议以及后来在中央全会上让政治局委员作报告和讲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他破坏了这个机构工作中神圣的集体领导制度，践踏了协商原则，有时他把报告的大致内容讲一下，

就要求大家对报告的基本思想表示赞成，到后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实际上，会上出现了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我看到，政治局委员们常常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对这种新做法感到惊讶。

这一点在讨论尼·安德列耶娃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文章时表现得十分突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读了这篇文章后，对文章没有表示特别的异议，大概他的家人还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因为他的家人总是对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有倾向性的分析。有一天晚上，他在翻阅文件，让我处理他案头的一些问题时似乎很随意地问我：

“《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尼·安德列耶娃的文章你读了吗？”

我说，刚开始读，还没读完。

“那上面说的好像都很对，只不过要引起一场很大的争论。”他得出结论。

我当时并没有认为这篇文章有多么重要，但是，雅科夫列夫对文章所持的极力否定态度促使我又看了一遍这篇文章。过了两天，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来了个急转弯，他这时认为，这篇文章是在攻击改革。很难说，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观点，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话题是针对这篇文章的。

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是没注意到这篇文章，就是没把它看得那么严重，一些人甚至赞同文章中的观点，他们就这样表态。会议快结束时，已经晚上8点钟了，发言虽然不太活跃，但很坦率，开诚布公。戈尔巴乔夫突然大发雷霆地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应该对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作出评价。

“明天继续讨论。”最后他说。

戈尔巴乔夫的突然发火让人莫名其妙，令人费解。

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室里继续召开，戈尔巴乔夫情绪激动，还是他先谈自己对文章的评价，然后让其他人发言。通常发言的顺序是从坐在主席旁边的人开始往下排，接下去是中央书记们发言。虽然戈尔巴乔夫作了“炮火准备”，会上意见还是不一致，有人对文章全部或部分地采取否定态度，也有不少人指出，文章在谈到我们的历史以及人民用辛勤劳动和鲜血得来的财富时讲了很多实话。戈尔巴乔夫开始急躁起来，态度越来越粗鲁，有时对政治局委员很不礼貌。会后他说：

“我算明白了，我在同什么人一道工作。同这些人是搞不了改革的。”

在讨论中，重要人物都迎合戈尔巴乔夫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常常即兴插话，对那些认为文章多少有些合理成分的人进行冷嘲热讽。我有时想，这些人怎么会容忍总书记指责自己不忠实既定方针，损害自己的尊严呢？每个人都无权拥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而且无论碰到怎样的喊叫和斥责都不应该改变自己的观点。

我不止一次在报刊上读到并听到西方政治家谈戈尔巴乔夫的魅力、优雅的风度和良好的文化修养的文章和谈话，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善于根据需要制造印象，但我和很多人都知道他另外一些方面的特点和习惯：他很粗鲁，常使交谈者感到难堪和受到伤害。

会议持续一整天，政治局委员们在解释和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人们几乎是在宣誓效忠总书记，以至于忘记了开会的目的是讨论这篇文章。后来，重复这种场面的次数越来越多，当代表大会讨论国内和某些共和国的事件时出现不同意见，结局往往也是这样。不久，在政治局会议上经常出现效忠的誓言，我记得也曾经要求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和我对领导个人、而不

是对思想和原则、人民和国家表示忠诚。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的无所作为及其错误决定的指责越多，他就越加需要维护对他的崇拜。在讨论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只要看到有人不认真听他讲话，他就要斥责一通。有时，他粗暴地打断与会者的发言并让此人离开会场，他常常这样对待卢基扬诺夫。大家都装作没看见这种对同志的无礼做法，而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去细想，为什么雷日科夫会失宠。沉重的工作负担，主要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同戈尔巴乔夫关系冷淡以至几乎破裂，这些都是他无法承受的，结果，他患了严重的心肌梗塞。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曾在政治局粗鲁地对待阿利耶夫，会后阿利耶夫就患了严重的心肌梗塞，住进医院，而且两年以后都没有恢复过来。当然，批评阿利耶夫是有原因的。但是，为什么要在会上那么肆无忌惮地指责他，而会上需要的是同志式的气氛和彬彬有礼的批评。阿利耶夫被安排退休了。在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对阿利耶夫和他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评价，但在公布的速记记录中这些话被删去了。

雷日科夫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是在“因病”的体面借口下离职的。但这种病及其病因是逐步形成的。我对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之间友好的同志式关系还记忆犹新，是戈尔巴乔夫（按照他的说法）最早说服安德罗波夫提拔雷日科夫任中央书记，后来又推荐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总是支持和帮助戈尔巴乔夫，常常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但这段时间确实很艰难，适合某种生活条件的体制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并按照新的规则去运行，部长会议的一个决定没有得到执行，会出现很多连锁反应，降低整个工作效率，从而招来对政府的批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和雷日科夫本人对此感到特别痛心。

苏联部长会议起草很多关于经济改革的重大决定，雷日科夫为落实这些决定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是，给他的帮助是不够的，周围到处是批评的声音，这种状况当然使总理很着急。在会上，他常常同那些认为报刊上对政府工作进行无的放矢的攻击只能使事情更糟的人站在一起，雷日科夫发言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这种自我毁灭的路线，但这样做只能给他带来新的烦恼。

他不止一次地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请你们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总是批评政府，而且像在集贸市场一样乱喊乱叫，为什么说明真相的文章报刊上不予刊登呢？这是什么公开性？”

但是，雷日科夫讲这些后一点也不起作用，因为过后，正如他有一次承认的那样，批评会更多。不久，为了使部长们和其他经济领导人有机会在报刊上撰文，他建议创办周刊《政府通报》。但谁去读这份既没有名气，印数又少的报纸，尤其是在创刊初期？

雷日科夫从发生强烈地震的亚美尼亚回来后，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雷日科夫突然向很多人展示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能，他为消除地震后果做了大量工作，果断地解决问题，在电视上作了好几次精彩演讲。亚美尼亚之行结束后，雷日科夫的威望增高，这严重刺痛了戈尔巴乔夫，戈氏的威信这时正急剧下降。

“我们的尼古拉是平民党党员。”戈尔巴乔夫当时说，“他过问政治太多了，他应该干些具体事，最好去解决经济问题。”

戈尔巴乔夫从认识雷日科夫时起就称呼他米科拉或尼古拉。我说过，戈尔巴乔夫对所有人都称“你”，甚至对不熟悉的人也是这样，只是对葛罗米

柯不敢直呼“你”，从来不敢不拘礼节地称呼他。

大概雷日科夫工作中的这种独立性加深了总书记同总理的裂痕，虽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雷日科夫当时提出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整顿国内秩序，增强纪律性，雷日科夫的做法逐渐引起戈尔巴乔夫的反感。戈尔巴乔夫把雷日科夫和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视为自己的对手和反对派，并且总是找机会批评他们。我前面已经说过了，雷日科夫不久得了重病，接着就被安排退休了。戈尔巴乔夫同另一位帮助过他升迁的战友的关系也是这样结束的。

最初，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建议和发言，他像冲锋时的政治委员一样，总是第一个跳出战壕，捍卫那些尚未完全搞清楚或并没有深入了解的决策。但过了一段时间，葛罗米柯讲话越来越少，他这个年龄的人工作起来是很吃力的，特别是在这个总书记的领导下工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还应该处理一些他十分精通的国际事务，但从一开始就不让他插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事实上无法参与对外政策方面的决策。一般情况下，葛罗米柯甚至连戈尔巴乔夫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会见和会谈的很多细节都不知道，这些会见的谈话记录总书记也极少发给政治局委员们看，很多谈判和协议对国家领导人、包括部长会议和其他很多领导人都是保密的。对国防部、克格勃、对外经济部门也是如此。政治局委员、安全会议成员、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也不了解总书记—总统外交活动的全部内容。这些记录放在哪里，我说不清楚，至少，这些材料经常不让我看。

葛罗米柯很快就认输了，他眼看着衰老下去。我望着他，看到的是疲倦的目光和一副病态的面容。原来，他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痛心和苦闷，他为自己参与了国内发生的这场悲剧感到内疚。我已经说过了，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发言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多地讲生活中的困难，常常回首往事。这时戈尔巴乔夫就望望政治局委员并使使眼色，大概想说，这是在和什么人一道工作。我说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最初向所有人保证，他不会重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一些人担任两个职务的错误，然而，强迫葛罗米柯离任后，他很快就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首脑。我早就明白了，如果顶头上司说“不”，就应该理解为“可以”，或者是“对”。总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也可以随时把话收回。

政治局会议议程在最后几个月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极少拿给政治局领导成员讨论。在研究许多问题时，发言的人越来越容易冲动和生气，但有时又表现得很冷漠。给我打电话的次数频繁起来，都在询问退休需要办哪些手续，能否保留原来的医疗待遇，退休待遇怎样。过去政治局委员退休金可达400~500卢布，保留医疗待遇，给一套别墅，可以用车，但这时这些规定开始灵活掌握、因人而异了。所以，我能够明确答复的问题很少，而且所有一切待遇最终都取决于戈尔巴乔夫对这个人的态度。

会上争论越来越激烈，有时出现矛盾。利加乔夫的发言常常同总书记鼓吹的路线背道而驰，但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这样。有时，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比如，在必须实施改革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主要在改革的速度上有分歧。另外，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忽视军队、军工综合体和党组织结构的路线表示不理解，而主要是不明白总书记为什么言行不一，常常背离既定路线，忽而跟左派走，忽而跟右派走。所有这些引起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批评，有时他们以沉默来表示反对通过某些决定。

利加乔夫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央委员会和党内都知道或猜到利加

乔夫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总书记意见一致，很多人支持利加乔夫的行动。总书记感到，正在出现一个能够联合并引导党内一部分力量的领袖，显然，这是戈尔巴乔夫所不允许的。不久，利加乔夫成了大众传媒攻击的靶子，而且毫无根据地指责他受贿。用这样的手段对待这样级别的领导人是没有先例的，利加乔夫要求迅速澄清事实并立即作出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想公开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辩护，他曾对我说：

“我不认为利加乔夫会受贿，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卷入这种事的。他能干很多事，唯独不会干这种事……”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否认报刊上的这些诽谤，所以，利加乔夫只能蒙受不应有的耻辱，在生活恢复本来面目之前，只好自己在污泥浊水中挣扎。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能超越总书记，而戈尔巴乔夫又开始缩小他的活动范围。如果以前当总书记不在时，是由利加乔夫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那么现在这种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戈尔巴乔夫休假时，会议则不定期地召开，他把所有重要问题都从议程上勾去。不久，利加乔夫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了。

总书记说：

“我们干嘛要两个平行机构呢？一切问题都可以由中央政治局决定……”

书记处召开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利加乔夫这个政治人物被孤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总书记和那些指责利加乔夫贪污受贿的人不谋而合。它使中央书记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也就是破坏了苏共的结构和苏共所有组织。

### 克里姆林宫里的斗争

早晨。只能根据“起床”的命令来判断早晨的到来。刺眼的电灯亮了，广播也同时开始，而且一直到晚上10点钟都亮着灯，开着广播。7点钟吃早饭，早饭有没磨碎、没扬净的燕麦粥、多刺的鱼、茶和面包。说到这种粥，我很遗憾地想到那些被杀的马，它们大概更喜欢喝这种粥。每当我想到自己为机械化和减少耕畜而进行的斗争，就觉得惭愧，这是我的幻想的结果。没有像样的碾米机和簸谷机，而且马都被杀了，做香肠了。不过，这儿部队烤制的面包倒是很好吃。

早饭后就开始等待了，这是最难熬的时候。有的人等待审问——常常要等几周，有时几个月；有的人——等着见律师，还有的人——等着见亲人或送来的东西。我什么也不等，至少等不来好事，但恰恰让我去见侦查员。轮到我了，空荡荡的走廊，一个楼梯接一个楼梯，警报齐鸣，仿佛向众人宣告，这是一个危险的犯人我在走廊里贴牢房走，闻到了监狱里那种刺鼻的气味，这种气味是“水兵寂静”监狱给我的第一个强烈印象。这是倒霉的气味，令人恐惧的气味，人在遇到危险和精神极度紧张时才会感到这种气味。周围的一切——墙、床、衣服，甚至连走廊上都有这种气味，走廊里的穿堂风也驱赶不走这种气味，到处都是这种气味，它压迫和折磨人的神经，使每一个迈入监狱门槛的人总是处在惊恐状态之中。

走过一个个用铁门隔开的管区，通过一层层楼，终于来到侦查：员办公的地方。屋里有三个侦查员，没有律师。他们客气地说我犯了第六十四款的死罪，并说这是他们可以给我定的最轻处罚。

我以一种十分感激的心情接受轮番审讯，直至律师到来。的确，这些问题并不是故意为难我，这些问题是调查工作所需要的，也符合一般人的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对他们来说，刑侦工作最重要的案子是杀人、强奸，可能还有巨额贿赂。

但是“以夺权为目的的政变”是无论如何不包括在内的。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或者忘记了旧教科书的内容，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有时我同这些人谈话回来时有一种感觉，维申斯基不朽的事业现在掌握在斯捷潘科夫的手里了。

其实，其他人才是出不来的，要知道斯捷潘科夫本人是过去高压制度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掌握权力的往往不是最聪明能干的人，而是最狡猾、最会阿谀奉承的人，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中央政治局及其主要人物始终是这个政治厨房的烹调家，提名党和国家主要人物——苏共中央总书记这道菜就是他们“炒”出来的。他们选出总书记并心甘情愿地服从新领袖的意志，尽管事先就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失去自己的职位。这种提名往往不是冷静和无私的行动，这总是各种力量和集团、政治局暗中的实权人物间的一场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有时在总书记还在世时，常常在他们去世前很久就已开始了。

很难肯定勃列日涅夫是否出于诚意，但列昂尼德·伊里奇重病之后确曾提出过不再担任总书记的问题。当时很多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个提议完全持否定态度，他们对这种变更没有思想准备，他们看不到还有谁能把他们、把中央、把全党统一在他们信奉的理想和实践活动的轨道上。而且，当时无论提升哪个新人都会改变力量分布，使力量对比出现不平衡。因此，多半是大家都在努力让勃列日涅夫留任总书记，虽然他身体状况很差，不能积极开展工作。他们说服他不要改变现状，工作可以量力而行，还为他确定了灵活的工作制度。

与此同时，开始“清洗”和调走那些跃跃欲试觊觎总书记位置的政治局委员。尼·维·波德戈尔内、德·斯·波利扬斯基、亚·尼·谢列平、彼·叶·谢列斯特一个接一个因不同的原因离职，但实际上都是因政治看法不同而正式“离开”中央政治局。人民群众把这种退休的原因称为“疏忽大意”，暗指对总书记不够尊重。

但是，清洗后留下来的志同道合者却不能不考虑新领袖的问题，至少要找一位可依赖的、能够胜任中央政治局这个厨房全部工作的人。于是众人的目光“落在”苏共中央总务部负责人契尔年科的身上，他在勃列日涅夫身体情况恶化时开始高升，实际上正在成为替总书记处理中央政治局很多问题的领袖人物。1976年3月他当选中央书记，1977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多人对他的提升是满意的。契尔年科得到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格里申、吉洪诺夫的大力支持，因为他离真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很远，他是一个纯粹事务性人物，虽然很勤奋并做了很多工作，但缺少必要的风度、才华和坚实的理论修养，而且主要是缺乏独立岗位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及党内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的确，他曾努力使一部分作家、诗人、剧作家、艺术家、演员等靠近自己，但这主要是某一方面的创作人员，或者是一些沽名钓誉的人。

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这样的决定是十分荒诞的，他们不愿意加强契尔年科的作用，极力想推举一个新人，很多人认为安德罗波夫最合适。



苏斯洛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器重，提拔为中央第二书记。与此同时，还有人支持柯西金，但他是中央大多数领导人不能接受的人物。当时大家以默认的态度支持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同时开始寻找有前途的人。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促使政治局委员考虑换班的问题，必须使这个最高法院的成员“年轻化”。因此在相对年轻的地方党的领导人和部长们中间也开始进行寻找干部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不可能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

不久机会便出现了：1978年中央政治局主管农业问题的费·达·库拉科夫去世了。

库拉科夫死后，关于他的死因出现各种传闻，但是所有的传闻都十分庸俗和无聊。戈尔巴乔夫有一次也谈到他的死因。戈尔巴乔夫很了解库拉科夫，认为他有很多优点，但无论如何够不上一个最大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虽然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公开的批评。

1983年秋初，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党校作完报告同我们一起乘车回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了农业发展问题，但他并没有局限在这个问题上，还谈了农村发展的一般经济和社会问题。库拉科夫在世时，如果请他作报告，他总是从农业角度谈应该播种多少麦子、荞麦、饲料作物、如何种植和收割。

戈尔巴乔夫说：

“他总是从大田农艺师的角度去看农业部门，他不懂经济，但却是一个好交际的人。他生性热爱生活，好聚会豪饮。”

在斯塔夫罗波尔任边疆区党组织负责人时，库拉科夫就以好客著称，经常找理由招待客人和自己的战友，在高加索山麓和山区修建了许多疗养院、休养所、别墅，可聚会的地方很多。他在出差和打猎时也从不拒绝宴请。他喜欢打猎，就是在莫斯科也没丢弃这个嗜好，在附近挑选了好几个猎场。勃列日涅夫请他到扎维多沃来时，他还经常参加克里姆林宫的狩猎活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1978年库拉科夫刚做完胃部手术，尚未痊愈，因饮酒过量，夜里死于心肌梗塞。当然，也有一些熟悉他的人认为他是自杀。

这种突然死亡意外地成了国内发生的很多戏剧性事件的序幕，这种死亡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出现空缺。看来，没有这种不幸事件，戈尔巴乔夫决不会在通向权力顶峰的仕途上爬得那么快，这个悲剧为他向上爬开辟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作为斯塔夫罗波尔人参加治丧委员会并在红场列宁墓上为库拉科夫致悼词。正是在那儿，在观礼台上，我第一次从远处见到这个人，他的外表给我的印象是极其矛盾的。他年龄不算大，但委婉点说，有些发胖，头发稀疏，他讲话带点当地口音，像乡下人似的，在句子和词中乱打重音。当时的情况我记不起更多，坦率地说，我当时并没有十分在意去看这位边远地区来的人，我也根本没想到，会在某个时候同他共事，更不可能猜测到他会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

大概，他本人当时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列宁墓上为库拉科夫的早逝致完悼词、把骨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后，戈尔巴乔夫焦急地等待着谁将成为政治局抓农业的人，这一次命运又向他微笑了。

47岁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占据了库拉科夫在中央的职位，这个人物，正如我上面所说，对党的很多高层领导人来说是

意料之中的，虽然对另一些人出乎意料的。了解和推荐他的人有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实际上还有所有到矿泉疗养院休养的领导。但是也有人反对这一任命，他们不愿意让安德罗波夫推荐的人掌权。所以，当时还提出一位主管农业问题的书记候选人——乌克兰共产党波尔塔瓦州书记费·特·莫尔贡。于是各种力量为把“自己的”人拉进中央展开了一场斗争，书记处工作人员把这些情况都告诉契尔年科，让他们同时到莫斯科来“相面”。勃列日涅夫要见戈尔巴乔夫时，却找不到他这个人，于是准备把莫尔贡领到别墅去见勃列日涅夫。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当时曾到处找他，不晓得能否找到，但是，了解中央委员生活的人找到戈尔巴乔夫的司机，知道他进了哪幢楼，于是，根据楼里住户的情况，确定了他在谁的家里。勃列日涅夫对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持支持的态度，自然，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书记，不久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来了一位精力旺盛的年轻书记，打破了政治局的平静局面，很快就发现有些人不喜欢他，他同柯西金的关系不太融洽。戈尔巴乔夫同苏联部长会议其他领导人和部长的关系也很紧张，当然不是和所有人。当时大家都知道中央的作用，只是有少数人敢自作主张、但我认为，这些人也是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协调立场后才敢这样做的。

戈尔巴乔夫同库纳耶夫的关系也没有马上协调好，库纳耶夫好长时间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到莫斯科来也不去看望他，甚至不给他打电话。解决哈萨克的问题，库纳耶夫有勃列日涅夫作靠山，他常常直接去找勃列日涅夫，而且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必要时他到中央政治局来，政治局也从未拒绝过这位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库纳耶夫同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基里连科关系一直很密切，而这就足够了。

当然，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库纳耶夫也改变了态度，但已为时太晚。1985年9月戈尔巴乔夫视察切利诺格勒州时，库纳耶夫也乘飞机到这儿来了。9月初是金秋季节，在北哈萨克正是收割最紧张的时候。新总书记来到区中心朔尔坦德，全苏谷物经济研究所设在这里，他来到科学院院士巴拉耶夫处，在他那儿待了半天，研究先进的耕作方法和抗风蚀办法。巴拉耶夫当时病得很重、但他还强撑着身体，让总书记看了很多东西并汇报了科研所的工作。然后，戈尔巴乔夫到康拜因工作的地里视察，同机务人员进行交谈。

他同库纳耶夫也进行了谈话，但看来没有达成谅解。动身那天，早饭后他们相互道别，库纳耶夫赠送了哈萨克传统礼物——两件绣着哈萨克图案、袖口镶着貂皮的深绿色丝绒长袍，丝绒顶的哈萨克帽子也是貂皮做的。另一件女式长袍送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礼物是收下了，但关系中的裂痕却始终没有消除。库纳耶夫为阿拉木图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索洛缅采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这是民族主义色彩的事件。中央全会因他在这件事上的责任以及收受属下的礼品等问题解除他苏共中央委员一职。他从大楼出来时，警卫人员收回了他的证件。这位老一辈党的活动家、共和国领导人就这样含着满腹冤屈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戈尔巴乔夫同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复杂。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大叔”（很多人这样称呼谢尔比茨基）不太尊重中央政治局这位年轻人。但是有一次他到莫斯科来，忽然心血来潮去拜访戈尔巴乔夫，这次会见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他经常回忆这次会见，并觉得这次会见消除

了隔阂。但看来远不是彻底消除，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不长。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中央全会，他说来不及在开会前从纽约赶回来，虽然据航空界人士分析，是完全可以赶回来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视察乌克兰期间，同谢尔比茨基进行了一次相当尖锐的交锋。在向共和国积极分子发表演讲时，戈尔巴乔夫对共和国领导人的许多缺点提出尖锐批评，过去从未有一个苏共领导人对乌克兰领导人如此不尊重，而且我认为，过去也不可能不尊重乌克兰领导人。

谢尔比茨基在共和国内也有不少反对者，这些人听到来自“上面的信号”后马上趾高气扬起来。他明白，换班的时刻来临了，以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谢尔比茨基很少“惹事”。不过，公道地讲，他还是想什么说什么，从不耍心眼，也不耍花招。但他讲话越来越少，经常生病，在领导班子换人后不久他就退休了。有些人极尽一切辱骂之能事攻击他，直到死后对他的批评才停止。不过很多人最终还是明白了，他们失去了一位英明的、有原则性的、为乌克兰作出很多贡献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葛罗米柯是一个我行我素、脱离尘世生活的人，他在国内很受尊敬，人们认为他是一位善于维护国家利益的人。他过去在电视上频繁露面更是提高了他的威信，人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有才干的外交家，而且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主要同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商量，到后来，实际上是他独自确定外交路线。他很长时间没有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至少没有像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那样，只是在戈尔巴乔夫被提拔起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成了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时，葛罗米柯才注意到戈尔巴乔夫。

当时，西方大众传媒已经从年迈的党的领导人中发现并注意到这位年轻人。他没有背负历史错误的包袱，正像他们说的那样，是“新一代”人。1984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伦敦并会见玛·撒切尔后，实际上欧洲和美国所有政治活动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伦敦之行很成功，这使戈尔巴乔夫增强了信心，他开始积极努力工作，踌躇满志，但是在苏联很少有人知道访问的事。很久以来，我们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除总书记外，不突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个规定也适用于大众传媒，关于访问评价的报道，它们要听苏共中央的口径。

如果需要增加一些对访问及其成果的报道，则这些报道会被删去所有形容词，经过反复过滤，最后剩下的就像一堆鹅卵石，冷冰冰的，毫无特色。

有时，当某个政治局委员在国外访问时，有人或借西方特工部门之手，或授意我们的情报机构败坏他的名誉。于是开始揭露这个领导人或毫无边际地吹捧他，这使总书记对此人产生怀疑，从而给这个人带来厄运，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在他背后搞的阴谋。

在这次访问中，正如戈尔巴乔夫告诉我的那样，大众传媒对客人们很友好，说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戈尔巴乔夫的夫人（如果相信他的话）以自己的魅力、得体的装束、举止言谈令英国社会倾倒。她同几乎所有人都能用英语问候并针对国际政治发展倾向谈些看法，但是我们的广播和电视对代表团访问的成就没有给予报道，没有对访问给予应有的重视。后来才知道，甚至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发给中央政治局的密码电报也都压在外交部葛罗米柯和中央委员会契尔年科总书记手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当时把这些情况看作是苏共中央和外交部中对立派对他采取的有预谋的行动。他得出这样的

结论还因为，在他访问匈牙利，会见卡达尔时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对戈尔巴乔夫来说，1983年如果报纸上能发表一条匈牙利领导人接见他的简讯，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这次会见就等于承认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但是这条消息没有及时见报。也许莫斯科并不重视他，也许不报道的原因的确是因为对戈尔巴乔夫没有好感。我同他一起去的匈牙利，我发现，戈尔巴乔夫对我们的报刊不积极报道他同卡达尔会见一事十分生气。

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报纸上才报道他访问的消息。正义终于胜利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增加了一位著名的活动家。

葛罗米柯一直坐山观虎斗，到最后时刻他才决定改变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轻而易举地向戈尔巴乔夫妥协，他还主动提出让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外交部长惊人的嗅觉延长了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葛罗米柯和戈尔巴乔夫彼此相互需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登上党和国家权力顶峰之前和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还能够尊重葛罗米柯，当有了实力和信心后，他就改变了自己对前外交部长的态度。他本人越来越需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个正式国家首脑的头衔。

戈尔巴乔夫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对乌斯季诺夫来说并不感到意外。

戈尔巴乔夫分析了莫斯科力量分布情况后，非常重视乌斯季诺夫的作用，认为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关键人物。他经常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打电话，请求军人在收割最紧张的时候给予援助。当时是有传统的，军队常常派汽车营到国家东部地区运粮食。他还常以其他理由给乌斯季诺夫打电话。

大概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也注意到了年轻的中央书记，认为他有才干、有风度，所以他们逐渐亲近起来。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不知道谁会接替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乌斯季诺夫说：

“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您就把这事承担下来吧，我们支持您担任总书记。”

乌斯季诺夫一再推辞，但有一次他说，他不会担任这个职务。

“我已经到年龄了、又有很多病，还是让契尔年科来干吧。”

这些话当时刺痛了戈尔巴乔夫。他明白了，他不可能越过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直接跳上去，所以他不会马上得到总书记的位置。他不知道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能活多长时间。不过还有一件事他也不知道，乌斯季诺夫考虑到契尔年科任总书记的可能性后，支持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内二把手。契尔年科当时也保证同意这种安排，并且口头上答应由戈尔巴乔夫主持中央书记处。但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无法完全行使党内二把手的职权，因为他不具备很多必要的权力和现实的支持。过去关于他同安德罗波夫关系密切的传闻对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后来戈尔巴乔夫本人竭力回避同安德罗波夫的关系。对已经去世的安德罗波夫开创的事业大受欢迎这一事实他甚至感到很忿怒，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人民爱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原因。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忍不住说道：

“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你想想，对这位前克格勃主

---

乌斯季诺夫。——译者注

安德罗波夫。——译者注

契尔年科。——译者注

席、这位把持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狱和精神病院并把不少人赶到国外去的人，国内外大众传媒为什么不把他彻底搞臭呢？就因为他是‘两面派’，所以国内外的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而不侮辱他。”

这些一时冲动说出的肺腑之言说明，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不得志而苦恼，同时又嫉妒给人民留下美好印象的安德罗波夫。人们怀念安德罗波夫是因为他生活朴素，他不是热衷于在电视镜头前炫耀自己，而是致力于整顿国内秩序，准备逐步对国家进行现实的改革并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曾到处炫耀安德罗波夫对他的宠爱，致使后来很多人坐卧不安，不知该如何对待去世的总书记的心腹之人。这种关系长期以来使人们对作为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很反感，不少政治局委员瞧不起他，而且一部分经过多年艰苦工作才当上州和边疆区一把手的地方领导人也明显地不喜欢他。

毫不奇怪，戈尔巴乔夫进入中央政治局后，出现了一批反对“疗养院书记”的力量，不少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也不太信任戈尔巴乔夫，担心一旦他掌权会改变力量的对比。所以安德罗波夫在世时就有人开始推荐格·瓦·罗曼诺夫做未来的领导人，他们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而且经过考验和锻炼，没有拿破仑式的纲领。推举罗曼诺夫也的确有道理，罗曼诺夫多年来一直领导列宁格勒党组织，熟悉国防工业，是一位相当著名的人物。他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但他缺乏中央书记应具备的机关工作能力。罗曼诺夫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水平提高到处理全国性问题的程度，老是停留在市和州的工作水平上。他既不是一位立场鲜明的政治活动家，也不是出色的演说家，在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很少讲话。但罗曼诺夫也有强大的反对派，反对派觉得他肯定会进中央，甚至有可能成为党的领袖。于是他们展开了精心策划的幕后斗争，制造各种谣言，有时是难以置信的谣言。

有一条谣言的用心是险恶的，他们散布说，罗曼诺夫在列宁格勒工作时，竟允许自己女儿在皇宫举办婚礼并使用沙皇的餐具。这个精心杜撰的、具有挑拨性的谣言曾长期在各级权力机关和居民中流传。10年后，反对党和特权的勇士们又把这件事翻出来。当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议会委员会审查了这件事，结果查明，参加婚礼的一共12个人，婚礼是在罗曼诺夫别墅里举行的，他实际上连婚礼都没参加，因为在家里闹了些别扭，罗曼诺夫一个人到办公室去了。至于宫廷餐具则更是无中生有的事了。

但是，报刊却不愿意刊登这些真正的事实。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把这一切情况都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我也讲了审查结论并建议在报刊上发表，但总书记没有这个意愿。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领导已经不愿意为自己的战友澄清事实真相了。于是罗曼诺夫含着满腹的冤屈退休了，他不打算同诽谤去争斗。其实有一只妙手，可能还不止一只手在操纵和控制这些诽谤性谣言的传播。

我越深入制造政治食品的厨房，了解情况越多，对围绕争夺我国领导机关最有影响的职位，首先是总书记的宝座所玩的大规模秘密“游戏”就越清楚。80年代中期，各种企图占据关键职位的力量都在纷纷活动，这场斗争无章可循。不排除这种情况：在安排关键性最高领导职务、清除可能的竞争者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本国特工机关的参与。大概，罗曼诺夫是偶然落入这个漩涡的。

还有一个总书记候选人——弗·伊·多尔吉赫，他是契尔年科和吉洪诺

夫、实际上还有部长会议所有领导人推举出来的。多尔吉赫负责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燃料动力综合体和机器制造业，在生产者中很有影响。他本人是著名的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他是在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拔上来的。他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的岗位上被调到苏共中央。吉洪诺夫积极支持他，请他参与商量部长会议研究的很多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戈尔巴乔夫焦躁不安，也使他同多尔吉赫的关系更加复杂。

“吉洪诺夫又打电话让多尔吉赫去参加部长会议的会议。他们是想让他当领袖。”戈尔巴乔夫愤怒地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千方百计限制多尔吉赫的影响，发动了一场反对多尔吉赫的秘密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多尔吉赫的失败而告终。多尔吉赫退休了，虽然他精力还很旺盛，还能够工作并对事业作出贡献。

多尔吉赫退休后，常常来找我，让我捎信给戈尔巴乔夫，请求给他安排些工作，因为生活越来越艰难。但是，他没有得到答复。

“这个人太狡猾。”戈尔巴乔夫说。“他有很多退路，怕吃亏。现在让他休息去吧。”

总书记是不会宽恕多尔吉赫的，因为他不会忘记他认为权力有可能交给多尔吉赫的那段日子给他带来的痛苦。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彼夫（用他的话）有交情，而且他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那儿还得到很大支持，那么他同切布里科夫的关系则没有搞好。他知道，维·米·切布里科夫是一名顺从的工作人员，勤勤恳恳地为契尔年科效劳并经常向他汇报党内和社会上力量分布情况。不过，切布里科夫也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常给他打电话，向他汇报工作，但这只是做做样子，而且他担心契尔年科会知道这一切。可他又不能不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因为他十分清楚契尔年科的身体情况，不知道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会怎样。切布里科夫为这种优柔寡断和谨小慎微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想方设法解除其克格勃主席的职务，卢基扬诺夫调到最高苏维埃后，这个机会来了。

切布里科夫从克格勃系统“解脱出来”后，像安泰一样失去了力量和威力。作为中央书记，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影响，没有实权、联系和情报，他只能静悄悄地消失。

这时国内有一股能够给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制造谣言的势力，而且还有订货人。苏共中央、大众传媒经常收到一些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贿的匿名信，终于，一则关于切布里科夫肮脏行为的消息传到总书记的耳朵里，这使总书记兴奋起来。

“你看，上帝发现了骗子。”戈尔巴乔夫说。

“但这是谣言，是诽谤。”我反驳说。“这又是有人想玷污一个中央书记。”

“你还是去找他一趟，对他说，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总书记那儿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相信这些传闻。但您应该知道部说了您些什么。”

在权力斗争中，政治反对派不惜任何手段，唆使人民一会儿反对党的这

---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只要接触土地就能得到力量。有一次他被敌人举起，无法触地，最后被掐死。——

个领袖，一会儿又反对另一个。我不敢说，这些谣言都不符合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在政治局第一次改组中，切布里科夫被安排退休。根据雅科夫列夫的推荐，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戈尔巴乔夫同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一起解决最秘密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喜欢格里申，而格里申同样不喜欢他。掌握实权的莫斯科书记很有影响，是契尔年科的人。所以，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削弱他的权力，不久就找到了借口。莫斯科发生商业工作者的重大刑事案件，调查表明，神通广大的首都商业局局长特列古博夫也卷进受贿案中。对这些案件的调查令格里申十分不安，他非常清楚矛头是指向哪儿的。1984 年秋，他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我听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格里申刚刚休假回来，得知苏共中央正在调查首都商业工作者同党的机构的联系后，十分愤怒地把这一情况向戈尔巴乔夫反映。

“苏共莫斯科委员会党组织不能为所有的骗子承担责任。”格里申大发脾气地说。“而且暗示市领导同特列古博夫和商业系统其他领导人有私人联系的做法更令人无法容忍。”

戈尔巴乔夫反复安慰格里申，说调查这个案子不是要降低市委和市委书记的威信，但事实总是要澄清的。

“他开始不安了。”戈尔巴乔夫放下听筒说。“大概那儿确实不太干净。应该把事情彻底搞清楚。”

利加乔夫也参加了结案工作，逐步揭露出很多违法乱纪和虚报浮夸的事实。利加乔夫开始处理住宅建设中的虚报现象。莫斯科流传着各种难以置信的传闻，人们传说普罗梅斯洛夫和格里申滥用职权，所有这些传闻降低了市领导的威信，使市领导四面楚歌。

契尔年科常常出来为格里申解围，但是，作为党的领袖候选人和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他已经名誉扫地了。

当时，格里申替身体衰弱的总书记干了很多工作，直到最后一刻始终忠实于他。大概，正是格里申和契尔年科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迫使这位莫斯科领导人作出将功补过的姿态，最先站出来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很难说，这样做能使他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延缓多久。不久戈尔巴乔夫就请格里申来谈话，之后格里申交出权力，退休了。然而，败坏苏共市委领导人的报道一直没有间断过。

戈尔巴乔夫对中央其他一些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同样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既没有创造性，又很不协调。从一开始，在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中间就笼罩着不信任和竞争的气氛，而且常常发生公开的冲突，大家要经常理清关系，有人甚至希望辞职不干了。

戈尔巴乔夫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们安排工作时，故意让他们相互发生冲突。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利加乔夫和尼科诺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工作关系。这些人负责处理同样的问题，在党内又具有同样的权力，都不愿意作出让步。

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叫我去报告工作，正巧，这时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扎伊科夫紧急求见他。我想退出来，但戈尔巴乔夫却让我留下，也许他认为有我在场扎伊科夫不会那么毫无顾忌，并且很快就能走，也许他认为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谈话需要有现场证人。顺便说一句，他倒是经常这样做。不知为什么，总书记进行一些秘密谈话总是让自己部门的某个人在场。于是，这一次我就无意中目睹了这个场面。扎伊科夫坦率地谈了书记处的状况、主持会议的人同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很激动，心绪不佳。他说，工作开展得不正常，中央内部没有贯彻集体领导原则，不尊重中央书记，这样做对事业没有一点益处。

雷日科夫总是抱怨一些中央书记干扰经济工作，他甚至同某些人，首先是同利加乔夫的关系很紧张。而我以为，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他觉得，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意见不一致对自己有利。还有一些领导人找戈尔巴乔夫要求辞职，主要原因是书记处和政治局内关系不正常。总之，存在很多磨擦，无法协调一致地工作。也许，在其他任何一个组织中，磨擦和争吵都不会对事业带来这么可悲的后果，但政治局委员之间潜在的冲突使党和整个社会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委员们经常发生争吵，有时是激烈争吵。戈尔巴乔夫时常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把雷日科夫留下来作些解释，后来他说：“尼古拉不理解改革的实质及其深刻性。”大概，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理解改革的实质，所以，总是闪烁其词，把所有权力部门和管理部门甚至自己的战友都弄糊涂了。

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先讨论很多外交部的工作问题，但这些问题常常不列入会议议程。当众人走了以后，政治局委员在小范围内讨论一些永远也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事情，这主要是指外交部的干部问题。但这不过是把屋子里的家具换换地方，而不是更换“靠关系爬上来的”干部，很多东西原封未动保留下来。那里确实相当混乱，裙带风在外交部相当盛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的作用开始减弱，会议开得越来越少，决议通过得很仓促，常常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好几个月不开一次会，这种情况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内容越来越少，党和中央委员们发现，曾经强壮的机体开始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实际上是在埋葬国内独一无二的强权机构，政权日益瘫痪。戈尔巴乔夫听不进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斯柳尼科夫以及后来舍宁等领导人关于政治局已经不起作用的意见，虽然他们是用极其委婉的语言来提意见的。

顿涅茨克州马里乌波尔生产联合企业“亚速机器制造厂”电焊工出身的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瓦·阿·盖沃龙斯基在《公开性报》上十分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在提及高层领导人时写道：

“在书记处会议上，我们始终坚持既定的路线。应该指出的是，很遗憾，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只参加了两次书记处会议。”

“而政治局到1991年夏初时已经三个月没有开会了。我记得，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讲的：‘如果政治局在近期内还不开会，我就在中央全会上要求取消这个机构。我



们政治局委员不应该对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决定承担责任。’

“还有一件事。7月17日戈尔巴乔夫去伦敦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我问中央书记奥·舍宁：‘奥列格·谢苗诺维奇，我要会见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记者们会问，那儿有什么消息？可我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却什么都不知道。’奥列格·谢苗诺维奇回答我：‘瓦连京·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政治局委员，也同样什么都不知道。’”

总书记是这样一种人，地位提高以后，就失去了感觉尺度，一有“成就”便飘飘然起来，不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现实，为自己今后的败落打下了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什么也不怕，戈尔巴乔夫害怕依靠党，因为党已经威信扫地，其中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持之以恒地解决问题才使党威信扫地的。同时他也不能脱离党，因为他十分明白，脱离党会导致他政治上的灭亡。

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后，政治局开始了最后的挣扎。党的这个主要机构总共就召开了几次会议，对苏共活动问题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 苏共中央全会

苏共中央全会在党的工作中发挥很大作用，实际上，全会不仅决定当前的政策，而且还决定国家的战略政策。中央全会通过和批准国家建设、国际关系、工农业发展、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等重大问题，讨论军工综合体状况，并且还就最重要的干部问题通过一些决议。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全会工作出现很多新迹象，恢复了一部分列宁的民主制原则，消灭了形式主义，给工作中的变化带来一股新鲜空气。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响起一阵阵掌声，全会参加者起立欢迎刚刚当选的年富力强、讨人喜欢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微笑着等掌声平息下来后，请求允许他宣布全会开幕，并建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主持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信任新总书记，因此，一致赞成全会开幕并让总书记主持会议。只要对事业有好处，他们什么都可以同意。

由谁来主持中央全会，过去都是集体决定的，就是斯大林也要征求全会的同意，而且也不都是由他主持全会。当时的民主程序可能是形式上的，不过执行起来却很严格。

但现在总书记却直接开始介绍参加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应邀与会的人，并请求允许他宣布全会开幕。

最初，他在会上作的报告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后来，他开始把一些粗制滥造的、某些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塞进报告中。最初，与会者被他的魅力所倾倒，满腔热情地接受总书记的思想。辩论都是建设性的，中央委员不是按照预先规定的顺序发言，而是想发言的人都可以发言。要求发言的条子都登记在本子上，这个本子就放在戈尔巴乔夫的桌上，不断有人给他递送要求发言者的名单。当然让谁发言由他一个人决定，可以让第一个登记的人最后一个发言，也可以不让发言。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当时确实有一种畅所欲言的气氛，可以批评反对戈尔巴乔夫方针的人并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后来，全会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中央委员开始明白，这是在改革的幌子下破坏党的结构，破坏经济和国家的管理结构，把人民推向贫困的深渊。逐渐地开始出现违背国家既定发

展方针的苗头和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如果在戈尔巴乔夫王朝执政初期，还能经常把一些具体问题提交中央全会并提出一些相当明确的任务和解决任务的办法，那么到后来讨论就成了抽象的辩论。党不是像从前那样处理实际问题，而是陷在内部争斗中。

在中央全会上，批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声音越来越多，大概没有一次中央全会不批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调任新工作岗位后，履行苏斯洛夫的职权并在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梅德维杰夫也受到全会的批评。戈尔巴乔夫从不阻止对自己的思想家的批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成了全会参加者的“出气筒”。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感觉到中央委员情绪上的变化，经常改变自己的立场，放弃贯彻他提出的各项决议。但这只不过是总书记为缓解辩论锋芒、迷惑周围的人而一贯采用的迂回策略。每次全会之前，他总要作一些“家庭准备”，以应付对自己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得知中央委员准备发言反对他施行的方针时，总是抢在他们之前发言，激烈地抨击与会者。很难用语言表达出这种激情，他大叫大嚷地指责大家不相信改革，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诅咒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号召动摇分子理智从事。戈尔巴乔夫经常用辞职、国家要毁灭、要发生贫困等办法进行威胁，他本人也常常猛烈抨击国内的局势，把一些令很多人胆颤的“底片”曝光。被总书记的表演才能弄得惊讶不已和困惑不解的中央委员们默默地看着党的领袖那张愤怒的脸，而他不顾中央委员的情绪，大谈骇人听闻的危机的所有预兆。这场戏演完以后，想发言的人比以前少多了。他们中很多人把发言稿中批评的字眼删去，只讲本地区改革的成绩，至少是指出并非一切都那么糟、那么不可挽救。一些我很早以前就熟悉的党的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多次抱怨说，这位改革建筑师真有念咒的本事，他们往往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自己竟那样轻易地被人弄得团团转，扮演着各种角色。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像一位出色的演员，变着法儿地感染听众。

最近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开始越来越多地邀请那些不是中央委员的州委、边疆区委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以及军事部门领导人、社团组织负责人、苏共的人民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等参加苏共全会。被邀请来的人很多，克里姆林宫的中央全会大厅勉强容纳得下所有与会者。哪些人是总书记不愿意邀请参加会议的呢？这就是记者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戈尔巴乔夫认真审查被邀请人的名单，勾去所有对他没用的人的名字。

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重演了为全会拉“观众”的角色。过去，当赫鲁晓夫在党和人民中失去威信时，他就邀请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参加中央全会。显然，这么多人与会不可能对列入议程的问题进行集体的和开诚布公的讨论，更谈不上以批判的态度进行讨论。听见的只是不停的掌声，被邀请的人感觉到自己在参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我多次参加这类活动，开始时我还认为，应该这样做。但是，不久很多人就明白了，拉“观众”参加中央全会并不是民主的表现，甚至完全相反。这是以公开让全体人民解决问题为幌子来压制批评的一种低级的做法。现在，戈尔巴乔夫又在重复赫鲁晓夫那一套。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仅仅在重复老一套做法，他还想出了压制批评的新办法，这就是他的创造性。比如，他经常用下列办法来对付中央委员对总书记路线日益不满的情绪：在中央全会开幕前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

老广场小会议厅召集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开会，向他们介绍即将开幕的全会的议程。

“明天我们要讨论党的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一般开头都这样说。“还要通过一些重要决议。我知道你们那儿有很多问题。大概不一定所有想发言的人都来得及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而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想听听每个人的意见。因此，今天请大家来商量商量当前的一些问题。”

这种“民主式的”开场白以其真诚博得了党委书记们的好感，他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些有意见并想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此时在这个小型会议上把话都讲出来了，他们批评戈尔巴乔夫没有明确的改革路线，一些做法令人难以理解，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国际政策的目的是不明确。党委第一书记们、中央委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主席台，批评改革方针是一种自杀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认真地听着，不停地在记事本上把书记们的发言内容记下来，有时作一些说明。我认为，他甚至把针对自己的一些不客气的语言都记下来了。

在这样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是让所有想发言的人都把话讲出来，即使知道他们是反对自己的。我曾想，总书记不会让他们讲话的，免得把事情搞糟，但是我错了。苏共领袖首先让这些人讲话，如果偶尔听到有人不同意批评改革，他会委婉地制止这些人，请他们不要妨碍发言的人，并答应让每一个想发言的人都把话讲出来。于是，与会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主席台。这种畅谈通常要持续8~10个小时，直到没有人想发言为止。

“还有人想发言吗？”戈尔巴乔夫问道。“请上来讲。”

但是，与会者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要求结束会议。戈尔巴乔夫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并简单地对这次会议作总结。他强调指出，他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将对一些原则性问题作出答复，现在他只想谈谈同粮食收割、牲畜过冬或居民食品供应有关的一些问题。通常总书记最后总是谈这些问题，当然，有时对他批评得“多了点”，他也忍不住，于是就导演出一部感人的话剧。他在剧中扮演雄辩家的角色，施展他的全部表演才华。

“改革应该从自己开始。”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你们具备所有的工作条件，不要总是抱怨中央……”

开完这样的会议后，他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把外衣一扔抱怨道：

“等把他们的脑筋转过来，我已经累得满身是汗了。你看看，这些新当选的书记都是些什么人？”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开幕前夕所受的这些煎熬是一出精心排演、精湛表演的戏剧，收到了预想的效果。第二天，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上作完报告后，会前已经讲完自己看法的人再没有人要求发言，也没有人批评戈尔巴乔夫路线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已经向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把自己想到的都谈出来了，另一些人对昨天的激烈发言多少感到有些难为情。大概，还有些人不太敢重复昨天说的话。所以，中央全会开得很平静，像以往开得最好的时候一样。如果以后有人研究1990~1991年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他不会充分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因为对改革和整个戈尔巴乔夫方针的批评都被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外去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一切都结束得比较顺利，通过了模棱两可的决议，缓和了矛盾，造成了中央委员意见一致的错觉。

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手法对付中央委员，当全会参加者们识破

戈尔巴乔夫的花招后，他就再变换一种策略。总书记不仅仅让中央委员，而且还让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的代表发言。结果，大家在次要问题上讨论来讨论去，说起话来就不再那么尖刻了。戈尔巴乔夫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言，把与会者搞得疲惫不堪、精疲力尽。中央全会会议常常开 12~13 个小时，一直到晚上 10~11 点钟，有时甚至到夜里才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决议都可以“通过”。最好笑的是，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开会的方法称为列宁的民主制原则。

“在中央全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畅所欲言，让大家听到他的意见。”总书记总是这样说，努力向人们显示他的民主作风。从外表看，似乎这一切就是这样，但实际上，改革建筑师只想听自己的，所有其他声音都是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独奏伴奏。只是到了 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花招才无法再愚弄中央委员了，他本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中央委员的信任。

戈尔巴乔夫不喜欢除他以外再有什么人在中央全会上作报告，但有一次，他还是同意给利加乔夫一个机会，让他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教育问题的报告。不过，他本人也就意识形态问题作了报告。结果，没有对利加乔夫的报告进行讨论，所有发言的人，虽然没做准备，都谈党的意识形态问题。

这种嫉妒心理和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的作风是无法搞好中央和政治局内部的气氛的，人们逐渐都甩手不干了。大家看到自己得不到重视，很快便消沉下来，失去工作的兴趣。这正是那些战友疏远他、失去政治活动积极性的原因之一。

中央全会的工作很少有在一天内结束的，戈尔巴乔夫尽可能地让更多想发言的人讲话，但中央全会规定的发言时间是相当严格的——每个人发言 15 分钟。每两小时休息一次，代表们都到下面的小吃部去。头几年小吃部里备有很多热菜、冷菜和水果，经常有热香肠，午饭时还有汤、夹肉面包和馅饼。最初，这些费用都从党的经费中支出，只是最后几年才向与会者收些钱。在饭桌上，中央委员们继续讨论报告和发言，互相交换意见，进行争论。很多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们利用开中央全会的机会来解决一些紧迫问题，设法“搞到”机器和原料。

中央全会结束后，或在会议期间，戈尔巴乔夫经常向中央书记、各部负责人及自己的助手询问，与会者的情绪如何。但是，越来越难以让他高兴，中央委员们逐渐地都不再到他那儿去了，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开完中央全会常常马上就回家去。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们也不去找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越来越缺乏相互间的理解，不满情绪日益严重。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还有一点能够证明大家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发生变化：后来一段时间，当总书记走进全会大厅时，没有人鼓掌，没有人起立，而且很多人并不在意他的出现，仍在继续谈话，在会场来回走动。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招呼与会者注意开会了。

很多中央委员、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在发言时谈的都是些批评意见，他们说，总书记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党和中央委员会。这些批评大都是有理有据的。很多党员退党，中央委员中出现派别组织；一些人主张保留现行原则，一些人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一些人支持戈尔巴乔夫是把他看作摧毁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力量；还有一种人是为捞好处才依附在党的机构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见解、因此，一旦好处没有了，就声明退出苏共。

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已经不能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了，他们常在各种

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上展开争论。总是讨论某个发言人关于民族问题、对过去战争的态度等拙劣的或不成熟的声明，有时就连最没有争议的声明也能突然引起争吵，大家都对国家的局势不知所措。最近一年半来，在全会会议大厅中坐着的是过去伟大时代的一些影子，他们是否感觉到党和国家的崩溃已近在眼前？我想，大多数人是感觉到了。但是，在现任总书记领导下，他们已无力改变任何东西了，很多人只是在等待他们时代的结束。

苏共二十八大以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开始作最后挣扎，曾经强大的党的核心正在衰亡，整个机体正在坏死。

这里验证了四年前戈尔巴乔夫说的一句话：“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 党的文件

1987年初，阿·伊·卢基扬诺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开始主持中央国家法律部的工作。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高兴地离开了他从1983年开始领导的劳神的总务部，搬进另一个办公室。他面前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负责军队、克格勃、内务部、检察院、所有行政和护法机关的工作。卢基扬诺夫的工作变动结束了我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生涯。

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结束后，我突然被叫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会间休息的大厅，大家在很随便地谈论着中央全会的结果，回忆着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发言以及讨论报告时的一些细节情况。这时，戈尔巴乔夫打断谈话，说道：

“看，这就是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的接班人。你们大家都熟悉博尔金，我建议批准他担任总务部负责人。”

这个场面对我来说是意料之外的。两个月前，戈尔巴乔夫向我透露过这个想法，但我当时拒绝了。我说，我不熟悉这种文牍式工作，如果不需要我的话，还是让我回报社去吧。

“我根本受不了这种公文工作，非得‘折腾死’不可。”我说道。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让你去赴刑场吗？”戈尔巴乔夫说道。“这个工作对我很重要，我请你帮忙。”

谈话没有继续下去，大概我的拒绝使他为难了，或者问题尚未最后决定，这只是“试探”一下我的态度。反正我当时尽可能表示不同意，因为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反对我干自己不了解的工作，我不愿自己被牢牢地拴在一个职位上。按照我的性格和工作经验，我更愿意自己单干，自己领导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可现在我被叫到休息厅，面对党的领导人，总书记又讲了关于我的任命的意见。我听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表态赞成这个决定。于是，戈尔巴乔夫不久签署了大概是卢基扬诺夫起草的关于我的任命的决定。

这项我不大熟悉的复杂工作就这样落在了我肩上，我痛苦地调整工作方式。如果过去晚上9点以前可以下班的话，那么现在差不多要到夜里12点钟才能把事情搞完。

中央总务部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它从事哪些工作呢？

早在20年代斯大林时期就建立了总务部，它是由中央的一个特殊部门发展而来的，是为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全会和中央各部237服务，向它们发送文件和公民来信的，它还负责监督拿到党的最高政治机构、党的地方委员会和组织审查的所有文件的进展和执行情况。这些文件的数量相当多，最近

中央每年收到上百万封居民来信、上万份各种文件和材料，这些文件中提出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工作的迫切问题，通报各地的情况，同时还有那么多的文件发送到各共和国、边疆区、州直至个别区。

所有给中央的这些文件都要经过一道大门——总务部。邮件立刻被分送到中央各有关部及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手里。所有邮件均由总务部负责登记注册和保管，直到通过相应的决议和作出答复为止。

经总务部同意送给总书记的是最重要的、同他主持的工作有关的材料和通报，这包括克格勃、外交部、国防部和内务部、同军工综合企业有关的单位的文件，党内系统的文件包括共和国党中央、苏共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亲自签署的所有报告。

有一个向总书记及党的其他领导人汇报情况的特殊渠道，即外交部、克格勃、总参谋部，偶尔也有驻外经济代表机构从国外发来的密码电报。同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党中央、州委、边疆区委直至个别区也有直达密码电报联系，密码电报可以不通过任何人，直接由私人秘书转达给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他們要找的其他领导人。在征得总书记的同意后，由负责向苏共中央送文件的那个部门领导人在文件上注明收件人，必要时，戈尔巴乔夫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某个通报，或根据提出的问题分派任务。实际上，总统活动中也有这种规定。

在总书记—总统办公桌上除文件外，还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州委、边疆区委、政府、各部、特别是国防部、内务部、克格勃以及一些社会组织——共青团中央、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科学院等单位材料，所有这些文件收到时都要登记注册，由总务部掌管，直到作出决定为止。

应该说，总书记—苏联总统的信息渠道很多，而且常常是重复的。首先信息来自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安全会议成员、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送给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通报是多方面的，绝密文件他亲自送到总书记这儿来并亲自汇报。有许多邮件因所涉及的问题的缘故要用封口信送给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亲自给这些信件开封，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秘书代为开封。有些机密文件总书记委托我向他报告。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同助手们的活动有联系。这些助手同中央委员、部长、作家、艺术家、军人、外交官有广泛的联系，这使总书记能够了解各部门及社会组织负责人、文化界、科学界、教育界知名人士本人的意见。由于有很多助手和顾问，所以他们的消息也是戈尔巴乔夫信息来源的主要部分。

文件来源的第三条重要渠道是总务部。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把要求正式研究的问题的材料送到总务部，这些文件由总务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戈尔巴乔夫的秘书亲自向戈尔巴乔夫汇报，有时甚至用封口信给他送到别墅，在休假期间——送到休养地。总书记—总统不在时，这种邮件要报告给他的代理人。

最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收到上报来的文件时，越来越爱生气，大概地方上的坏消息使他焦躁不安。此外，他往往很不耐烦，不像从前那样认真地阅读所有文件并作出评价，常常把报告压在那儿，有时没开封就退回来了。在他准备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材料和起草在最高苏维埃的发言时，是不能给他送邮件的。这时邮件只好按顺序压在那儿，致使有的内容过时，

等到通过决议时已为时太晚。当然，对一些微妙的消息，特别是同他现实和潜在对手有关的信息，他在任何时候都会毫不迟疑地认真阅读。

邮件的一大部分是公民来信，这类邮件每年约有 100 多万件，1987 年达到 120 万件。部分信件来自国外，一般每年有 30 万件，有时达 40 万件。大多数信件是直接寄给总书记的。当然，最近几年这条河里的水越来越少了，特别是苏联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出现争吵以后，戈尔巴乔夫的威信逐渐下降，致使这条河变成了一条快要干涸的河流。

有一次，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让我把中央一天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整理好拿给他看。工作人员把这些信件放在箱子里，拿到五楼一间大空房子，屋里所有桌子、椅子上都摆满了信，最后不得不摆在地上。光是给他的信就有 3000 封。总书记翻看并阅读了一些信，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同社会人士的各种会见中，他谈了自己了解的信件内容，几乎每一封给中央的信都很感人，很多信令人不忍卒读。人们在述说自己生活的困难和各种违法事件，抱怨困苦的生活。最令我不安的是那些谈到孩子和老人生病的信，那些因无人关心和缺少药品而濒临死亡边缘的人的呼救声至今仍触痛我的心。总务部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措施帮助这些受难的人，但不是所有的事情总务部工作人员都能做得到。

随着信件中对总书记的批评日益增多，戈尔巴乔夫对信件也失去了兴趣。但我每天仍挑选出 20 多封信，让人放到他桌子上。可这样做，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总书记，都不会带来快慰。

正如我已经谈到的那样，大部分公民来信都要送给中央各部，此外，有些最尖锐的问题还要写出简介、简评、报告和专题简报。所有这些材料一定要向戈尔巴乔夫汇报，有时他吩咐把文件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邮件的简评甚至发至中央全会与会者。这是一项看起来很平常、但却非常必要的工作，我们非常认真地做这项工作。

总务部下设一些专门机构，负责保证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中央全会期间也为中央委员服务。总务部有一个局负责接收、打印和复印所有分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文件，一般都是些秘密文件和各地党的机构、苏联部长会议、外交部和国防部、克格勃等部门的通报。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就是根据这些文件确定的。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实行两班工作制。他们对这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们这样干并不是迫于压力，而是出于职业道德。这个局还为中央全会服务，为会议做记录，出版记录。速记记录是由高级速记员和打字员完成的，一至一个半小时后，发言人就会得到自己讲话的记录稿，本人要对稿子进行核对并签字。全会快结束时，速记记录就准备好了。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决定都是总务部的这个局搞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局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文件。这里的文件数量也相当大，涉及党的活动的所有文件都由该局负责。

总务部向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寄送的中央决定不仅涉及党内工作，而且也涉及经济部门的工作，此外，还发送干部任命通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等。

每次中央政治局开完会以后，总务部领导都要负责准备记录稿，针对党的最高层领导机关研究的问题提出决议要点和给有关的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下达的任务要点。我将准备好的一份记录送给戈尔巴乔夫，有

时他在决议的一些提法上作点修改，但常常不提任何意见就签署记录。中央书记处的记录也由总书记签署，即使会议不是由他主持的。

所有送到中央或由中央机构准备的文件最后都要放到档案馆，总务部有两个局专门为档案馆服务。书记处档案馆里保存的是该机构主管权限内的有关材料，中央政治局克里姆林宫档案馆是档案的主要保存地点。从 20 年代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活动的文件都集中在这里。这儿保存有苏共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政治局会议工作笔记和记录、各共和国、边疆区、州、部、主管部门、科研所、设计院、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外交部、国防部、国家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等的各种情报资料及很多著名的党、苏维埃和国务活动家、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材料。

几十年来，档案的数量增加了很多，尽管管理得很好，但要查找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记得，我曾就馆藏内容提过一个建议。我来到一局档案馆，同志们带我看设在原斯大林住宅和克里姆林宫政府大楼地下室中的档案库，所有文件都放在专门的箱子里，保持恒温和一定的湿度。被称作“特别公文”的文件和 30 年代就用封口袋保存的材料则放在单独的房间里。其他文件当然也很重要。看过档案馆后，我向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结论并建议将哪怕一小部分保存的材料向社会开放。为此，总务部有人提出出版一本专门杂志，使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党中央当前的文件，而且也知道一些档案材料。戈尔巴乔夫和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支持这个建议，于是，总务部很快就开始出版《苏共中央通报》。杂志首次发表了很多有意思的秘密笔记、通报、党和政府的决议，从而使人们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国家的一些历史事实。中央政治局负责调查 30~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的镇压活动的委员会发表的材料在该杂志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选材工作使我们又一次有机会十分认真地研究档案材料。

工作人员告诉我，在翻阅前年务人民委员部主席叶若夫的个人档案时，档案馆工作人员发现一包同弗·马雅可夫斯基惨死有关的文件，其中有他临死前写的几封信，包括给政府的信，他自杀用的“勃雅特”手枪和穿透他心脏的子弹。

后来，经戈尔巴乔夫同意，总务部准备把这些材料转交给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并在杂志上发表，从而使所有关于诗人之死的谣传不攻自破。我想，克里姆林宫地下室这些重要的国家机密库里还保存着多少意想不到的东西啊。

我认为，我的前任，当然首先是阿·伊·卢基扬诺夫，多次向中央总书记，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汇报过关于档案馆材料、特别是那些封口袋中的材料的问题。对此我也作过汇报，但戈尔巴乔夫不表态。大概他比我更了解这一大批材料，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们。我的这个推测得到一些事实的证实。有一次，在同雅鲁泽尔斯基会谈之前，戈尔巴乔夫给我一个紧急任务：

“档案馆中应该有关于卡廷事件的通报。赶快去把它找出来，拿给我。”

我吩咐马上去档案馆找这份文件。文件确实很快就找到了。两小时后，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两包封口文件，上面注有“绝密”字样和只有经总务部负责人允许才能开封的附言。当然，这里指的是总书记或他信任的人。

“找到了吗？”当我来到他办公室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问道。

“不知是不是这个？”我把口袋递给他并答道。



他把口袋拆开，浏览了几页，然后亲自把口袋封好并粘上。他把文件还给我说：

“一份材料里讲的是在卡廷枪杀波兰人的真相，另一份是调查委员会在战争期间解放斯摩棱斯克州后所作的结论。一定要保存好，没有我的同意不许让任何人看。这些材料太敏感了。”

我知道，后来波兰方面、雅鲁泽尔斯基和专门成立的苏波联合委员会不止一次地向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必须公开交出卡廷惨案的全部材料。克留奇科夫、法林也建议这样做，但总书记一总统对这些要求没有反应，给他的报告也得不到答复，他不许总务部提供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而且，他亲口说过并委托转告波兰方面，除战争期间发现的那些材料以外，没有找到其他有关枪杀的可靠材料。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无法否认这是谎言了。应该说，这还不是他向我国和国际舆论所讲的最大谎言。

我不止一次地想搞清楚，为什么总书记一总统在效法赫鲁晓夫继续调查斯大林时期搞的大镇压事件时，突然停下来并开始闪烁其辞和说谎话，难道对苏联共产党来说，还有比承认全世界都已知道的党的一些领袖批准枪杀上千名同胞、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以及很多外国公民更可怕的事吗？为什么改革建筑师突然隐瞒起这段应受到谴责的杀人罪行呢？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答案。不过，我认为，有时最普通的利益和原因也能影响戈尔巴乔夫作出决定，甚至非常重要的决定。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以及某些场合下，他大声宣称，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中央政治局极个别人作出的。当然，这种论断即使对那些不了解决策内幕的人来说也是很可笑的。他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参加政治局的所有会议，怎么可能不知道出兵的原因和这场战争的主要事件呢？从1980年10月起，戈尔巴乔夫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即使从形式上说他也应该知道并为阿富汗发生的一切事件承担责任，而这还不是证明他了解出兵阿富汗内幕的唯一论据。

在阿富汗战争确实已经前途渺茫的情况下，谢瓦尔德纳泽希望澄清这个问题。阿富汗领导人日益把战争的负担转嫁给苏联军队，因此，军队上层领导人和克格勃领导人中的多数人认为，必须改变我们援助阿富汗朋友的性质。而且，作战部队中普遍感到疲惫不堪，社会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为别人的利益而参战是没有出路的，结束战争也是在国际事务和对外经济事务中冲破封锁的条件。当然，当时的领导人明白，苏联军队出兵阿富汗可以加强我们的南部边境，避免敌对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渗透，阻止因伊朗宗教人士掌权而活跃起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蔓延。而且在中亚各共和国中已经出现一些不祥征兆，民族主义抬头，对其他民族采取不容忍态度。依我看，正是这些原因促使苏联卷入了一场棘手的战争中。勃列日涅夫的总书记生涯从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以在遥远而又神秘的阿富汗的战争而结束。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结束流血冲突，于是，当时谢瓦尔德纳泽开始查问有关出兵阿富汗的文件。戈尔巴乔夫同意外交部长翻阅这个时期政治局的所有材料。

谢瓦尔德纳泽来找我，了解如何更好地熟悉文件。他当时十分忧虑，但是，与其说是忧虑阿富汗事件，不如说是忧虑国内和党内的状况。在坦率的交谈当中他突然问道，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如果知道，那么他要把党引向何方。我记得，当时这些话使我非常震惊，我觉得，谢瓦尔

德纳泽怀疑总书记的方针的正确性，他在为自己选择行为方针。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这次谈话使我很不安。

在这次谈话中，谢瓦尔德纳泽要求把关于阿富汗的文件送到外交部去，于是，总务部派专人给他送去所有文件。我不认为，外交部长没有把自己的结论向总书记—总统汇报，戈尔巴乔夫肯定知道所有情况，因此他同其他人一起支持从阿富汗撤军的建议，主张用其他办法支持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第二个关注出兵阿富汗问题的是 A·C·扎索霍夫，总书记—总统又下令让他去翻阅当时的文件。

在中央政治局档案馆（后来成了苏联总统个人档案馆）里可以找到我国和其他国家舆论界关注的许多其他问题的答案。

比如，同 1939 年苏德谈判有关的文件就是一个例子。里宾特洛甫同莫洛托夫签署的秘密协议早就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兴趣。协议涉及到我国西部边界新的国界线把邻近一些国家的地区划归苏联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第三帝国”档案馆中发现了这些文件的复制件，但苏联方面从未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以至于很多西方专家怀疑这些复制件是德国外交部和情报部门伪造的。因此，这个问题时而具有现实性，时而被搁置一边，但是，无论谁怎么想，这些秘密协议的确存在。1956 年以前，这些文件保存在莫洛托夫的保险柜里，他离开政治舞台后，这些文件交给苏共中央，保存在政治局档案馆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文件。大约 70 年代中期，葛罗米柯曾关注过这些材料，从一些笔记来看，苏联外交部曾调阅过这些协议。

到 80 年代下半期，关注这些文件的人越来越多。我担任中央总务部负责人后，有人向我汇报说，这些秘密协议保存在档案馆中，而且既没有装进档案袋，也没有特殊批注和印记，中央很多工作人员都可以看。我叫人把文件拿给我，并且立即向戈尔巴乔夫报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秘密协议共两页，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署的，还有苏联西部地区和邻近国家的一张大地图，上面有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签名。莫洛托夫在秘密协议上签名用的是拉丁字母。曾经使所有人困惑不解或怀疑这些协议是德国复制件真实性的秘密终于解开了，莫洛托夫一反常态用拉丁字母签名。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在这种问题上不可能出现一时心血来潮的事，多半是他当时希望人们对文件的可靠性提出疑问。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动心眼，他把自己姓名三个字母“N·CT·”端端正正写在地图上。

戈尔巴乔夫认真看了一遍协议，然后在桌子上把标着苏联西部新旧边界线的地图展开，这是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上面标出城市、居民点、铁路和公路、河流、丘陵地带和平原。地图上的字用的是德文。总书记研究着半个世纪前两个大国共同划分的边界线，边看边谈自己的感受，偶尔也向我提些问题。眼前这些文件并没有使他惊讶，他的语调里更多的是气愤，因为他不得不触摸过去的事。

“认真保存好！”他最后说。

然而，国内外对秘密协议的兴趣则有增无减，法林、雅科夫列夫也开始找这些文件。我把这个情况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他果断地说：

“不要给任何人看。需要给谁看，我会告诉你的。”

时间在飞逝。在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苏德秘密协议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形势时，戈尔巴乔夫突然说，寻找这份秘密协议原件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他这是在说给我听。他为什么要向全世界撒谎，我说不准。或许他当时认为，

他没有义务用事实教育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或许他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他惧怕公布这些文件的后果。而他的一些拥护者却为他开脱，说什么总务部知道这些文件，但没有向总书记汇报。戈尔巴乔夫也认可这种说法，他不想说出真相，也不想承担迷惑社会舆论的责任。总之，这个谎言既没能帮他保住苏联，也没能帮他保住自己的国家领袖职位。戈尔巴乔夫后来作出的违宪决定促使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脱离了苏联。

在人民代表大会发言后不久，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好像很随意地问我，是否把那些协议销毁了。我回答说，没有专门决议我是不能随便销毁的。

“你明白吗？这些文件现在意味着什么？”

在戈尔巴乔夫向全世界宣布他没见过秘密协议以后，我猜到了这个题目的危险性。他想永远忘掉这些文件，但要销毁这种文件却不那么容易，特别是战前关于卡廷事件的情报也提到过这些文件。所有这些材料是随时能够引爆的定时炸弹，会在道德和政治上致戈尔巴乔夫于死地。苏联总统虽然知道同波兰人民的悲剧事件和苏德秘密协议有关的往事，却极力不让最高苏维埃、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知道真相。

没有人愿意销毁这些文件，改革的建筑师和新思维理论著作的作者本人也不敢作出这样的决定。秘密销毁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据我所知，这些文件在各种登记册和卡片中多有记载，要消灭痕迹，就需要销毁这些登记册，而重新抄写战前的所有登记册是不现实的。还有很多人也知道这些文件，他们决不会干这种冒险的事。同很多国家档案馆不同，政治局档案库有极其严格的制度，某个文件即使压在总书记那儿，也要催还。所以，我认为，这个档案馆对文件的保存是完整的。

大致也是在这段时间，克留奇科夫还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一件事，他说雅科夫列夫同国外特工机关有联系。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就是在克留奇科夫前来向总书记汇报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克留奇科夫和我都同雅科夫列夫很熟，那么他拿着这些材料去汇报时，肯定心里是非常矛盾的。克留奇科夫简要地同我谈了向戈尔巴乔夫汇报的事，我听到这个消息并不高兴，我当时对克留奇科夫说，报告这种事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我记得，克留奇科夫是这样回答我的：

“我们把这个情报压了很长时间，审查又审查，核实又核实，动用了我们所有的力量。此事证据确凿。”

他指的是什么，我不能说，但我再说一遍，当时这个消息令我十分不快。

我有理由对克留奇科夫谈的那些问题进行思考。雅科夫列夫从加拿大返回莫斯科后曾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常常钻图书馆，会见美国学者，搞到了我们情报部门多年要搞的情报和史料。老实说，我当时以为他在国外可能是给我们军事情报部门或克格勃工作，但决没有想到他会干克留奇科夫的人怀疑的那种事。而且在加拿大他作为大使是了解所有特工人员情况的，但我们在那里的情报机构好像没有被破坏。

因此，我对他说的话有不同看法，但我也不能轻易否定克留奇科夫坚信不移的事。于是我说，既然他掌握的情报证据确凿，那就不能不向戈尔巴乔夫报告。

“是的，我知道，这不是讨论的问题。”克留奇科夫回答说。“我只不

过想告诉你，因为我们俩同亚历山大 最熟。”

我不能不同意这一点，因为正是雅科夫列夫介绍我同克留奇科夫认识的。

过了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问我：

“你知道不知道，雅科夫列夫还留了一个哥伦比亚尾巴？”

我回答，听说过，但不知道细节。戈尔巴乔夫说，他让克留奇科夫同雅科夫列夫谈一谈。

“你是否也参加他们的谈话？”他向我建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喜欢这样做——把所有不愉快的事都推给别人去干。我当然是极不愿意参加这个谈话的，因为这是在没有掌握任何事实，也不知道怀疑的理由的情况下，我就来参与指控一个快要登上国家权力最高峰的人。不过，我知道，在国外，连一些国王和总统也受苏联情报机关的影响，但这都是一些不民主和不廉洁的人。

这件事还没有完，当总参谋长谢·费·阿赫罗梅耶夫证实，军事情报部门也掌握了同克格勃相类似的材料时，我开始时仍没有对此引起重视，因为我知道将军和很多军人同雅科夫列夫关系极不融洽。但是，克留奇科夫同他相识多年，性质可就不同了，一般情况下，他不会抱有成见和不怀好意。

戈尔巴乔夫让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找另一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个别谈话，说他涉嫌同外国特工机关有联系，并要求作出解释，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荒唐的。而且参加这个谈话的也不应该是我，掌握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权力的总书记才应该作为第三方参与这种调查，以便消除对雅科夫列夫的怀疑。但戈尔巴乔夫对真相并不感兴趣，他更喜欢政治局委员之间有磨擦和内讪，希望他们的地位不稳。

不论怎样，两三周后，克留奇科夫同雅科夫列夫还是谈了一次话。谈话是在十分随便的场合进行的，不仅衣领扣子是敞开的，而且所有的扣子都没扣上，因为谈话是在桑拿浴室进行的。顺便说一句，历史上在罗马浴室里的确曾经解决过非常重要、十分微妙的问题。

说实在的，我常想，要是我受到克格勃的怀疑，我该怎么办。如果克留奇科夫说，他掌握了关于我的这种材料，我会立刻去见戈尔巴乔夫，把对我的指控告诉他，并要求尽快澄清事实。

“在对我的怀疑没有解除之前，我将辞去所有职务。”

这是在受到怀疑的情况下应该和需要做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问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是否来向他作过解释，他回答说：

“没有，没来过。”

这也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戈尔巴乔夫知道所有情况之后是如何表现的呢？最初，总书记限制雅科夫列夫看文件的数量。这里还应该提一句，有一批绝密文件，戈尔巴乔夫亲自指定谁可以看。通常只有两三个人，有时是四个人可以看。有专人负责把文件送到某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办公室并等着他看完，这都是些非常重要的国家机密。所以，戈尔巴乔夫限制雅科夫列夫看这些文件，等他离开政治局后，就根本不给他送任何保密材料了。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其他措施，一两年后，总书记只是开玩笑地谈到这件事。有时他不满意雅科夫列夫的某件事，就问我：

“喂，莫非他真的在哥伦比亚大学被人‘抓住’了？”

有一次，他在签署政治局关于雅科夫列夫去西班牙（或者去别的国家）的决定时，开玩笑地说：

“看来，间谍头子会在那儿召见他。”

这话该怎么理解呢？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大量的现实问题和国内局势的变化，这个问题被遗忘或不再那么尖锐了，连克留奇科夫也不提它了。我以为，这件事已搞清楚，但后来我确信，克格勃还在怀疑，而总书记最终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弄个水落石出。

克留奇科夫或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无需向戈尔巴乔夫本人报告、也没有注明“退回”字样的那些文件都交送到中央政治局档案馆，后来这里变成苏联总统档案馆。这都是些国家级的，包含国家机密的文件，它们充实了档案馆的两部分馆藏资料——现代问题档案资料和长期保存的档案资料，档案馆具有长期保存档案的全部必备材料。

1980年夏天，有一次在老广场的中央大楼里，我去找中央总务部第一副部长克·米·勃戈柳博夫（当时总务部部长是康·乌·契尔年科），我同勃戈柳博夫很熟，1961年在他担任中央鼓动宣传部出版局局长时就和他一起工作过。他兴致勃勃地同我谈了总务部复制和长期保存文件的条件。

“根据我们下达的任务，科研所研制出一种纸，可以保存上千年不变质。”他对我说。“不会因年久而发黄和破损。现在开始用这种纸打印政治局记录，以后将用这种纸处理和保存所有文件。”

当时，不论学者，还是勃戈柳博夫，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不知道，档案馆的文件根本无需保存上千年。十几年后，它们就被广泛传阅，成为学者和所有感兴趣的人（而且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担心，有许多材料，我们将不得不到哈佛或其他能够珍惜历史的档案库中去看。

档案专家们说，在巴黎起义摧毁巴士底狱时，激愤的人民把极其珍贵的文件都销毁了。如果不是俄国驻法国大使预先把一些无价之宝运走的话，他们会把一切都毁掉的。应该感谢我们的民主派领袖们，他们鼓动莫斯科人去攻打苏共和克格勃的堡垒，只是破坏了一些纪念像和纪念碑，而没有去糟蹋档案馆。我们应该寄希望于真正的历史学家会不带任何成见地使用所有这些材料。

总务部中还有一些以技术性质为主的部门，每年需要复制近百万页文件，装订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量记录。大批打字员和速记员两班制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得值班，有一些人要守在电话机旁，而且常常被人从家里和别墅火速叫来执行紧急任务。

戈尔巴乔夫常常采取这种全体紧急动员的方式，特别是最初的时候，人们总是随时准备执行紧急任务。中央总务部在契尔年科时代改变了面貌，在卢基扬诺夫时代得到巩固和发展，最近又得到更新。它是一个十分协调的机构，不论是在行政命令管理体制的鼎盛时期，还是在改革时期，它都为苏共中央和各地党委的工作起到了保证作用。至少在执行总书记、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任务方面，中央机构从来没有拖延。全体工作人员都受过良好训练，有责任心，熟悉业务，不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能够召之即来。问题主要出在领导人身上，出在制定方针的人身上。

## 关于特权

又是一天即将过去，天气一定不错，太阳照耀着整个城市，还能感觉到它的温暖。

下午，阳光有时透过百叶窗厚厚的铁片照在铁栏杆上，照在我贴在铁栏缝隙的手上，当时我还能感觉到逝去的夏天的温暖。可是影子很快拉长，光线也渐渐暗下来，夜幕开始降临大地。午饭过后便感觉到冬天、寒冷和一种难以忍受的东西的来临，令人心情沉重。今天我在原本是窗子的地方站了三个多小时，可窗户被厚厚的玻璃砖挡住了，只是透过百叶窗的细缝才能感觉到阳光、天空和大地，但绝对是看不到的。

熄灯了，我毫无睡意地躺着。不由得又想起家来，想起了我一直放心不下的 90 岁高龄的老母亲，想起了我的妻子、女儿和外孙女。

总而言之，应该思考的东西很多。

报刊受总书记周围的人的怂恿，争先恐后发表文章，越是不了解情况的人，越是能泼脏水。当时有一种说法：既然他去福罗斯，而且是从医院里溜出来，可见他相信事情会成功，可见他觉得有利可图。我相信那些提出这类问题的马屁精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一行动的动机，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说，世上还有很多比吃饭、比权利和安逸生活更重要的东西。我确实实是病了，但我比很多人都清楚，我的祖国病得更加严重，她将面临着解体、流血、贫困及社会和民族间的战争。因此，我不过做了每个公民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都会做的事情。

世上没有哪种职务和利益可以使人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我这辈子从未想过当领袖，也没追求过高官厚禄，更不抢镜头，不像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那样总是在镜头面前拥来挤去，我从没喊过“总书记万岁”，尽管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头几年我对他完全信赖，并且全力以赴地帮助他。在总书记周围的人当中，我是第一个拒绝乘坐“海鸥”小轿车的人，我始终住在十年前分到的、与另外三家合用的一套四户别墅里，尽管我的“官衔”完全可以使我改善现有的状况。由于工作繁忙，实际上没有休息日，没有正常休假，我甚至从没有在疗养院里正经疗养过，也没有去过中央专门医院。但是当我知道一小撮自私自利之徒想背叛和出卖祖国、破坏俄罗斯人世世代代用鲜血和生命建设的国家时，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去福罗斯的建议。我再重复一遍：任何利益的诱惑都不能改变我的行动。

其实，对大部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部分科学、文化、新闻工作者来说，当时的各种特权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倒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他们所享受的这部分特权不过是没有以工资形式付给他们的那部分酬劳。的确这里需要作些说明，因为就这一问题公布的许多材料都与事实不符或者说得不够充分。我认为，关于特权说得不充分并不偶然，因为批评特权的人恰恰是无偿地享受一切的人。

这一制度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一直延续到今天，只是在强大的抨击下才垮掉了呢？

在我们国家，物质刺激制度从来不是根据简单的平等原则制定的。众所周知，革命后的头几年曾为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开设专门食堂，供应各种各样的食品及高热量的营养品，理由是当时有很多行政机关的职员工作需要加班加点，需要吸引一些高级专家参加我们的工作。比如，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

的“食疗餐厅”就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开设的。这种制度逐渐推广到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间，尽管工人和行政人员在工资水平上实际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管理机关却拥有某些特权，就是这些特权使得行政人员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保守国家秘密、不去参与非法活动。

一部分所谓的主管干部在医疗、分配住房、别墅、使用交通工具方面享有特权，退休后还享有相当高的养老金，但这都是后来的情况了。斯大林统治时期，在中央机关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特权，而待遇是有范围的，不允许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有什么额外的东西。我曾赶上这个时候，当时一个有四五口之家的督导员也就住一间房子，而且是与人合住在套房子里。能住进高楼大厦的，或者是部长，或者是著名学者、作家、演员等，直到60年代中期都是这种情况。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新盖了许多住宅楼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行政命令制度的加强不仅使行政人员数量增加，而且也使特权扩大，出现了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的各种不同待遇的等级制度。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职务到不同的专门医院就诊，勃列日涅夫时期还为他们提供不同规格的别墅等等。当时还有按职位等级供应食品的制度，一部分工作人员每星期可在食品商店得到（当然要付钱的）特供食品，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每天都可以得到这样的食品。有一部分行政人员每年享受优惠疗养和休养并提供路费，其余的工作人员可以在疗养院休假，但并不是每年都能去，也不是在较好的季节，而且自己要负担一部分费用。

赫鲁晓夫担任党的领导（后来担任政府领导）以后，特权制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还没有触及到最高权力集团，享受额外“待遇”的人数大大减少。这同压缩部委的数量，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一部分工作人员转到地方机关也有关系。赫鲁晓夫时期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和中央医院就诊的人员减少，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食疗餐厅”就餐人数减少，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专车也减少了。很多疗养院转交给工会管理，其他一些不合理的规定也相继被撤消。但是当时还保留所谓的领导干部享受特供食品的制度，尽管当时商店里的供应相当不错。

当然，一部分享有特权的人，如上面提到的国家最高领导层，不在赫鲁晓夫反特权之列。然而就是对特权的这么一点限制也让赫鲁晓夫颇费了一番精力，一下子取消这些特权是很困难的，最主要的是这样做非常危险。

我认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恢复机关的特权，这绝非偶然。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身为机关出身的人非常清楚，他们能否顺心如意主要取决于执行最高领导层路线的人员是否富足，因此最初几年不只恢复被赫鲁晓夫取消或限制的规定，实际上还建立了新的庞大的系统。领导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务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固定到这个餐厅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员迅速膨胀。

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为了仿效建立这种制度的经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派人到我国取经，他们参观了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餐厅，赞扬餐厅的供应原则，只是提出一条意见：看来俄罗斯人确实有民族特点——甚至在内部商店也排队。当时情况的确如此，为了买半公斤香肠或小灌肠，有时不得不排上一个小时的队。我亲眼看

见排队的人群中有全国著名学者、设计专家、著名演员及一些科研和文化界人士，他们的时间极为宝贵，把时间浪费在这类特权上简直是犯罪，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上班时间内。

从 1965 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房，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新的中央专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 生活在光明的未来

当然，这些特权和国家高层领导人所享受的特权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1987 年以前，政治局委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形式上的工资为 800 卢布，这是个相对不小的数目，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是由工资决定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有一些专门的内部决定，规定什么人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有些决定只有三个人知道。比如，除工资外，政治局委员可以免费从克格勃九局供应站领取价值约 400 卢布的营养食品，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以领取约 300 卢布的营养食品。那些直接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书记还可以免费享受早、午、晚三餐，以及水果和他们想订购的任何东西，而且运往别墅的以及通过苏共中央分发下去的食品都要经过卫生检验或者在严格的卫生监督下在专门的车间加工制作。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列有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领导人特供食品清单。这本列有各种“美味健身”食品清单的书有数百页，证明了我国的物产丰富。总而言之，可以享用和款待客人的食品数不胜数。不过顺便提一句，这些机关的人并不十分好客，至少是不喜欢接待那些一起共事的人。我曾亲眼见到有些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他不主张志同道合的人经常会面），请求允许邀请某位高级领导人到家里作客，同时还要说明请客的由头。

所有的食品都可以从克格勃九局的仓库里免费领取。而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正如我前面已经谈到的，只要来上班不仅可以定一日三餐，而且还可以定其他食品，且数量不限。很多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我不止一次看见警卫弯着腰扛着沉甸甸的纸盒子或手里提着大皮包把自己的主人送到汽车里，把他们分到的东西运到别墅去。

我知道，这些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当选的政治局委员的情况，但是很多做法一直延续到很晚。只是党的二十八大上选出的中央书记才真正是具有新思想的人，他们不追求过分享受，而且也丧失了以前的各种待遇。直到 1990 年前，过去的很多东西一直保留着。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奇纳不止一次拿着一叠发票找我。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每天公事和私事的大笔开支，这都是昂贵的开销。有时某些党的领导人一天用掉的钱相当于老职工一个月的退休金。

“你说，我该怎么办？”克鲁奇纳问我。

“应当去报告戈尔巴乔夫，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试图给他出主意。

于是他默默地拿出戈尔巴乔夫的一张编号为 001 的发票，上面的数额使我打消了任何提建议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全国各地正开展反特权斗争的时刻，只有总书记生活在世外桃源。顺便说一句，1991 年夏天，我曾建



议戈尔巴乔夫为所有的人规定公务开销限额，多余部分必须自费。然而这项规定仍然不适用于总书记。

高级领导人的特权制度不只限于免费食品，他们的住房、别墅、汽车等很多的费用也都由国家或党的预算负担。他们的住宅通常在设备齐全的高档楼房里，必要时配备警卫和各种服务人员，尽管有各种奢侈条件，可是按西方标准来看，这些住宅还是很简朴的。

我们再来看看别墅的情况。这些别墅位于首都西部，在莫斯科河沿岸地区，一般都是现代豪华别墅，通常坐落在松林地带，占地达 50 公顷。别墅区有温室、家禽放养栏和其他小动物栏，最近又在别墅旁边修建了游泳池和芬兰蒸气浴室。这些别墅都是建筑杰作。别墅均是几层小楼，有很多房间、卧室、浴室、卫生间，楼内有宽敞的餐厅，可容纳 40~50 人，既可打台球、又可看电影。通常别墅旁边设有储藏室、冷冻室、厨房，院子里有保温车库，昼夜可以停放专车。大概所有的家眷都在这样的别墅里靠党和国家的经费生活。客观地讲，安德罗波夫的别墅是特别简陋的，他不想更换别墅。克留奇科夫一直使用在他被选入党的机关前往了 15 年的那所别墅。

为国家别墅服务的工作人员很多，如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当然还有花匠和警卫员。我的一个熟人成了高级领导人后也分得一套这样的别墅，当时他找到我，不安地对我说：

“喂，我不能住在这样的别墅里，这里无法正常休息。身边围着一群人转来转去。而且这简直是宫殿，住进去会脱离群众的。我不想住这样的墅，我得去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谈谈。”

此前不久我同另一个新当选的苏共中央书记也有过一次类似的谈话、他为此种排场和众多的仆人而感到不安，也想请求领导让他留在原来的中央别墅。我当时唯一能劝他的话是先别急着去谈，等等再说。遗憾的是很多人很快习惯了这种奢侈，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身份、在外表、举止、言谈话语中不时地表现出一副官气，他们与过去同事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因此我不急于提什么建议，况且我知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别墅都是戈尔巴乔夫亲自分配的。这是他的一大爱好。

除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外，在疗养地还有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别墅和宫殿供领导大夏天休假用。实际上每个领导人家都有疗养别墅，而且还在继续建造这种别墅。戈尔巴乔夫时期，已开始设计的新型别墅仍继续在克里木、黑海沿岸、基斯洛沃茨克和高加索其他地区建造。这位改革设计师好对建筑风格提意见，对别墅建造的地点、外观和布局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想夏天在前几任总书记或政治局委员住过的官邸休息，因此在格鲁吉亚的海岸上又建造起一座中央总书记官邸。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是格鲁吉亚领导人一再要把这座别墅建在这里的，他们说那里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既有大海的空气，又有高加索山上松柏散发的清香。工程搞得非常气派，我从群众来信中得知，连浴场上的沙子都是从几百公里以外运来的。

在福罗斯也以惊人的速度建造了一座总书记官邸。几千名工程兵被派去参加这项工程建设，但是它并没有给苏联总统带来运气。

不过，主要建筑物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官邸。除建筑人员和保卫人员外，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官邸的底细，但是根据专家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述，可以想象得出它的豪华程度。这里拥有保证对国家和武装力量进行领导的一切必要设施。

我认为，对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来说修建官邸是必要的，但是建筑规模应该由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来定，因为这种建筑的造价需几百万卢布，用现在的卢布得花掉几千亿。修建供夏季休息的官邸也应该由人民监督，以使这类工程的费用不超出合理拨款的限额。党的领袖毕竟不是伊斯兰教长，不能摆沙皇派头，他们的费用不应该用人民的钱财来支付。甚至连沙皇当时都用个人的钱去买土地和建造别墅。

遗憾的是修造楼堂馆所的嗜好还不仅仅局限在郊外修建官邸。

有一次，那还是 1986 年夏天，克鲁奇纳打来电话，问我：想喝茶吗？我同他 1972 年就认识，我当时随《真理报》记者组来到切利诺格勒采访。那里的收成不错，而当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正闹旱灾，很多地区收回的粮食还没有播下的种子多。根据克鲁奇纳的建议我们走遍了整个切利诺格勒地区，参观了那里的产粮区，后来又去了科克切科夫。当时《真理报》刊登很多有关庄稼收获情况的文章。自那时起我们经常见面，讨论一些农业问题。瞧，现在他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想见我，我回答说很高兴见他。几分钟之后，我们就见面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把我叫去，给我几天的时间考虑，在哪儿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建造新房子合适，要我拿出初步方案。我吩咐人找地点，但是我觉得这似乎已没有必要。因为我已接到命令把房子建在列宁山上离莫斯科大学不远的地方。”克鲁奇纳忍不住向我说了这件事。

我默默地听克鲁奇纳说，和他一样，也对这种决定感到惊讶。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位总书记决定专门为自己修建房子，到目前为止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哪儿有空房就搬到哪儿住；同几十家几百家住在一幢楼里。当然这些房子非常好，即使设计上有不如意的地方，也容易改造，所以没有人抱怨。现在戈尔巴乔夫的做法不同寻常，不知是他不明白问题的微妙之处和因此而引起的麻烦，还是出于某种他无法抵抗的压力。

我陷入沉思，克鲁奇纳谈的情况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本来对总书记爱好修建别墅就有很多传言，现在又多了一件事，而且是有根据的。

我小心翼翼地问克鲁奇纳：

“休谢夫大街上怎么样？那里的房子很棒。”

“现在戈尔巴乔夫一家就住在这幢楼房里，但是他们对这幢房子不满意。我曾建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搬到列宁山上当年赫鲁晓夫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住过的国家别墅，或者在这个地方盖一座新别墅，那里的交通很方便，但是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克鲁奇纳说。

我认真而又有点激动地对克鲁奇纳谈了我的想法：不能在这种地方建房子，那将出现多少传言，总书记的威信也会大大下降。不管有多大功劳都不可能平息这种怨声。克鲁奇纳叹口气说：“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从窗户可以看到他们的母校——莫斯科大学的大楼和周围的环境，他度过青年学生时代的地方。”

我和克鲁奇纳边谈边喝茶，他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他内心焦急万分，我想也真够他为难的，现在他要为这份差事付出代价了。1984 年，当时安德罗波夫在世时就提出了挑选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问题。从前的主任已经上年纪，又同过去的班子关系密切，甚至连工作方法都一致，尽管他认真负责地履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意愿，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时代变了。现在需要把自己信赖的人提到这一位置上来，戈尔巴乔夫向安德罗波夫推荐克鲁奇纳。

早在共青团工作时戈尔巴乔夫就认识了克鲁奇纳，对他在切利诺格勒州的工作情况早有所闻，亲眼见过他在中央农业部的工作情况。戈尔巴乔夫可能就是根据这一切决定选择他。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对批准新办公厅主任问题一直犹豫不决，而且契尔年科及其周围某些人坚决反对克鲁奇纳担任该职。他们的理由是克鲁奇纳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不熟悉经济、财政工作。然而中央办公厅主任当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办公厅及其所属部门确定党的整个预算，是苏共财产、财务、储备的保管者。掌管党的建筑物，出版社、中央专门医院、疗养院、汽车库、相当数额的住房及其它物质和技术资源，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办公厅的关键作用。实际上每个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或州委第一书记都想找办公厅主任解决地方上的一些日常问题，如建造住宅、行政办公大楼、幼儿园和增加汽车等。

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坚持，安德罗波夫对这个问题迟迟不作答复。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和安德罗波夫通电话时我在场，我听见安德罗波夫用微弱的声音说他原则上同意，并请暂缓下任命。可能是契尔年科强烈反对，也可能是安德罗波夫自己犹豫不决，也可能是他想再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商量商量。他实际上不了解克鲁奇纳，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白，任命戈尔巴乔夫推荐的人实际上是把办公厅完全交给戈尔巴乔夫。根据中央所形成的传统，总书记向来是办公厅的监护人。

最后，安德罗波夫已卧床不起，只偶尔能说出几句话了，当他刚恢复一点气力时就向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对克鲁奇纳的任命，并说已把这个安排转告契尔年科。这次谈话一结束，戈尔巴乔夫立即把我找去，一会儿克鲁奇纳也来了，他向我们讲了同安德罗波夫谈话的内容。

当时正值晚上，日常事务已经结束，因此戈尔巴乔夫可以讨论问题，畅谈办公厅的任务和必须整顿它的工作，避免过去的错误，不要受党内个别领导人意愿的支配，要经常征求意见等问题。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办公厅工作非常了解，也感到他对克鲁奇纳几位前任的工作非常不满。后来我从克鲁奇纳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所有请求都是向总书记报告并得到他的“批准”后才予以满足。

过了很长时间，契尔年科办公室才发布任命克鲁奇纳为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决定。不能说这个消息使他特别高兴，他确实对很多问题都不懂，尽管担任新的职务，但是和以前一样关心农业，关心农业收成。新的工作要求他付出极大的努力，他首先接到的几项重要任务是不久后成为总书记的契尔年科交给他办的。克鲁奇纳经常找我，给我讲契尔年科交给他办的那些越来越不可思议的私事。我不知道他家里谁坚持要搬到休谢夫大街当初为勃列日涅夫准备的住所去，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很快便开始为契尔年科搬进这所房子做准备工作。

戈尔巴乔夫特别关注克鲁奇纳的工作，常常很生气地对我说：

“瞧，我看米科拉已经死心踏地投靠‘那边’（指契尔年科那帮人）了，真卖力气。”

戈尔巴乔夫成为事实上的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后，仍旧把人分成对“自己”忠诚的和不忠诚的两种。所有帮助过总书记契尔年科的或者同阻止戈尔巴乔夫提升的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有来往的人都被列入反对者的行列，若干年后他还对那些人的左右摇摆耿耿于怀，很少有人

能得到他的器重。

可见那时戈尔巴乔夫内心深处就怀疑克鲁奇纳的可靠性，由于他在完成总书记及其家属委托的事情时常常犹豫不决，这种怀疑心理越发严重了。这一切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冷淡下来，尽管党内的财政问题还和从前一样仍然由他们俩决定，但是很多问题已不让克鲁奇纳解决了。他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态度逐渐变冷，经常来问我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总书记想干什么，为什么那些帮助他巩固地位的人现在这么使他生气。

列宁山上的别墅竣工了，总书记及其家人很快搬了进去。但是在这之前，国内开始了一场反特权斗争，列宁山上这座豪华别墅引起居民和代表们的极大注意。旅游车在莫斯科大学附近的观景台开过时，导游让游客注意路边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房子，人们扒着车窗争看这座 60 年代初学校式样的建筑。尽管反特权斗争一时还触动不到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夫妇这样认为），但是为防备万一，他认为在这座别墅里住一套比较简朴的房子更为合适。

苏共中央所有房屋建造历来由书记处或政治局决定，唯独这座豪华别墅的建造及其工程预算的文件我从来没见过，很可能是卢基扬诺夫主管中央总务部工作时办理的此事。反正克鲁奇纳在完成总书记交待的任务时，总是不那么轻松，尤其最近二十八大的代表们要求彻底公开党的预算，他感到很不安，身体和精神上都有些受不住了。总书记的胃口越来越大，这就像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克鲁奇纳。戈尔巴乔夫建造别墅的兴趣一直到他任职的最后日子始终未减，他在官运即将结束时还兴建了几项工程。

戈尔巴乔夫演讲需要很多人起草讲话稿，但是国家别墅里没有适合总书记和夫人住的体面的地方，因为在后期他们亲自参加一些最重要的讲话的起草工作。去扎维多沃路途太远，况且最近一个时期也不安全。于是为便于总书记对讲稿进行最后审定，决定在沃伦斯科那原来斯大林别墅附近再建造一座别墅。这座新建筑是一座别致的宫殿，里面有供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警卫用的单独套房，有供集体和个人工作用的宽敞的会议室。这里有很多专为助手和顾问使用的宽敞的房间，还有普通工作人员、打字员和速记员专用房间。别墅内有宽敞明亮的餐厅、台球室、打字室和复印室、现代化的通讯联络设备——一切都是为了起草鼓动人心的讲演稿。1991 年夏，别墅里先后运来家具和厨房用具，购置了各种进口设备，为在这个新思维的城堡里开始庄严的创作活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然，这座设计考究、建筑豪华的别墅用于戈尔巴乔夫进行创作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时代变了，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精力去讲演了，他的那些“笔杆子”也都相继离去。

雷日科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时，戈尔巴乔夫就想方设法把总理、所有的副总理和部长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赶出克里姆林宫政府大楼。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一次雷日科夫说，他决不当被撵出克里姆林宫的总理，国家政府历来设在这里，很难说这件事与雷日科夫下台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任命帕夫洛夫任总理并批准他的内阁后，戈尔巴乔夫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政府搬到普希金大街上的一幢大楼里。这样一来斯大林在二层工作过的办公室腾出来了，戈尔巴乔夫随时可调换办公室，他可以占用所有的房间。

1990 年底，戈尔巴乔夫把尤·谢·普列汉诺夫、克鲁奇纳和我则到他那里，拐弯抹角地说了一大通，中心意思是应该把二楼按苏联总统的规格重新装修。他看着自己的办公室，描述他隔壁的那些房间，什么应该保留，什么应该改装。至于三楼他现在的办公室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室，应该改建成外宾

接待室、电视演播室和小工作间，其它房间改成住宅。住宅里应该有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

我和克鲁奇纳长时间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极为不安的是克里姆林宫里又要出现一套个人住宅。克里姆林宫里有列宁的一套住宅（现已成为纪念馆）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当时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住在克里姆林宫；第二，除了这里的房子他们再没有别的住宅，大部分人也没有别墅。为什么现在要给总书记—总统在克里姆林宫院里搞一套住房，这是根本无法让人理解的。我们想可能是出于一种考虑，戈尔巴乔夫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改乘防弹的“吉尔”轿车，下令加强警卫护送，尤·谢·普列汉诺夫还采取了其他安全措施。但他还是觉得躲进克里姆林宫里保险，因为那里驻扎着一个警卫团。现在戈尔巴乔夫上班的路上看到的到处是同胞们仇视的目光，他不想看见他们，上下班都乘防弹车。

如果说安全问题无疑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改建克里姆林宫这座独一无二的历史建筑遗迹的问题则更加重要。在这件事上免不了要同文物保护协会和舆论界发生冲突。

我同克鲁奇纳讨论了这些问题，认为不可能阻止这一方案，唯一可行的是找个得体的借口拖延开工日期。理由是非常严肃的，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里面很多地方不是随便可以动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催促尽快给他拿出新房间改建方案。保安部门及专家开始准备方案。一个半月以后，准备好的方案送给戈尔巴乔夫，尽管从来都很难理解他是否满意，“同意”还是犹豫，但是这个方案他大体上同意了，因为他对方案提出很多修改意见。第二个方案没作大的改动就通过了，保安部门和办公厅开始具体实施。大概八月事件改变或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据我所知，老广场苏其中央大楼总书记办公室的重新装修方案也停了下来。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整个第五层都成了总书记的官邸，当时强迫所有的人都搬出了这层楼，还把外宾接待室改成了电视演播室。

这样的改建装修是总书记—总统工作中最有成效的一个方面，要不是形势严峻，可能还会看到他在建筑方面的更多创新。

## 反对腐化的斗争

特权当然不只局限于前面所说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通常都有外出用的豪华“吉尔”轿车。家属乘坐的是家庭专用的“伏尔加”轿车。供赖·马·戈尔巴乔娃乘坐的专车有卫星通讯设备，后面有卫队专车。总统的子女也受到卫队保护。

医疗服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领导人及其家属都享受免费药品。总书记可以免费镶金牙，安装齿桥和假牙等。

特权还表现在远程旅行的交通工具方面。政治局委员不论是公务还是休假都免费乘坐带有各种设备的专机。葛罗米柯喜欢乘坐挂在特别快车上的专用车厢去海边，喜欢透过车窗观察我们国家的实际生活。领导人出国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差旅费。戈尔巴乔夫让他的夫人也拿差旅费，尽管保安人员对总书记—总统在国外的起居有必要的保证，而且接待方面也同样保证各种需要。这件事主要不是说明他们贪财，而是说明他们已渐渐地适应了市场关系。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通常用这些钱购买贵重物品。

当然，领导人享受的各种服务很难一一列举。例如，有许多特供点、内部服装店和内部商店，政治局委员及其家属可以在这里买到所有的进口商品，实际上不受数额限制。警卫部门的领导人经常抱怨，进口货卖得太快，装满货架越来越困难，因为外汇很有限。当然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也不是都一样，他们中很多人是俭朴的，值得人民敬佩。

1988年起对干部特权的批评越来越激烈，戈尔巴乔夫好长一段时间不表态，犹豫不决，不敢触动那些基层干部的特权，但是最后不得不撤掉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餐厅。同时还解决了使用克格勃九局别墅的问题，当时决定政治局委员转到各部委别墅，中央书记转到中央别墅区，部长会议工作人员去自己的别墅，而谢瓦尔德纳泽则转到外交部别墅，据说，这座别墅从战前就没修缮过。腾出来的国家别墅都分配出去了，转交给了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一些劳动集体。半年以后，尤·谢·普列汉诺夫去看转到别人手里的那些别墅，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呆了——进口卫生设备破烂不堪，壁纸脱落，木地板裂开。

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不再享用苏共中央预算拨出的伙食补助。南方大部分官邸都转给各部门，不再归警卫部门管辖。“家用汽车”、卫队和进口商品分配方面也发生变化。最后戈尔巴乔夫以整顿秩序为名先是用定额限制自己的战友购买商品，后来干脆就不准他们去购买了。享受这种权利的只有他一个人，当然还有他的家属，后来，必需品开始凭卡供应，这对戈尔巴乔夫一家更方便了。

新闻界有不少传闻，说戈尔巴乔夫的西装是服装店著名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制作的。全部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他穿过的那些西装均由库图佐夫大街上一家裁缝店的两个小伙子缝制的，他们技术高超，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用进口的或国外买来的面料迅速而高质量地把总统“包装起来”，使他达到世界水平。我曾把里根和后来布什的西装同戈尔巴乔夫的服装进行比较，我发现美国没有这样的好裁缝，或者说雇佣这样的裁缝太昂贵。至于赖·马·戈尔巴乔娃的服装，基本上都是“舶来品”。

我再重复一遍，我过去和现在都赞成总统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过体面的生活，他们也应当有体面的收入，但议会应该规定他们的工资和各种特权。这些要有法律根据，而不要像过去那样瞒着人民。

1990年底，移交别墅、国家疗养院和休养所的工作已结束，当时戈尔巴乔夫决定把皮聪达的别墅赠送给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谢瓦尔德纳泽对政治局不参与解决别墅问题感到奇怪和气愤，他说不应该处理属于其他共和国的尤其是地处古老松林里的财产。早在赫鲁晓夫开始修建别墅时，就有很多闲言碎语，为什么现在又要掀起这种烟雾？（当然，把别墅给格鲁吉亚这件事比把堪察加地区几千平方公里的俄罗斯大陆架“拱手送给”美国更重要。自己的东西总是最宝贵嘛）由于谢瓦尔德纳泽不同意，戈尔巴乔夫也就不再坚持了。他明白不该一个人支配国家财产，这样做会有人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的欲望仍没有减退，有时戈尔巴乔夫还是对普列汉诺夫说：把某某别墅转交给外交部。但是他喜欢的别墅仍然自己留用，比如扎维多沃别墅仍由他管辖，尽管国家要为此花很多钱。

通常有数百人为首长服务，前面说过，每个别墅里都有厨师、服务员、清扫工、花匠等工作人员，这些人都有军衔，千方百计为上司创造舒适的条件。但是他们在一些家庭受了多少委屈却很难说清。服务人员纷纷离开一些

领导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并嘱咐其他人不要接近某某领导一家人。

当然也不都是这种情况，很多家庭始终很尊重为领导人服务的人的劳动。据我所知，今天仍有人保持着互相留恋之情和友好关系。

80年代末，由一些人民代表组成的“为正义而斗争战士”小组打着民主化的旗帜对管理系统的工作人员展开了猛烈攻击，他们成立各种委员会，揭露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要求取消为中央和部长会议开设的专门商店和食堂，取消公车、公家别墅、机关疗养院、医院和专门建造的宅邸，以及他们所没有的一切。但是他们又勇气不足，只批评那些中下层管理人员，不敢反对高级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特权。他们没有注意到，类似的专门医院和疗养院不仅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卫生部第四总局有，很多工厂、矿山、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都有。所有这一切可以视为一种原则立场，要是他们今天仍保持这种“批评”立场，报刊还像五年前一样继续揭露首长们的特权就好了。

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文章。那些激进委员会成员自己及其一伙一占到纳税人的钱带来的“好处”，就一言不发了。但应该指出的是，新住户认为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过的别墅很俭朴，那些反特权战士对带有住院处和疗养院的中央专门医院已不感到不安。特供商店照样存在，高级首长专供的食品今天照样挨门挨户地送到家中和别墅里，家庭成员依旧享用公车。

“民主派批评家”立场不能始终如一，他们垂下了眼帘。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为过去的行为而难为情，而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为人之道是“君子不念旧恶”。

我应该说明，我不认为上述特权有什么可指责的。全世界到处有管理机构，而且各国都千方百计让机关工作人员珍惜自己的位置，尽职尽责地工作。问题在于，如果一切照旧，五年前人们干嘛要那么折腾呢？

### 党的领袖们的作息制度

自从国内形成行政命令式经济管理制度后，领导人就没有正常工作和休息过。这个制度的特点是一切都要由中央控制，因此随时随地要把握住操纵杆。领导国家也按这种办法，国家机关就是握操纵杆的。于是领导人废寝忘食，一天工作14~16个小时，以至更长的时间。革命后是这样，战前和战后也是这样，改革的年代还是这样，只是在停滞时期稍稍有些不同，不过也只是重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及其小部分战友不这样做。不管是斯大林、赫鲁晓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从来没有正常休息过，也没有正常工作过。早在20年代，斯大林每年夏天都要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疗养院休息和治疗。20年代初他开始有私人医生，到专门医院看病，他患有有关节炎，易患感冒和咽炎。和所有休假的人一样，他也有一个疗养证，不过他常常使用其他姓名。对他和对所有的人一样，开治疗处方，对每次沐浴和治疗过程都有记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茨哈尔图博和其他地方有了别墅。在高加索的任何地方他都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他经常一个人去休假，妻子死后他变得更加孤僻，很少消遣娱乐，尽管他也是个不错的猎手。他的主要“爱好”是搞政治斗争、阅读文件、解决各种政治、经济和国际问题。

30年代中期，每逢夏季星期天，莫斯科的领袖们都在别墅里休息，到森林深处野餐。这是当时一种流行的休息方式，他们经常不用邀请同家人一起

去聚会。草地上铺好小桌布，这些从前的领袖和家人们团团围坐在一起。每逢星期天，党内老同志都到斯大林那里去，讨论各种问题，谈论文学、艺术和日常事务，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地位、上下级关系和镇压的病毒把这些人分开了，大家不再叫他的绰号和家里用的名字，而是正式称呼他“斯大林同志”。甚至伏罗希洛夫这位大概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战后也不用“柯巴”、“索索”这些爱称来称呼他了，而是改称“亲爱的、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还有一大堆美化领袖的华丽词藻。但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在二三十年代并不是这种情况。

30年代末，即战争前夜，工作制度更加严格，斯大林经常工作到晚上10~11点，有时工作到第二天早晨。那些年在加紧研制许多新型武器、修建国防工厂、安排生产大批现代化坦克、飞机、大炮和轻武器。

战争年代是非常时期，领导人几乎不分昼夜地工作。这种彻夜不眠使人极度疲劳，斯大林也是夜不能寐。实际上当时全国上下都是这种状况，这确实是极其异常的情况，而且的确延续了很长时间。

赫鲁晓夫上台后并没有马上改变这种习惯，因为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现状了。但是赫鲁晓夫打破斯大林的神话后，把从前所有他的象征物也全部铲除了。在赫鲁晓夫时代，官员从早晨8~9点开始工作，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从10~12点才开始工作，我记得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不合理。然而总书记自己却作出了榜样，每天9点之前按时上班，强令其他人也执行新制度。

赫鲁晓夫的确以好动驰名，他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邀请各界人士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旅途中他也不放过消遣的机会，但是他的作息制度多半具有自己的特点。问题不仅仅在于总书记，重要的是政权机关的全体人员都应按新的制度工作，这将对许多管理机关和企业的工作产生有益的影响。那时候中央书记9点之前准时上班，有时还更早。前面说过，苏斯洛夫是步行上班的，很多党的工作人员也效仿他。

斯大林死后，国家领导人的休息制度也进行了调整。赫鲁晓夫委托伊里切夫每星期四把所有的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召集到列宁山上的综合体育馆观看文艺节目，经常给他们放映新的国产和外国影片，让他们在这里会见文艺界人士。当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决定还在游泳池搞了一些保健设施，总书记关心最高机构成员的健康状况，努力使战友们增强体质。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很多人都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他们的医疗服务那时才刚刚开始臻于完善，到叶·伊·恰佐夫主管卫生工作时达到最好水平。这样做还因为当时中央书记的别墅里实际上没有游泳池，再说这些别墅全是革命前或战前建造的，到后来，凡是没有游泳池的别墅设计方案都不予批准，而当时一切都比较朴素简单。

赫鲁晓夫出差时也喜欢打猎，只要有会他他便一大早坐在那里等候着猎物的到来。当时一般不使用了望台和动物诱饵，如果使用这些东西也只是为了那些短期逗留的贵宾们，后来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一班子人都爬到了望台上去打猎，拥有各种难以想象的方便设备。打猎爱好者们常建议赫鲁晓夫去“打野鸭子”、“打野鹅”和其它野禽，他们写信告诉他什么地方又发现了熊窝。我不知赫鲁晓夫对这些建议作何反应，但是很显然，他们邀请他是指望这位打猎迷能动心并一起去。

一次我发现肖洛霍夫的一封信，他邀请赫鲁晓夫到顿河一带去打小鹌。肖洛霍夫的信写得真是精彩至极！他生动地描绘着即将开始的这次狩猎活



动，我仿佛看见了南方炎热的草原、针茅和一群群小鸟，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肖洛霍夫信中介绍飞抵罗斯托夫州需要多少时间，再用多少时间能到达鸟的栖息地，描述了等待猎人的将是怎样的快乐。我不知道那一次赫鲁晓夫是否跟肖洛霍夫一起去打猎了，但是他显然喜欢这样度过时光。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可以休假一个月，赫鲁晓夫通常去海边。中央书记还可以到疗养院休养，当时还有很多得到疗养证的人在这里恢复了健康。我曾同谢列平、波利扬斯基和库纳耶夫一起去休假，尽管这在当时是不常有的事。

休假时国家领导人经常会见，一同吃饭和游泳。我认为，当时这是开始恢复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班子的作息制度更加灵活和宽松。当时中央政治局起草决定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作息制度。勃列日涅夫在工作的头几年都是早晨 9~10 点之前上班，经常半夜结束工作，过了不久他便经常到别墅去看“新闻”节目，白天经常休息。后来勃列日涅夫就像“阴雨天的太阳”很少去上班了，根据所通过的决定，他可以一天工作 4~5 个小时，还有工间休息并明确了每天结束工作的时间。当然他也可以 12 点来上班，他每星期休息三天，一年有两个月的时间休假，也可以在冬天休假。决定规定，年满 60 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可增加休息时间，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保持年迈领导人的生命力。勃列日涅夫很快搬进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变得不大容易接近了。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也仿效他改变了工作制度，爱好打猎的人星期五就纷纷去了猎场，那里已为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勃列日涅夫经常叫上自己的亲信一同打猎，他很精通此道，常常和猎手们一起专扛驼鹿或野猪。他经常搞这种活动，有时也邀请库拉科夫、波利扬斯基等人一起去打野禽。

我讲这么多丰富多采的休息方式，并不是想否定许多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各部部长所做的大量工作，他们确实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工作，从不计较时间。

安德罗波夫上台以后，作息制度有些变动，实际上这是要约束那些工作自由散漫的人，规定要按时上下班。

这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严厉时期，契尔年科上台后一切又都“恢复原状”。契尔年科本人过去工作时间很长，后来由于身体状况他不能长时间工作，经常要去医院看病，这当然也影响到大家的作息時間。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一开始他的作息时间没什么变化，他和过去一样早晨 7 点起床，散步、游泳、看报，8 点半车到别墅接他，9 点钟他已经上班了。新职务当然也增加许多工作量，每天工作安排得满满的。早晨他见中央总务部部长卢基扬诺夫，他送来苏共中央收到的各种文件。这些文件非常多，信息量很大，内容广泛。当时戈尔巴乔夫对呈报给他的所有文件都要看一遍，这些文件都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桌子上一早就堆满密码电报、国内各种事件的简报和其他材料。大概所有安排的活动结束后他都再见一次卢基扬诺夫，再后来的活动就是临时安排了。除接见外宾（他很喜欢见外宾）的时间外，谁都不知道总书记的工作日程。至于那些想求见戈尔巴乔夫、向他报告国内问题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的毅力了。早晨接待室的电话铃就响起来了，很多人来电话问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接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也等待着总书记的接见。对有些人戈尔

巴乔夫很快就接见了，而对某些人有时故意拖延几个星期才见。他最常接见的是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书记，商量新干部的任命问题。总书记是易激动的人，他不能长时间地做一件事，很快会“烦躁”，经常转移注意力。接见来访者时，他会打电话谈一些与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的事情，别人不得不听他打电话。有时他竟回忆起往事，谈起他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工作。中央书记本来只想谈几分钟，但可能在戈尔巴乔夫那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我有时在他那里一呆就是五六个小时，身不由己地坐在那里听戈尔巴乔夫长谈，参加他同政治局委员的会见。一般情况下，他们一来我便起身准备去接待室等他们谈完话，但戈尔巴乔夫经常把我留下：

“你别走。”他说。

我不知来访者是怎么想的，可我自己觉得很不自在。来访者一走，戈尔巴乔夫就安慰我说：

“瞧，我们就这么快把他打发走了。不然他们一来就会给我提一大堆问题。让他们自己去干吧。”

总书记除了阅读密码电报和有关自己活动的材料外，还喜欢阅读和修改他同外宾的谈话记录。经切尔尼亚耶夫审查过的记录他也进行修改，删掉某些东西。

每逢这时他就说：“没必要得罪人，我们那些顽固分子不懂得思维的艺术。国际政治是极其微妙的事情，不是谁都可以搞的。”

他还有一种爱好，那就是修改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文章、著作，他如此陶醉于修改材料，专心致志，而自己还不明白他已完全把内容改走了样，已远远地游离了他提出的想法和任务。

“这才是辩证法。”他对自己和在场的人说。

“你们知道吗，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的情节特别注意，有一次他问作者：‘肖洛霍夫同志，为什么格里戈里·梅列霍夫没有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没有留在红军里？’

“肖洛霍夫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我是想这么写，可是梅列霍夫不往那儿去。’”

这个故事戈尔巴乔夫给我们讲了大概数十遍，后来他得出结论说：

“这里需要逻辑，需要生活的真实。既然文章内容变了，那说明这个内容是不完全的，应该按照逻辑发展去写。我要是没有弄清楚逻辑关系，那我既不写文章，也不发言，因为肯定不成功。”

遗憾的是总书记的“生活逻辑”常常取决于他的情绪。第二天他又出现了更合乎逻辑的想法，总书记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他平常总对我说：“你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净讲些报纸上兜售的刻板东西。”他还教训我，“这可不是给《真理报》写东西，应该更有根据，更深刻。”

有一次我忍不住反驳了对报纸工作者的这种责怪。

“《真理报》不是最不好的报纸。我记得《真理报》发表您的文章时，顺便说一句，这都是在报界工作者的帮助下发表的，那时您曾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和感谢。”

戈尔巴乔夫惊奇地扬起眉毛，脸涨得通红，但他还是忍住了。总的说他不喜欢记者，有一次，在为总书记准备他即将在家乡发表的讲话稿时，我想吸收一些当地报界工作者参加起草工作，戈尔巴乔夫反对说：

“不要请他们，这些人只会溜须拍马，没什么用处。”

很难同意他这种看法，我对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些报界工作者非常了解，他们很精通业务，我曾仔细观察过他们的工作，曾经想把一些人调到《真理报》编辑部。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每天都搞文字工作，这使他不得不放下很多其他事情。他总是匆匆忙忙地、不太情愿地接见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实际上不会见部长和其他经济部门领导人，我认为，他是知道自己不太内行，不想承担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身边的人曾打算安排他同部长和其他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定期会见，但是毫无结果。如果我们请求的次数多了，他就说：

“那好，就召集部长们开会吧，让他们汇报各部的工作。你们通知部长会议，让大家拿出意见来。”

“但是这要您给雷日科夫打电话，亲自同他商定。”助手们对他说。

戈尔巴乔夫不情愿地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接通了电话，于是开始了长时间的讨论：邀请谁参加，什么时间开会，会议的目的是什么，由谁作综合报告等等。日期一推再推，往往拖得原来的问题已不那么迫切了，又出现许多新问题，最终一切都无声无息地不了了之。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中，我不记得他主动邀请过哪一位部长，听听他的意见，他从没有认真地考察一个人的能力，给他以支持和帮助，只有两三个他早就认识的部长例外。而且对他们也并不友好，甚至对那些他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并且也接受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的人，他的态度也不友好。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布加耶夫的电话很不耐烦，布加耶夫是民用航空部部长，戈尔巴乔夫知道他同勃列日涅夫关系很密切，因此一直同他保持密切关系，至少他经常同他互致问候，也收过他的礼物。第四总局管理局局长恰佐夫也不像以前那样受宠了，戈尔巴乔夫对他越来越不满。

“院士又要到国外去学本事啦！”戈尔巴乔夫一边在中央书记处关于恰佐夫到国外出差的决定上签字，一边说，“他自认为是一个政治家，在国内得了那么多奖章、称号和职务，现在又要到国际舞台上...”

戈尔巴乔夫对恰佐夫的声望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器重一直耿耿于怀，他三番五次地说恰佐夫已经老朽无用了。

“多少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都已长眠于九泉之下，可他却还在干，可又不干自己的事，只是到处兼职。必须给他安排些实实在在的活。”戈尔巴乔夫说。

不久大家看到戈尔巴乔夫在寻找借口赶走恰佐夫，任命“自己的人”担任这一职务。后来他根据苏斯洛夫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了出路。

有一次他说：“我想任命恰佐夫为卫生部长。让他干干吧。尽管我相信他不会同意这个任命。显然他早已明白应该离开。我看他正在搞一个心脏病治疗中心.....”

戈尔巴乔夫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免掉恰佐夫“克里姆林宫卫生局”局长的职务，免得引起闲话。因此他认为“赶走”恰佐夫的最好办法就是晋升他的职务。

我不记得戈尔巴乔夫是否请恰佐夫到中央同他进行过单独谈话，但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给恰佐夫打过电话。他对医学事业无人过问、人们报怨看病难发了一通牢骚后对恰佐夫说：

“请你帮助推动推动这项工作，保证给你提供各项援助。”

当时恰佐夫可能拒绝了这一请求，反正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戈尔巴乔夫请他再考虑考虑。或许恰佐夫已经明白总书记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他了，于是他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请求，认为提职后离开总比留下来只当个心脏病治疗中心的领导人要好，况且这个职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免掉。

就这样，恰佐夫当上了苏联卫生部长，运用自己学者和组织者的经验推动国内卫生事业。我不知道总书记是否履行诺言、给予恰佐夫帮助，但是他并不想让他长期担任这个职务，尤其是恰佐夫出车祸后，已不能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地工作了。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对这个问题也不那么感兴趣了，他已经把恰佐夫赶出为国家领导人治疗和保健的系统。

我再一次确信，戈尔巴乔夫和很多政治家一样，友谊的感觉已经淡漠了，当然，要是他们有这种感觉的话。一个用不着的人从戈尔巴乔夫的视野中消逝了，尽管他在很多方面应该感谢恰佐夫，因为恰佐夫不仅是领袖们的医生，而且还是他们所信任的人。我多次听到戈尔巴乔夫同这位院士的谈话，他们不仅谈领袖们的健康状况，而且还谈最微妙的干部政策问题和政治局内的力量分布。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戈尔巴乔夫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把握分寸。

戈尔巴乔夫决定撤掉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时，克鲁奇纳、雅科夫列夫和我多次请求他不要这样做，不应该破坏和毁掉已建立的制度，而要想办法扩大服务对象。但是反特权代表委员会的压力使意志薄弱的总书记非常恐怖，他不明白批评的矛头不是针对卫生系统，而是针对党和政府机关，要削弱这些机关并把一部分人赶走，以便安插更合适的人，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自己想进入这个系统。我看很多人最终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不再折腾了。

总书记不仅对周围最亲近的人态度冷淡，对自己的老乡也是如此，有时竟表现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冷酷无情。有一次主管苏联农工管理委员会的弗·谢·穆拉霍夫斯基来电话，他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人，担任过苏共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参加过卫国战争，曾在各级党和苏维埃及经济部门工作。他从青年时代就认识戈尔巴乔夫，而且同老乡的关系一直未断。

穆拉霍夫斯基在电话里说：“我收到一封信，是‘列宁遗训’集体农庄主席科普利科夫写来的，你大概知道吧。”

有关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科普利科夫的情况我听说过。“列宁遗训”集体农庄也以完成高指标而闻名斯塔夫罗波尔。农庄主席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把农庄搞成了先进单位。他们在盐碱地上夺得大丰收，而且完成的其他指标也很高，特别是养羊业。

“出什么事啦？”

“不知他得罪了什么人，现在把他关起来了，说他在单位干私活。罪名还有集体农庄经费超支、主席以权谋私等。如果依法进行侦查也就罢了，可是他们对他进行拷打。你看看这封信，请设法报告戈尔巴乔夫。科普利科夫是他提拔起来的。戈尔巴乔夫提拔他为农庄主席，而且后来在生产上给过他很多帮助。”

半小时以后我收到了穆拉霍夫斯基派人送来的信。我读着这封信，竟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不仅把这位著名的农庄主席、党的边疆区委委员关了起来，而且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没干的事。还特意将一些灭绝人性的人关到他的囚室，这些人往死里打他。总之他们打坏了他的肾，他成了残废。

我读着这封信，字里行间渴望着援助。我立刻去找戈尔巴乔夫，好在就

他一个人。

“又出什么事啦？”他问，并继续读他的密码电报。

“您认识科普利科夫吗？”

“是‘列宁遗训’农庄的吗？”戈尔巴乔夫问道。

“他被关进监狱，成了残废，您听说了吗？”

“没有。”

“请您看看这封信。”我把那封信递给戈尔巴乔夫。

“你就说是怎么回事吧，别再塞给我那些废纸了。”

他没有看这封信的意思，我便极其详细地把科普利科夫的遭遇转述一遍，其间还夹杂着自己的评论和建议。我希望他能从这一野蛮的事件中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不应限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领导人的经济活动自由，不能迫害他们，更不能用残忍的手段对待他们。要以此为例指出，护法机关不能用刑讯和其他犯罪手段逼供，但是戈尔巴乔夫听我说完后非常冷淡地说了一句：

“你去和伊万谈谈。”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博尔德列夫当时是苏共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未必不知道这位著名集体农庄主席发生了什么事。戈尔巴乔夫看我迟疑不动，接着又问道：

“你还没说完吗？”没等回答，他又埋头看起电报来。

我退了出来，总书记对一个人的遭遇如此漠不关心使我不知所措、而且这个人又是他非常熟悉的人，此人刚担任农庄主席时，总书记曾对他的工作给予帮助。科普利科夫也表现出工作能力，在生产中进行多种革新，以此帮助提高边疆区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威信。

当然，我没有耽搁，马上给博尔德列夫打电话，但是谈话很不顺利。显然他已经知道科普利科夫的事，可能他也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报告，因此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我将派人研究此事。我对谈话结果不满意，后来又给苏联总检察长打电话，恳请他不仅要搞清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还要采取措施。没有总书记批示，我只能做到这些。

法院的干预奏效了，案子有了结果，但是这一重大事件的结局对为农庄工作付出很多心血的科普利科夫来说是很悲惨的。他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对谁也不相信了，他被开除了党籍。他可能记恨那些在困难时刻抛弃他的人，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已经说过，戈尔巴乔夫奉行的原则是：“人一走，茶就凉。”

有一次、我对他说，他的老乡打来电话，我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这时他突然回答说：

“你凭什么断定我同所有的斯塔夫罗波尔人关系都好？以后没有我的话你什么也不要做。”

但是从边疆区来的所有信件我仍旧呈报给他，不过返回来的信件大都没有他的任何批示。我问如何处理这些信件，他气愤地说：

“不用处理。”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曾试图把总书记、后来的苏联总统的活动日程作正规安排，但是一切尝试都失败了。改革设计师不仅听不进建议，还把这些建议视为篡夺他的权力。

他这个人很容易烦躁，思想不集中，在向他报告情况或者他同中央书记

会见时，经常突然低下头看电报，使人觉得他已经忘了他正在进行会见。他的思想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本收不回来。他经常匆匆忙忙结束谈话或者（像是对着我）开始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使命的评论，这种东西他有时会读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大量的文件还没有看，于是他把这些文件留下来带回别墅去看。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准备出差或者不改写报告，不在这些报告中寻找逻辑和生活的真实，那么他每日的工作通常是杂乱无章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第一年始终在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他经常请有关学者来，听他们对改进国民经济工作的建议。这些会议上主要讨论财政—生产问题，没有人想到在政治制度上进行重大改革。这方面考虑最少的是总书记，他是党所信奉的学说的纯洁性的主要捍卫者。因此各种会议和中央全会讨论的是一些组织和技术革新问题。当时曾筹备召开加速科技进步和加速各工业部门革新的会议，这不是偶然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出对社会经济进行深度改革的配套方案，但只说这些是不够的。当时根本没有一个稍微完整的改革计划，大概只有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的某种轮廓。

戈尔巴乔夫通常在中午1~2点进午餐，他吃饭的时间一般只用5~7分钟。总书记经常说：“请等一会儿。”然后走进休息室赶紧吃些东西。

他很快从休息室出来，如果有请来起草稿件的人，他们就一同工作，不过总是无精打采的，经常走神。有时午饭时间长些，那是戈尔巴乔夫要休息或请医生来给他做按摩。通常他每天要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进行五六次谈话，赖莎对他的计划和工作情况非常了解。

晚上他阅读各种参考消息和文件，但是经常放下手中的文件，大声阅读那些对自己工作成果的评论。如果觉得这样还不够，他就把这样的材料带走，显然是读给家人听。

如果没有什么急事，总书记吃完晚饭后8~9点钟回家。回到别墅后马上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散步，通常散步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然后又伏案工作。散步时经常出现一些想法，夜里11~12点，有时还要晚，总书记经常打来电话，委托我在他早晨到来之前办些事情，经常突然指示安排一些早晨的活动。他也常在这个时候给中央政治局委员打电话，但是大多数战友却不敢给他往别墅打电话，他一次就教训得他们永远不敢再这样做。

有一次他非常气愤地说：“这是什么风气！白天找不到他们人，一到晚上电话响个不停。葛罗米柯夜里总要跟你谈话，其他人也不停地来电话。应该认真谈谈这个问题。我以后不再接电话了，要么更换电话号码，谁也不告诉。”

总书记—总统只接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普戈、雅科夫列夫，大概还有我的电话。没人无缘无故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并不是谁的电话都接。我经常打电话找不到他，尽管我知道他会得知有人找他。一般只有他自己打电话时才不会没人接，如果这时你不在电话机旁，那就麻烦了，他会严厉地盘问你在这儿，和谁在一起，为什么不在电话机旁。

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以后，每逢政治局开会他总是提早去上班，会前他认真审阅文件和有关会议讨论的问题的补充材料。11点之前他接见那些会上要任命的干部，这些人通常是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部长及军队领导人。11点政治局会议开始，有时开到晚上9~10点才结束，中间休息一会用午餐，有时中间不休息。

会后，戈尔巴乔夫经常邀请心腹之人交流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言的感想，评论发言中的某些用词，或表示同意或表示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书记不再提前与会了，对讨论的问题也不做准备，显然他觉得自己已经熟悉这些问题了。可是事实经常相反。戈尔巴乔夫往往不熟悉讨论的问题，他对讨论作总结时，经常从别人的发言中抓住一个思想，试图加以发挥，但往往只谈些浅薄的看法，人们心中显然很不满，但又觉得无可奈何，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对开会感到厌烦，开会成了他的负担。

如果没有外事活动，戈尔巴乔夫上班来得越来越晚，却又提早下班回家。当然，戈尔巴乔夫同往常一样，在家里很晚才睡，而且他的睡眠不好，睡得很少。

总书记—总统在克里米亚休假，后一段时间在福罗斯为他新修建的别墅休假。夏季他的假期是45天，但他一般只休一个月左右。最初他冬天还经常到皮聪达休假，但很快就不去了，国内的事态发展不允许也不可能再安排冬季休假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也都仿效他。

夏天休假时，戈尔巴乔夫常常写作，为此他让切尔尼亚耶夫一起去休假，卷宗里还有其他助手写的“草稿”，他那本《改革与新思维》就是这样问世的。西方也出版了此书，该书不仅给作者带来荣誉，还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戈尔巴乔夫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如打猎、钓鱼之类的活动他都不喜欢，尽管他的枪法很好，一次去白俄罗斯的时候我曾亲眼见过。以前戈尔巴乔夫也曾经打过猎，那是在他担任党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当时经常要接待从莫斯科来的贵宾，安排他们休息和锻炼，包括打猎，因此不论愿意不愿意也得打几枪。

戈尔巴乔夫不打网球，也不玩“安静游戏”，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玩政治游戏，显然他认为自己是玩政治游戏的高手。休假期间，除少数人外，戈尔巴乔夫不接见任何人。勃列日涅夫喜欢安排一些“克里米亚会晤”，喜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同行来访，喜欢在海边休息，而戈尔巴乔夫则喜欢离群索居。

不过在这一个月中，经常在休假快结束时，戈尔巴乔夫也把在附近度假的两三对夫妇请来聚会，曾请过卢基扬诺夫夫妇、梅德维杰夫夫妇、雅科夫列夫夫妇等人。他们对我说，这种聚会虽不是正式会见，可并不轻松。休假回来后，戈尔巴乔夫经常同周围人的交流这些会晤的感想，以及他战友的夫人给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把南方的国家别墅分配给各种团体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休假的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常常因安排一个人什么时候、在哪儿休假发生矛盾。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谁也不愿意去普通疗养院。而且享受莫斯科近郊别墅的条件也发生了变比，现在大家只能在机关别墅休假。虽然这些别墅也很不错，但是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昔日生活中那种威严和神秘感已经没有了，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他们是普通人，他们对此感到很突然，因为多少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上司奉若神明。也有人认为，不这样就不能维持长期统治，领袖越独裁、越不好接近，就越能统治长久。

## 改革的末日

已经有两个星期侦查员没有提审我了。说真的，现在我倒想看到他们。我感到俄罗斯检察院好像发生了麻烦事。果然是检察院被盗了，审讯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帕夫洛夫的录像带“跑到”国外去了。西德《明镜》周刊登出了他们交待的详细内容，我们的报刊作了转载。侦查组惹出了麻烦，人们怀疑他们把国家财产私有化并进行倒卖。一些能干的记者对绝密材料是如何从保险柜流失的作了种种猜测，他们善于误导一般人的思路。有人需要这样做，但不是那些被捕的人。金钱未必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多半是用金钱“掩盖”政治行为，把一切归结为刑事犯罪。尽管具体干这种事的人可以一箭双雕，很可能斯捷潘科夫是在执行一项重要指示，那么是谁下的指示呢？

我经过考虑后得出结论：发表这些东西对福罗斯的受难者有利。最近，一些从胜利喜悦中冷静下来的报纸怀疑那个“优秀的德国人”是否真的没有参与八月事件。这有可能引起对他的不信任，而且不仅仅在我们国家。只有在押犯的交待才能挽回局面，看来用欺骗手段搞到了这种交待材料。于是出现一种说法：这是暴力行动，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没有参与此事。不管怎样，只有高手才能完成这种偷窃而又不留痕迹。这只是推测，还有待查证。如果找不到罪犯，世人即使怀疑某些能人与此案有牵连也无济于事。

三天后，我被押着穿过监狱长长的走廊去见侦查员。这些人总算出现了，坦率地说，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走廊里一片昏暗，押解人急急忙忙关上牢房的监视孔，免得有人看见我或者我发现熟人。押解人似乎觉得每个牢房里都有我认识的人。我听到一个声音冲着那些我未见到的人严厉地命令道“脸冲墙，不许转过身来，”他们竟然这样对待同事，也不寒暄几句，也不看看是谁都通通给逼到墙边站着。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发慈悲。现在要同侦查员讲的话多着呢。

我猜对了，这些人愁眉不展地坐在那儿，没有一点精神劲。他们想知道我对丢失录像带的严重事件有何考虑，他们听到我怀疑是“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干的，顿时活跃起来。这些侦查员也不容易，他们自己也明白，他们不过是政治家棋盘上的小卒，在出卖国家机密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指责他们的。总之很清楚，检察院的内部冲突影响到调查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侦查组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留下来的人想了解受侦讯的人叛国的动机：是不是有目的，是不是想夺权。他们提问题无精打采，有时甚至离题很远。我早就发现，他们提问题不是为了了解真相，而是给事先设计好的结论找证据，有用的就记录下来，没用的就不记了。

我不止一次问侦查员、为什么对事实不感兴趣，为什么只相信他的说法？他的说法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和似是而非的东西的大杂烩。当然，那时形势紧迫，现在他可能把很多想象的东西当成现实了。但是应该把这些离奇的东西搞清楚，可现在他们恰恰没有这种愿望。所有涉及总书记行为的问题都被细心地回避了，总是答复说：这是需要专门侦查的问题。对戈尔巴乔夫不问任何不愉快的问题，审讯记录中尽量不提他的名字。按常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他暂时还是总统，尽管他是个不成功的总统，是个威信扫地的人，弄得自己身边的人都起来造反，但形式上他仍是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谁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我认为，这种形势对受侦讯的人也有影响。

总之，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问，但现在提这些问题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侦



查员并不关心口供如何。侦查组的领导对每个人的罪名和惩罚办法早就定好了，我认为，早在审讯之前，有可能在逮捕前就已定好了罪名，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护法机关忠实于俄罗斯的传统，先判决，然后取证，最后进行法庭审理。

这一点我在牢房里就想到了，当改革从促进建设的动力变成破坏党、国家和整个苏联的机器时，就想到了。

这部运转了几十年的社会管理机器还在不停地工作，和以前一样通过决议和决定，但是党和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对制定的措施已经没有信心了。我有时看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的部领导人突然忍耐不住，激烈地有时甚至尖酸刻薄地批评起草的决定，批评国内形势和无人负责完成计划的现象，但更糟的是那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沉默或根本不想发表意见的态度。政治局会议上再没有人害怕批评，批评常常遭到冷嘲热讽。会议结束后，我常常看见有的部的人学着总书记的腔调和手势说应该做什么，于是周围的人一阵苦笑。

我参加报告和讲话的起草工作越来越少，显然戈尔巴乔夫已觉察到我对这种夸夸其谈反感，所以他吸收一些新人来做这项工作，这些人继续不厌其烦地给他想各种词汇，还越来越多地出现外来词。

这位来自边远农村、青云直上的总书记喜欢用莫名其妙的外来词，他能非常快地记住这些词，但有时却不理解这些词的意思。有一次他问我：

“你知道‘吹风会’是什么意思吗？”

我解释说，这是向新闻记者提供消息的一种形式。他又到雅科夫列夫那里验证了一遍这个词的意思。从此以后，“吹风会”一词经常在他的讲话中出现，我觉得他开始用这个词来指各种会议。最近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极力用西方国家语言中的概念充实自己的词汇量，千方百计用这些词来点缀自己的讲话。应该说，听起来也确实漂亮：“应该给农村的劳动者开个吹风会”，“要保证各方在吹风会上达成协议”。总之，他经常用这类词语。

我不隐瞒自己对总书记—总统过分喜欢写文章和发表讲话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我同他谈过不止一次。那还是在1988年的一天晚上，当时戈尔巴乔夫心境很好，可以谈心、谈各种问题，我说，我非常担心话多不值钱。两三年来话讲得太多，从前他的讲话文集被争先恐后购买，现在开始堆在仓库里，在书店的橱窗里摆得退了色也卖不出去。我认为应该少讲话，有新思想时再讲，但是这些话得罪了他。顺便说一句，我同某些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也经常讲到戈尔巴乔夫话讲得太多，这些委员认为只有少说多做才能使总书记摆脱人们的讥笑。

有时我去沃伦斯科耶，看到很多同志在那里辛辛苦苦地写文章，他们缺乏信心，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感到不安。中央顾问小组即从各个研究所调来给戈尔巴乔夫起草讲话和报告的工作人员，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实现总书记—总统讲话中的思想充满热情。况且这些思想一个比一个糟糕，“笔杆子”们心灰意冷。有时候我们讨论某个问题，他们也只谈党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直言不讳。但是当时人们已不害怕谈论错误，不掩饰自己对国内形势的不安和担心。有时同志们问我，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这一切，他是否清楚改革的结局。提这些问题的都是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物，他们看不到真正的变化，渐渐地离开了戈尔巴乔夫，他们不再给他提建议，不再帮助他准备讲话稿。

如果把戈尔巴乔夫讲话中具有感情色彩的话，把改造世界的不实际的想

法去掉，那么会发现这些讲话有许多合理的和健康的论断。不幸的是话讲得虽好，但这位总书记总是以说开头，也以说结束。在创造新词汇方面戈尔巴乔夫超过所有的前任，我认为按执政时间长短来衡量所说的话，他在斯大林以后的领袖中绝对名列前茅。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演讲者，多年以来通过讲话号召群众建功立业，但他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号召。如果说破坏现行制度不需很多智慧和技巧，而且他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绩，那么在建立新制度方面他却觉得力不从心。人民过高估计了他的话，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七年的夸夸其谈不仅没有使国家向前发展，反而向后后退了。

天才领导人和平庸之辈的区别不是看他怎么说和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如何实现自己的话。能够达到预定目标、被人民铭记在心的，只能是伟大的组织者，而不是那些演说家，正是这些组织者才能够实现最宏伟的思想，无论怎样贬低斯大林，人民在公正地批评他杀害无辜同胞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他，这是因为他继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后实现了很多民族思想，建立并巩固了强大的国家，使得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尊重自己。

如果全民族的思想被抛到一边，代之以小贩们“发财吧”的口号，那么从这个时候起，一切将被毁坏，曾经强大的国家和军队会瓦解，生产下降，科学和教育衰退，就会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结果就会导致一部分人狂吃豪饮，另一部分人去喝救济稀粥。要使国家站起来，需要天才的组织者，这些人必须具备坚强的性格，德高望重，两袖清风。

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改革末日的最初征兆的呢？当然这里说的不是具体日期，末日是逐渐到来的，但是可以感觉到了，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言行中开始缺乏信心，在探索新的经营方式方面开始摇摆不定，把失败归罪于别人，害怕承认错误，害怕承担责任，和从前一样到处讲话，通过一些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决定。也许一切开始得还要早些，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们彻底分裂时，一切就已经开始了。但我是在发现戈尔巴乔夫明知国内情况，还讲那些言不由衷、盲目乐观的话时，才开始醒悟的。他越来越希望能有某种奇迹出现，帮助他摆脱困境。

他心目中的奇迹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来自海外的奇迹：“西方会帮助我们。”

“你们以为我到西方国家是旅游吗？”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经常出国旅行辩解道。“那你们就错了。我是去谋求贷款和经济援助。现在正和意大利人进行贷款的谈判，西德银行也准备援助我们。美国人对发展经济联系也感兴趣。在改革的道路上西方不会抛弃我们，那样做对他们不利。我们会得到喘息时机的。我们也需要和平，需要裁军。”

戈尔巴乔夫总是这样解释他在我国经济即将崩溃的时刻到国外出访的理由。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本人相信这些童话，所以他每个月都许诺西方朋友会给大量援助。但是他们只是许诺，却始终不给实际援助。西方领袖们只是牵着那些渴望援助者的鼻子走，期待着这个东方大国彻底崩溃。他们既不需要伟大的苏联，也不需要伟大的俄罗斯。

党内和国内形势越严峻，戈尔巴乔夫同各种运动代表人物的秘密会谈越频繁。他接见民主派，对他们说自己拥护自由、公开性，主张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进行重大变革。然而他又向那些主张渐进改革的人保证，只有苏联共产党才能完成改革，才能始终不渝地忠于列宁的遗训。

总书记看到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晓得有朝一日必须对所做的事情承担

责任，于是不得不投向左翼改革力量，并且在前政敌的旗帜下完成搞垮国家的事业。但是在此之前，他多次在这只即将沉没的船上从左侧窜到右侧，蒙混大家，掩盖自己的真正意图。可能正是这种恐惧心理使他无法意识到自己这些下意识的自救行为的后果，但是旁观者对他这种政治上“胆小怕事”的作风看得一清二楚。

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情况，党内很多人已经感到总书记的很多建议和方案不切合实际，因此常委会和党组织以及中央委员中常常发生分歧。1987年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社会实行民主化的方针，他说，人民和党选出来的代表受机关工作人员领导，而不是受中央委员、执行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成员领导，这种制度必须改变。不过他忘记说明，整个政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即总书记和他的机构统一领导的，首先应该改变的是他的机构。

尽管如此，提出对社会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是正确的。显然应该精简管理机构，赋予这种机构以新的职能。总书记曾谈到工作中的不足，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也顺利地实现了一些有关决定。不久以前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实际上是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完成的，部长会议不过是形式上签署党的机关的很多决定或解决既定行动计划中的个别任务。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政治局要通过决议则必须对各种文件进行认真研究，所以最近几年来苏共中央内成立了一个庞大的专家机构。中央机构中不仅有负责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组织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而且还有熟悉机器制造业、建筑业、化学工业、农业、经济、科学和教育等问题的部门。中央机构中还有熟悉国防工业、行政机关、国际事务等问题的专业部门。

国内任何稍微重要的问题的讨论和解决都必须经过苏共中央主管部门批准。很多问题的决议草案都由中央各部或书记处主动提交政治局研究并作为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通过。

关于干部问题的中央全会开过以后，戈尔巴乔夫委托利加乔夫和中央书记处拟定精简机构方案。制定方案的工作完成了，草案提交政治局之前，戈尔巴乔夫亲自进行审查，并提笔取消很多部门或者将一些部门同其他部门“合并”，精简人员编制。精简机构工作不仅涉及主管所谓经济机关的部门，而且涉及主管党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总书记在审查决议草案和准备报告时，经常邀请参与各种问题讨论的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助手来发表意见，这时他会大声朗读文件，指出那些不妥当的提法，在众人的帮助下提出新的提法。

戈尔巴乔夫对在场的人说：“中央要化学工业部干什么？应该把它撤掉。”

他说的基本正确，但是问题并不在机器制造部或建设部，整个领导制度反映的还是战时和战后恢复时期命令式管理方法的要求。很多地方需要改革，但是改革不能破坏经济，不能使国家倒退几十年。

### 党的分裂的开始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这是战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决议和党的其他文件，并试图解决中央委员会增补新委员的问题。由于党的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忘记了赋予代表会议增补中央委员的权利，因此对这项任务的完成增加了难度。但是，召开

代表会议并在会上通过各项决议的事实本身已经使本次代表会议成为苏共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会议准备通过以下内容的文件：关于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各民族间的关系、公开性、法制改革等等。

1988年年中，党和社会实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很多人接受不了，一部分人觉得这些改革措施太激进、太不寻常；另一部分人又觉得太守旧，结果党内和社会上人们像森林里的蚂蚁一样惶惶不安。各种力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新的派系。公开性使全体人民，特别是舆论界放开讲话。报刊和电视报道的内容有真的，有似是而非的，也有公开的谎言。党的机关生活中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都给曝光了。全国沸腾了，每个共产党员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

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受总的情绪的影响，共产党员首先推举那些能言善辩、敢于批评党内制度的人为代表，结果当选代表中不仅有很精明强干的革新家，也有主要想上电视露面的平民主义者。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代表会议，会上对领导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发言自始至终争吵不休。首先开始发言的是《星火》杂志的编辑B.科罗季奇，他声明说，据他掌握的材料，出席代表会议的领导人当中有人受贿。他这番话立刻使全体代表哗然。一位阿尔泰代表马上请他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当时代表们得出结论：必须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当然科罗季奇是依据侦查材料讲这番话的，后来查明，是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向科罗季奇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乌兹别克斯坦一些州委书记涉嫌受贿，于是《星火》杂志编辑作了上述发言。

对代表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特殊新闻，侦查员早在报刊和电视上对“乌兹别克事件”作过介绍，电视屏幕上多次放映从受贿者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黄金和钱。只不过新的揭发材料没有指出姓名，这才使大家不安起来，因为这样一来全体与会者都背上了黑锅。委员会在调查核实科罗季奇声明时，我又想起我以前知道的许多事情。

关于这个共和国贪污受贿问题说来话长，它与乌兹别克人的民族传统有密切联系。乌兹别克人总是向客人赠送礼物，贵宾就更不用说了。即使调查最紧张的时候，乌兹别克人也保留着这种习俗，他们仍然坚持说：我不过送一个哈密瓜，一串葡萄。但是这种朴素的传统后来变了样，象征性的礼物变成了“昂贵的馈赠”，当然这与莫斯科来访者有很大关系，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他们自己带着礼物到乌兹别克斯坦，又从那里接受回赠。正是这些贵重礼品的感化，供应物资数量增加，改良土壤的面积扩大，于是有关“共和国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一些工作人员和物资技术供应工作人员的事不断传出。早在70年代末，《真理报》由于对乌兹别克案件的很多内情不了解，身不由己地卷进了这件事的漩涡。编辑部工作人员通过计算发现，每吨棉花的肥料和水的使用量超过标准，这意味着不是利用不合理，就是隐瞒了播种面积。报纸触到了共和国领导人的痛处，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隐瞒耕地的事。报纸还对共和国提出其他批评意见，结果沙·拉·拉希多夫突然宣布当时《真理报》总编米·瓦·齐米亚宁和农业专栏编辑的我是乌兹别克人民的敌人。共和国领导人甚至当着很多莫斯科客人的面也公开这样说。

很多到塔什干出席全国会议的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告诉我，政治局候补委员沙·拉·拉希多夫说齐米亚宁和我是乌兹别克人民的敌人。齐米亚宁到苏

共中央以后，就只剩下我这一个敌人了。当时我很苦闷，主要是我不明白因何受此“殊荣”。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刊登关于棉花（当时称“白色的金子”）生产的文章的意愿，有一次这类文章刚一刊登出来，我就接到中央农业部长弗·阿·卡尔洛夫打来的电话。

“拉希多夫又埋怨了，你们有些地方可能搞错了。”卡尔洛夫笑了笑，接着说，“他认为报纸就会发表文章，报社的人连棉花都没见过。你最好到那儿走一趟，亲眼看看。”他又笑起来。他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当过几年中央第二书记，非常了解那里的习惯，他建议我到“那里”去一趟也不是偶然的。

“文章又不是我写的，这是记者们写的，他们在那里生活几十年，对那里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回答说。

卡尔洛夫继续说道：“那你也应该去一趟，没什么不好的，那儿有很多吸引人的东西。”

我该怎么办？我绝对不能去，尤其不能去一个把你说是人民的敌人的共和国。而另一方面忽视中央主管部长的建议也不太合适，有关棉花的知识我的确只是从书本中得到的，我从未去过这个共和国，但是我尽量拖着不去。直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他说：“你是怎么搞的，不懂棉花，又不想去亲眼看看。净登些外行人的文章。你还是去看看吧。”

“那儿说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去干什么，这不是找倒霉。”我说。

“行了”，别说啦，抽空儿赶快去一趟。”他最后这样说道。

“好家伙，还不把我包围了。”我想着。大概拉希多夫自己也在报界干过，努力想展示共和国取得的成就。但我还是不想去，而且那样做也有失体面，好像我想讨好他们。我继续拖着。

几个月之后，入秋时分，“正巧”有一个去乌兹别克斯坦的机会——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水利化巡回会议预计在塔什干召开。我想这倒是去一趟的借口，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学者中有我很多朋友，我没有跟《真理报》驻塔什干记者打招呼，请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秘书长 r.C.穆罗姆采夫给我订好旅馆，便和他同机飞往塔什干。

四个小时以后，飞机在散发着热气的机场上降落。我同科学院院士们一同向候机室走去，我发现人们纷纷给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洛巴诺夫和副院长让路，却挡住了我的去路。来接我的是乌兹别克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中央一位副部长、《东方真理报》总编等人，他们作了自我介绍，我们互致问候。然后他们建议我去党的宾馆住，接着悄悄地对我说：

“沙拉夫·拉希多维奇在等您。”

我不同意去党的宾馆，对他们说我要和同志们一起到另一个宾馆去，把朋友丢在那里不好。

“我们把您和同志们一起都接去，那里离市中心很近，环境幽静。”他们安慰我说。

我看一眼站在一旁的院士，发现他并不反对，我便同意了。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宾馆。我们安顿下来，几分钟后便同乌兹别克的同志一起前往党中央，来到拉希多夫的会客室。他立即接见了我和他从桌子旁边站起、迎上来表示欢迎。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一种真诚，一种友善和尊重，我的恐惧心理消失了，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说过我是乌兹别克人民的敌人。拉希多夫请我坐下，给我要了茶，然后开始详细介绍共和国的情况。看得出他对这次会见非常高兴，多亏我抽出时间来结识乌兹别克小兄弟。他详细介绍当地情况，提

出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困难，我坐在那里想：该如何理解这一切？要知道他把问题说得比我们在《真理报》上写的要严重得多，既然如此，为什么生气呢？

大约过了 50 分钟，拉希多夫看看表，提议共进午餐。这时已经是 1 点 20 分了，我没有反对，因为我非常清楚话还没有说完。我们走出会议室，穿过楼道走进一个不大的厅，中央书记处成员、部长会议领导约 15 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这是礼仪性的午餐，每天中午 1 点这些人都集合在这里互通信息。桌子的正面和右手的位子还空着，拉希多夫坐下来，请我也坐下。房间朝阴面，挂着百叶窗。我面前的餐桌完全是欧洲式的摆法，淡蓝色的桌布，浆硬的餐巾，桌子上有很多蔬菜和水果，盘子里放着新鲜的奶酪、熏制食品和一些甜食。我一边展开餐巾，一边听拉希多夫讲话：“今天《真理报》编委会成员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到我们这里作客。”四周一片寂静，我清楚地听到前不久还在莫斯科市委工作，现任乌兹别克党中央书记小声说：

“这不是给乌兹别克人民的事业抹黑、诬蔑乌兹别克人民的艰苦劳动的那个报纸……”

仿佛炸弹爆炸了一样，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指责报纸发表的文章，责备报纸有偏见，如此等等，的确像在谴责人民的敌人。当时我已经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了，我站起来，拽下餐巾，准备离开这些人。我又不是来找他们的，我同这些人又没有什么关系。这时拉希多夫伸手把我按下，以略带责备的口气说：

“同志们，我们的客人来自列宁的《真理报》……”

突然，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讲起来，以让人反感的甜蜜声音说：

“列宁的《真理报》，对，这个报纸一向是我们的帮手，我们的导师……列宁的《真理报》，列宁的《真理报》……我耳边响着这些声音。”

情绪变化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我已想不起当时还说了些什么话。我看着中央书记，他慈父般地微笑着，他非常得意的是终于见到了我。这时拉希多夫开始吃东西，并请其他人也吃。上的是红菜汤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的心在发抖，我明白了，他们是想在这里借别人之口教训我。接着讨论我的行程，需要看些什么，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只有我无所谓，我认为反正都一样，因为我哪儿都没去过。我只坚持一点（尤其这场餐桌上的戏之后），要求我的老朋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穆罗姆采夫与我同行。尽管他们不太愿意，但还是同意了。

这次乌兹别克之行使我看到了拉希多夫的巨大影响力和这个家族中的顺序排列，他们也教训了我。但是我还看到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贫穷而非常勤劳的人民的忘我的劳动精神。我看到了在 70 度高温的驾驶室工作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他们握操纵杆的手掌和手指已出现烫伤，我看到了烈日下弯着腰在棉田里劳动的妇女。人民那善良而坦诚的心灵使我明白了很多东西，战争年代他们能够接受从祖国各地疏散来的千百万人并且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别人的孩子，对此我已经不感到奇怪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为此我们将永远欠乌兹别克人民的情。

现在党代表会议上又提起贪污受贿的问题，当然不能不相信某些领导人有不同形式的受贿行为或收了赠品，不能不看到那些以权谋私的暴发户，但不能认为所有领导人和全体人民都这样。那些极善于巧取豪夺的人努力在乌

兹别克斯坦捞取精神和政治资本，不正当手段和不干净的人不可能净化环境。

他们明白，错怪人民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于是转而开始攻击中央各级权力机关，一些与那些肮脏勾当毫不相干的人不仅无端受到怀疑，而且遭到谴责。正如侦查人员说的，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开始时隐时现”，但是当时主要打击对象是利加乔夫。

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战友受到责难并不着急，只要这种指责没有涉及到他本人。他接见了格德良，认真地听了他的汇报、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总书记关心的并不是乌兹别克事件，而是格德良等人是否要翻腾他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历史。至于“乌兹别克事件”，政治局秘密会议上经常讨论，而且作出过有关指示，经戈尔巴乔夫同意追究了某些中央委员的责任，不过后来因找不到足够的违法证据又作了甄别。已经查明，审讯时对他们采用了非法手段。

我当时的乌兹别克之行的确很不寻常，回来后，我还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电话铃响，这是拉希多夫从塔什干打来的。他问我旅途如何，感觉怎样，他还向我谈了这一天共和国发生的事情。我明白拉希多夫认为应多交朋友，不想利用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排挤人。后来他又随便来过几次电话、介绍共和国的情况，这使我陷入了某种微妙的境地。报纸仍然刊登批评材料，未必会有谁认为我回来后变得顺从起来，但是在共和国再没遇到不快。至少没有人抱怨我，而《真理报》的所有文章，包括那些批评文章，地方报刊都及时转载。

从乌兹别克继续不断地寄来数以百计的信件，揭露棉花收购工作中的违纪现象，以及围绕这个问题发生的各种事件，由于不便核实，不能发表。我就把这些信件送交苏共中央或克格勃，有的还呈报给安德罗波夫。不过我从未收到过答复，尽管显然安德罗波夫什么都知道，他到中央后开始加紧调查所有事件，最后导致拉希多夫心肌梗塞而死亡。

今天想想当时的情况和拉希多夫的所作所为，我认为他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相当聪明，没有让民族主义在这个有大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生活的共和国里泛滥，但是他好用权势、生硬粗暴。拉希多夫自己是个记者、作家，因此他器重文人，多年来他在报界有很多朋友，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他经常去找《真理报》科技部一位编辑，此人是他的老同事，或如他所说，是他的“良师”。拉希多夫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领袖中很有威望，他为共和国作了很多工作：修建灌渠和灌溉网，提高棉花产量，发展共和国科技、文化和艺术，进行大规模建设，包括重建地震后的塔什干。这些都是他的功绩，但是他不能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物，不能不受当时全国的风气影响。和勃列日涅夫一样，他也有很多缺点，对那些丑恶不良现象视而不见，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共和国里领导专断、虚报浮夸、贪污受贿成风。我认为很多情况他都知道，而且很多事情是在他表示同意或默许的情况下做的。因此不能说，他是被迫根据当时国内的游戏规则行事，不能这样辩解。莫斯科的领导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滥用职权现象，因为他们对地方工作情况不检查，对共和国暴露出的违法行为不制止，或派那些受到指控的人去调查问题。

这大概还不是这位领袖的全貌，只有时间能够证明，究竟谁对这位重要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的评价是错误的。

而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乌兹别克事件”问题开始妨碍对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问题进行积极讨论，科罗季奇的发难不是偶然的。有人蓄意说党的领导人是犯罪分子和贪污受贿分子，而党是反人民的，是吸血鬼。即使证明不了上述说法，至少能投下一个阴影，让人们怀疑70年来国内所做的一切，抹杀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也找到不少各种“证据”，每件有关机关特权的事实都会激怒听众。代表们要求查清他们的钱都花到什么地方了，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饱食终日”的。

代表们情绪激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新一代共产党员知道了斯大林在30~40年代和50年代初犯下的罪行。对老一辈党员来说这已不是什么新闻，他们或者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或者是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文件、从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了解到的。党的二十大后，中央主席团发出一封秘密信，讲述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团的违法行为。现在这些事又重新出现在报刊上，这是戈尔巴乔夫搞起来的。

1986年底，斯大林时期被镇压者平反委员会关于检察院、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其他护法机关破坏法制的材料呈报给戈尔巴乔夫，这是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成立的各委员会的报告。

第一个委员会由莫洛托夫领导。所有这些材料都保存在中央政治局档案室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无疑都有重要价值，因为这些材料根据新的线索综合了大量的揭发性材料。但是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综合的这些材料不满意，很可能又发现了新的事实，因为调查本身就引起了对证人证词的连锁反应。今天很难非常有把握地谈论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即赫鲁晓夫不信任莫洛托夫，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与破坏法制有牵连。其实莫洛托夫也非常清楚，赫鲁晓夫本人在过去大镇压的肮脏事上也不清白。但还是成立了一些新委员会，由“赫鲁晓夫的人”领导，收集到大量补充材料。

我还清楚地记得60年代初的事情，当时从集中营出来的犯人给苏共二十二大写了大量的信，讲述自己和同事生活中那些可怕的往事。国家安全部和检察院那些被审判的侦查员也写来了很多信，谈了当年如何强迫他们“挖”证词。所有这些信都寄到这些委员会。当时那些原来的犯人写的书已经完稿或准备发表。

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也写了一本书。那些年她经常到伊里切夫那里去，把描写她在古拉格那段时间的书稿给他看。不久这本书开始打印，书中对集中营生活的描写真实可信，使人们大为震惊。但这时对斯大林时期罪行的揭露已近尾声，谢列布里亚科娃的回忆录没能全部发表。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一个专门的部，把所有回忆录手稿和其他有关那一时期的材料都收集起来。

是什么原因使得赫鲁晓夫中止了他的揭发运动呢？

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首先，当时振兴经济，活跃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时期已经结束。赫鲁晓夫给私人副业以致命的打击，对合作社的工作做了很多限制，这对农村和全社会的生活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恶化，粮食供应更加困难。改革经济管理制度的尝试和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没能奏效。

这一时期过分渲染了斯大林在估价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前夕的形势方面的重大失误，说几百万苏联人民牺牲不值得。

赫鲁晓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和对战争没有足够的



准备等事实使人民失去对国家领导集团的尊敬，因此决定停止平反委员会的工作，延缓恢复真相的过程，停止公布当时证人的材料。有关镇压的材料存放在档案馆。

什维尔尼克当年领导的委员会作的笔记非常详细，戈尔巴乔夫也看了这个笔记和其他文件。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对当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十分了解，笔记中谈的事实给戈尔巴乔夫留下深刻印象。

“档案馆里还有没有关于镇压的这类材料？”戈尔巴乔夫问我。“再找一找。”

“只有三个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什维尔尼克的笔记最全。”

他沉思一阵儿问道：

“还有谁知道这些文件？”

“60年代末党的所有领导人和中央委员都知道。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信就是以这些笔记为依据的。至于现在的领导人中有谁知道这些文件，那要去问卢基扬诺夫。”我回答说。

“把文件保存好。什维尔尼克的笔记给我留下，我还要再看一看。”

两三个星期以后，戈尔巴乔夫又谈到此事：

“应该让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知道这些事情。这个由我亲自来做。”

他直接拨通了控制台的电话，听到雷日科夫的声音后问道：

“你现在能来我这里一趟吗？放下所有的事情。”

接着他又给葛罗米柯、利加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打电话。当大家心神不定地被紧急召集到总书记办公室后，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统治时期大镇压的情况，但是这里有些鲜为人知的文件，我想读几段给大家听。”

他翻着什维尔尼克那本厚厚的笔记，读了几段审讯记录和委员会的结论。

我觉得，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次紧急召见、向大家高声宣读这些文件，也不明白总书记的用意何在。只是会见快结束时戈尔巴乔夫才略显兴奋地、简短地说出了自己此举的目的。中心意思是，党和社会还不知道斯大林制度的全部罪行，要接受事实的教训，必须将那一时期的真相公诸于众。但是戈尔巴乔夫没同意向政治局委员宣读什维尔尼克的笔记，他说他要亲自向国家其他领导人介绍笔记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经常把中央书记和党的其他领导召集来，每次三四人，向他们宣读文件中的某些内容。等大家都了解情况之后，总书记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完成赫鲁晓夫当年未尽的事业。那时的与会者当中，大概除了戈尔巴乔夫没有人会想到重新提出镇压问题会使矛头转向党、中央委员和政治领导集团。

索洛缅采夫负责主持政治局的这个委员会，当时他是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有雅科夫列夫、卢基扬诺夫、斯米尔诺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和一些克格勃工作人员。我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面临着给那些在国内生活复杂时期被无辜判罪的人恢复名誉的重要工作。

索洛缅采夫的委员会每个月大约召开两次会议，通过一些保证为被镇压的人平反的重要决定。我们发现被判罪的人太多了，于是作出结论：除证据

确凿者外，应该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至少我同意这种观点，尽管还有些人持怀疑态度。问题是有一些国家最凶恶的敌人、祖国的叛徒和刑事犯也同这些无辜的人一起坐牢。当年曾有几十万叛徒——我们国家的公民——站在法西斯德国一边同苏联人民打仗，他们受到了公正的惩罚。遗憾的是有罪的和无罪的一起被枪杀，还被埋在一起。我的原则是：宁可错误地为一个有罪的人平反，也不能漏掉一个无辜的人。

索洛缅采夫的委员会（后来由雅柯夫列夫主持）做了大量工作，委员会不仅恢复了正义，而且还指出了检察院、法院、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护法活动中的缺陷。情况越来越清楚，司法和检察院工作中的不少缺陷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

很多舆论机关试图把改革年代开始的对过去罪行的审查工作同整个党的活动联系起来，指责党参与这些罪行。在大批判的高潮中出现一种看法，认为今天党还在限制自由，还在迫害无辜。我不是想为党，特别是为过去党的领导人掩饰罪过，何况我的亲属当中也有人被镇压。但是应该主持公道，否则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这样一来真理未必能获胜。反正我认为主持公道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第一，过去遭受镇压的首先是共产党员。第二，改革时期入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战后出生的，他们不了解过去的恐怖，他们真诚地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

党率先举起改革旗帜，它不顾一切困难，扫除许多阻碍前进的障碍。苏联共产党谴责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发动了争取民主化的斗争。大多数所谓民主派都是原苏共党员及其领导人，这一点绝不是偶然的。不仅如此，党还为继续把运动推向前进创造了条件。有人会说，苏联共产党是迫于生活压力才这样做的，事情或许是如此，但是不应该忘记，1985年除苏共外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如此迅速地改变社会发展方针。

从最初几位演讲者的发言中已经感觉到代表会议与会者们富于批评精神，容易激动，许多人发言时非常不讲究用词。所有这一切不仅反映了党内的情绪，也反映了全国的情绪。叶利钦和利加乔夫的发言使代表会议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利加乔夫早已成为舆论工具和舆论界各种民主党派代表发言批评的目标，代表会议也对他提出了各方面的批判。发言的人批评他热衷于用行政命令方法领导党和国家，严格控制报刊，破坏意识形态，不能坚持党的工作原则，等等。实际上他是在替戈尔巴乔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还不大敢碰他）“受过”。

在这种情况下，利加乔夫决定反驳批评他的人，说明事情真相。会间休息时，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不主张他这样做，并劝他不要发言。

“他何必去发言，这只能是火上浇油。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形势。”总书记对我说。

形势当然非常紧张，但我看到利加乔夫仍继续准备自己的发言。助手们来到他身边，带来打好的稿子，他对稿件进行修改后，又送去重新打印。可我当时认为，他只是准备发言，不到万不得已时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我错了，利加乔夫坚持自己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发言的许可。

他在发言中谈了对目前情况的看法，回答了批评他的人，解释了他同叶利钦的关系，与会代表们曾在这方面谴责他。发言是坦诚的，有时很尖锐，

得到了与会者和舆论界的反响。但是他同叶利钦的关系是主题，他们之间的分歧显然早就开始了。我不清楚引起他们不和的全部细节，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这两个人都很固执，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结识多年。如利加乔夫自己认为的那样，他是帮助叶利钦登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教父，可能早在叶利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他们关系中就有了阴影。听别人对我说，他们发生争执的原因是这样的。

当时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农业形势很不好，乌拉尔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很久以来，这里就是从企业家和建筑师中选拔领导干部，他们熟悉自己的业务，但由于各种原因对农业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属于这样的州，大量的信件都证实食品供应存在的困难，但领导人说，他们为工业和国防部门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改进农村的工作，很多人都离开农村到城里工作了。

当时中央农业部密切关注各地区的形势，于是决定研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农业状况，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当地领导人的汇报，并制定改进农业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同意这个计划，中央和其他主管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该州。当时起草一份调查报告，提出几条相当重要的结论和建议，批评州党委工作不得力。中央研究了这份报告，但是考虑到州里有不同意见和照顾当地领导人的自尊心，决定将报告退回苏共州委会处理，为此中央农业部副部长专程去了州里，但是在州委会全体会议上，中央文件受到批评，包括州委领导的批评。

苏共中央收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对中央书记处决议的反应的报告，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是知道当时决定派人同叶利钦在中央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这次谈话要由利加乔夫来完成，他当时主持党的组织部的工作。谈话很成功，利加乔夫非常喜欢叶利钦，他向戈尔巴乔夫谈了这个情况。不久叶利钦被调到莫斯科，主持苏共中央建筑部门的工作。叶利钦到首都后，立即投入工作。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利加乔夫在干部问题上有了很大决策权，于是叶利钦被提名担任党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当时格里申已经结束工作，莫斯科的社会公共事业、食品供应、住房建设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那时需要一个“新”人物，符合戈尔巴乔夫口味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像戈尔巴乔夫认为的那样，一个忠于他的人。

总而言之，换班子的条件已经成熟，精力充沛的叶利钦担任此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同莫斯科腐败的上层人物没有任何瓜葛，这在当时很重要。不过莫斯科人也表示怀疑：怎么搞的，怎么让斯维尔德洛夫夫人领导莫斯科。难道首都没有人了吗，非要一个外来人？但是没人重视这些意见，于是叶利钦当上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叶利钦到莫斯科后带来很多变化，首先是调整干部。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所有领导机构不仅年龄老化，而且对周围的一切已司空见惯。但是当时也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城市供应没有得到改善，还出现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叶利钦也感到了这种困难处境。此时利加乔夫已主持中央书记处，他对各项工作要求很严，可能也有些过头的地方，至少当时叶利钦很少来书记处，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当时还有一个原因，莫斯科撤换干部工作没有带来什么结果，于是又进行第二次干部调整，这引起莫斯科人的极大不满，也使上级领导担心起来，他们开始考虑新书记上台以来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磨擦逐渐加剧，叶利钦感到自己很孤立，周围似乎已形成了一个真空，

使他有时不能很好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经常一言不发，显然他反对这种夸夸其谈、毫无结果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一开就是8~10个小时，中间经常不休息。

1987年夏，叶利钦上书戈尔巴乔夫，陈述自己对改革形势的看法，批评书记处工作不得力，表示他不可能再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这封信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写的。善于兜圈子的戈尔巴乔夫确实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这使人感到沮丧。他有一个习惯：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取得成功。总书记观点的“多元化”使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两派人士都怀疑他的诚意。

有一次，我听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通电话，叶利钦可能提到信的事，要见戈尔巴乔夫。

总书记回答说：“别着急，鲍里斯，我们是得见面，讨论你关心的问题。但现在要纪念十月革命节。今年是70周年，你我都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顾不上这个。”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戈尔巴乔夫转向我问道：

“你知道吗？我休假期间叶利钦给我寄去一封信。他对改革的进程、书记处的工作和其他许多方面都不满意。他还提出解除他在政治局的职务问题。他在莫斯科准备了大批木柴，正在寻找攻击目标。

我当时不知道这封信的事，但是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很多人都想见总书记，想从他那里得到支持或建议。但是戈尔巴乔夫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写作，想方设法摆脱各种会见和具体事务。

关于信的事好像到此结束了。我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性格，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要庆祝十月革命节，而在于总书记想故意拖着叶利钦，不急于处理信的事，杀杀他的气焰，何时自己想见他时再接见，而不是按叶利钦的想法去做。

1987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审查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提纲。一切都平静地、按部就班地进行，戈尔巴乔夫作了报告。会议执行主席利加乔夫问道：

“同志们，还有人想发表意见吗？”

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人想发言，于是准备宣读决议。利加乔夫再次环视一下大厅，说道：

“如果没有人想发言，我们将转入下一个议题。”

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偶然性，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是常有的。戈尔巴乔夫看了看坐在前排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打断利加乔夫的话头，说道：

“好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想讲话。”

我不知道叶利钦是否真的想作补充发言，这一点只有主席团成员才能看得见。因叶利钦坐在第一排，很多人都在注视大厅，可能没看见他举手。

叶利钦站起身，走上讲台。他的发言简短扼要，他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但是接下来开始对改革问题作陈述，他发言的速记记录已经公布，这个速记记录符合讲话内容，而且采纳了叶利钦作的一些修改。他讲话的中心思想是

改革目标不明确，不彻底，中央书记处不胜任工作，有时妨碍事情的发展，没有很好地帮助莫斯科的党组织，它作出的许多决议都墨守成规，如此等等。讲话中有几处谈到了我们这儿有个人崇拜的苗头。他的讲话使与会者群情振奋，把很多人煽动起来，他们纷纷插话，气氛也由此紧张起来。

戈尔巴乔夫宣布休会。我看他满脸怒气，脸涨得通红，极力掩饰自己的懊恼。他努力抑制激动心情，但是说他喜欢让人吹捧倒是正中要害，否则他不会让那么多嫡系上台发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席团成员都准备起来进行反击，此时戈尔巴乔夫却装成一个调解人，他大概确实也不太想亲自参与挑起冲突，但是问题已经挑起来了。中央委员们匆匆忙忙准备发言提纲，我看见戈尔巴乔夫在安排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言的顺序。

铃声响了，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突然发现全体中央委员完全变了样子。过去很多人就对叶利钦没有好感，而现在犹如大堤决口。发言开始了，有的发言很尖刻，言词激烈，非常不友好。戈尔巴乔夫再也不阻拦大家。中央委员，包括莫斯科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发表了意见，他们不仅支持叶利钦退出政治局的申请，而且坚持要他辞职。最后戈尔巴乔夫问道：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还有精力继续工作吗？”

但是已经晚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叶利钦坚持退出政治局，辞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确，他后来对自己的草率之举感到后悔，他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请求保留他党的市委书记的职务。但是很多事情已经不可逆转，当时大家的情绪过于激愤，结果中央全会通过决定，认为叶利钦的讲话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党的莫斯科市委受托审议解除叶利钦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政治局当即通过决定，解除叶利钦党内一切职务，指出这样做对加强苏共莫斯科市委的领导是非常必要的。

叶利钦由于神经过度紧张住进医院，当医生通知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时，便决定召开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全会于11月11日晚举行，戈尔巴乔夫、拉祖莫夫斯基，好像还有利加乔夫参加了此次会议。总书记讲话，他在很多问题上批评叶利钦，调动起莫斯科人的精神，他们慷慨陈辞，显示自己的批评才干。

扎伊科夫接替叶利钦在苏共莫斯科市委的职务，这并没有把该市的情绪平息下去，莫斯科新领导人性格相当软弱，经验不丰富，这显然对事情不利。不久，许多人又怀念起办事果断的叶利钦，但是他已被任命为苏联部长，被派到建设委员会。

从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叶利钦和利加乔夫、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叶利钦之间的斗争已经明朗化了。尽管还有一些人对他表示同情，还同他保持联系。叶利钦被逐出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对很多人来说象征着将联合起来，与苏共展开广泛的斗争。叶利钦在人民中的威信越高，戈尔巴乔夫心里越紧张，现在他认为这位新部长是政治上最危险的敌人。总书记试图同叶利钦言归于好，使他能俯首听命，但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当时斗争已经进入新阶段，开始逐渐探索采用科技进步时代各国政治机构都掌握的手段和方法。我觉得，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总书记同自己的政敌斗争的情况。

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自由和公开性的创始人密切注视着自己的臣民，尤其那部分对国内事件有主见或反对进行冒险革新的人。我不知道总书记是

什么时候开始利用特工机关搞窃听的，很可能是从他登上权力顶峰之日开始的。但我第一次碰上此事时，“名垂史册”的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正率领苏联检察院侦查小组搜集乌兹别克领导人干的不光彩勾当的材料，而且他们竟敢翻腾总书记过去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历史（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那时立刻掀起一场风暴，戈尔巴乔夫愤怒已极，立即命令克格勃调查此事，弄清谁想翻过去的老帐，谁下的这些命令，这是不是反对改革设计师的政治阴谋。这一切都是从洛布任尼泽一封信的复印件开始的，我印象中他是基斯洛沃茨克餐饮业托拉斯的主管，因一些真真假假的舞弊行为被判刑。这封信还附有一位在莫斯科近郊希姆基居住的律师写的解释材料。大约半年前，当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的行为对戈尔巴乔夫还没多大影响时，我就向他报告了洛布任尼泽这封信的事，我认为凡是与斯塔夫罗波尔有关的事情都应该让总书记知道，况且写信的人说他本人认识总书记。但是总书记对这封信丝毫不感兴趣，他说他甚至不记得这个人。我还是把这封信寄给了苏联总检察长，请他认真调查所列事实并采取措施。我又第二次把这封信连同那份败坏戈尔巴乔夫名誉的解释材料向总书记作了汇报，他气急败坏，当着我的面立即给克留奇科夫打电话，委托他详细调查这起阴谋。

“瓦洛佳，一定要弄清楚。拜托啦，那些恶棍要往我脸上抹黑。”总书记对克格勃主席说。

戈尔巴乔夫还委派我同原苏联总检察长列昆科夫谈话，调查是谁下令搞斯塔夫罗波尔问题。我打电话同当时已退休的列昆科夫联系，约好见面时间。列昆科夫刚一来，戈尔巴乔夫就打来电话，请我们到他那里去。

总书记早就认识列昆科夫，因此戈尔巴乔夫立刻就对他不客气。他开始进行逼供，是谁让检察长调查戈尔巴乔夫过去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历史的？是谁派侦查员到那里进行调查的？是不是契尔年科或者莫斯科的其他领导人让干的？列昆科夫说，他从来没有专门派谁去过那里，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命令，他也不清楚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翻老帐的企图。总书记认真仔细地，甚至是刨根问底地盘问这位苏联前总检察长，但我觉得他没有刨出什么东西。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很激动，每句话都流露出愤怒的情绪。列昆科夫被这种逼供和生硬的提问搞得不知所措，我觉得他在回答问题时不十分果断，也许他知道的比说的要多，至少他没有向法律专家戈尔巴乔夫招供，讯问结果没有使总书记得到满足。他还从各个方面对他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但是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列昆科夫强调说，他一向尊重戈尔巴乔夫，从没调查过他过去的历史。

列昆科夫走后，戈尔巴乔夫疑惑地看了看他的背影，说他不大相信这位前检察长的保证。

“这件事如果没有那些极力想阻止我当选总书记的人参加是搞不起来的。今天这种翻旧帐的事也对一些人有帮助，必须弄清楚这一切。我给过你一封信、是我的老相识、内务部副部长写的，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是有一个调查我过去历史的命令。这个命令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批准。我一定要查清真相，这个任务已交给克留奇科夫。你和他同这位内务部副部长谈谈，不过他现在生病，有人说他正在住院。”

对内务部副部长的拜访没有得到多少东西，他的病情很严重，讲话吃力，医生们暗示，他没有几天活头了。他唯一明确说的是，调查斯塔夫罗波尔领导人活动的命令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下达的，全苏检察院负责执行任务。

我和克留奇科夫对副部长说，如果以后想起什么，再给我们打电话。一星期后，他果真打来了电话，但说的是内务部长巴卡京准备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请转告戈尔巴乔夫，说赶走一个躺在医院里的人是不人道的。

戈尔巴乔夫说：“告诉巴卡京，这个……（接下去是一句不尊敬人的话），我先要把他赶走。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刚一条腿进了坟墓，你这个才提升的……（接下去又是不堪入耳的话）就准备在死人身上跳舞。”

同内务部副部长不可能再见面了，他很快不行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他带着戈尔巴乔夫感兴趣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时隔多年又旧事重提，这到底对谁有好处？总书记猜测着，可能他已经猜到了。他相信这是那些政敌干的，他们会抓住他生平中这点小事不放，散布流言，当然也有些事实依据，否则不好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那么紧张、动员那么多力量。反正从那时起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受到严密控制，这倒使人看清了所谓的“乌兹别克事件”的某些情况和匆匆炮制此事的内幕。

舆论工具开始大肆渲染，极力向观众和读者灌输中央领导人中有贪污受贿行为，不停地在电视上播放同一笔钱和黄金，其实这是同克格勃共同收缴来的。报纸和杂志也刊登一些惊心动魄的材料，这一切使形势更加紧张。过了不久，侦查小组煽动说，贪污受贿涉及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不知是苏联检察院不愿反映不十分可靠的事实，还是出于别的考虑，反正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多次想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他们掌握的情况。他们给叶利钦写信，请他把这一切报告给戈尔巴乔夫。不久在一次少数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读了莫斯科侦查人员的这封信。信中说，根据侦查到的口供，党和经济机关及苏共中央机关的许多领导人都涉嫌贪污受贿。信中提到一些人的姓名，包括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人物。

与会者静静地听着情况通报，会议室里一时鸦雀无声，这说明所通报的情况给与会者留下了印象。接着简短地交换了意见，责成建立一个委员会，对所发生的这一切进行详细审查。格德良和伊万诺夫侦查组应该继续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也负责对列举的事实进行调查。

这件事情闹得越凶，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指责的声音就越高，他们大概已经感觉到证据不够充分和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不排除还有另外的势力在操纵他们，把他们的侦探才干用于更需要的地方。时过不久他们指出，此案调查过程中牵扯到利加乔夫、梅德维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后来又说牵扯到戈尔巴乔夫。但这时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的行动已受窃听器监控，因此足以证明很多说法事出有因。克格勃机关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本来可以对诽谤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行为采取措施，但总书记并不急于制止这种不法行为。

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热衷于研究自己政敌的谈话记录，最初都是他亲自接收这样的情报，亲自拆看，然后退给克格勃。随着这些文件数量的增加，除绝密文件外，他都委托我来办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政敌当选为代表显然使克留奇科夫感到为难，我听到过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的一次电话谈话，克留奇科夫报告说，他的特工机关不再去记录代表们的谈话了。

克留奇科夫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的人拒绝做这些事，我又无权强迫他们做。这是违法的。”

“瓦洛佳，你在说什么？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你们却等闲视之。你们想

想该怎么办。”

我后来了解到，克留奇科夫不想直接搞记录。现在是戈尔巴乔夫找人去谈话了解情况，反正戈尔巴乔夫对反对派的基本行动了如指掌。

当时叶利钦自然是被注意的主要对象，但是他被选进苏联最高苏维埃并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以后，特工机关不可能再使用违法手段。因此克留奇科夫又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却得到一个激怒的答复。

“怎么，还用得着我去教克格勃怎么干吗？”

据我从一些文件中所了解的情况，克留奇科夫已不直接窃取别人的谈话记录，也没有再向总书记提供这种记录。从来没有窃听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党、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电话，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一般不采取反常之举，我当然不清楚这件事的全部细节，不清楚戈尔巴乔夫和克留奇科夫的所有谈话内容，但是表面的情况同我这里描述的差不多。

所收到的这类文件仍定期向总书记报告，起初这件事都是我亲自做，但我很快领悟到，当着我的面总书记不便认真阅读这些文件，因此后来我便把材料封起来送到别墅，如果赶上戈尔巴乔夫休假，我就送到他休息的地方。从退回的文件上画的着重线来看，戈尔巴乔夫认真阅读了这些文件。有时在退还文件时他还要求把一些记录再放几天，而很可能他自己早留下了一部分文件。

总书记一总统还关心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和国内知名人士生活的许多事情，除正式情报外，还有口头情报，总统掌握的情报很完整，很全面。显然，改革的设计师认为，民主归民主，但是了解政敌的意图更重要。

代表会议上很多代表发表的批评意见和利加乔夫的讲话（他在讲话中也触及到叶利钦的观点）使辩论更加激烈。叶利钦也决定发言，可代表会议已接近尾声，没给他提供发言机会，于是叶利钦决定直接走上讲台。全体代表都坚持让他发言，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到跟前说：

“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到主席团办公室，告诉他我允许他发言，让他坐下，不要站在讲台前。”

我走到叶利钦身边，然后我们单独来到主席团办公室。当时叶利钦很生气，有些神经质。我尽力安慰他，告诉他戈尔巴乔夫答应让他发言，但是他请叶利钦在前面坐下，叶利钦回到大厅，他好像是在第一排坐下了，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让他发言了。

叶利钦的发言是批判性发言，同时对利加乔夫的讲话和许多其他问题作了答复。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谈他对改革的看法，同时提出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讲话谈到了改革中的不足、党内变革的速度缓慢和可能出现的个人崇拜。叶利钦提议撤换总书记，让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辞职，改组机关和公开党的预算。他又提出对莫斯科没有给予足够的帮助的问题。最后，叶利钦请求撤消十月（1987年）全会关于他的讲话“政治上是错误的”决议。他认为，自己的错误只在于讲话的时机不当，不应该在十月革命70周年前夕发表这种讲话。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十月全会的情况，发言的人不想支持叶利钦的这个请求。会场上气氛继续紧张，人们的情绪有些失控。对已经习惯于稳重的讲话和稳妥的决议的党和人民来说，这次代表会议仿佛一枚特殊炸弹加速了苏共的分裂。

从近50年来第一次召开的这次党代表会议起，党内生活开始发生不可逆



转的变化，这些变化震撼了国家，震撼了全世界。当时人们都明白，如果国内不恢复应有的秩序就会失去所有已取得的成就，就会毁掉国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领导的意图，我当时也不是都理解。我同戈尔巴乔夫就这一话题交换过好几次意见，但只有一次他说了一句：“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他在考虑对策，但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无论中央政治局，还是后来的总统委员会和安全会议成员以及政府都不知道，就连他最亲密的战友也因不了解他的真正意图而陷入迷茫。他是否有一个消灭党、瓦解国家的战略计划？我认为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他有个摆脱不掉的念头，有一个最终目标，但如果不消灭现存制度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他满怀激情而又小心谨慎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大多数人认为改革就是巩固国家，加强国家的实力和提高人们的福利，但是实践表明，总书记没能实现这一点。在他试图改变社会的同时，不由自主地消灭了国家制度。政权的腐烂的根基被拔掉了，可是这个政权像随风草一样，在这个巨大的国度里飘来飘去，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和铁腕人物的出现。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即将结束，虽然出现激烈的辩论，不接受、有时甚至不容忍不同观点，但是并没有影响通过一系列重要决议。会议通过了深化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还将进行当年的党内总结改选工作，改组党的机构和苏维埃机关，准备补充和修改苏联现行宪法，完成人民代表的选举，然后成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而这一切需要尽快完成。

### 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

无论是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代表，还是中央委员，在通过各项决定和决议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下台打基础。几十年形成的社会发展基础受到了改革尝试的冲击。

正像一位诗人说的，一切事物在开始时都是美好的。社会民主化思想像杨树的白絮一样满天飞，许多人感到呼吸比较畅快了。那些不受器重的初级研究员和得不到当局提升的实验室主任都走出令人生厌的研究所，不再昏昏欲睡，他们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使许多坚定的唯物论者很快变成了笃信“资本主义天堂”的信徒。苏共容许所有愿意的人参加人民代表的差额选举。苏共中央、各级地方党委就是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条件下，在给代表机关以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行动自由的口号下准备选举运动的。每一个席位可提几名候选人，这种方式使得所有愿意的人都可参加选举。

由于苏共多年执政，部分居民形成了一种顽固的偏见：不愿接受党的代表。实际生活表明，只要受到党的委员会的支持，即使是精明能干、知识渊博的人也很容易输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苏共的对手。在厌恶苏共的浪潮中，许多匆匆过客被选为人民代表。他们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当然也有不少天才的、高水平的、各方面很有造诣的人当选，但这一切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时没有反对党来对候选人进行必要的挑选。遗憾的是，1989年初谁也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差额选举原则当时非常诱人。但对那些代表苏共去竞争的人来说，这种原则也是危险的。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他感到许多党政活动家，包括他在内，可能会在竞争中失败，不能当选。因此他产生了一种想法：代表不仅从选区中选举，而且从社会组织中选举。他给这种想法找出了相应的根据，说必须使工会、共青团、党、创作

者联盟和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在立法机关中也有代表，这样，就可以不仅按区域，而且按职业特征更充分地反映群众的情绪。

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妙，它不仅在党内受到欢迎、而且受到工会代表、作家、画家、演员、新闻工作者等的欢迎。戈尔巴乔夫还责成有关部门确定选举代表的名额：党、工会和其他大型组织各为 100 名。这是一个小花招，它在实现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这些代表也应该实行差额选举，这样就会使戈尔巴乔夫的主意化为乌有。最后经过共同努力才达成共识：这是各社会组织的权利，由它们自愿决定是搞差额选举还是等额选举。

戈尔巴乔夫在同他的助手讨论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全会上将不对德高望重的人搞差额选举。”

近来，他为自己的威信开始不断下降感到不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自己在选区提名感到担心，害怕出现有声望的竞争者和自己可能落选，而对在全会上搞秘密选举也觉得不安。

“可能有许多人会不友好地投‘反对票’。然后再有人兴师问罪，必然会闹得很不愉快。这个‘百人’不能搞差额选举。”

他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他自我感觉不好，寝食不安，身边的人眼看着他迅速变老。他越来越爱激动，使用激烈的言词和语调，他常作出一些突然的决定，义常常改变主意。直到选举前夕，他还在考虑自己应该在哪里参加选举。

他问身边的人：“你们说，如果我在选区参加选举，党员们会说什么；总书记不愿由党来选？如果我由中央全会来选，那群众会怎样想？不相信人民。”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应当在大的选区参选，因为这里既有共产党员，又有非党选民。最后我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是竞选人民代表，而不是党代表大会代表。他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想必是经过同家里人和同政治局委员讨论后，他最终还是决定由党来选举。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党的全会上参选。他下不了决心在莫斯科提名自己为候选人，是因为他怕首都都有强大的反对派而遭到可耻的失败。去其他选区参选又觉得丢面子，而且还要同别人在差额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竞争。他害怕输，害怕他得到的支持率低于正在积聚力量的他的主要政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在权衡了所有的“利”“弊”之后，认为唯一不会背叛他的只有亲爱的党、党的中央委员会。

于是开始制定“百人”名单。拉祖莫夫斯基会同组织部工作人员负责提出名单，他们把许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各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都列进了名单。戈尔巴乔夫对此不太满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明白自己参加“百人”选举名单的各种困难，他已经连续几天坐在长条会议桌前同拉祖莫夫斯基一起商定可能的人民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总书记来说，周围有个“好的”陪衬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名单越来越像为选举创作联盟而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一些著名的作家、演员被写上了，一些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上了名单，一些党的工作人员被划掉，换成了另外一些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创作集体和组织的一些著名代表的名字列入名单。已经给办公室送了多少次咖啡、茶和夹肉面包，而工作依然没有头绪。中央全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必须及时将这个名单提交给全会审议，而且名单不应引起特别的疑义，否则就得修改，就会增补候选人，而这将会

导致预料不到的结果。

1989年1月10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幕。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他谈了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性和劳动者的政治积极性的高涨，他在报告中对苏共中央告全党和全体选民书草案作了说明。这些话与会者都没用心听，有经验的人早就学会了区分表面文章与问题的实质，而实质是代表党的代表候选人名单。我看到了名单的制定过程，看到了是谁的“长满老趼的”手勾掉了一些名字，添上了自己合意的人的名字。但是关于社会民主化的报告却冠冕堂皇地谈论全党参加苏共代表候选人的选举。

“共有10.5万个基层组织参加从各地共产党员中提名代表候选人的工作”，总书记在用事实说明党的民主。“经上级机关审查后提出31500名候选人。随后经市党委和区党委审查选出3500人。然后由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进行讨论。讨论采用了各种形式——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各党委会向苏共中央提交了207名候选人。”

中央还直接收到大量推荐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信件，这使名单上的候选人增加到312人。

不过，戈尔巴乔夫没讲在这个名单上他需要的只有几个人，至多15个人。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按照难以忘怀的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的遗训进行争取民主选举代表候选人的斗争的。

一向给人们讲授真理的圣人现在又在展示如何运用民主，其中心意思是，如果民主有助于登上权力顶峰和长久执政，那就是好民主。与此同时，如果民主不妨碍他随意行事，那也可以不要任何专政。

参加中央全会的人看了“百人”名单后当然提出了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名单中没有“他”。许多人心里害怕按选区选举，害怕出现差额，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戈尔巴乔夫对为什么必须这样安排参选名单作了解释，他讲了很长时间，许多人已大体上懂了，为了一道好菜应有相应的配菜，为了几个必须被选上的人而推荐了一些著名的演员和作家、工人和农民。他们被列入党的名单就使那些恶意找茬的人无法说这“百人”全是党的干部，也不会引起著名的和有威望的人的不满。不过，正像后来实践表明的那样，这个手腕没有多大效果，当选的代表被称为“红色”或“黑色”百人。

全会上没有进行广泛的争论，党的纪律仍然起着作用，所以选举比较顺利。有些选票上勾掉一些姓名，但这并没有越出正常限度。可是，如果实行差额选举，很多人就会失去获得代表证书的希望。这里的选举是有保障的，不必在群众集会上当着居民的面演讲，也不必汇报对代表委托书的执行情况。现在只剩下一道关——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批准，这实际上是个形式。

与此同时，国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见的选举运动。各社会组织和各种富有首创精神的团体都全力投入运动，代表候选人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舌战。每一个席位都有几个人竞选。竞选情绪越来越激动。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如果你谩骂党，你就大可放心，因为你肯定会当选。结果是这种方法到处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相信这一点，成功也就随之而来。

所有的批评言论都说到了人们的心里。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望很大，但是四年之后他们的希望破灭了，生活困难和混乱现象越来越厉害。人民感到，困难重重，民族关系加剧，犯罪严重，供应恶化，前途一团糟。人

们寻求救星，抛弃那些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的人。他们可以崇拜那些给他们带来幸福、给祖国带来荣誉的人，把他们当作偶像，但是不能容忍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恶化。

不过，主要是一些大城市里斗争激烈，许多地区局势相当平静。尽管实行差额选举，那些精明能干、讲求原则、办事公正的人仍然当选。人们还是能够看出谁更可靠，而不让那些偶然的竞争者进入苏维埃。但是当个代表候选人也不错：可以随便许诺。你想要改善生态环境——请吧，想要更好的供应——马上就办，想要新的住房——多少都行而且不晚于五年。最令人感动的和最可悲的是人们轻易相信这种许诺。即使有人怀疑，但是能听到充满希望的话也是愉快的，这些话使人听了舒服，给人留下美好印象。

当然，当时是民主改造的初期，对当时那些日子和发生的事件要求不能太苛刻。党的领导本身有错，人民期待正常选举和自由表达意志已经等得厌倦了，时间一长，人们就会分清谁是谁非，他们在提候选人和选代表时将更谨慎，只选那些慎重地、负责地对待自己的义务的人。而在那些日子，经济混乱使各种运动的领导人走向分离，为主权而斗争，使对现实有不同看法的人之间产生对立。

1989年5月举行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选举，选出了人民代表。下一步将是代表大会，建立大会的领导机构。还不十分清楚，是2500名人民代表每次会议都来呢还是从他们之中选出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感到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全考虑好，暂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不了解代表们和代表团的真正情绪，还有许多未知数。而眼下他正准备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这方面的工作他早就开始了。

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他十分喜欢的一系列国外之行、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判与他的总书记身份不太相称，这种身份对西方的伙伴也不方便。因此，戈尔巴乔夫违背当初不兼任两种职务的诺言，开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自己当选国家首脑做准备。问题先在一小部分亲信之中，然后在政治局委员中进行了讨论，原来，大家也都在等待着这一决定。大家一致认为，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党的领袖没有领导苏联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在基本上得到大家同意，或者确切说，没有遇到极力反对后，开始进入选举准备的新阶段——向中央委员作宣传鼓动。他邀请了相当一批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委和州委的书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在民主条件下党的领袖应该领导苏维埃，而且各级都必须实行。戈尔巴乔夫说，在文明国家中执政党都推举自己的领袖为总统或政府首脑，我们不应该违反民主传统，应该改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我们不应该放弃国家管理杠杆。

他建议各位书记推荐自己为候选人，参加苏维埃机关的选举。这一建议使书记们有些莫名其妙，他们不反对戈尔巴乔夫这样做，但是干嘛也要他们这样做？后来有人发言，意思是，对这一建议应当好好考虑一下，不能着急。看来，书记们不打算“得到”苏维埃的权力，一些人觉得这是额外负担，另一些人则担心突然落选怎么办。简言之，没有得到积极支持。

但是，戈尔巴乔夫说服人的本领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得那样迷人和激动，眼里充满真诚，声音里流露出必须这样做的决心，书记们开始动摇了。我感到他们正在把自己的职务与苏维埃机关的领导职务作比较，我明白，反抗已被摧毁。即使有人不愿任两种职务，他也很高兴同意总书记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只要不触动他就行。而其他人则认为，现在必须使总书

记和他们领导两个机构。

这场历时三小时、使戈尔巴乔夫“汗流浹背”（照他的话说）的“简单”战役终于大功告成，取得了完全胜利。现在需要过下一道关。在这方面他会得到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第一书记和代表团的帮助，一切都会按需要去做。在占领新阵地方面，总书记的经验已绰绰有余。

1989年5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那几天的天气格外的好：风和日丽，树木吐绿，芳草茵茵，鲜花盛开。一群与众不同的人汇集到一起，这里有质朴的先进生产者，他们只会埋头工作而不善言辞；有从事经营管理的党的工作者，他们也不是“西塞罗”，早已忘记如何热情地、恳切地和尖锐地与人谈话；还有一群新型代表——讲坛代表，他们能言善辩，具有高超的演说艺术和不错的理论修养。近来苏维埃政权各方面的工作都遭到指责，但是唯独没人指责不注重发展高等学校、教育和科学。论敌未必会抱怨文化知识不够，他们之中许多人具有学位，他们虽不懂生产或者没有做过实际经营管理工作，但这不要紧，他们是科学工作者、作家、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总之，这是一群受过教育的而又善于雄辩的

人。

大厅里坐得满满的——代表、来宾、记者。我看着新一届的当选者，感到过去会议上那种消极状态结束了。现在你不能再打瞌睡，代表们已经在这里结成集团、确定战略、分配力量。各代表团都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波罗的海三国人决定公开“暴动”。第一书记们抱怨说：我们这里有一些不听指挥的人，他们在家默不作声，但在这里吵吵闹闹，顽固坚持自己的路线。人不断增多，巨大的礼堂就像一个蚂蚁窝。在莫斯科代表和列宁格勒代表就坐的前几排，聚集了一大帮全国各州的代表。那里正在就讨论问题的方法进行工作，虽然他们对一切做法早就交换过意见并已明确下来了。

大会开幕前夕举行了所谓党的代表小组会议。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开得极其艰难。共产党员也是情绪复杂、意见各异，在选举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其他领导机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以前在这方面有中央组织部的积极协助，而现在组织部工作人员十分谨慎，害怕指责他们给代表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指责机关越权的讲话以后，大家都吓住了，认为最好还是不做。

几十年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都认为机关工作人员是自己的传送带，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党的地方机关时，而现在却开始指责机关超越权力。戈尔巴乔夫自己不止一次责成各部工作人员监督党的委员会的工作，派他们到各区、州、边疆区和共和国贯彻中央的路线。机关甚至专门设有督导员职位，其责任就是指导党组织和常委会的工作。现在这些工作人员受鄙视，挨批评，被禁止做从前是他们的任务的工作。人们看到政治局的过错被这么快地转嫁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只能惊奇地、不知所措地耸耸肩膀。

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首先审议组织问题和程序问题。斗争从一开始就展开了。里加第一市立医院“急救”室主任B.托尔佩日尼科夫代表登上讲台，他要求公布是谁下令屠杀第比利斯1989年4月9日和平游行示威者的，并提议为死难者致哀。就像火星溅到了汽油桶里，代表大会炸开了锅。礼堂里一片喧哗声、掌声、喊声，气氛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白热化。医生知道他在干什么，许多代表不再那么平静和审慎从事了。麦克风前排起了长队，每一个人都想发表自己的意见，都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以便让选民看到：

他们没有选错——瞧，他们的代表是在如何为正义事业而斗争。

莫斯科代表尤为积极，但是他们遭到了其他代表的责难。许多人妒忌莫斯科的富足生活、它享受的特别照顾以及它比别的城市的优越的商品供应。同时形成了一个反对派力量领导中心——跨地区议员集团。总之，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激烈斗争，几乎动起手来。发言中充满侮辱性的语言，对党、党的机关、军队、克格勃都展开了攻击。干部特权是一个特殊的话题，许多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不正确的，但没有人对批评作出回答。共产党员代表企图挤到麦克风前，但是轮不到他们，而且他们的发言含糊其辞，没有信心。只有几位被露骨的谎言所激怒的妇女不择言辞，作了坦诚有力的答辨。

除了对党攻击外，看来军队也是主要攻击的目标。经托尔佩日尼科夫煽动，会场上掀起了攻击士兵、军官、将军的浪潮，他们被指控驱散第比利斯的游行示威并造成平民的伤亡。人们要求军事长官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作出解释。全场代表不时起立为全国各地的死难者致哀。我看着发生的一切，心里想道：为什么要责难军人？为什么要侮辱那些执行命令的人？难道士兵们被派到阿富汗是他们的过错吗？难道驱散第比利斯的示威游行是他们志愿的吗？也许我错了，但是我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戈尔巴乔夫。

当在军队参与下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时（由于某种原因死伤了一些平民），本应将一切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关于那些日子的事态，戈尔巴乔夫全知道，因为国内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不向总书记及时汇报的，无论他是在首都，还是在非常遥远的国外。

这也涉及到格鲁吉亚 1989 年 4 月的形势。那些日子我还记忆犹新，4 月 2 日戈尔巴乔夫飞往古巴，履行他访问这个自由岛国的诺言。总书记早就决定出访古巴，但由于平美尼亚地震一直未能成行。现在他同卡斯特罗和古巴人相会了。访问相当成功，尽管在对苏联改革的看法上还存在一些微妙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最终目的，不仅苏联人，而且古巴人也不完全理解。

在回国途中要对英国进行访问，准备会见许多人。在那些日子里，我已完全确信，总书记已失去了党员的谦虚精神和对身边的人的同志式态度。他像一个皇帝，在他的官邸里及官邸外代表团成员、数十个陪同人员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总书记不知何故一直未从楼上下来，副官、警卫、女服务员却不时到他的房间里去。克鲁奇纳和我围着使馆转了好几圈，情况依然如故。我们已经开始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原来他只是在改变同某人的会见时间、更换衣服以及交代那些我永远不理解的琐事。我认为，精明能干和朴实无华是区别真正的领袖和其他人的主要特征。

就在我们访问伦敦的时候，第比利斯的严重事件日益迫近。关于这一点，据我所知，同莫斯科保持经常联系的尤·谢·普列汉诺夫向总书记作了汇报。我也向戈尔巴乔夫谈了第比利斯令人不安的局势，转述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博布科夫的话，他曾找到我并通过专线告诉我，第比利斯的局势已失去控制。我认为得到这种通报后，戈尔巴乔夫给莫斯科打过电话，至少回到苏联那天他在机场听了详细汇报。前来迎接总书记的政治局委员们曾达成行动协议，包括让谢瓦尔德纳泽带领调停使团前往第比利斯。但是外交部长没有去，他无疑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这个问题。

格鲁吉亚首都事件过后，我从前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准·伊·帕季阿什维利那里了解到一些事件的细节。他曾飞到莫斯科，谋求会见戈尔巴乔

夫，他们的关系曾经非常好。他在总书记的接待室里坐了两天，等待谈话，但是戈尔巴乔夫躲着不见他。帕季阿什维利被告知在饭店等候召见，但是我了解戈尔巴乔夫，他不愿安排这次不愉快的会见，尽力拖延，而后来干脆让我去见帕季阿什维利，了解一下他想干什么。历来如此，许多不愿意的会见、不愉快的谈话，总书记总是推给别人去做。在第比利斯事件上也是如此，这次事件是由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军人们应付的。而同帕季阿什维利的谈话，总书记推给了我，尽管这更不符合逻辑。帕季阿什维利也感到惊讶。拒绝会见的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知道一切情况，但是他不想让人知道他了解情况。

帕季阿什维利看上去很沮丧，他泣不成声地解释了为什么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及时去第比利斯，冲突如何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说有关第比利斯事件的一切决定都是得到领导同意的，诚然，他没向我说是谁同意的。帕季阿什维利的处境十分为难，他不能向任何人说出全部真相，除戈尔巴乔夫之外，但又不愿承担过错。而在这一切中还掺杂着他同谢瓦尔德纳泽的冰冷关系，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共青团时期。然而过了不长时间，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帕季阿什维利的说法就有些不同于那时对我说的了，造成人员伤亡的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们成了替罪羊。这种立场不仅使人惊讶，简直使人震惊：政治领导人就这样随随便便把过错推给代上级受过的军人。没有一个政治家有勇气为这些执行他们命令的人辩护。

但是，军人只不过是执行别人的意志。我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采取原则立场。我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是多么不简单，要承担责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看来，代表们在等待着这样的承认，全国在等待着这样的承认，但是这样的承认没有等到。有一次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戈尔巴乔夫。

我说：“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的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您会使无辜的士兵免受攻击并保卫军队。”

但是戈尔巴乔夫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我触到了他的痛处，我想，这是他绝对不喜欢的。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是胆小还是政治家的谨慎，我那时不能作出完全肯定的判断，只是后来又碰到类似的事件后我才确信，胆小是他素有的特点。这种特点会使任何一个国家首领最终失去权力。

我那时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总书记、国家武装力量总司令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在那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没有提高他的威信，而在许多人首先是军人眼中他失去了一切。没有人再信任他，这也是苏联总统与军官团及整个军队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的原因之一。

各种政治信仰的拥护者为扩大对代表和社会的影响，每天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着精疲力竭的、令大多数人生厌的斗争。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他总是巧妙应付，给一部分人宽宽心，给另一部分人降降温，给第三部分人鼓鼓气。但是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他越来越经常地改变声调，提高嗓门，在安·德·萨哈罗夫发言时关掉麦克风。这一方面引起了嘈杂的喝采声，另一

方面激起了愤怒。大家都对主席团不满，认为不应为那些人提供讲台，缺乏严格要求，不遵守限定发言时间，一片混乱。会间休息时，戈尔巴乔夫走进主席团休息室，他疲惫不堪，惘然若失。其实这不是主席团的房间，而是过去召开苏共代表大会或一些隆重的会议时中央政治局聚集的地方。这次党的领导没有被选进主席团，他们坐在台下或同自己的代表团在一起。但常常在这个老地方聚会，一起喝茶休息。其他主席团成员都在下面一层的房间里，那里的一切要朴素简单一些。

而在这上面召开了政治局特别会议，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他们交换意见，想办法，出主意。这些人第一次不能控制进程，无力改变局势。他们在这种时刻都想些什么？大部分人明白，大门已经打开，涌进来形形色色的人，其响彻全国的声音，既令他们害怕又使他们无力反抗。但这个声音也使千百万公民感到不安，他们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在党的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戈尔巴乔夫总是在会议开始前 30~40 分钟来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很少捱着点到。安全部门形影不离地盯着总书记——总统的行动。我经常听到：他通过了凯旋门，驶近克里姆林宫，汽车进入克里姆林宫。通常总是保卫部门的首长在大会堂专用入口处迎接总书记。有人帮他脱下衣服，把他送上电梯，他乘电梯上到三楼，他在那里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边设备齐全，可以工作、休息、接受某些医疗处置以及每天理发。戈尔巴乔夫每天的生活从洗头开始，理发师为他理平头发，修刮后脑勺和鬓角，做发型，吹干。有很长时间为他理发的是一个小伙子，这小子曾为勃列日涅夫理发。后来一位年轻妇女取代了小伙子。在理发师工作时，总书记有时请我报告文件，听完报告后指示给某些人写便条以便执行或了解情况。在来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之前，他已同克留奇科夫、弗拉索夫或普戈、亚佐夫、谢瓦尔德纳泽、总理以及某个中央书记交谈过，了解了国内外事件的最新信息。

等理发师梳理完毕，戈尔巴乔夫乘电梯下到主席团大厅，确切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聚会的房间。他同在场的人问好，有时在桌旁坐下，喝一杯咖啡，同主持下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交换意见。但更多的是在同所有人问好之后，就前往主席团成员聚集的大厅，往往在那里开始讨论下次会议的问题。

在代表大会工作期间，戈尔巴乔夫经常走出会场，去喝咖啡或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电话，会见中央政治局委员、助手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

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也是经常离开会场，召见国家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见反对派领袖。

几天的会议工作表明，共产党员代表都是明哲保身。戈尔巴乔夫也明白这一点，他过了很久才在老广场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召开各州和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给他们鼓气，增强他们的信心。会议对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过程进行了讨论，有人指责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中央机关没有认真做代表的工作，没有起到组织作用，没有个别做工作。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知所措，建议大家积极抢麦克风，其实这是反对派的方法。反对派并没有睡觉，他们的代表总是在一起协商，制定保证他们成功的措施。这种成功的主要手段就是对党、对干部特权、对国内局势的尖刻批评。对军人的尖锐抨击依然充斥会场，这一切都在部分居民中引起了反响。这些居民还没有觉醒，可以看出，他们很容易被批评迷惑。

政治局委员的聚会越来越频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惊慌不安的面孔和



焦虑的议论，政治局会议分析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拟定稳定局势的措施，提出反措施。结论只有一个：现在在麦克风前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应当进行个别工作，接近代表，特别是那些动摇不定的、容易受过激口号影响的代表。民主派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而且进行得巧妙、严格。发言者在大会上说，有人在饭店对代表进行说服、劝告、收买，甚至恐吓。夜里有人往饭店客房里打恐吓电话，许多代表被弄蒙了，被吓唬住了。党由于未能保护代表免受民主派中那些好战分子的袭击和威胁，在代表大会上失败了，使自己的拥护者疏远了。

代表大会开的时间越长，形势越明朗：由于出现矛盾，代表大会不可能作出建设性的决定。有人提议从代表中选举最高苏维埃作为常设机构，提议被采纳。但是围绕候选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许多在代表大会上发表特别激烈的、甚至粗鲁的讲话的人没有进入最高苏维埃，多数票机制将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淘汰。这使民主派发狂了，他们说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富于挑衅性的和被操纵的多数，说中亚代表在表决时总是轻率地协同一致。为了对付对苏共路线的这种强大支持，反对派甘愿支持主张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民族主义势力，不时有人叫嚷要求主权、成立独立国家。对此谈论最多的是莫斯科代表和波罗的海三国代表。大会上的分裂日益迫近，因此相当一部分代表准备退出会场。于是再次进行说服和劝导。

当然，这是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代表们虽然来到会场，但是还没有从竞选斗争中冷静下来，他们激烈地、有时是不加思考地相互指责。每一个人都想表现自己，都想在发言中出人头地。权力结构及其威信在人民代表的发言中动摇了，这种热情和冲动在全国存在很长时间，不仅代表们这样，许多党的工作者也是如此。

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也非常激烈，各种力量、派别、党团又力争权力而争吵起来。对戈尔巴乔夫的提名和选举远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发言者在支持总书记为候选人的同时，指出了一些令他不快的事，建议他放弃党的领袖职务，集中精力从事国务活动。安·德·萨哈罗夫指出，他支持选举戈尔巴乔夫是有条件的，要取决于对主要政治问题的辩论情况，不能让选举流于形式。萨哈罗夫说，如果流于形式，我认为不能参加这样的选举。代表们要求戈尔巴乔夫说明他在克里米亚建别墅的情况。

人民代表    。苏霍夫提起了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针对戈尔巴乔夫提的那个问题：“我听着您正确的、热情洋溢的讲话，甚至您打断发言者的那些失礼的话，我不把您同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而同伟大的拿破仑相比。拿破仑不怕枪弹，不怕死，带领人民走向胜利。但是，受一些应声虫和妻子的影响，他背弃了共和制，实行了帝制。我非常担心这条道路，若果真如此，革命事业就会完全失败。看来，您也不能克服报复心理和妻子的影响……”苏霍夫说，我将投您的票，但是请您考虑这些意见，以便使人民确信我们将向着共产主义思想前进……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主席团主席候选人资格的讨论当时空前激烈。被提名为候选人的还有叶利钦，但是他这次没有同忠于总书记的力量竞争。投票结果表明，在 2221 票中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有 2123 票。总书记梦寐以求的目的之一实现了。

阿·伊·卢基扬诺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

代表大会结束了，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像一股刮过的台风，使全社会、

全国、甚至全世界都为之激动。全世界都极度紧张地注视着苏醒的俄国熊是如何走出洞穴、走向文明世界的。如果它出现在体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情况将会怎样，周围的一切是否将会崩溃？

变革之风是有感染力的，它激发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居民，助长了东欧各国潜在的并时常爆发出来的情绪。

后来还开过几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斗争依然很厉害，但是权力越来越多地转入苏联最高苏维埃手中。不久，卢基扬诺夫成了最高苏维埃主席，而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位苏联总统。总书记—总统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只要得到非常权力，他就能在国内实行任何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取得中国在短时间内、在国家免遭破坏和保持完整的情况下取得的那样的成就。

人民代表大会的那些日子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证明了什么？它们暴露了社会早就感觉到的和分析研究专家所了解的东西。党没有做好在新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准备，它对国内的事态发展越来越失去控制。关于这一点的原因，我已经说过了，这里只补充一点。代表大会上的争论证实：相当一部分居民早在选举期间就不支持党了。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而苏共中央对此却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此外，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了苏共与全体居民之间的裂痕，鼓舞了那些曾对政治斗争漠不关心的人。

第一次代表大会表明，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对新的政治争论和斗争的形式与方法也没有做好准备，从而动摇了共产党员对领导人捍卫党的原则和思想的能力的信心。最后，代表大会的工作结果证实了一个痛苦的事实——政治局和总书记没有威信，他们没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动员党的力量去实现既定目标。但仅仅是没有能力吗？

当然，应当看到，人民代表大会、整个民主进程是在不利于党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受挫，国内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各级主管干部和机关因过去和现在犯的错误而遭到批评，主要的大众传媒摆脱了党的一贯控制。党的二十七大和二十八次只是承认苏共患有重病。

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切清楚吗？据我所知，他在主观上没有对形势作过分析，依我看，他认为这是多余的。此外，代表大会上的混乱局面和选举国家最高职位的艰难过程都没有唤起他应有的警觉。相反，戈尔巴乔夫更加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地位牢不可破，经常“不顾一切地”蛮干，在同自己的同志、同共和国、党组织、州和边疆区的领导人、同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谈话时，有时表现粗鲁甚至没有礼貌。许多人都说：这样一个有魅力的、有文化修养的、非常客气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得粗鲁生硬起来。但是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许多人大概都发觉了，他对所有的人，甚至对比他大的妇女，都不客气地称“你”。激动起来，他会不择言词地大声斥责，会使人难堪，下不来台。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也善于以其魅力“蒙蔽”人。

他刚使雅科夫列夫受了一顿气，又亲昵地对他说：“萨沙，情况怎么样？请你把我的发言稿再加工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看看……”

## 最后一次苏共代表大会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在中央委员和地方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中还留下相当多的老人，他们清楚地记着 1985 年 3 月那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大家都还牢牢记着他最初采取的那些十分胆怯的步骤，他对自己的行动没有把握，要求提供帮助和建议。五年前这种帮助是多么重要，而现在这些记得当年总书记那软弱的、寻求支持的形象的人是多么碍事！情况多么有戏剧性，也许这是领袖周围的人的悲剧——他们不再有用了，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不巴结上司。现在更适合的是另外一些景仰自己的偶像的人。1990年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为了实现他的打算，需要采取另外的工作方法，需要在党的领导层中、在中央和政府中提拔新人。但是，甚至在对州委和边疆区委作了大换班后他仍然不满。

“难道能同他们一起工作吗？”因为一些批评意见而大为恼火的他在一次全会休息时说，“必须更换，尽快换人。”

党的二十八大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戈尔巴乔夫全力以赴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他想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轰动的、开放的和民主的大会，就像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为此采取了差额选举代表的原则，一切全按照苏维埃的工作模式进行，竞选大会代表的斗争积极展开了。在一些激烈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的党组织中，有时被提名和当选的代表不是富有经验的人，而是那些能够不顾情面提出尖锐批评的人。

中央组织部以往的监督作用和不可缺少的帮助现在没有了，它在精简之后已大大“消瘦”，其工作人员害怕介入党的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事务，更不用说代表选举了。而且这在人力上也是不可能的，有几个局只剩下四五个人，却管理着从库尔斯克到外高加索的大片地区。结果，中央书记们失去了大量信息，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而共和国党中央、苏共州委、边疆区委则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中央工作人员下基层的数量减少了，电话费也大大减少了，然而那种失去管理杠杆作用的情况发生了。

在正常情况下，这对党组织来说好像并不可怕，但是在一切事情都由中央决定、地方不习惯独立解决问题这样一种多年形成的体制下，情况就不同了，各级党委不知所措。此外应当看到，总书记在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后又当选苏联总统之后，对召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审议党内问题已失去兴趣。政治局和书记处很少开会，中央下发给地方的文件越来越少，也不再给地方充分通报国内党内的情况和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任務。此外，区委员会急剧减少，很快便丧失了影响局势的能力。

国内大部分地区代表的选举都是按竞争原则进行的，这不能不反映出选举的偶然性。正派的人不可能运用那些蛊惑人心的平民主义口号，许多共产党员因此而遭到失败。其实，不仅仅是这一点在代表大会上决定了代表们的立场，如果国内和党内的形势稳定，如果人们相信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人们未必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过错不在于差额选举，而在于那些对国家和党负有责任的人。

但党的代表会议和历次人民代表大会毕竟使领导人、至少使总书记本人学到了某些东西。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那些日子里，戈尔巴乔夫严肃地考虑着自己以后在党内的地位。总书记对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尤其是苏联总统的角色无疑很满意，但对从事党内事务他已感到厌倦，觉得是个累赘，似乎应当放弃党的领袖地位，专心从事国务活动。关于这个问题，人民代表和地方上许多共产党员说过不止一次，而最近中央委员也谈到这一问题。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妨碍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第一，离开总书记的职位会大大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他可能会成为左、右两翼的批评对象。党的新领袖的上台

可能会使改革的总设计师完全失去声望。第二，戈尔巴乔夫自己怂恿所有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担任党的委员会和苏维埃两个关键职务。而现在，当他得到国家首脑职位后，就要放弃党的领袖的活动领域，这是又一个批评他的理由。戈尔巴乔夫为此问题绞尽了脑汁，他召集自己的亲信，反复权衡各种“赞成”和“反对”的理由。

他问道：“为什么放弃总书记职务就不能仍作为党的领袖？列宁当时虽然领导着政府，可他还是党的领袖呀！”

他看着自己的助手，等待他们回答。一些人认为这很难实现，另一些人认为这种建议是一条摆脱困境的好办法。我真想说，这个思想确实不错，也可以这样做，但为此至少需要在某些方面像列宁那样。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怕刺伤戈尔巴乔夫的心。

“而如果设党的主席职位呢？”他听完各种议论后问道。

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的，甚至是非常大胆的。如果这是在一两年前提出的，可能就通过了，但是现在无论党内还是社会上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说得委婉一点，已经不友好了。不能让这个想法破灭，否则就意味着政治死亡。也就是说，应当寻找某种更简单易行的办法。

议论越来越不现实，都是历史的类比。但是不知为什么所类比的过去的活动家都是独裁者，而这在民主化条件下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采纳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建议：总书记及其副手由代表大会选举，副手将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

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寻找“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在报刊上和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批评意见后，总书记已经同他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了，戈尔巴乔夫已不再喜欢和满意利加乔夫了。需要一位新人，但不仅仅是纯洁无瑕的，要想被党选中担任这一职务，应当具有一系列优秀品质：担任大的党组织的领导，被公认为自由派，具有党内工作、经济工作或苏维埃工作的经验。但是还远不止这些，谁要以为苏共二号人物应当“绝顶聪明”，应当具有坚强的性格和雄辩的口才，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确切地说，他应该具有完全不同的“优点”：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不超越头号人物，善于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领袖的思想并在任何情况下不把它们据为己有。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具有上述品质的人在党内无疑可以挑到，而具有相应“优点”的人到哪里去找？这真让人伤脑筋。当然，有一个冒险的解决办法——提拔两个精明能干的人进政治局并让他们“相互争斗”。以往的经验证明，这将长期耗费第二书记的精力，他将会经常忙于斗争，寻求总书记的支持，这样他就顾不上搞阴谋了。但是这事带有很大风险：万一两位合格的领袖互相协调，那总书记就完蛋了。

开始审查可能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亲自做这项工作并对自己的选择严格保密，当然是在一定时间内。他对那些应该离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顶替者的名单也秘而不宣。这里的挑选原则不是什么新的：需要“自己”人，但是要那些不特别顶嘴的人。我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做的，但是最近组建党的最高机关的方法基本就是如此。

也许这种幕后政治活动是建立顺从班子的唯一途径，但是它给人以某种卑鄙的感觉。难道就不能实行正常的选举吗？要知道人们了解自己有威信的领导者的，可以让他们提出候选人。但是，恐怕只有那些从未当过一把手的人才会这样说。

1990年春天正是紧张的时候，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了，报告正在匆忙起草中。戈尔巴乔夫常去沃伦斯科耶的“写作班子”那里，后来则常去离他的郊外官邸很近的新奥加廖沃。他已不再去扎维多沃，没功夫，而且也没有那种心情，总书记始终对代表大会的结果担心。我看到，他的班子的情绪也不佳。人们不耐烦了，失去了信心，他们感到，留给历史的只是空话而没有行动。过去的五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空的，而对人民来说是希望落空、幻想破灭的五年，是实际生活下降的五年。全社会都愤怒了。共产党员受到排挤，甚至那些在平炉旁、在田野或农场工作的共产党员也不能幸免。关于这一点，寄给总统和苏共中央的大量信件可以作证。

代表大会终于要开幕了，这一次它是在夏天举行。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走到主席团的桌子前宣布，一共选出4683名代表，除26人外，其余全部到会。接着选举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争论立即展开。来自马加丹的一名矿工建议将党的全部权力交给代表大会，宣布全体苏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辞职，不选他们为领导机关成员，因为他们没有完成苏共二十七大的决定。他还建议对每一位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作出个人评价。

戈尔巴乔夫答应回头讨论这个问题，并随机应变，使斗争降温。他当然永远不会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一来气消了，对立情绪不那么激烈了。选出的大会主席团完全是工作性的，它的人数很少。大会的其他领导机构也都被通过。应该开始工作了，但是麦克风前的发言者却常常抛出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煽动听众，燃起他们的激情。只是两个半小时后才转到苏共中央向党的二十八大报告工作的议程上，报告由戈尔巴乔夫来作。

他的报告还充满了乐观主义，要人们相信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但是，戈尔巴乔夫对此说得愈多，会场上的气氛就愈紧张。人们又在谈论党的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反映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等问题，列举苏共信奉的其他价值观。总书记自己是否相信他所说的话，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确切说是缺乏行动，只是为了应付形势变化吗？连那些很了解总书记的人也永远搞不明白，他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

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会上声明，实行私有化就意味着党选择的道路及其工作方法是错误的，所以必须纠正这种私有情绪，而在二十八大上的报告中却说各种私有形式是必要的。“市场”这个词，过去总书记提起来就谈虎色变，现在成了消灾避祸的法宝。问题当然不在于观点的改变，而在于这种改变必须要有根据，必须向共产党员、向全社会通报。许多人还在重复着戈尔巴乔夫昨天的口号，而今天这些口号已被改变和抛弃。这使人们感到莫名其妙，越来越多地产生一个问题：总书记、政治局是否还控制着局势，他们是否在批评的压力下摇摆不定。我在《真理报》工作期间认识的一个区委书记有一次对我说：

“你们上层这样变来变去，我们都跟不上你们在理论观点上的变化。我经常到一些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人们讲解形势，说社会主义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可再一看，你们已经提出了新的思想。我只好再次去企业，人们向我提问，说我三个月前就是这样说的，他们问我有没有自己的观点。我有自己的观点，真的。我认为我们选出的某些领袖反复无常。请你们每次作决定前先弄清情况，三思而后行。别以为在边远地区的人都是傻瓜，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一切，只不过暂时沉默不语罢了。”

代表大会坚持要党的领导人报告工作，戈尔巴乔夫作了让步。第一个发

言的是雷日科夫，接下来是梅德维杰夫，他早就受到批评，说他瓦解党的思想体系。随后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扎伊科夫、利加乔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作了发言。许多代表对领导人的报告不满意，要求他们承认错误，悔过自新。会上的情形跟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不容人反驳，争抢麦克风发言。也许这是一种时代的风格，也许西方民主的拥护者现在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或许是人们“被压制”得太厉害了，对空话和无所作为太厌烦了，所以代表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每天的情况都是如此，政治局委员个个懊丧不已，无精打采。他们预感到，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这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了。在政治局委员聚会的房间里什么情绪都有：怀疑者的激昂的声音，失望者的无动于衷，热情者的充满斗争神情的眼睛，悲观者的暗淡的目光。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忧虑不安，休息时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会场里，在电视转播机前答记者问，同某个人交谈。他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也曾利用这种方法。许多人想挤得近一点，想“进入镜头”。交谈的内容常常是大会讲台上刚刚谈过的那些问题。这种“深入群众”的做法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也试过，但是在全会上没有许多人围着他，没有人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许多人不走近总书记，这种情况使他十分不安。他从会场回来时常常抑郁不欢。

总书记的果敢精神和信心越来越不足了，有时让人感到，他对这一切早就厌烦了，懊悔担负这个力所不及的担子。会上经常有人指责中央和他本人无所作为，而且指责十分尖刻，只有神经坚强的人才经受得住。但是，终于触到了他最痛的地方，人们呼吁总书记埋头国内事务，少到国外去周游。这个批评正中要害，戈尔巴乔夫忍受不住了，脱口辱骂这位批评者。他为此生了很长时间的气，指出他这个缺点的阿尔泰区党委书记再次发言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还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叶利钦请求发言，当时他已完全转到反对派方面，因此人们对他的发言特别注意。他比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讲得更坚定、更自信，他的话语十分尖刻，简直有些残酷，而且与其说是对大会代表讲的，不如说是对人民讲的。他着重批评了党的机关，认为希望在于实行多党制，在于让苏共党员有可能决定自己的政治选择。他建议改变苏共名称，使它脱离一切国家职能。人民“将只支持这样的政治组织，它不是号召实现不切实际的、遥遥无期的共产主义，而是通过日常事务维护每个人的利益，帮助我们的国家变成先进的、富强的、幸福的国家”。叶利钦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这样说道。

但是，戈尔巴乔夫担心的不是这种关于国家和党的预言，他感到不安的是叶利钦关于现苏共领导人的前途的话：“可以认为，人民将会要求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因他们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而实行法律制裁。我这里仅举一件事，即由于禁酒运动而造成的损失。人民还会追究其他方面的失误责任：对外贸易方面、农业方面、民族政策方面、军事政策方面，等等，等等。国家应当知道苏共给它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这是对总书记本人的警告，我感到他牢牢记住了指责的要点，当时他要尽力挽回局面。至于叶利钦的发言，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最后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了。他同党告别时，警告说苏共及其领袖将不会得到好结果，最后果不其然。他宣布自己退党，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认定他作为代表的权利失效。

无论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之间、叶利钦同中央之间的冲突有多严重，这种抗议性的退党给许多代表和共产党员留下了印象，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以及后来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当然，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的行为对事情的这种结局也起了促进作用。

代表大会继续工作，它就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各种问题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提出了国家进一步改革的新途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感到制定的决议没有生命力，因为没人去执行这些决议，没人去为实现它们而斗争，也没人要求实现它们。

代表大会进入最后议程，选举中央总书记及其副手。从一开始讨论候选人就产生了意见分歧，一些人想让戈尔巴乔夫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另一些人认为他不能一身兼两职，说这不合规矩。有人说总书记不抓党的工作，还有些人担心如果苏联最高苏维埃禁止兼职怎么办。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作出了选择，他不打算放弃领袖的位置。大会开始提名候选人。被提名的人很多，但是他们都先后放弃了，只剩下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阿瓦利阿尼。他经历了坎坷的生活道路，一直坚持同戈尔巴乔夫“竞赛”。诚然，阿瓦利阿尼在表决时只得到 501 票。但是令人惊奇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在 4683 名代表中有 1116 人对戈尔巴乔夫投了反对票。这一结果看来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实质上这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败：四分之一的大会代表不再信任他……

戈尔巴乔夫内心为之一震，他当然知道事情不会平静地结束，还会有斗争，但他没有料到会在政治拳击台上被击倒，裁判已开始为他剩下的日子计数了。

接下来还要经受一道考验——选举总书记的副手。除了“预定的”弗·安·伊瓦什科外，被提名为候选人的还有利加乔夫。在规定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回答问题的时间里两人都通过了检验。好像对利加乔夫提的尖刻问题要多一些，令人感到他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还会遇到困难。结果正是如此：大会选中伊瓦什科为中央总书记的副手。利加乔夫总共得到 776 票“赞成票”，3642 票“反对票”。

我无意中看到了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结束的最后一幕。总书记在对自己的“副手”投完票后，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吉耶夫厅通往大会堂的狭窄通道里意外地遇到了利加乔夫。刹那间他不知所措，突然说了一句：

“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叶戈尔。”

“而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利加乔夫回答说，“投票赞成您当选总书记……”

他们分开向不同方向走去，从此他们永远分开了。我记得，利加乔夫在 1985 年春天为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他掌握着“党的干部”，他找过不止几十个中央委员、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谈话，请他们在 1985 年的非常全会上支持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五年过去了，不同的世界观、性格和原则使两人分手了，戈尔巴乔夫很容易抛弃老关系和老同事。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过朋友，至少在莫斯科是这样。还有一个大问题：他到底有过同志吗？这似乎不该问我，请听听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们是怎样说的：“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总是回避人际交往？他有没有亲近的同志，还是他信奉英国政治家的哲学：英国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但是它有利益。”

有一次在谈话气氛比较坦率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赖·马·戈尔巴乔娃，

她一向很介意普通人和不太普通的人对他们的看法。我说，党的领袖不同自己的战友在通常的家庭环境中聚会，不讨论人们的日常小事，这不能不令人遗憾。这些话看来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感到不安，她很快又开话题，挂上了电话。五分钟后，她又打电话说：

“可您大概也知道每年新年都同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以及他们的妻子聚会呀？”

我的确知道此事，但是第一，这种聚会只是每年元旦搞一次；第二，正像中央书记们告诉我的，这是一种令人乏味的不得不应酬的聚会，它很像是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带着妻子和举着酒杯罢了。很多人都极力逃避这种聚会，因为那里的气氛使人压抑，说不定会给谁留下不快之感。

也许我触到了总书记最痛的地方，因为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交代我编制一个他的助手、顾问和他们的妻子的名单，可能想搞一次什么聚会，但是当他一看到长长的名单后，显然就彻底打消了聚会的念头。当然，问题不在于聚会和酒宴。在总书记同他的战友的关系中没有人际温暖，没有尊重。戈尔巴乔夫当政这几年他的班子工作任务繁重，精神备受压抑，在这种环境中非常需要人际温暖、正常交往、支持甚至关心。我向来认为，能够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只是为了共同的思想，而绝非为钱，因此把周围的人当作仆人对人是极不尊重的。

就这样两位领袖分手了，他们心里未必能留下相处的温暖。难道政治斗争高于正常的人的感情？或者是我什么也不懂，或者是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权力而准备忘掉一切其他的東西，也许他们就根本没有其他的東西。

在二十八大大选出中央委员后不久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选举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也在全会上被选进政治局，因为当时忘记规定代表大会上不仅选举总书记为中央委员，而且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新的党的最高机关的人员组成大大改变了，以前的领袖们实际上都没有留下，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梅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扎伊科夫、斯柳尼科夫和其他许多人都未进政治局。选进来的都是带有另外的优点和缺点的“新”人。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都进入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改变了，实际上百分之八十的中央委员都是新人。

代表大会期间，有一次我走进戈尔巴乔夫的房间，看到他一个人在拟定中央委员名单，现在这项工作他不委托任何人了。戈尔巴乔夫也不能同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商量，因为他知道他们实际上都要离开政治舞台。他也不能同拉祖莫夫斯基商量，后者早就因健康状况请求辞职，而且戈尔巴乔夫对他也不满意。利加乔夫的命运也已经非常清楚。就这样，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一副孤独的、凄凉的样子，拟定着中央委员会这个几十年来在我国最高最有力的机关的成员名单。我看了纸上字迹潦草的姓名，突然感到，在这些纸上已经确定了一场大悲剧的最后几幕，而这场悲剧的深度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已不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中央全会了，而是从前的大党内部各种派别的代表的集合体，这一点很快就在毫不妥协的争论和尖锐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了。

但是这一切也使人感到另外一种不祥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这个在人民中已失去威信，甚至在党内也失去影响的人竟然可以独自确定苏共的领导人，从而确定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确定自己意志的执行人。这又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它竟容许一个人决定千百万同胞的命运，决定一个大



国的未来。

## 走向总统的历程

1990年3月27日。这天早晨苏联人民代表从“俄罗斯”饭店和“莫斯科”饭店鱼贯而出，前往克里姆林宫。10点钟将要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会，宣布头天晚上选举苏联总统的投票结果。巨大的礼堂坐满了人，里面不仅有代表，而且有不少来宾：各部部长、各部门工作人员、数十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到处是记者：电视台记者、电台记者、摄影记者。

大厅里闹哄哄的，像一窝受到惊扰的蜜蜂。计票委员会晚上的工作没有保密，选举结果已悄悄在代表之间流传。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在正式宣布之前不能太相信小道消息。

休息室的铃声响了，代表们各就各位，我也坐到了北奥塞梯代表中间自己的位置上。我刚才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到主席团聚集的地方去了一下，聚集在自己房间里的政治局委员已经知道了计票结果。戈尔巴乔夫显然在黎明时就得到了通知，他虽然满脸倦容，但是看样子很满意投票结果。他脸上荡漾着笑容，漫不经心地接受着人们的祝贺，把助手拉到一边，交代他们起草誓词。这个仪式对他和国家来说都是新的，但是助手们知道美国的做法，所以并不觉得困难。其实他们已经做了某些准备，不过事情并不会因宣誓忠于苏联人民而延缓……

主席团成员各自就座，计票委员会主席宣布投票结果，全场静静地听着检票情况，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位总统，在2486票中得到1834票。代表们起立，向新的国家首脑鼓掌祝贺。他将要宣誓，于是，3月28日苏联总统将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誓捍卫宪法，遵守宪法的精神和规定。苏联第一位总统就这样产生了。各共和国也不甘落后，半年之后苏联已经有十多个总统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去，问题只有一个——为总统工作配备一个相应的管理机构。以前决定推举他担任总统职务时曾谈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只是泛泛议论，而现在要提出具体建议。他的机构应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人心里有谱，尤其是考虑到戈尔巴乔夫仍是总书记，他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了。他当着我的面给助手们打电话，然后又给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打电话，请他们为他准备建立总统机构的提案。

最后他对我说：“你也准备一下自己的意见，机构应当不大，但要有效率。”

说起来容易：“机构应当不大，但要有效率。”但是这个任务有许多未知数，在着手确定机构的结构和人数前首先应当知道，苏联部长会议是否保留。戈尔巴乔夫曾无意中说过一句，他不再需要这样多的部长和工作人员的政府了。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就明白，总统不会轻易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你先想一想，然后我们再讨论。”

过了一些时候戈尔巴乔夫又把我叫去，给我看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和沙赫纳扎罗夫提出的总统机构的方案。总统已看过这些方案，几个人的观点、构想各不相同，机构也没有缩小。关于政府的组成方案在戈尔巴乔夫心里也已酝酿成熟，他在办公室里一边踱着步一边说：

“我们需要五六个全苏性的部：能源部、国防部、交通部、经济部、财

政部，应当想想还有什么。所有其他任务由地方和共和国解决，而留归中央管理的部要进行精简和改造。苏联部长会议，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再需要。一切都由总统领导，为解决日常经济问题，应建立一个以总理为首的内阁。副手要少，总统和总理设一个管理机构，一切技术服务手段也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继续议论着管理机构，连可能的政府领导人也谈到了。可是我觉得，这不过是解决问题的初步办法或者更像是愿望。改变上层管理机构，同时丝毫不触动地方，这是相当复杂的。核工业和核电站怎么办？需要外交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银行归谁管？我向总统提出这些问题并建议由新政府或其领导人就国家经济管理机构提出一个完整的构想。戈尔巴乔夫同意了。

“总统机构应包括为内阁服务的部门。”戈尔巴乔夫最后说。

一个半星期后，我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份总统机构示意图。政府将是什么样的，还不清楚，方案还没有准备好。在一张很大的绘图纸上画着机构的所有部门，它们的相互关系和隶属关系。戈尔巴乔夫仔细看着示意图，读着说明文字，他让我把图全留下。过了几天他把图还给我。要求把一些部门合并起来，把某些部门独立出来。他补充了一个同他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责有关的新部门，设立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及其对军队和国防工业、内务部、克格勃的管理机构。后来他批准奥·德·巴克拉诺夫担任此职。

重新修改完示意图，我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他让我去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当时大会堂里正在竞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其中一个主要竞争者是叶利钦。由于旧的偏见和恶感，人民代表产生了意见分歧。党把赌注压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亚·弗·弗拉索夫身上。投票结果表明，哪一个候选人没有得到所需的票数。两轮投票都没有结果，于是苏共改换自己的候选人，由伊·库·波洛兹科夫加入角逐。

戈尔巴乔夫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他来到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并作了发言。他的发言令人感到他支持党的候选人，他在会场一直呆到投票结束。无论是在叶利钦当选前还是在叶利钦当选后，他从未作为苏联总统到过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在八月事件后他到过那里，但这时已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也不选择坐的位置了，甚至连国旗好像都忘了，这简直不可饶恕。

选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是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决定戈尔巴乔夫坐的位置，召开了一个精英会议来帮助总统思考。参加会议的有像卢基扬诺夫这样的专家。坐在第一排似乎不合适，有人建议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但是要比主持会议的代表高三四排。这个主意也被否决，因为戈尔巴乔夫决定带着总统的苏联国旗一起去。

戈尔巴乔夫带国旗和其他象征物还是第一次，不知是他自己看到美国总统总是坐在国旗旁边呢，还是他的助手提醒他这一点，他下令在他的座位旁放置一面苏联国旗，而在总统座机上画上苏联国徽。所有这些愿望安全部门都照办了，现在总统办公室、会议厅和其他场所，凡是总统坐的地方，都在一个专门的台架上挂着一面鲜红的苏联国旗。

那天在解决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座位问题时，国旗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既然既不能坐在会场也不能坐在主席团中，有人建议坐在楼座上，那里既可以让大家看到国旗，又可以让大家看到总统。虽然看似坐在代表的侧面，但却是在他们的上面。这应该使竞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党的候选人的拥护者受到鼓舞。但是，不知是看不清国旗呢还

是看不清总统，反正总统的代表大会之行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伊·库·波洛兹科夫落选了。

那几天也取得了几项实际结果。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接过机构组成示意图，趁着讨论候选人的时间，对示意图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认真的修改。他又勾掉了几个部门、另添了几个，改变了几个部门的隶属关系，使它们直接归自己领导，并确定了机构的人数和工作人员的任命程序。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以总统令批准的，他请我负责提案工作和领导该机构。

还需要为最高领导人——苏联总统和副总统建立若干最重要的部门：安全会议、国防委员会、戈尔巴乔夫和亚纳耶夫的助手和顾问班子。这个班子仍按以前的标准，人数众多，最近一段时间，仅总统的助手和顾问就有瓦·安·梅德维杰夫、亚·尼·雅科夫列夫、列文科、谢·费·阿赫罗梅耶夫、瓦·瓦·扎格拉金、B·叶戈罗夫、B·卡拉肖夫、维·尼·伊格纳坚科、B.A.奥热列利耶夫、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格·霍·沙赫纳扎罗夫，还有格·普里亚欣、B.C.古先科夫和几个顾问。按照美国方式，他们自己的服务人员，包括助手、顾问、秘书、速记员都属于助手机构。戈尔巴乔夫还下令批准了大量编外顾问。他们是B·阿巴尔金、斯·阿·西塔良、B·奥西皮扬和其他许多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批准了总统机构设置，但是现实生活经常对它加以修正。起初内阁是完全服从于总统并且只有6~8个部，但这个设想很快就与实际相脱离。我惊讶地发现成立了一个同前苏联部长会议一样的货真价实的、独立的管理机构。强大的管理机构就像生物肌体中的细胞繁殖一样不断增加。由总理瓦·谢·帕夫洛夫以及整个内阁“提出”、戈尔巴乔夫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不断成立一个又一个新部，它们实际上同以前的部没有区别。

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大而有效率的”管理和服务机构的思想也相应落空了。内阁机构超过了2000人，为它以及各部服务的经济和技术人员约有16000人。苏联总统机构1991年8月共有技术人员不足400人，因此，无法再对这些机构进行任何合并或精简。戈尔巴乔夫签署的建立共同机构的命令无人理会，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求说：

“有些事您可以同帕夫洛夫一起解决。怎能什么事都要我来做？您至少可以决定某些问题吧？”

我能决定什么？如果苏联总统发布的关系全国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指示都得不到执行，怎么能“解决”机构的精简与合并问题？内阁不理睬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也看到了，但他默不作声。显然，由于过于劳累和其他什么原因他经常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敢拒绝任何人的请求，特别是某些有影响的人的请求。这一点在决定继续使用原经互会大楼的问题上表现甚为明显。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伊·斯·西拉耶夫请求总统将该大楼交他使用，他提出的理由是他必须在那里安排几个部和一些服务部门，说这座楼离白宫近。戈尔巴乔夫责成帕夫洛夫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卢基扬诺夫也就这座楼房打报告，说苏联人民代表办公地方太挤，请求把该楼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总统又责成帕夫洛夫认真对待卢基扬诺夫的请求。后来莫斯科市长加·哈·波波夫也想要这座楼，戈尔巴乔夫又在请求将楼房交给莫斯科苏维埃的报告上作了肯定批示。最后叶利钦就这座楼提出请求，戈尔巴乔

夫又责成认真审议和解决问题。对其他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原则性问题，他也是这样的态度。

从党的总书记向苏联总统的转变是艰难的，不彻底的。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的多年的书记生涯中养成的许多工作方法、风格和作风在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活动中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戈尔巴乔夫要求建立一个类似中央政治局的机构，在那里可以发表讲话、发布指示、审议产生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各种社会生活问题的立法文件。这种思想显然是亚·尼·雅科夫列夫提示他的，结果它就像一粒良种，掉在肥沃的土壤中，发芽结果，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其参加者既有政府代表，也有社会活动家，如钦·艾特马托夫、尼·雷日科夫、B.亚林、亚·雅科夫列夫、瓦·拉斯普京、斯·沙塔林、瓦·梅德维杰夫等人。我也参加了该委员会。

建立这个委员会的思想是很好的，但是该委员会是一种自愿的组织，苏联宪法没有规定这样的机构，委员会的人员与构成完全由总统决定。委员会也没有明确的任务，它总共只开过5~7次会议，审议了几个日常问题、国防工业转产问题和一些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与会者的水平还是他们的地位，都使他们不能深入地和认真地解决问题。给戈尔巴乔夫提建议成为一种空谈，因为戈尔巴乔夫不需要这些建议。因此委员会的会议不是定期举行，而是随意安排。我发现，召集委员会开会成了总统的负担，很快委员会对他成了一种妨碍。有一次戈尔巴乔夫请求委员会就国内形势谈谈看法时，这种情况就明显表现出来了。委员会成员们第一次感到他们是有用的，可以阐述形势并提出对策。

结果，总统就听到了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话。B.亚林、瓦·拉斯普京和其他一些人谈了国内局势，说人民已经厌倦了试验、犹豫和空谈。“改革”一词在大多数人中引起了变态反应，因为好端端的事情被搞坏了，成了对合理看法的嘲弄。我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脸涨红了，知道这是不祥的征兆。总统没等所有的人都发表意见就中断了会议，而且不再急于接着召开。

“你瞧，他们胡说些什么。”过后戈尔巴乔夫一边在办公室里神经质地踱着，一边说道，“这就是我所信任的人，这就是我从鬼知道什么地方提拔上来的人。这个亚林，可真行！对瓦·拉斯普京我的确也没有别的指望。”

总统委员会的命运已经注定，不知是觉得这个机构无用呢还是对它的人员不满意，或者是由于来自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批评（最高苏维埃代表认为许多无益的决定都是出自总统委员会），反正时隔不久戈尔巴乔夫取消了该委员会。而且这一举动非常仓促、迅速，委员会成员是在决定通过之后才知道自己被免职的消息的。我知道，这种不礼貌的做法深深刺伤了许多人的心。

“你知道因为什么把我们免职了吗？”雅科夫列夫问我。

我否定地摇了摇头，对所发生的事我也和他们一样不知所措。

“这算是什么事？先生。”对突然解散委员会强烈不满的雅科夫列夫说道。

不过，他很快就同总统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企图淡化这一不策略的行为，他答应保证雅科夫列夫的一切物质保障并建议他领导重新建立的总统顾问班子。然而他没能遵守这个诺言。梅德维杰夫也当了顾问，他过去曾同雅科夫列夫一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总统委员会成员，他当然不愿也不能服从雅科夫列夫的领导，所以只好让两人都做高级顾问。戈尔巴乔夫不想保留他们过去的用车待遇，这是尤·谢·普列汉诺夫告诉我的。在工资方面

也是这样，因为其他总统顾问不理解这里的工资差别，这会造成新的矛盾焦点。

苏联总统不遵守诺言，使雅科夫列夫感到心灰意冷，他的职责使他感到苦恼，1991年仲夏他向戈尔巴乔夫面交了辞呈。

“亚历山大刚来过，”戈尔巴乔夫说，“提出了辞职和说明他这么做的详细理由。我请他先别着急，再考虑考虑。你把辞呈收起来，但是先别给他办理。”

7月初雅科夫列夫前往瓦尔代休假，从那里又给戈尔巴乔夫寄来一份辞呈。这次戈尔巴乔夫批准了他的辞职。

我对此事感到不安，但不奇怪，在谢瓦尔德纳泽突然提出辞职后已经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总统周围的气氛早就不正常了，变得有点虚伪和令人忧郁。我认为，他从来都不相信任何人，对别人的工作和成就感到妒忌。但在外表上这不是总能一下子看出来的，所以人们一开始都愿意接近他。

我已说过，戈尔巴乔夫在刚上台那几年受到学者、作家、记者、政治活动家的极大关注，他很愿意会见那些不仅期待着改革，而且在寻找能够联合和领导各种健康社会力量的领袖的知识分子。人们无私地尽力帮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新的思想，带来经过多年深思而酝酿成熟的方案，想方设法使改革不仅能开始，而且能巩固并取得积极成果。

这个时期大多数人相信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国家生活能够得到改善，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一种自由的创造性局面。然而戈尔巴乔夫那时就对前来帮助他的人怀有某种戒心，他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不完全相信他们，怀疑他们的真诚，所以他从来坦率直言。由于这种与人疏远、工作不尽职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不礼貌行为，许多人开始寻找借口离开戈尔巴乔夫。

我知道他同卢基扬诺夫自大学年代就有来往，我总觉得，这种昔日的关系会使他依赖卢基扬诺夫的帮助和建议。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他经常轻蔑地谈起卢基扬诺夫，说他有“教授”腔，总是以一种教训人的口吻提建议。

“他总是用反面的社会舆论和信件来吓唬我”，戈尔巴乔夫常常忿忿不平地说，“人民支持我，我不需要这种好为人师的口气。”

当然，我不了解他们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中的各种细节，但是我清楚地看到，戈尔巴乔夫很难容忍卢基扬诺夫，这一切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关系。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不喜欢卢基扬诺夫的妻子，常常火上浇油。从某些议论和意见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对卢基扬诺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中获得的威信十分敏感。此外，卢基扬诺夫更博学多才，更有教养，这也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他经常忍不住对卢基扬诺夫说一些挖苦话。当然，卢基扬诺夫也有缺点——心胸狭窄，猜忌多疑。但是他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执行戈尔巴乔夫给他的指示。这也没能使卢基扬诺夫得救，在第六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坚持认为卢基扬诺夫在八月事件中有罪并把他交由检查机关侦查。许多代表都有这种印象，我想，凡是在电视上看到这齷齪的一幕的人都会有这种印象。

戈尔巴乔夫推荐阿·谢·切尔尼亚耶夫为国际问题助手，他是一个真正有学识的精力充沛的人。

正像人们常说的，他是凭良心工作的。苏联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包括裁军问题协议，没有一个不经过切尔尼亚耶夫这个戈尔巴乔夫的小谢瓦尔

德纳泽之手，没有一个不是经他充实和赞同的。我认为这位党的老工作人员、忠于祖国的前线战士没有错，他是奉命起草那些给我们的国家、军队、俄国的利益带来损失的关于裁军、撤军等文件和各种协议的。总书记常常使一些富有经验的人也上当受骗。

因此，当一次戈尔巴乔夫对我说不应把所有的重要文件都委托给切尔尼亚耶夫时，我并不感到奇怪。

“他的履历表中家庭第五项内容有些问题，你不要把绝密的信息给他看，也许会‘远走高飞’。”

他的这个警告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久久不愿批准切尔尼亚耶夫做自己的助手。

我不了解切尔尼亚耶夫家任何人，也不了解他的亲属的出身，但是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对他身边的人都有考查材料并知道可以委托谁干什么。但是这一切让人感到不合常理，不合同志之情。

更使人难堪的是戈尔巴乔夫断言他的助手维·尼·伊格纳坚科在安排他答记者问时收了几家外国大众传媒代表的钱，这种指责难以让人相信。伊格纳坚科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多年，他曾协助勃列日涅夫写作《小地》、《复活》等书。他是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电视片的创作组成员，获得过列宁奖金。还有，他很了解亚·尼·雅科夫列夫并把他推荐给了戈尔巴乔夫，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助手，并说他有可靠的材料，他禁止给他绝密文件，担心这些文件会被出卖给外国人。

戈尔巴乔夫对沙赫纳扎罗夫也不完全信任，经常抱怨关于卡拉巴赫问题的决定被泄漏给亚美尼亚了。

安全会议的一次会议泄露了一条绝密的国外情报，致使情报中涉及的人了解了实情，此后，他责成克留奇科夫调查此事，并下令不再邀请自己的助手和顾问参加安全会议的会议，而且供安全会议讨论的秘密问题的范围也大大缩小。

总的说来，沙赫纳扎罗夫在总书记的助手中享有特殊地位，他的外表就像一尊雕塑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一头浓密的银发，古铜色的美菲斯托菲尔式的面孔带着一层薄薄的铜绿。

改革开始后，中央机关里许多人人都知道沙赫纳扎罗夫出身于非常古老的、好像是亚美尼亚人或阿塞拜疆人家族，对此沙赫纳扎罗夫曾多次慎重地说过。

当然，沙赫纳扎罗夫特别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好，而在于他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他实际上了解所有苏共领导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中央机关和最后几位总书记手下工作，所有领袖上台时他都没有被更换，他的世界观总是平稳地随着党的路线一起变动。他有多大岁数，很少有人知道，再说他的作用也不是年岁决定的。他的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在理论上为各个领导人开辟道路，让领导人满意地体验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至少按照某种科学理论行事的滋味。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沙赫纳扎罗夫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闪现出新的光彩，因为时代要求的正是这样的人。他总是面带微笑坐在那里，当人们向他说明所谈的问题是什么和要求他做什么的时候，他的样子就变了，潜藏在他身上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于是沙赫纳扎罗夫很快就一页接一页地起草出一篇好文章。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要求，他也不像其他助手一样去争论，而是另写一篇，而这篇则更正确、

更有说服力。他能够写任何题目的文章，经济、政治、军队、生态，凡是出自他笔下的东西都是杰作。

“我们得到了一个多好的撰稿人，”戈尔巴乔夫常常赞叹说，“一点不挑剔，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像西塔良，我请求了他几次来当助手。而这一位马上就爽快而庄重地说：跟您去——随便到哪儿都行。你看，多好的人啊！”

“没说的，老手不误事。”我附和着总书记说。

“一点不错。如果他能少在国际组织中当代表和少说一些不应说的话，特别是在电视里，那就更好了。”

“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毛病。”我安慰戈尔巴乔夫说。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服务人员在机关中制造紧张气氛，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影响、自己的特权而斗争，有几个人还打报告抱怨不重视他们的作用。由于总统对一些高级负责人也开始不信任，气氛便更加紧张。戈尔巴乔夫不满意谢瓦尔德纳泽某些行动，认为他是在为自己工作，说他首先关心的是提高自己的威信。雅科夫列夫也失去了总书记昔日的信任，戈尔巴乔夫认为，雅科夫列夫也开始“做自己的买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越来越经常派他到城外别墅去起草文件。

我总觉得，一个真正的领袖，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不应也不能陷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无谓的争吵中。监视谁说了什么，什么观点，去了哪里，跟谁去的——这不是当今世界大人物的事，至多是他们手下人的事，而且他们不应卷入宫廷阴谋。可惜，戈尔巴乔夫还没有达到一个国务活动家应有的老练和大度，他卷入了涉及他的战友的各种事件。特别使总书记——总统感到恼火的是他们之中某人的威信提高，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他们之中哪一个人被过多地谈论和报道。当他知道某人受到的赞扬超过他时，他就会失去自制。我根据经验知道，这些人很快就会完蛋，总书记——总统将会使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叶利钦丢掉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一职的一个深刻原因恰恰就在于他被说成（而且不仅仅是在莫斯科）是一位勇敢抨击旧习气的活动家。他在莫斯科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全国各城市的人都读到了，这使戈尔巴乔夫心情不安。这一点就足以使叶利钦不能再担任首都领袖了。还有其他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要感到自己的威信受到威胁，戈尔巴乔夫马上就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不管对方是总理还是外交部长，或是中央书记。

对在报刊上或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受批评的人他也是这样不能容忍，这实际上意味着总统将会很快把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交给”大众传媒随意处置。

如果我说他怀疑自己的大部分战友不忠、自私、想夺他的权，这大概不会错，有时候他的一些做法简直可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喜欢别人给他往郊外官邸打电话，但是他自己却打个不停，好像他完全忘了15分钟前他已经谈过同一个问题，有时他打电话根本没有明显的理由。

“你现在在哪儿？”他问道，听完回答后便说，“那好吧，我再给你打电话。”

因为他给其他人也打这样的电话，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检查反映了一个不相信别人的人的多疑症。这一点我很快就证实了。

1990年夏末，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他突然在上午11点左右给我打电话。从他的声音和谈话我明白，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感到紧张着急。

“你知道雅科夫列夫现在在哪儿吗？”他神经质地问我。

我回答不知道，说今天是星期六，也许他在别墅里。

“不，不在。”戈尔巴乔夫急忙说，“我给别墅打了电话，他不在那里。那你知道巴卡京在哪儿吗？”

我对这个问题更加奇怪，实在猜不透他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

在夏季的休息日人们能到哪里去呢，我推断着，既然不在别墅，那就可能上森林里去了，或者是到河里游泳去了。

“你总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说，“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也不在。”戈尔巴乔夫用凄惨的声音说道。“有人给我说，他们全都打猎去了。如果知道什么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感觉和某种不安，我不明白一个人到森林去休息或者去钓鱼为什么使他不安。他远在海滨，从哪里知道这一切的，看来有人监视这一切并随时向他汇报情况。

40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他打通了他们汽车上的电话，汽车好像停在梁赞州的一处森林里，可是除了司机，这几个人都不在，他们都到远处什么地方去了，没人接电话。司机去找他们了。

“他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干吗凑成一堆？他们想干什么？”戈尔巴乔夫神经质地问道。

我小心地推测说他们在采蘑菇。

“你说什么呀，还有几个将军也跟他们在一起，看来他们是打算做什么事。”

我的情绪完全被破坏了。我明白，他将会常来电话，我将不得不长久守在电话机旁。但是戈尔巴乔夫晚上很晚才打电话来，并且比较平静地说，他同莫伊谢耶夫通过话了，莫伊谢耶夫解释说，他是到狩猎场休息去了，在那里偶然遇上了雅科夫列夫和巴卡京。

“可是给亚历山大的电话到底没打通，说他到森林去了。这事没那么简单，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戈尔巴乔夫最后说。

我知道他对巴卡京也不太相信，对巴卡京在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并开始“得分”特别担心，所以他极力劝说巴卡京竞选俄罗斯总统。

“他超不过雷日科夫，”他说，“但是这有好处——能拉一些选票。”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经常搞这种检查，而且他与雅科夫列夫、巴卡京或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愈复杂，他们对他们的活动就盯得愈紧。他常说：

“亚历山大总想当领袖，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时戈尔巴乔夫同雅科夫列夫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雅科夫列夫常常想另换一个工作岗位。在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人中当时盛行一种风气——总统的助手彼得拉科夫院士离开了他，沙塔林院士同他疏远了，谢瓦尔德纳泽让出了权力，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已经不在，中央委员中总统周围的人渐渐减少，戈尔巴乔夫的助手、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也决定离开。

这个对祖国忠心耿耿的人处境悲惨，导致他最后作出不幸的决定。1991年8月阿赫罗梅耶夫死在了他的办公室里。这位参加过战争全过程、因对人民国防事业的贡献而获得最高军事职位和荣誉的战士，如今竟因为对别墅进行某种装修而受到污辱。看到报刊上写的和听到那些不了解战争却变成了反特权勇士的人民代表说的有关元帅“滥用职权”的无稽之谈，真是令人感到



羞耻。这是那些庸俗小人在吹毛求疵，他们没有勇气捍卫阿赫罗梅耶夫，甚至没有勇气使他免受攻击。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说：公民们，我们对这位前线战士，这位我们应该万分感激的人做了些什么？这些人现在哪里？历史将发现档案中的发言记录并将那些侮辱我们的军队、侮辱其劳苦功高的将领的人公之于众。

国家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使我们以及其他感到震惊，大大刺伤了我们的心，他同自己的助手、世界著名的苏联元帅断绝了关系。

我曾同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一起去过美国，我看到了美国军人和里根是多么尊重阿赫罗梅耶夫的。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迎接他，而那时他已不担任国家总参谋长了。现在他遭受浅薄的小人的侮辱，难道总统的这种背信弃义能不给这位戴着元帅肩章的老战士造成不可愈合的创伤吗？难道不正是国家领袖们不愿向他告别的鄙薄态度导致那些盗墓者恶毒卑鄙地污辱阿赫罗梅耶夫的陵墓吗？

正像我说过的，元帅曾准备辞职。事发前两个月阿赫罗梅耶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并坦率地说，在当前这种他本人受到鄙视、军人受到污蔑、仓促地而主要是单方面地裁军的情况下他无权占据总统身旁的职位，不想参与对军队和国家的破坏。戈尔巴乔夫对事态的这种转变感到不知所措，他请求谢尔盖·费多罗维奇暂缓一缓，再工作一些时候。他当时把阿赫罗梅耶夫拉进自己的机构，是想用他的名义掩盖自己在美国的谈判中作出的那些不总是有根据的让步，他也不掩饰这一点。

“你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他吗？”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只要他跟我在一起，裁军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我们的军人和护国派信任他，西方尊敬他……”

苏联元帅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提出了离开戈尔巴乔夫的辞呈，但是事态的发展如此急转直下，他离开了人世，因为他不能背叛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誓言，以及同他一起经历了千山万水的战斗历程、一起加强军队教育官兵忠于祖国的战友。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这里早已不是创造性的气氛了。如果说过去我对公式化的工作性质感到压抑，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使我感到痛苦。戈尔巴乔夫这两年很容易激动，动不动就发脾气，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改革早就停滞不前了，在权力的上层中进行着不择手段的斗争。我考虑着转到某家报社或杂志社工作，等待有合适的时机就提出辞职，尽管我估计这将会很棘手，但是需要作出某种决断。这事我大概只能同列·费，伊里切夫院士商量。命运使我同他在60年代初就结识了。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真理报》主编帕·亚·萨丘科夫把我叫去，眼不着我（他在谈话时有这种习惯）说道：

“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伊里切夫请求推荐几位记者到他那里工作，我把您的名字报上去了。”

他大概从我的面部表情上感到我不满意。坦白说，我那时并不知道伊里切夫是谁，但是我明白，这将使我离开我热爱的事业。

“您也别担心，我推荐了很多，都比您有经验，岁数也比您大，他们的机会更多些。”帕·亚·萨丘科夫审慎而又平静地接着说，“虽然如此，如果征求您的意见，您也别拒绝，不然将会很尴尬的。”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去了中央委员会。我们来到面朝老广场的主楼的三层，坐下来等着。终于轮到我了，我走进办公室——房间明亮、宽敞、里面摆着一张大会议桌，桌上铺着绿呢子。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坐在桌子后面，他让我坐下，就开始问起我在政治经济学、苏共历史、哲学方面的知识修养来。后来我得知他曾在弗拉季高加索农业学院教授过哲学，熟知季米里亚泽夫的学说。

他是一个好动的、手脚麻利的、急性子的人，经常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我仔细瞧着他：个子不高，微胖，有点秃顶，但脸庞很讨人喜欢，两眼炯炯有神，思维敏捷。他在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并且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没有改变。

伊里切夫根本没有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工作，也没有谈我将要做什么。我谈得非常坦率，完全不希望他看中我。将近一个月没有动静，我认定不会再有人对我感兴趣了，所以当萨丘科夫把我叫去给我看任命我到伊里切夫办公室工作的决定时，我非常不安和伤心。

这不仅改变了我的计划，而且实质上改变了我的一生。然而几年后我又回到了《真理报》社，而12年后再次“应召”做党的工作，来到一个超级大国的最高政治决策场所。

伊里切夫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办报人。他的写作和编辑能力都很强，作为《真理报》的责任书记，他经常出色地组织召开所有记者参加的编辑工作短会。他自己也是在50年代非常痛苦地转到外交部报刊局、后又调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的。他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当我在1989年底或1990年初见到他并谈了自己的计划时，他沉思了一会儿。

“我觉得，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从内部观察这一切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一个搞写作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先别着急，再考虑考虑。我当初对我离开报界也非常惋惜，后来我明白了，我在认识上得到的也许多于失去的。”

关于他如何放弃《真理报》的工作，他给我讲述得“惟妙惟肖”。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语言生动、温文尔雅、一副知识分子的谈吐风度，而且他讲述的那些东西也是情趣盎然。

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伊里切夫皱着眉头说：“这是在50年代，斯大林对我很熟悉，有时打电话谈些工作问题。有一次夜里12点他给我打电话，请我到他的‘近郊’别墅去。别墅在沃伦斯科耶，你知道的。一小时后我来到别墅，除了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也在那里，还有一个人，我想不起是谁了。他们正坐在桌前吃晚饭……邀请我坐下，问我喝什么，给我倒上格鲁吉亚葡萄酒。我当时饿极了，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那时一般都工作得很晚，在报社要工作到拂晓。这是从战争时期养成的习惯，斯大林一直到去世都保持着这种习惯。他们给我倒满酒，我现在还记得：深红的颜色、味道醇美、酒香浓郁……大家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大高脚杯很深，那时斯大林的餐具都是大容量的。我一看。大家都很高兴地一饮而尽，而我喝了半杯就感到喘不上气来，必须停止，不能再喝了。我放下酒杯去夹菜，这时听到贝利亚说话了。他两眼盯着我，好像不对任何人，实际上是冲我愤愤说道：

“‘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应当喝干。’

“我说我还要工作而且不会喝酒。贝利亚已经站起来，用悲痛的声音说：

“ ‘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为您的健康把他的半杯喝干。 ’ ”

“ 斯大林只是眼里闪现着讥讽的微笑，他可能喝多了，正在胡思乱想。我也开始头晕了，我抓住酒杯，紧紧攥住，而贝利亚企图掰开我的手。

“ ‘ 我想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喝干它， ’ 他的两片薄嘴唇变得苍白，裂开笑着。

“ 我感到他醉了，很难预料他最后会怎样。于是我站起来，举杯祝斯大林健康，然后鼓足勇气喝干了。

“ 我感到脑袋沉甸甸的。我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而且那时一般很少喝酒。我坐在那里，觉得酒劲向全身扩散，每个细胞都醉了。食欲已经没有了，只觉得头越来越晕。一看，酒杯又斟满了，这次是为贝利亚干杯。我想我完了，我把酒杯放在酒瓶后面，想吃些菜。刚想夹一块乳猪肉，就听斯大林说：

“ ‘ 为什么伊里切夫同志不愿为我们尊敬的拉夫连季干杯？是受委屈了还是跟我们合不来？如果是受委屈了，那就应当喝和解酒。 ’ ”

“ ‘ 斯大林同志， ’ 我含糊不清地说着，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 我还没有喘一口气…… ’ ”

“ 我觉得我会说出另外的话来，说他不是领袖，但我没往下说。

“ ‘ 他不能喝， ’ 斯大林带着明显的口音，也不看我，对着在座的人说，‘ 伊里切夫同志，让我为我们的朋友、尊敬的拉夫连季喝干您那一小杯。 ’ ”

“ 我又抓起酒杯，连祝词都没说就喝了。接下来又为某人喝，我已经不用人请了，我只是偶尔瞟一眼我看中的那块乳猪肉，后来发现它已经没有了。不过我也不再想吃了，脑海中浮现出往事，我讲了一些寓言故事和记者的笑话，我看到所有的人都笑个不停，津津有味地看着我。我记得，当我离开的时候，马林科夫帮我穿衣服，驾着我的胳膊。

“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我走后的事。那天我走后，所有人都回到桌前，斯大林问道：

“ ‘ 《真理报》主编到底怎么办？是否任命伊里切夫？ ’ ”

“ ‘ 太贪杯，斯大林同志， ’ 贝利亚说，‘ 而且口不严实。应该找一个比较稳重、比较严肃的人。 ’ ”

“ ‘ 我同意，拉夫连季， ’ 斯大林说，‘ 您看任命谁。 ’ ”

“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伊里切夫伤感地回忆着 40 年前的事，他接着说：“ 我的任命没有通过，而派谢皮洛夫当《真理报》主编。从此我的办报工作就减少了，调到外交部和中央之后就完全停止了。但我不惋惜，你也别惋惜，而只要有可能——你就写，别放下手中的笔。 ”

几个月后，伊里切夫离开了人世。这位院士、外交部副部长、新闻工作者、前苏共中央书记还是一位绘画鉴赏家。几十年来他收藏了几十幅世界著名画家的优秀作品，他把它们全部捐赠给了博物馆，其中包括他的故乡克拉斯诺达尔市。

也许伊里切夫对我的劝告是正确的，但是环境变得越来越陌生。戈尔巴乔夫身边那些 1985 年同他一起开始激进改革的人一个也没有了，有些人被他“ 赶走了”，有些人自己离开了，而我就像一座小岛，周围是一片不可理解的、越来越陌生的地方。

不过，一些戈尔巴乔夫说他完全相信的人留下来了，如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总统每天要给他们打几次电话，经常会见他们。他们定时向总统汇报国内形势、军队状况、各政治派别情况、他们采取的措施和预定的行动。米

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每天都要翻阅或仔细研究几百页各种通报，他让我同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经常保持联系，尽力协助他们。但是，尽管我们经常联系，总统还是常常通过别人转告他们起草这样或那样的文件。我开始对此不在意，后来明白了，信任归信任，而戈尔巴乔夫怕担风险，对某些微妙问题则通过另外一些人解决。

我对亚佐夫不太了解，而和克留奇科夫是几年前经雅科夫列夫介绍认识的，当时克留奇科夫还在情报部门工作。雅科夫列夫邀请我们到他的别墅作客，我第一次看见了我久闻其名的人。克留奇科夫文静，快活，非常有幽默感，爱开玩笑，对熟人常做一些滑稽可笑的动作，在非工作环境中喜好交际。据我所知，他不喝酒，实际上滴酒不沾，只是在正式宴席上给杯子装满冰，倒上苏打水，再加上一丁点儿威士忌。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溶化的冰水对身体有益，所以毫不吝惜冰块。

克留奇科夫、亚佐夫，还有内务部长普戈一直都是戈尔巴乔夫的顶梁柱，直到他们看清国家、军队、社会会发生灾难，有引起苏联解体、民族冲突、难民增加、经济崩溃的危险时为止。据我所知，克留奇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我国情报机关获得的西方特工机关关于搞垮苏联的打算，关于彻底摧毁我国的大国地位的必要措施的情报。

总统委员会取消后，经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建立了一个安全会议。这是一个符合宪法规定的组织，参加安全会议的有瓦·维·巴卡京、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弗·亚·克留奇科夫、瓦·谢·帕夫洛夫、鲍·卡·普戈、叶·马·普里马科夫、德·季·亚佐夫、根·伊·亚纳耶夫。据我所知，他们大部分人都忠于改革社会生活、加强国家实力的思想。在事情没有发展到国家分裂、经济混乱、流血屠杀的地步前，他们一直支持戈尔巴乔夫同遇到的困难作斗争，后来他们不能不分道扬镳。

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没有固定职务，只完成一些临时交待的任务。其他人都有很高的职务和职责。没有任何有关安全会议的条例，谁也不知道它应该干什么。对此知道最少的是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在召开了几次安全会议后就确信，除了麻烦和额外的负担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总统早就习惯于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或直接找某个执行者而不需要建议，他公开提倡的民主原则对他早就成了障碍。苏联总统实际上已不再就大部分国内国际问题向安全会议成员和政府领导人通报情况，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们分送同某个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谈话记录。1991年8月1日，戈尔巴乔夫召集安全会议成员开会，十分简短地说了一下布什来访莫斯科的事，让人觉得好像美国总统就是来看看克里姆林宫，同戈尔巴乔夫在红场散散步。通报十分简单，以致过后安全会议成员找我或打电话询问还有没有补充信息。这次访问结果始终对安全会议保密，更不用说对党和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了。

其实，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戈尔巴乔夫只让非常少的几个亲信参加了同布什的会谈，而大多情况下是他们两人单独谈话，一有可能他就尽力单独同布什在一起。例如，有一次吃午饭时，当服务员还在往上端咖啡时，戈尔巴乔夫就站起来说：

“乔治，我请您和我一起出去走走。”

他们离开餐桌，只带着翻译从后门出了克里姆林宫，来到克里姆林宫的伊万诺夫广场，然后走到红场。他们之间早就建立了信任的关系，谈话非常坦率，早在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时就为此打下了基础。戈尔巴乔夫在美国期

间始终由布什陪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非常清楚，里根的任期就要满了，必须同他的继承人搞好关系。布什作为美国副总统，当时有很大可能成为总统，他在自己的圈子里毫不隐讳这一点。总书记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有一次，当布什在华盛顿陪同戈尔巴乔夫从苏联使馆前往白宫的途中，他们在汽车里进行了坦率而信任的谈话，谈话的目的，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讲，是为了确定改革的前景。他没说过这些前景是什么，但是我几次看到他请派往华盛顿的特使转告布什，说“汽车里的协议仍然有效，他将彻底履行。”显然，在那次美国之行时戈尔巴乔夫承担了某种责任，定期向对方通报履行情况。

戈尔巴乔夫和布什之间这种密切的私人关系使总书记——总统确信他从华盛顿之行开始奉行的方针能够实现。然而美国的国家首领和实业家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宁愿慷慨解囊向戈尔巴乔夫个人提供各种货币奖金和其他奖赏，而不愿提供许诺的贷款。除极个别例外，我国始终没有得到这些贷款。由于贷款被冻结，我们无法缓解逐月恶化的经济状况。我想，戈尔巴乔夫明白这一点，他清楚“亲兄弟，明算帐”这个理。西方不愿意而且也不会给这种摇摆不定、经常改变的政策贷款。

许多谈判和所承担的义务的真正结果，国家和最高苏维埃领导人都十分清楚。安全会议，正像我已说过的那样，根本没有多大作用。安全会议是不定期召开的，会上提出的多是一些次要问题，有时还有一些偶然问题。会上都讨论些什么呢？1991年4月，在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关于联邦委员会的活动的通报，讨论了关于各共和国履行向中央预算上交资金的义务的问题。各共和国领导人都实行独立路线，都怀疑本地区受到国内其他地区的掠夺。他们对许多经济问题都不了解，在联邦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没有礼貌。会上还讨论了改善情况的可能措施。

4月30日，安全会议听取了关于格鲁吉亚地震和向该共和国提供援助的问题的报告。鉴于某些国民经济部门经常发生罢工和生产中断现象，会议还研究了颁布关于某些国民经济部门实行特殊工作制的苏联总统令的可能性问题。

1991年5月8日讨论了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可能性，7月1日在亚纳耶夫的主持下讨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局势。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办公室里看密码电报。最后一次会议，是在8月，涉及布什的访问、新奥加廖沃进程，还研究了农工综合体的形势。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只是纯通报性的。顺便说一句，苏联内阁也不能就农业问题作出应有的决定。管理杠杆已经掌握在各共和国手中，因此问题被提交给联邦委员会审议。

尽管安全会议是符合宪法规定的机构，但它对任何部门的实际事务都不能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无能为力只是突出表明政权已陷入深深的危机，它没有能力整顿秩序。实际上内阁的活动和苏联总统命令都贯彻不下去了，前苏联版图内的各国的首脑越来越经常地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违背他的意愿而自行相会。共和国领导人的这种行为客观上剥夺了苏联总统的决策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彻底明白这一点，他觉得，只要集中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权力，只要有非常权力，总书记——总统就绝对控制着这个大国。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只是紧紧攥着缰绳，而他的马早就被卸套了，它们现在拉着别人的车奔向相反的方向。但是要想认清形势，需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而总统在他60岁以

后这种嗅觉就不灵了。

1991年5月2日，戈尔巴乔夫满60岁。在我国，这对大部分男人来说是一条界限，到这个年龄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了。但这只是对那些在机床旁、在田野上、在办事处和研究所等地方工作的人而言。对于政治家来说，正如他们所认为的，才刚到成熟期。戈尔巴乔夫也持这种观点。他不打算退休，虽然他的体力已明显减退：他越来越经常地和越来越多地重复说过的话，经常离开话题，想不起向谁交代过干什么。一些老年病也表现出来了——剧烈的头痛、高血压。高血压使他特别担心，他害怕患中风或者类似的病，他认为这是他家族的遗传……

1983年冬天，有一次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我快要死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悲哀地望着某处空间，陷入忧郁的沉思。

“您这是怎么啦？是医生给您说了什么？”

“我父亲就是在我这个年龄时死的，我也是那样的症状。”

我清楚地知道，他那时很健康，而且很结实，至于高血压、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其他的人实际上都有，特别是那些爱坐在安乐椅上并且食欲旺盛的人。他对自己的健康疑心特重，年轻时他就在热列兹诺沃茨克治疗并总是要医生给他查那些根本没有的病。他的胃口很好，如果他不吃什么东西，那准是因为吃得过多或是必须保持体重的缘故。他每星期有两天“减少”奶酪的日子，特为总书记准备了酸奶油奶酪，这种状况要持续一昼夜。但是他经常坚持不下来，他给自己要来咖啡，同咖啡一起端来的有饼干、烤制食品、夹肉面包、糖果、泽菲尔糕和水果软糕。给我的印象是，这些饮食上的名堂反而使他的体重增加了。

政治局开长会时，如果总书记不逢减肥饮食日的话，就给他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他喜欢粗制的食品，尤其是羊筋肉或牛肉养麦粥。早饭也给他做粥，晚饭我也常看到给他

准备的荞麦粥。诚然，除了粥以外，还有其它许多丰富的饭菜。

总书记满60岁了，这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这样的日子里都大庆了一番。所有的领导人、朋友一同志、亲属都来了，大家频频举杯：为伟大的和英明的领袖、为新社会的建设成就而干杯。并照例为领袖获得最高奖章庆祝一番。

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十分简朴，就连最会拍马屁的人也没有提议为伟大的和英明的领袖干杯，建设成就更不用提了。

而且总书记也没有朋友一同志，他对所有的人都保持距离。

总之，没有奖章，更没有吹捧的词句，在这方面我支持戈尔巴乔夫。我认为不需要讲排场，再说在国家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也不是兴高采烈的时候。不过小型庆祝会还是举行了，中央书记、莫斯科州委书记和市委书记聚集在中央书记处大厅里，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祝贺。大家在桌旁坐了几分钟，听总书记的自白讲话，他在讲话中谈了党在他的生活和改革中的作用。他说得好像很真诚，而我听着他那些为了麻痹人们的警惕和在实践中反其道而行之而编造的漂亮话，常常有种受骗的感觉。或者他自己也相信他所说的，就像相信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一样。人心隔肚皮，要想杀死弥诺陶罗斯并走出迷宫，

仅有阿里阿涅德之线是不够的。

最后端上香槟酒来，大家一齐干杯，合影留念。然后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姆林宫，安全会议成员、政府和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将在那里继续为他举行庆祝会。克鲁奇纳跑去吩咐给这些同自己的领袖仅仅会见了半小时的党的工作人员再上些酒来。

而这时第二场祝贺已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虽然戈尔巴乔夫估计帕夫洛夫会讲话，但是发言的却是卢基扬诺夫。他讲了一番祝贺的话并赠送了礼物。随后致贺词的是亚佐夫，他赠送了一把马刀，刀鞘上带有镶嵌物，刀柄是黄色金属做的。普戈送给戈尔巴乔夫一支刻有赠言的马卡罗夫手枪和几匣子弹。这已是第二支马卡罗夫手枪了。第一支带有金色镶嵌物，是维·米·切布里科夫以前送给他的。这样苏联总统就很好地武装起来了，他把一支手枪放在保险柜里并拿给我看过几次，告诉我怎样装弹和怎样瞄准，另一支他可能随身带着。

巴卡京凭着他敏锐的美感送给总书记一尊据他认为是一个诗人的大理石头像，其实它谁也不像，想必是某个公墓雕刻家的作品。戈尔巴乔夫到底没有找出一个与这尊大理石杰作相似的他所熟悉的人来，于是吩咐把头像送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仓库。对真正的艺术一窍不通的管理人员企图把这个被抛弃的礼物作为青年苏沃罗夫的头像登记入册，但他们这一招没行通。无论如何，这首“石头诗”曾被精心保存，它后来的命运我就知道了。

克留奇科夫和另外几个人都把自己的礼品直接送到了总书记的别墅里。一些国家首脑、使馆和我国许多部门也都送了礼品。所有礼品都是个人的，因为中央和安全会议送的集体礼品是一个精致的帕列赫漆画匣，匣盖上应戈尔巴乔夫的请求画着克里姆林宫。

然后轮到助手和顾问们向总统祝贺，他们确实讲了许多动听的话，但是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认为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的话最热烈最动人，他甚至在安全会议上还讲过这一点。

在讲完话和传统的拥抱并且不时带有热烈的亲吻之后，所有的祝贺者都走进隔壁房间，那里的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饮料。斟满的酒杯再次使大家精神振奋起来，的确，远不是所有的人。很多人抿一口酒就离开了这个大厅，忙自己不平常的事去了。庆祝会的正式仪式实际上就到此结束了。戈尔巴乔夫前往别墅，他没有叫一个战友去那里，我想，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他那里。他的几个老战友对庆祝“活动”的冷场和简陋感到几分惊讶，他们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又喝了一杯并按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议论了一阵困难时期。

### 新奥加廖沃困境

记者所称的新奥加廖沃会议和在这个莫斯科附近的总统官邸开始的调整前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相互关系的过程不仅会在祖国历史上留下痕迹，它们无疑将成为中央政权投降的象征，成为一个大国的国家体制崩溃的象征，成为民族冲突激化的象征，从而使这一过程的设计师戈尔巴乔夫的名字

---

阿里阿涅德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之女。她给杀死弥诺陶斯的雅典英雄忒修斯一个线团，线头固定在迷宫入口处，以此帮助他走出迷宫。——译者注。

永垂史册。

然而，新奥加廖沃会议也在我国社会中引发了许多意外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后果今天还难以预言。新联盟条约应当成为这一过程的法律根据。鉴于苏联政府的决定和总统的命令在地方上越来越不受重视，必须制定这个文件。早就出现了谁的法律和宪法更优先的争论，结果共和国只是有选择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不再向苏联国家银行全额上交税款，侵犯部署在他们领土上的军队的利益，限制提供短缺产品。

与此同时，起草新联盟条约实质上并不是政治上的急需，而多半是日益崩溃的经济形势要求的，大家都想在复杂的时期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整天担心被邻居“吃掉”。这也是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加强、流血的民族冲突不断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切更加剧了国家的离心力。

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助长了”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次总书记决定访问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他来到塔林，在那里不由自主地受到部分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挑衅，他们散布谣言说俄罗斯人要吃掉他们。总书记煞费苦心证明，事情完全相反，俄罗斯在养活爱沙尼亚。挑衅者显然就等着这句话。现在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所有社会阶层都生气了，开始要澄清究竟是谁养活谁。污水源源不断地泼向俄罗斯人。戈尔巴乔夫当时动员经济学家为他的论点论证。他引证数字、事实、部门间和共和国间平衡表结算资料，他证明得愈多，他的反对者愈顽强。哪一个民族会同意说自己是被人养活的？哪一个领导人会坚持这种看法？总之，从一切方面来说，总书记都输了，他自己也暴怒了，结果更加激起了爱沙尼亚人的反俄情绪。但他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已经用事实、计算资料驳得他们无法否认。你知道，他们都是外行，手中没有这样的平衡表。我看，他们已开始考虑了，在爱沙尼亚经济学家中也有理智的人，他们懂得是怎么回事。而其他的人则都是浅薄涉猎、一知半解，是强词夺理。”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向人诉说他的胜利，他认为自己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之所以要签订新条约，是因为国民经济崩溃，对内政策没有效果，宣布的改革没能实现。由此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原因——国家领导没有能力实现制定的措施、团结各种社会力量。

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民族间闭关自守只会使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有人多次警告单枪匹马不能生存，单枪匹马只能使尚存的东西完全毁坏。但是，当领导人的政治自负使人厌倦时，当民族主义情绪炽烈起来时，很难用合理的论据说服人们。所以愈是让他们我行我素地占领基地，他们的欲望就愈大，那时就会像有些化学反应那样，一发而不可收。在要求有自己的军队和国防工业之后，又要求有“自己的”货币、边界、海关、国旗等等。

由于中央软弱无力，没有能力领导一个大国，实际上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更有能力的地方领袖。许多人认为这至少是免于灭亡的一条生路。苏联总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给自己保留某些维持总统权力机构的权力和能够保全他的面子的那些象征。但是为了给中央争得这些让步，还需要进行斗争，需要全力以赴、不惜任何手段进行斗争。为进行这种决斗选中了新奥加廖沃。

这座郊外总统官邸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它？

新奥加廖沃位于离莫斯科 35 公里的地方。这座古老的大庄园坐落在莫斯



科河岸高处松林中。它的一部分曾属于一个俄国企业主，所以有几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庄园深处有一座用石头建成的奇特的单独住宅。革命后这里住过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据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讲，这曾是伏罗希洛夫的别墅，后是赫鲁晓夫和契尔年科的别墅。最近几年，戈尔巴乔夫把它用作“个人家庭”会见里根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活动家的地方。

靠近乌斯宾斯克公路有个两层楼的招待所，一共只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卧室，有几个大饭厅。在带顶的和有防寒设备的外廊里也摆着许多大桌子，可以容纳 70~80 个客人。就是在这个招待所二层的大厅里决定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制定新联盟条约草案。

为什么偏偏选中新奥加廖沃这个地方？要知道到这里是很不方便的。各共和国首脑就像旅游观光者一样被用大客车拉来，再以同样的方式送回莫斯科。但这里有自己的优点。首先，制定这样的文件很费功夫，会议经常到半夜才结束，愿意者可以留在那里过夜。第二，组织者认为，新奥加廖沃可以载入历史并成为新思维的象征，成为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共同体这种民主观点的象征。新奥加廖沃文件应当像戴维营协定一样，后者今天还留在全世界的记忆中并“经常被提起”。第三，招待所对会议来说虽然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它拥有保证会议顺利进行的一切必要设备，包括丰盛的伙食，许多最复杂的问题都在饭桌上取得了进展。第四，新奥加廖沃离苏联总统的官邸不远，虽然这不是非常重要，但毕竟能使他很快到达“那里并返回”。也许在这里制定草案还有其他理由。

早在 1991 年初就建立了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院士和总统的两名代表——前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列文科和格·霍·沙赫纳扎罗夫。这是一项费时的和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当时邀请了各共和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来参加。但是最初草案需要由高级人物作政治上的加工，这就要求由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讨论并提出原则意见。戈尔巴乔夫决定召集他们到城郊官邸开会。

应该说，我那时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能比保存我们的联盟更重要。1990 年底，我同戈尔巴乔夫就苏联的命运问题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同总统进行详细交谈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他不喜欢谈论他不痛快的话题并竭力回避那些“沉重的”谈话。但现在所说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因为自 1988 年起在我国就已日益清晰地显露出破坏联盟的深刻裂痕，出现了某些共和国自行其事的现象。当时还只是在许多文人的言谈话语中流露出稍稍可以感觉到的离心情绪，这些人把侮辱中央和俄罗斯，指责它们有沙文主义情绪当作一种时髦。一些乌克兰老朋友对我说：如果仅是外高加索、摩尔达维亚或波罗的海三国的代表闹腾，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抬头，“闹独立性”，那时我们的统一就将完了。坦白地说，我甚至无法想象这种情况。同俄罗斯有着几百年的共同友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斗争了几十年的乌克兰兄弟怎么会背叛我们的联盟。我不相信这一点，我明白，如果这样，那些大量存在的杂居民族和异族通婚的数百万家庭将会非常痛苦。

那时我认为，关于俄罗斯同乌克兰分裂的思想是荒诞不经的，是异端邪说。但是，看来我并不十分清楚某些促使国家分裂的势力的秘密活动。波罗的海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总是向往分离出去，特别是在苏维埃国家通过共同

努力给他们建立了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首先是道路之后。

现在我坐在总统办公室里，谈起了联盟的未来。我认为这个问题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决定着我同总统的合作关系。戈尔巴乔夫知道我的这种“心态”，也许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他的回答直截了当。

“苏联将会存在下去。你谈到对经济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不错，但是你没有看到如果国家垮台会产生什么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问题不仅仅是工厂的归属权，还有领土的归属权，还要重新确定边界。我们有几千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生活在本民族区域之外。你想过他们怎么办吗？不能允许民族大迁移。比方说，如果我们的克莱佩达和许多地区归属波兰人，立陶宛怎么办？”

总统列举了一些有争议的领土，说高加索和中亚一些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可能会因这些领土发生争执。他以乐观主义的语调结束了自己滔滔不绝的话：

“只要我当总统，就不允许破坏联盟。为此在苏联宪法中规定了避免作出仓促决定的机制。现在说说经济。如果没有石油、天然气，没有任何能源，他们能干什么？剪断这条脐带，减少补贴，他们连半年都坚持不住。你是知道的，我在爱沙尼亚时曾说过这一点。我指出了产品供应关系和谁养活谁的问题。这在实践中也可以看到。顺便说一句，爱沙尼亚不是唯一一块依附在强壮的俄罗斯肌体上的领土。所以你不必担心。”

“我不反对主权，但是一想到被某些人挑起的民族不和的严重后果就觉得非常可怕。我不愿参与毁灭国家，我也不相信能够‘文明分离’……”

“你说什么？我再说一遍：联盟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我决不后退……”

他以激动的语调结束了谈话。总统勉强控制住自己，发火可以说是预料中的事。他经常会失去自制并当面提出任何指责——沙文主义、帝王派头，还有更激烈的言词。

我说不准戈尔巴乔夫那时说的是真话呢，还是制造烟幕，或企图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人们在实际中看到总统把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交出，使国家一步一步接近垮台。最后果然如此。波罗的海三国违反自己的所有诺言，未经全民公决，违背苏联宪法，“脱离”联盟，在经济上和国防上打开一个缺口。而重要的是，几十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成为不受保护的人，叫喊民主的波罗的海人首领不把他们当人看。

在这次谈话后到联盟垮台之间还发生了一桩事——维尔纽斯事件。我不清楚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次行动、但是他显然对事件了如指掌。他感到普戈有困难，就请亚佐夫去帮忙，找克留奇科夫谈这个问题。

“不能指望他们。没有一件事能做好。什么事都会搞砸。”他抱怨说。

正是在那个时期他委托安全会议一些成员制定必要时在个别地区或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措施。很难说这是为保护联盟做的准备呢还是怕中央垮台、怕自己的总统职位丢失而采取的措施。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看，后者更像是真的。而当时正准备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将要决定祖国的命运。

1991年5月24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来自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委员会成员已经坐着小面包车到了、各共和国领导人沿着公园林荫道散着步，等候领导的到来。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是乘自己的专车来的，苏联总统很快也到了。全体人员登上二楼大厅。大厅不算大，但

是 50 个人围着大桌子松快地坐下了。这里有许多水晶吊灯、精致的家具、地毯，但是对工作不是很方便，声音效果不好，天花板很低，而且光线暗淡。全体人员就座，戈尔巴乔夫坐在会议桌端头一个不大的主席台后面。他右边是卢基扬诺夫，左边是帕夫洛夫，然后是叶利钦、杰缅捷伊、纳扎尔巴耶夫，以下按苏联宪法中各共和国的顺序排列。桌子的末端坐着前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

会议开始。苏联总统提议会议讨论以下问题：新联盟条约的名称、签订条约的主体、建立新联盟的原则、它的最高机关的结构、税收和所有权。这些都是条约草案的最重要的问题，联邦委员会各次会议围绕这些问题争论不休。

提交的条约草案叫作“主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这个名称的简称同苏联的简称在写法和读法上一致。草案提出今后将保留联邦国家，设置中央管理机构负责管理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戈尔巴乔夫在讨论开始时说，现在对许多原则立场有意见，需要找到解决问题和向前推进的办法。俄罗斯的立场在这场讨论中非常重要，因此大家都注意听叶利钦的意见。他说，应该对草案进行详细讨论，但是俄罗斯领导人主张叫主权国家联盟。中央的形式应当根据各共和国的意愿来确定并可以交给苏联总统管理。应该把最大限度的权力授予地方。只要确定所有权和税收问题，条约可以签署。税收应是单渠道的，每个主权国家将向中央上缴必要的税额。俄罗斯认为，重要的是参加联邦的各共和国应先签订这样的条约。

乌克兰的立场与俄罗斯接近，也很强硬。

与会者都十分清楚，签署联盟条约不是那么简单的。许多前自治共和国领导人也主张作为主权国家签署条约。鞑靼最高苏维埃主席 M. 舍伊米耶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他坚持只有在其共和国独立签署条约的情况下才同意接受条约。

他说：“我赞赏俄罗斯维护主权的精神，但是在鞑靼斯坦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决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如果我们不捍卫这个原则，人民就会不理解我们，就会愤怒。还有经济问题。为什么化学和国防综合体应转交俄罗斯管辖？许多部门应直属中央……”

这样的声明使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十分紧张，反对的意见越来越尖锐。苏联总统建议再对条约草案进行加工，以求立场接近一些；下次会议接着讨论。

但在离去之前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宴会厅。联邦委员会成员、所有与会者都被邀请吃午饭。桌子摆在镶玻璃的外廊里。服务员开始上菜，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的食品，但是十分丰盛。谁要愿意，可以喝伏特加或白兰地。戈尔巴乔夫坐在中间，两边坐着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苏联政府和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宴席通常使矛盾得到一些缓和，毫不妥协的双方都变得和气了并做出样子，似乎对他们在会议上争执不下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话题越来越趋于一致，不时地开着玩笑，相互祝酒。戈尔巴乔夫总是在情绪特别激烈时利用这种工作休息时间请大家吃饭，他只不过是觉得这种方法可以协调联盟条约，等到下次会议开始时一切又“恢复原状”。

1991 年 6 月 3 日联邦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对文件进行加工，主要是想说服某些共和国领导人缓和自己的立场，但这不是那么简单的。戈尔巴乔夫建议逐条讨论草案，协调立场并一页一页地签署。这种方法遭到反对，俄罗

斯人坚持要讨论原则性问题。又开始对文件的名称、共和国的主权、所有权等进行协调，第一页只是在第二条和第四条上达成一致。参加会议的有大约40名共和国领导人，每个人对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要求，在原则性问题上谁也不愿让步，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会议到半夜才结束，最终也没能取得进展。

1991年6月17日下午3点联邦委员会成员再次聚集在新奥加廖沃，想单个讨论每一条的企图很快就破灭了。前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反对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认为自己是主权共和国，要求在条约中也这样对它们下定义。“否则就让九个加盟共和国签署文件吧，而与我们无关。”北奥塞梯的代表说道。

为了缓和激烈的情绪，宣布休息。虽然休息之后对话比较平静了，但是没人作出原则让步。在已形成的势态下有可能出现30多个主权国家代替15个加盟共和国，这使俄罗斯领导人感到不安，所以会议上不时爆发争吵。如果参加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共和国都将签署条约，俄罗斯领导人当然不能接受，所以再次建议改天讨论草案。

7月23日下午2点联邦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苏联总统神情沮丧，国内形势继续恶化，政治激情达到白热化。报刊上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不断加强，现在批评他的不仅有左派，而且有右派，不仅有对手，而且有战友。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告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宣言，反对戈尔巴乔夫无原则的方针。这样的声明以前报刊上也发表过许多，但是现在签署这份声明的有尤·邦达列夫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巴克拉诺夫以及许多其他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会议主持人的神经质传给了与会者，加入联盟的资格问题讨论了两个半小时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今天应该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向中央的财政缴款。叶利钦坚持每个共和国都必须执行单渠道固定缴款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认为中央应向每个企业征税，并且负责调整它们的上缴额。

“如果我们不把这一点写进条约，那我在这里就没什么事可做了。”戈尔巴乔夫说着，开始收拾他的文件夹。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举动即“做回家准备”是为了向与会者施加压力，用自己的离开吓唬他们，可是叶利钦不买他的帐。

“别逼我们在您缺席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他说道。

戈尔巴乔夫窘住了，他不知该怎么办。走吧——令人可笑，谁也不会理解一个大政治家的这种孩子举动。显然他在家对这种状况考虑得很少或者没有估计到，这是很难堪的，这已经是政治上的失败。会场寂静了数秒钟，总书记甚至没有时间对俄罗斯领袖的话表示愤怒，在最后一刹那戈尔巴乔夫宣布休息，他找不到任何比这更好的办法。现在一切都寄希望于晚饭了。

晚饭时商定由叶利钦、卢基扬诺夫、帕夫洛夫和杰缅捷伊解决条约这一条的提法。

前面道路上还有许多未达成协议的问题，关于新联盟的命运、它的经济、军队还有更多的未知数。这将给中央留下什么？它还能联合苏联曾联合的那些国家吗？现在就已经有许多共和国不参加讨论条约草案和拒绝签署条约，这不仅是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或格鲁吉亚，乌克兰也不准备签署条约。俄罗斯的许多前自治共和国越来越经常地和坚决地谈论自己的独立。闹独立的不仅有鞑靼，而且有巴什基尔、雅库特；卡累利阿、楚瓦什、车臣—印古

什的代表也越来越坚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布里亚特、图瓦、戈尔诺—阿尔泰共和国也在争论这一问题。主张统一联盟的人大惑不解，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结构已经不像联邦甚至邦联形式，而近似一种无定型的、残缺不全的东西。俄罗斯和乌克兰反对由企业直接向联盟预算缴款，建议在中央说明拨款用途后再给它拨款，这就要求事先公布军队、克格勃和其他部门的预算。大部分部门和生产，包括国防工厂、土地和矿藏，都转归各共和国了。

到8月中旬15个前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准备在条约上签字，其余的共和国或是根本不想签，或是想拖延到有利时机。俄罗斯的许多前自治共和国也不准备签署条约。

内阁中群情激愤，在一次会议上甚至有人对签署这样的文件表示怀疑，说它“会导致联盟瓦解”、国家灭亡。最高苏维埃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卢基扬诺夫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不仅是消灭最高中央政权，而且是遣散人民代表，取消所有议会机构。许多其他的社会组织、各部委和部门也都对签署条约表示不安。

正像专家们认为的那样，这对整个旧联盟是一个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只要为数不多的共和国一签署条约，就会消灭作为法律主体的旧联盟，因为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那些没有签署条约的国家就可以认为自己在联盟之外，旧的结构也就不再存在了。

关于联盟条约的条文内容、条约的主要原则，立法权力机关和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以及大众传媒主要是从不太权威人士的片断资料和转述中获悉的，条约的准备工作、围绕条约发生的冲突，戈尔巴乔夫都尽力保密。这个文件他连我都没让沾边，只有列文科、沙赫纳扎罗夫和另外两三个人“摆弄过”条约条文。这种神秘性引起了各种传闻，使政府成员、人民代表、社会组织感到不安，但戈尔巴乔夫还是秘而不宣。条约的内容越来越背离全民公决反映出的人民的愿望，比最糟糕的预言还糟。

这样的事态发展使反对苏联瓦解的势力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认为，如果苏联瓦解，随之而来的将是经济、财政、军队、所有其他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崩溃、整个文化的衰落、民族关系的紧张。据我所知，不容许按照这种方案发展是1991年8月发动事变的人的唯一任务，他们企图制止祖国解体，警告社会注意这种可能出现的后果，防止可能随着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无谓牺牲。遗憾的是，最糟糕的预言被证实了。在前苏联的各个地区流血冲突日益激烈，其他共和国开始排挤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经济联系中断，军队散架。

## 没有这样的党，没有这样的国家

今天是星期六，是洗澡日。小窗户打开了，看守用严厉的声音喊道：“准备洗澡。”大家早就准备好了，床上用品都收拾到一起，肥皂也准备好了，现在只等着出去。10分钟后传来口令：“出来。”领我们去澡堂的人神色各异，有的冷冰冰的，对人漠不关心；有的富有人情味，尽力帮忙。我们下到底层，澡堂就设在那里，确切地说不过是淋浴，四个喷头软绵绵地喷洒着水，那水时热时凉，有时干脆就没有了。“20分钟洗完。”看守说道。我们抓紧时间洗，尽量在此期间不仅洗好澡，而且把内衣也稍微洗一洗。淋浴间和更衣室都很脏，但主要的是希望有热水，真想暖暖身子。20~30分钟后我们被

领回来，我步履艰难地沿着陡立的楼梯向上走。晚上7点吃晚饭，晚饭后很快就该准备睡觉了。我就怕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只有自己的思绪陪伴着，于是便开始“反省”，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许多细节又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戈尔巴乔夫在心情好的时候常常小声朗诵诗歌、朗读话剧中的独白。

“我在中学参加过业余文娱活动，演过话剧，扮过大角色。”有一次他说道。

的确，他天生具有演员的才能。常常有这种情况，他在听到什么消息时总是装出一副莫名其妙、故作惊讶的样子，好像一切不是按照他的吩咐做的。所以说他身上的演员才能依然如故，不减当年……

“我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在舞台上背过他的诗。伟大时代的伟大诗人……”

同“自己的”班子在一起时，他通常总是吟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首诗中的那几句，一边吟诵一边不时意味深长地看看在座的人：

“党——唯一不会背叛我……”

党确实忠于他，而他却背叛和抛弃了党。

想不到一个准备庆祝自己百年诞辰的党不再存在了。要破坏一个党的威信、在精神上瓦解它和在组织上取消它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一个月前谁也不能想到苏共这个世界大党、这个领导着一个大国走过了7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赢得了人民的尊敬的党竟会这么突然地灭亡了。

八月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吓坏了。他很快就放弃了总书记的权力并同苏共划清了界限。正是在他的赞许和参与下苏共被解散和取缔的。如果总书记能多有一点儿勇气和冷静，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尽管苏共发生了这样的骚动，千百万共产党员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忠于自己的总书记。各级党组织和党委会甚至在对苏共领袖的工作或者确切说是不尽职暗中表示怀疑或者公开表示气愤的情况下，也仍然俯首听命，它们大都支持总书记的决定，甚至在它们不理解这些决定的时候，尽管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疏远。戈尔巴乔夫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最近我发现米哈伊尔·谢尔盖那维奇开始害怕召开中央全会，害怕会见各党组织领导人并同他们进行坦率的谈话。一些中央委员、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在碰见中央书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时常常表示不解其中奥妙。

“你们这是怎么啦？”他们问道，“为什么机关停止活动？我们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戈尔巴乔夫躲着不见我们，避而不谈党的前途问题，而主要的是不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

当然，党的积极性、党的威信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书记这样有影响的人，但是说句公道话，如果不是党遇到严重困难，不是党濒临危机状态，戈尔巴乔夫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瓦解这个有千百万人的组织。

我分析了党的各个机构、特别是领导机构的活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个结论：苏共的许多病症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袖的文化修养退化，在思想上及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实际计划方面缺乏竞争。

党的威信的下降是从党的领导集团的领袖丧失威信开始的。列宁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理论家、政治斗争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雄辩家，是一位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接替他的斯大林则是一位不那么卓越、

造诣不那么深的政治领袖。但是斯大林尽管在讲台上比较逊色，仍然具有相当好的理论修养，博学多识，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然而他却成了无法无天的象征并因此给党造成了难以愈合的、血流不止的伤口。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提升了赫鲁晓夫，他很有天赋，但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是一个三分学生，文化修养水平很低。

我曾见过斯大林手写的信件、文章、决议，他对文件所作的修改十分准确，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敏锐的政治活动家和精通俄语的修辞大师。他在他所藏的数百本书上的批注表明，他阅读的东西很多，他不仅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而且了解反对他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我也见过赫鲁晓夫的批示，可惜给人的印象是，像是一个不太有文化的、完全是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写的。诚然，应当承认，他向速记员口授的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词句也很生动，但是许多地方都不适于发表。我曾修改过他的速记记录稿以便在报上发表，这是一项非常折磨人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没怎么改变人们对党和国家的领袖的文化修养的印象。如果未来的研究人员要在档案中寻找他的自传体著作《小地》、《复活》或者其他什么讲话或报告的原稿，恐怕会白耽误工夫。他就没写过任何东西，而不仅仅是没写过纪实性文艺作品，他的战友、党员、大概全社会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他生前最后几年的宽容态度和善良性格，大概也因为他真诚希望人民得到社会主义的幸福，人们在许多方面原谅了他。

安德罗波夫的上台在阴暗的天空划过了一道明亮的光芒。他很有天赋，受过高等教育，是个有知识的人。但是他任总书记的时间太短，很难对他作出更多的定论。接替他的契尔年科也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优点，不能对党的文化行囊作出贡献。最后是戈尔巴乔夫，他无疑是个有学问的人，至少获有两个文凭。当然，他比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具有更多的广义上的文化，但像几乎所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各种优缺点的祖传的农村生活方式传统的体现者。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就是以他的名义写的《改革与新思维》。可能还有其它什么东西，尽管我知道他从来没有亲自从头（从白纸）至尾写过什么东西。

当然，几任总书记文化素质的退化是因为那时党内最高机构的总体“水平不高”，因此选中戈尔巴乔夫完全符合当时领导的水平，尽管许多人比新的总书记更有天赋，起码更有原则性、更有魄力，当然还更真诚。在政治局委员、党的领导人中无疑有社会贤达，但是遗憾的是，他们“没成气候”。

命运使党不仅受一种疾病的折磨，而且长期以来党内不同意见的斗争就没有中断过，党不断地同各种派别、反党集团、机会主义分子、倾向分子、派别分子以及其他现实的和虚构的反对党的路线的各种政治敌人进行斗争，但是党还从来没有同自己上层中的贪污受贿者、自私自利者作过斗争。这是苏共历史上新的一页。这种病削弱和损坏了党的免疫系统，破坏了党的巩固。苏共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各种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送从南方各地区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寄来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盛行，后来在安德罗波夫时期曾竭力改变这种做法，但是它的残余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只有利加乔夫才得以杜绝它。

许多人都知道馈赠礼品的事，不仅如此，对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赠送“某种纪念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礼品通常是电视、手表，在戈尔巴乔夫

时期礼品稍简单些。当时认为把所有的馈赠上交党和国家是不合时宜的，不过，安德罗波夫在这方面除外。据我所知，他对各种礼品的处理是无何指摘的。

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这方面则有些不同了。最初送给他们夫妇的礼品都上交国家贵重品保管局了，并在报刊上作报道，后来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没有了。总书记越来越多地收到各种基金会的巨额奖金，他的银行帐户不断收到以美元和其它外汇支付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及其它著作的稿酬。奖金的数额十分巨大，以致要派专门的密使去领。我不明白，为什么全部所得不自动交给供养总统夫妇的国家和党的预算部门。戈尔巴乔夫还经常收到有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以及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克鲁奇纳告诉我，这些东西他都没有上交国家贵重品保管局。

我对戈尔巴乔夫突然收到南朝鲜领导人卢泰愚 10 万美元的事大惑不解，我们同南朝鲜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话，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改变对南朝鲜的原则立场。”苏共总书记对我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朋友说。

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戈尔巴乔夫，所以相信他。另外，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正式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他不太相信自己的声明，所以在重申立场时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他最珍贵的共产党员的诺言。这样的高级共产党员是不会随便许诺的，所以可以相信他的诺言。

但是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听到他的诺言，因为变化很快就开始了。先是戈尔巴乔夫同卢泰愚在旧金山“偶然”会晤，然后是访问南朝鲜半岛，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一位新朋友。回到莫斯科后，戈尔巴乔夫把我叫来并满意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封，据他说，里面有 10 万美元。

“这是卢泰愚送的。”他没作任何解释，“你考虑一下怎么用……”

我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刚刚同苏联建立关系的南朝鲜领袖怎么会在第二次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就给这个超级大国的总统 10 万美元。就算是南朝鲜的习惯吧，戈尔巴乔夫怎么能拿这些钱呢？而既然已经拿了，为什么不立即交给苏联国家银行，又为什么把我和我的助手起草的关于将这笔钱转交给布良斯克儿童医院的文件压了半年，却说要想一想如何使用这笔现金。他在等什么呢？为什么至今没有一个人询问，这种事是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的？

这一切古怪行为发人深省，令人不安。问题甚至不在于推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些不明不白的馈赠，不断有人来信提问：总统的别墅是用谁的资金修建的？总统夫妇得到的礼品交到哪里了？我们给别人回赠了什么？总之，关于总书记—总统的礼品、外汇、他的国外和国内银行帐户、稿费、别墅、住宅等的流言被渲染扩大，广泛传播，降低了戈尔巴乔夫及其党内战友的威信。在来信中所有微妙的问题都同我国的国际事务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苏联的裁军速度比对手快并且不总是对等的？为什么从前华沙条约国撤军而不关心我国的财产和国家的其他利益？

社会各界早就盛传某些苏共活动家有不廉洁行为，这使那些 6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受到人民拥护的廉洁奉公者的威信也丧失殆尽。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影响党真正成为社会的动力、成为人民宿愿的代表者。

自 60 年代中期起，苏共的活动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不符合社会面临的任务的要求。让我们回想一下我国历史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篇章。在实际



争取国家变革的斗争年代，在反对沙皇制度、国内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实现苏联工业化的时期，党始终是一支强大的、目标明确的积极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时期，在战后建设和“冷战”条件下保证国家安全的年代，苏共显示了它的组织力量和思想力量。在祖国历史上这些激动人心的时期，党享有很高的威望，率领人民群众为崇高的目标而卓有成效地斗争。

进入平静发展时期和管理机构系统运行时期，党的积极性开始急剧下降。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党内开始自我谴责，普遍存在 30 年代那样的恐怖心理，“冷战”加强，国家卷入国际冲突，我觉得这都不是偶然的。后来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许多党组织又进入停滞时期、在这个新时期苏共领导没有制定出明确的路线和活跃党组织的措施。

由于生活相对平静和苏共党员可以在社会上担任领导职位，各种各样的人都想参加党的队伍。这种情况当然存在，但我首先想说，苏共无论是在它存在的初期还是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是许多创作者、学者、作家这些祖国引以自豪的人的思想防空洞。苏共党员中有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航天设计师和军官、作家和记者、社会活动家，实质上所有的知识分子精英都在党内。谁也不能怀疑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的入党动机，但是我认为苏共队伍中也混进一些偶然分子。

1986 年苏共党员共有 1900 万人，这是苏共历史上创记录的数字。然而要求入党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在第二十四次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间平均每年加入苏共的人为 52 万，而在第二十五次和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之间这一数字就达到 63.2 万，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每年加入苏共的人达 66 万以上。

苏联人这种源源不绝的入党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无疑，对这一过程及其后果应当认真思索。然而据我所知，对这种现象没有作过深刻分析，负有分析党的队伍的状况及发展特点的使命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领导显然不能保证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里不能不谈谈党、特别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委员会的领导人的年龄构成问题。他们许多人都已接近 70 岁，而有的已超过 70 岁。自然，这样的领袖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不懂得时代的新潮流。

组织部没有对此进行应有的监督。对所有这一切应该进行非常严肃的总结，至少应该先更换苏共中央组织部领导，迅速改变现状。

有一天晚上我去找戈尔巴乔夫时听到一句话，它使我陷入沉思。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工作将有变动。”他说道，好像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

我沉默了片刻，琢磨着这是指喜剧电影的片名呢还是这里另有什么文章，最后终于明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的命运要发生变化了。

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神秘人物，凡是了解他的人，对勃列日涅夫选中他都不感到奇怪。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善良、听话、不固执己见。由于他领导着党的组织工作部门，执行政治局的意志，实际上党的队伍及其结构就是由他建立的，苏共整个工作就是由他定调的。党变成最近几年这个样子，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工作有很大关系。在他领导的部门的影响下形成了党的

这种结构，许多党的委员会变成了一部僵化的机器。正是在卡皮托诺夫领导组织部的时期实行了接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加入苏共的独特限额，形成了党组织的刻板的工作形式。由于没有日常的事情，开始拿工作当儿戏。

我记得在一次（真理报）会议召开前，苏共区委来电话要求呈送发言者的讲话稿。在充满老的民主传统的报社党委和编辑部里共产党员被这种要求激怒了，尤·朱可夫和其他准备发言的人断然拒绝提交发言稿。

“我还从来没有按照写好的东西讲过话，”尤·朱可夫说，“况且我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再说我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听报告。”

总之，反抗非常强烈，区委的意图没有得逞。但是在其他方面一切都按指定公式进行着，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这样的荒唐事不胜枚举，以致引起共产党员的义愤。但是许多领导人认为自己的提升归功于卡皮托诺夫，因而都支持他，后来还给他挑选了一份美差。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并在同违反党纪和财经纪律作斗争中顺利任满自己的期限。戈尔巴乔夫对他很照顾并总是支持他。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大概确实是一个真诚可爱的人，他没有得罪过一个人，也没有暗算或诬蔑过一个人。但是不能不承认，按照形式主义发展党的队伍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不会看不到这是一枚定时炸弹，它会把党炸得粉碎。而既然看到了，为什么不改正错误，为什么不公开指出这些错误。

我的一个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老朋友早在 1966 年就预见到提升形式主义者担任党的高级领导人会导致什么结果。

当一个形式主义者来参加伊万诺沃州委的选举时，他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党的工作者，至少对于州里的共产党员来说是这样。他们遵照上面的意志选举他为第一书记，但还在注意看他怎样一个人，有什么能耐。而新到任者也没闲着，在召开全体会议前他请来了州委其他书记和各部主任，说应当准备他的发言。他要求指出党的第一把手在全国改革中的作用，指出中央全会的决定的及时性，最后提出要广泛利用地方材料。

当讲话稿起草完毕，他认真读了一遍，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予以通过。然后一双明亮清澈、富有魅力的眼睛望着文件起草人，轻声问道：

“问题的答案在哪儿？”

现在该轮到伊万诺沃人惊讶了。

“什么答案？”他们莫名其妙地说，“还没有人提问题呢。”

报告人善意地微笑着说：

“可是有许多生活问题困扰着积极分子，对这些问题需要作出回答。”

州委全体会议结束后，书记们在走廊上满意地说道：

“还行，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可以看出有经验。报告当然是别人帮着写的，不过回答问题还是挺利落、挺在行的。可以胜任。”

的确，这样的人都得到任用，甚至得到高升。

现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工作变动了，他的位置先是由利加乔夫、后由拉祖莫夫斯基接替，这两人都是戈尔巴乔夫的老朋友、他的志同道合者。利加乔夫是一个气质非凡的人，他善于领悟，工作能力强。凡是他确信正确的决定和思想，总是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但是他缺乏灵活性，有时使自己受到批评。拉祖莫夫斯基是一个比较随和甚至优柔寡断的人，当他看到党处

于一种他不理解的状况时，就请求辞职并很快脱离了党的工作。这也正符合戈尔巴乔夫的意向。

然而调整党的组织部门的领导人只是为改变党的干部政策创造了先决条件，不能立刻就看到具体的变化。不仅如此，苏共党员认为党的许多领袖蜕化了，他们在人民中的威信严重受损，而最近几年对戈尔巴乔夫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

不言而喻，原因不仅仅在于苏共的党建方法有缺陷，中央组织部只是大致定出苏共的结构、它的关键部门，具体事情都由地方领导去做。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挑选的“侍从”都是首先能够帮助他们在例行的党的选举中保住职位的人，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等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常常被突然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多党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共产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

当然，不能把这样的结论用于全党，但是各地不太注意苏共队伍的质量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看到了党内的这种弊端，例如，中央意识形态部顾问 A·奥尼科夫不止一次在报刊上写过这个题目，他还至少给三位中央总书记写过很多报告，但是没人理会他，他实际上是在敲一个紧闭的大门。

我曾多次向总书记报告过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顾问的报告，起初戈尔巴乔夫（他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就认识奥尼科夫）还看一遍报告，后来一看到署名，连看也不看就转给中央组织部。最后就连这也使他厌烦了，有时他问道：

“写的还是那些事吗？他有没有别的工作，是不是只有这些固执念头？”

奥尼科夫的工作当然非常多，但他所提出的问题也不是不重要的。

“我同他在原则上分歧，”戈尔巴乔夫有一次解释说，“他建议如何改正毛病，而我想消除产生这种毛病的原因。”

总书记没有往下说明，或者是不愿敞开自己的思想，或者是他认为不必跟我吐露心事。

不言而喻，党建工作不是也不可能只是卡皮托诺夫领导的部门的工作成果，背后操纵这一切的是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最后还有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也许玩弄数字可以哄骗某个人，但是形式主义给党造成了不可补救的损失是有目共睹的。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不相信理想但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不道德行为、贪污受贿、入党收费、出卖党证等事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外高加索情况更甚。这个曾几何时不大的、坚如磐石的、以自己的领袖和进步思想闻名全世界的党，如今人数发展到反常的规模，变得臃肿笨重，染上了难以治愈的疾病。

党的委员会、许多区、州的党委书记具有绝对权力，常常包办代替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他们不关心党组织和党员的需要和要求，只是中央的传声筒，所以当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病病歪歪的勃列日涅夫仍然领导着国家，而他那些年迈的战友把持着经济、工业、科学、文化这些正处于危机状态的重要部门。很多地方领导得不到应有的信息。

还有一个原因使苏共普通党员和领导人之间的裂痕逐年扩大，这就是各

种特权。关于这些特权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耳闻，这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并大大离间了党内各阶层的关系，最终竟导致共产党员要求澄清某某人的东西是哪儿来的，花费谁的钱。问题的提出是公正的，但是富有经验的党的领导却努力把所有的批评引向党的、经济的、苏维埃的基层官员。如果分析一下各个人民代表特权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就会一清二楚，最高领导集团没有受到检查。至于中央机关，许多工作人员之所以能留在这里工作，除有党纪约束外，主要是因为有机会到专门的诊所看病，到疗养院治疗，否则这些业务水平很高的工作人员——博士、副博士未必能看上这些官位，何况近几年工资又不是太高。

1985 年秋，戈尔巴乔夫得到报告说，提拔新党委书记的工作仍然停滞不前，地方领袖长期呆在一个地方导致他们满足现状，容不得批评并严厉惩处那些不听话的人。中央收到数百封有关这个问题的来信。赫鲁晓夫关于定期轮换党的领导干部，每隔 2~4 年把他们调到新的地方的思想受到勃列日涅夫的谴责。当时批评赫鲁晓夫破坏干部工作的稳定，使干部频繁调动，结果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的调动实际上停了下来。

人们数十年地呆在温暖的习惯的位置上，导致了干部的停滞，而主要的是导致人们不再关心接班人。许多领导为自己挑选了会讨好的人，一些工作能力显然很差但听话的人。因此一旦需要更换干部时，很难找到一个出众的人接替工作。于是那些才能有限、从未搞过党委工作的人就被提上来了。这些“外来人”就这样从一个州转到另一个州，也许他们并不比当地干部强多少，但至少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

对领导及其干部政策的不满加剧了党的各级统治集团的紧张关系，削弱了党，把它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效率的死板的机构。当然这种状况不是到处都存在，但是它在逐渐向越来越多的地区蔓延。

许多州和边疆区党委领导人文化修养水平的下降导致党的最高层包括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消极变化，而那些年的国家内外政策都是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的。由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党的领导没有能力采取措施使我国经济转上新的更有效的发展道路，许多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对于任何一个有野心的政治活动家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仅预先考虑到如何登上权力顶峰，而且考虑到及时体面地引退，以免受到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损失，免受人民的仇恨和曾把他奉若神明的大众传媒的猛烈批评。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个原则尤为重要，因为我国没有一位领袖是带着好名声离开自己的职位的。要想避免前任的命运，重要的是冲破周围那些与其说是关心领袖的命运，不如说是关心自己的幸福的反对者的阻力，及时引退。当然，能够这样做的人只能是那些强有力的、勇敢的、能理智估计自己的力量的人。

遗憾的是，年龄变化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是从领袖意识不到自己的实际能力开始的。如果勃列日涅夫能在 1972 年或 1976 年引退，那么在人民心中他就会是一个给社会带来幸福的领导人。可惜他没有这样做。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战友，都没有离开自己的高级职位并继续管理着国家，尽管这有时显得又可悲又可笑。在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年过 70 的基里连科在宣读中央候补委员名单时，把他们的名字念得滑稽可笑、会场上数千人先是一下子愣住了，随后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基里连科已经弄不懂发生的事了，他已经没有判断形势的能力了，尽管外表看上去是一个完全健康

的人。

既然谈到年迈领袖的智能问题，就不能不谈他们的助手，即那些不仅帮助领袖做一些技术工作，而且常常给他们出主意的人。“侍从扮帝王”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凭空而来的。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总统机构的多年工作中，我接触过许多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助手。这是一些年龄各异、修养水平、创作才能各不相同的人，但是他们大部分对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对事业忠心耿耿。他们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的上司在报告中提出的许多想法，大都出自他们。我非常了解赫鲁晓夫的助手，他们为了把中央第一书记那些感情充沛的讲话改成容易理解的文章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起草了大量的赫鲁晓夫给中央主席团的报告、给党的信件，还在分析国内形势方面做其他的重要工作，尽管同赫鲁晓夫一起工作不容易。

不管人们对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有什么看法，但他们都是非常尽职尽责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助手，戈尔巴乔夫的大部分助手和顾问，许多其他的机关工作人员、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大都是对事业、对中央和政府的决定的命运、对国家的命运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我觉得，以前存在的这种关系现在依然未变。我目睹了几次权力更迭过程，当我看到新任领袖把自己对前任的恶感发泄到他们的助手身上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记得，赫鲁晓夫的助手B.C.列别杰夫被解除工作，他对受到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慨，几个月后死在医院里，对苏共中央各书记处和各部的许多其他工作人员也几乎是这样残酷无情。向死去的领导人及其身边的人进行报复，这看来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

戈尔巴乔夫没有少费力气来更新党的领导干部，这是一项正确的措施。但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除了斯塔夫罗波尔外不了解其他地区，没见过全国大部分地区党和经济的组织者。他在中央工作的时间太短，而且主要抓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此他给自己选择战友不总是很成功。戈尔巴乔夫批评叶利钦频繁更换干部，可他自己已经更换三轮或四轮了，包括对那些人员应当稳定的机构。在党的二十八大他实际上再次更换了整个政治局。然而这次挑选干部也不是完全根据事业需要进行的，许多戈尔巴乔夫以前在共青团的熟人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还有一些戈尔巴乔夫看中的人也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弗·安·伊瓦什科当选为总书记，他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但是由于命运的急剧改变，由于重病、他没能展示自己的才华，施展政治领袖的才能。他有一个缺点——教师工作给他留下的痕迹太深。他一开会讲话就按捺不住要说教一番，这对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来说是不寻常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奥·谢·舍宁在中央负责组织工作，他是年轻一代的代表、优秀的组织者，他勤勤恳恳，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有魄力，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中央委员中（更不用说在广大居民阶层中了），大家都不太了解舍宁，他只是在积蓄力量和经验，展现自己的组织才能。鲍·卡·普戈也是这样的人，他是戈尔巴乔夫共青团时代的老朋友，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真诚坦白的人，但是在广大党员中、特别是在俄罗斯人中也鲜为人知。领导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A.C.扎索霍夫可算是个知名人物，戈尔巴乔夫也是在青年时代认识他的。扎索霍夫是一位灵活的政治家、国际问题专家，是一位好交际的人，他没有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值得赞扬的是他不隐瞒这一点。不知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他当时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不太成

功。

卢钦斯基的情况也是如此。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在改革的条件下或者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报刊的工作，因为那里已有非官方权威人士在指导大众传媒的整个活动。这一切使卢钦斯基非常恼火，但是他无法完成大多数中央委员要求他做的事。当时经验丰富的编辑和记者加·弗·谢苗诺娃在从事党内妇女运动以及社会组织工作，她是在顷刻之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次中央全会休息时戈尔巴乔夫把谢苗诺娃叫来，说打算提她进中央政治局。谢苗诺娃大吃一惊，并坦白说她不清楚做一个政治局委员意味着什么，有哪些义务。其实，情况还不止这些，全会开会前没向任何人谈及这项任命的事，对中央委员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消息。

E·C·斯特罗耶夫是政治局中非常有特色的人物。这是一个严肃认真、勇于进取、博学多才的人。他不是演说家，但他熟知农业生产，熟知农民生活，因此用简单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令人惋惜的是，1978年不是他在苏共中央领导农业工作，而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破坏时期要改变农业的状况已是极端困难了。他那谦虚、和蔼、正派的品行使人们都愿意接近他，他还善于组织能够在最困难时期改善局面的班子。

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及大会以后举行的全会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全都自动进入政治局。这种大家均等的原则，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这样的共和国领导人未必喜欢，而爱沙尼亚在政治局中有两名代表这件事又使这一原则完全有名无实。有几个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频繁更换，以致搞不清他们是否参加下次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我不怀疑当选各共和国党的最高职务的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之中许多人不仅对完成最重要的国家任务，而且对完成纯粹的党的任务都还未做好准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往往不认识这些来自共和国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他们也不清楚党的最高机关的构成。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禁止频繁的长途电话交谈，中央同地方的联系越来越削弱了。这就是新方针的结果，由于实行这一方针，总书记不仅摆脱了政治局中许多德高望重的和富有经验的人，而且像他所说的，建立起一个由他的忠诚拥护者组成的班子。在这一班人中无疑有天才的和坚持原则的人，他们在现行条件下竭尽全力为党分担着重负。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班人中也有许多人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政治眼光，缺乏很快搞清当前形势的能力。由于各级党的领导人都进行了更换，问题更加严重，大批刚刚熟悉工作的新人进入领导集团，降低了对党组织的整个领导水平，不正确的力量分配加剧了许多领导人的非权威性，使他们在党和人民中失去威信。这一切都是总书记的极大失误。

应当承认，提拔知名度不高的活动家任高级职务也是苏共中央工作中的一个失策。列宁的英明就在于，他在挑选杰出的战友和卓越的人才时甚至不排斥那些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不赞同党中央的战略的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领导人在性格和能力上各不相同，但他们无疑都是天才的、在党内国内闻名的人物。看来，把新的政治活动家送上“最高轨道”应当逐步进行，同时要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帮助他们提高威信。

在谈论总书记的失误、他采取的冒失步骤和轻率决定时，我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由于他的性格特点，他对某些党的、经济的或国家的领导人的好恶而铸成的。但是我不能担保说这不是有预谋的、有意破坏党和国家的行为。我之所以讲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独自确定苏

共中央和政治局的组成以及后来确定政府组成的经过，是想表明改革的设计师拥有多大的权力和我们的国家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它实际上是在由一个人摆布。关于这一点，在总结这个也许是最强大的党的活动时绝对不能忘记。

此外还应当看到，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往往是根据友好关系或熟人原则、根据对个人的忠诚情况进行的，这就掩盖了许多政治领袖最严重的错误。

最后，从最近几年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应当破坏下台者的威信。总书记及其战友越是想贬低自己的前任（往往还有他们的战友），自己就越丢面子。一切事情都要有个分寸。其实我并不坚持自己的结论，因为我对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的了解不能包括苏共领导的所有活动。但是很遗憾，我所得出的那些结论基本上都被生活所证实。

不管对选拔党和国家最高机构的干部方面的缺陷批评得多么正确，看来导致党被削弱和党的领导者中出现冒险主义者的最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社会失去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依靠这种思想，我们不仅完成了1917年的革命，而且团结了人民，经受住了国民经济改造的艰苦条件的考验，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战胜了希特勒德国，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取得了不愧我们伟大人民的地位，它的伟大胜利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实际上没有一次重大的国际行动不是在苏联公开的或非公开的赞同下完成的。

共产主义理想胜利地传遍了全世界，鼓舞许多国家的人民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它对敌人的理论观点也产生了影响，资产阶级世界的实用主义者从共产主义理想中吸取了许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并把社会主义国家所争取的东西用于实践。但是这个在150年前诞生的伟大思想到本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僵化”，我们的思想家违背时代的要求，长久以来并不无成效地把它变成了一种教条，他们坚持认为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无缺的。

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每天接触生活，认为我们宣传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公式已经过时和落后了，他们力图使这一伟大思想适应急速发展的生活实际。但是欧洲共产主义遭到了苏共的强烈谴责，我们的意识形态卫士不仅不容许在苏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阻挠在西方国家这样做，结果常常造成各国共产党的分裂。

科学技术革命根本改变了形势，要求提出能够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但是苏共被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为首的意识形态偶像弄得昏昏欲睡，不愿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革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党依然坚持过去的立场，从而在对于世界社会发展的认识失去了战略优势，丧失了主动权，无力地、教条地反抗着西方宣传的进攻。形形色色的经济和哲学学派的思想大杂烩，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舶来的思想代用品开始充斥意识形态空间。在我国条件下，利用这种理论大杂烩的做法导致的实际结果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戈尔巴乔夫对形势没有明确的认识，提不出能够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他的上台导致党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不仅如此，总书记还加快了党的垮台。千百万忠诚的共产党员信任他，选他为党的领袖，而对这些共产党员的命运负有责任的他却第一个宣布与苏共脱离关系，第一个背叛了党，怯懦地抛弃了党，而且是当众

公开宣布这一点。让历史去对这些事件和这种行为作出评价吧。无论国家的未来如何（我希望能是社会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的未来），人们永远不会赞同领袖在艰难时刻抛弃党的行为。这就像船长率先抛弃正在沉没的船只，将军第一个逃离战场的行为一样。

总书记最后的行为看来是受自我保护意识的驱动，但是不能说是出乎意料的。总书记没有能力团结中央委员并带领全党积极进取，他孤立无援，因为他实际上同所有具有自己的观点的人争吵过。戈尔巴乔夫明白他当总书记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无论是中央的组成还是党内的情绪都不再使他满意。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讲，6月底他曾同雅科夫列夫进行一次谈话，讨论将左翼民主派从党内分出去并编入争取民主改革运动的问题，而该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变成一个新的、独立的政党，这实质上是要把苏共的一部分转入其他轨道，实际上是分裂党。

这一点也不奇怪，戈尔巴乔夫既然当不了全党的领袖，他就打算做党内一部分人的领袖。总书记没有公开宣布这一点，这并不能增加人们对他的尊敬。搞幕后阴谋不可能有好下场。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拒绝支持苏共，时隔四个月他就失去了一切：总统权力和一切政治影响，变成了一个领取退休金的人，像西方大多数退休者一样，只能到各处旅行，看看世界并向大家讲讲苏联昔日的辉煌和自己在其解体中的作用。

随着党的威信丧失，国家及其经济也遭到破坏。工业企业相互联系中出现的困难发展到了灾难性程度，矿工的罢工运动使冶金业和许多生产，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机器制造业停止发展。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百分之十以上，国民收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与此同时，财政日益困难，生产成本、失业和半失业者人数不断增加。汹涌而来的经济困难和财政困难客观上迫使许多共和国变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用各种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同邻国隔绝开来。

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我国经济的惨状，是否知道社会正处于崩溃边缘，国家正面临着解体威胁？他知道。不仅如此，他自己也谈到国内的严重困难，但却没有提出使国家摆脱危机的相应措施，而主要的是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行动。关于这一点，至少他在会见俄罗斯共产党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时的讲话可以作为佐证。这次会见是在1991年4月初，俄罗斯各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聚集在苏共中央大楼第五层的大理石厅。在这次会见中，他对党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戈尔巴乔夫还谈了国内形势。

他从国民经济的状况谈起。经济正处在大崩溃的边缘，主要原因是经济联系瓦解，普遍出现易货关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东西，很快就要瓦解了。工农业生产下降。协定和义务得不到履行。许多企业根本不签订合作社供货合同。出口商品生产也因此而受损，外汇收入减少。

总书记重点谈了国民经济农业部门的状况，照他的话说，农业的状况实在令人担忧，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非常忧虑地谈了农村的情况。这个问题使党委书记们非常不安，因为他们清楚食品不够会导致什么结果。情况确实不妙，庄稼长势不如上一年，而工业企业、部队、学生不能参加收获。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把成熟的庄稼收上来。即使这样，国家还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生物收获量，而超过这个数额是极其危险的。

总书记还谈到不能容忍工业停滞问题。



“在这场混乱中又发生了罢工，特别严重的表现是煤炭采掘量的下降。由此导致焦炭产量减少，五金生产和许多其它重要产品的生产下降。B.X.多古日耶夫委员会正在制定经济调整计划。如果出现什么阻力，我们将不惜采取非常的和强硬的措施。请给他们以支持。

“这样的局势不仅仅是由于经济困难而造成的。反对派在人们中间煽风点火，竭力在社会上掀起波澜，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扑灭燃起的大火。当然，4月份的提价对社会的许多阶层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们应当克服一切困难。

“财政状况更为复杂。各加盟共和国开始采取拆台的行为。俄罗斯停止向苏联银行上交资金。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要查封他们的帐户，解除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长的职务。”

总统虽然对经济状况和国内形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但是后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大部分发言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已经预感到这一点，所以坚决要求采取紧急行动。

他们在发言中说，不要再空谈了，您的话我们已经听够了。需要采取具体的和有效的措施改变形势。请您履行自己的总统职责。

戈尔巴乔夫的辩护软弱无力，他又把球踢给了地方领导人。

“你们应当行动起来，”他回答说，“为什么总是指靠中央？放手工作吧，谁也不妨碍你们。”

这是戈尔巴乔夫习惯对所有地方领导人说的一句话。

政府已经没有能力解决一切重要的经济问题，实际权力越来越多地转入共和国手中。主权化过程和选举本国总统的运动在各共和国蓬勃展开。它们通过只反映“本”共和国利益的各种决定，无视苏联内阁的决议和苏联总统的命令。国内掀起一场同中央的积极斗争，各共和国领导人都想闹独立，捍卫自己的主权，相互之间越来越不理解。上交苏联财政的税收在减少。据苏联财政部长报告，到1991年年中有500亿卢布没有交上来。俄罗斯联邦根本不提交自己的预算。半年之间发行卢布达280亿。一切都靠国家准备金、国家的黄金储备、其他贵重物品和宝石储备支撑着。不采取坚决措施是摆脱不了这种绝境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在300~500天之内过渡到市场的建议，但是总统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他实质上早就在“随波逐流”了，他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漩涡并把一个大国也拖了进去。当年曾有人断言俄国没有一支力量和政党能够领导国家的改造，列宁坚决回答说：“有这样的党。”这样的党就是共产党，它当时成了一支重要的和具有威信的力量，它担负起了国家改造的重任。

但是在1991年9月可以肯定地说，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再也没有这样的党和统一的伟大国家了。自从1985年3月一小部分人通过巨大的阴谋活动在一个大国推出这位领袖，他便以职业家的手法欺骗了他周围的人，欺骗了把他推上最高职位的中央委员，用甜言蜜语糊弄了千百万苏联人。

1985年3月在历史上将成为新的动荡、黑暗势力之间的倾轧、无政府状态、人民视为最神圣的东西遭到践踏的开端，成为我们伟大祖国解体的开端。动荡时代开始了，人民暂时还在沉默。

## 改革的总结：成功还是失败

看样子我的大限到了。我已经好几天不能起床，医生坐在我旁边，尽监狱条件下的一切可能帮助我。他们多次向上级打报告请求将我转送医院，但是毫无结果，监狱长给检察院打的同样的请求报告也没有回音。斯捷潘科夫和利索夫都顾不上我，他们像伊利夫和彼得罗夫一样，在兴致勃勃地写自己的畅销书，书名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由于他们忙于写作，我有可能死去。监狱长在等不到答复的情况下担着风险将我送到第二十市立医院。这里是全国高血压防治中心，有国内最好的静脉缝合和并发症治疗专家。我极不愿手术，一直拖延着不做。但是几天后，我被用两轮车紧急推进手术室。

莫斯科的某个报纸幸灾乐祸地报道说我快要死了，说上帝已在招手叫我去。但是正如一位快活的人说的，关于我的死亡的传言有些夸大了。看来上帝的性格跟我一样——喜欢把一切往后推。诚然，多亏高血压防治中心那些高明的外科医生的帮助，我被“从那里”推出来了，医生、护士、所有帮助我的人出来了。也就是说，我将能写完本书的最后几页了。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那个阴晦清冷的春初的日子，他登上了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顶峰。当时他刚54岁零9天。向权力顶峰急速地和直线地攀登已成为过去，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活动天地，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创造结果有利于人民，什么都可以“培育出来”。我国近几十年来还没有一位领袖受到人们如此的企盼、得到如此的信任和被寄予如此的希望，没有一位总书记能由于自己的外表、由于迷人的、坦诚的样子和能言善辩而令人们如此喜爱。

他到退休时工作了六年多一点。他是在失去大多数人民的尊敬、失去威信和权力之后离开总书记—总统职位的。确切些说，他是在瓦解了国家、抛弃了使他掌权的党变得无用之后被迫辞职的。他至今仍认为他掌权的六年是照亮一个伟大国家的胜利曙光，但是在历史上这六年将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经济崩溃、人民贫困的悲惨的六年。在美国，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及其统治结果被看作是西方在冷战中“罪恶帝国”的胜利，在我国则被看作是民族的灾难、各共和国和经济的分崩离析、科学及文化的大滑坡、许多社会精神财富的丧失、兄弟相残的流血冲突及贫困和饥饿的开端。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我想，时间将会对这些问题作出详尽的回答。今天只能谈谈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

首先应当指出，改革既带来了一些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头几个月，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可以被看作积极结果的是对我国社会状况、经济和财政的严重情况的原因、人们的社会地位等的分析，这个分析本可以成为制定政治方针的基础，但是由于总书记行动中的出尔反尔而未能实现。提出社会民主化、改革政治制度、公开性、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军备竞赛等问题也可以算作积极倾向。

然而评价一位国家领袖的政策和活动不能只看他的良好动机或个别事件，要看有无有效的政治方针和积极结果。这样看的话，这六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丧失时机、告别幻想和神话的时期，是动荡的开端。实际上没有一项经济措施、没有一次保证提高生产和人民福利的尝试取得了切实的积极结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提出的社会民主化措施失去意义。

制定改革政策带有冲动性和不彻底性，而实施改革政策又缺乏权威性，

这种情况只能使形势复杂化并加剧社会发展的矛盾。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对 80 年代中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它可以使人深刻理解国内形势，作出客观结论，提出摆脱社会近几年所陷入的绝境的途径。之所以必须研究经济、财政、科学、文化、教育等的情况，还因为官方统计往往为“迎合”过去的领导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

这种分析由苏共中央机关的一批专家学者、许多大科研机构、苏联科学院、统计机关联合进行。参加材料总结工作的有阿·格·阿甘别吉扬院士、安·伊·安奇什金院士、斯·谢·沙塔林院士、B·莫任院士、斯·阿·西塔良院士、国家计委及其他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负责人。提交给总书记的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证明，国家正处在生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的边缘。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以前的国家领导对社会经济问题和工艺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局势。

本来应当从这个分析中吸取一切有益的东西，制定出在各个生活领域实行彻底改革的方案。然而，所作出的结论却是应景性的、思想定向性的和不完全正确的，分析报告主要被用作在政治上攻击前领导人的武器。它变成了勃列日涅夫、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成员领导水平不高的佐证。不言而喻，关于这一点可以说，但不能把严肃的分析文件和查明的实际情况变成报复或贬低自己的前任的工具，因为这一点在该文件中是微不足道的。

本来，详细了解社会状况之后可以制定改变形势的系统措施，预测经济发展，建立国家改革、首先是彻底的经济改革的理论体系，但是戈尔巴乔夫没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政治经济动荡不定、改革的结局令人失望、甚至常常令人可悲的最严重的原因。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没有向政治局领导人通报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只是在自己的讲话中“透露”一些东西。

总书记既没有阐述社会转轨的总趋势，也没有说明彻底改革道路上的主要阶段及以后的发展阶段，他甚至没有能力解决生活提出的个别问题，克服一般障碍。然而他认为失败的原因不是自己的过失，而是其他人不能有效的行动，结果开始经常撤换各级干部——政府首脑、经济的、苏维埃的、党的领导人。六年之中更换了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位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团所有成员和各部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这几年中先后由三人领导——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这种频繁更迭干部的做法是领袖的最大错误，它给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可悲的后果。

民主化和公开性运动使人民能够对国内状况和党的政策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对党垄断社会发展思想公开表示不满。这个运动席卷全国，使许多有魄力有进取心的人走到社会生活的前台。取消党对政权的垄断为许多政治流派平等竞争，为争取民心 and 人民的利益创造了条件。如果创造相应的条件，如果我国社会的文明、民主传统具有更深厚的根基并能制止某些领袖和部分居民的极端主义，对这些现象无疑应该给予肯定的评价。既然为民主过程创造了机会，就应该让这种过程走上积极的发展轨道，用于创造性的目的，用于团结社会、提高人们的法律素养和一般素养，这显然是在改革条件下国家发展的最佳途径。然而民主化却被用来搞冲突、分裂国家、各种力量进行对抗和搞个人报复。

顺便说一句，戈尔巴乔夫之后的领袖们也犯了改革设计师所犯的错误，他们把全部力量和手段，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及其他国家机构的活动，

不是用于建设性目的，而是用于贬低自己的政治前任。他们同戈尔巴乔夫的区别只在于总书记没有破坏前任领袖们的纪念碑，尽管他非常遗憾没能及时阻止在契尔年科墓前树立其半身塑像。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首先，因前领导人犯的种种错误，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即主要由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事技术精英代表组成的党威信扫地并被排斥于现代的创造性过程之外，尽管它的许多前领袖今天仍然坚持改革方针。苏共这个发起改革的、唯一有组织的、能最少痛苦地使开始的事业达到预定目标的力量实质上被推出了所有创造性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央总书记的努力下做的。

军队也是这种情况。对军队的精神上的攻击早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开始了，四年来一直未停。结果导致穿军装的人常常受到人身和精神上的侮辱和嘲弄，甚至发生过毒打军人和军官的事件。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联总统在国家保卫者受到侮辱时没有履行自己的直接职责，没有捍卫军队。不仅如此，他还害怕军队，不相信军队并且千方百计削弱军队，破坏它的威信。对克格勃机关也是如此，他甚至不愿会见克格勃工作人员。

戈尔巴乔夫很快也失去了对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学者的影响。知识分子看到总书记思想的局限性，尤其看到他的行动软弱无力，看到他总想在各种会议上和电视里发表讲话、在国内外发表各种文章和著作以后，都离他而去，或心灰意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或成为他的狂热反对者。

当工人、农民、退休者等广大居民的生活开始恶化时，戈尔巴乔夫又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苏联社会很容易就抛弃了他，尽管领袖最初的许多步骤曾得到广泛支持并成为苏联后来改革的基础。如果不是西方念及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为西欧和美国做了无私奉献而对他的支持，他早就成为孤家寡人了。

最近几十年苏联人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是和平问题，人们为此作出了许多牺牲。他们向往和平，但是这个和平应该在均等裁军的基础上实现。苏共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和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一论点，提出了在国家关系方面、首先是核俱乐部成员关系方面的新思维纲领，呼吁全世界裁军。这种主张无疑很有吸引力，但是正像军人们说的，要想完全实现它，只有相互作出让步才行。

但是在 90 年代初，苏联裁减武装力量的过程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因为随着国家的解体，军队、防空体系、战略空军和海军都相继瓦解。由于从原华沙条约国撤军，出现了对大规模杀伤武器没有防护的地带。此外还有一点，苏联的军队纪律松弛，大量开小差现象，新成立的国家召回本族的军人，独联体各国建立自己的军队，这一切使军队受到很大损失。因此世界政策中的新思维以及其他具有良好目的的改革措施导致了国家军事防御系统的崩溃，所以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获得了“冷战”胜利。

说在“冷战”中取得胜利，这是非常客气的说法。其实，这是处于混乱状态的苏联军队的毁灭，是一个曾几何时实力雄厚的强国的精神上的失败。这种毁灭不是由于美国的军事技术力量造成的，它是那些反对我国现行制度的力量搞内部投降的结果。

虽然新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没有考虑到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在理论上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组织上没有保障。向市场关系过渡的问题在 1989～1990 年才郑重提出，而且设想在极短期限内过渡到新的关

系体系，这不是偶然的。这个计划像中国的“大跃进”，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戈尔巴乔夫不明白，在从布格河到千岛群岛，从泰梅尔到库什卡的广袤的国土上不可能让几十个民族的心理立刻适应市场环境，不能不考虑继承祖先古老文化的各族人民的特点和传统。现代史上许多国家试图跳越发展阶段造成的可悲后果，没能使总书记接受多少教训。在我国进行的这场异想天开的试验并未出现我们盼望的奇迹，反而使苏联解体了。为这没有实现的奇迹也得付出代价，问题只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人民的痛苦、饥饿的贫困、几代人经济上受奴役，还是发生民族间的流血冲突。

遗憾的是，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以苏联总统为首的中央无力控制国内事态，这种情况助长了分立主义情绪，促使各共和国分离为独立的国家，加剧了民族冲突。民族不和甚至械斗的火焰在高加索、中亚、摩尔达维亚熊熊燃烧，许多其他的共和国以及俄罗斯一些大的地区的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一个曾坚如磐石的国家，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困难，顶住了苏联一大部分国土被占领的压力，克服了战后经济困难，现在却被搞得支离破碎。

这种后果是最可悲的，大批讲俄语的居民被迫离开中亚和高加索、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地区，生活在各共和国的德意志人境况更糟。在亚美尼亚生活了几百年的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而数十万亚美尼亚人则离开阿塞拜疆去寻找生路。很难想象数十万人的家庭遭受的那种痛苦，今天无辜的人们在流血，人们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对此感到惊奇，人们对儿童和老人的死亡已习以为常，他们陷入难于摆脱的痛苦之中，唯恐爆发内战。

由此可见，是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导致统一国家的垮台、生产减少、犯罪增加、人民生活恶化、出生率下降。这就是西方高度评价的和前苏联同胞痛苦忍受的结果。这场由戈尔巴乔夫外行地、优柔寡断地推行的、而后又被他出卖的苏联社会的改革成了千百万人的悲剧。今天人们很少考虑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现在他们只能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而斗争。

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意图实际上变成了国家的崩溃和毁灭、社会生产力的瓦解、科学、文化、教育的退化，以及流血冲突？

我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性格，是他的优柔寡断和热衷于他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些公式。实质上总书记依然是自己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培养他并把他推上权力顶峰的那个结构的产物。一方面他看到了现存制度的缺点，想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忠实于旧模式和旧方法。不管戈尔巴乔夫如何谈论民主化和公开性，但是他不是斯大林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化身，而只不过是他们渺小的影子——狡猾诡诈的苏斯洛夫的化身，而且甚至连他也不如。

这就是对他的行动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戈尔巴乔夫高喊民主化并谴责自己战友的斯大林主义，但实际上他独揽党和国家大权，独断人们的命运，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偏见、好恶决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组成、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及各州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选。他大谈集体通过决定、遵守协商原则，但却独断专行，一人通过或发布国家重要决定，排斥异己，并清除自己的竞争者。总书记—总统主张扩大公开性，但却不仅对人民和党，而且对自己的战友隐瞒关于政治局过去的活动的重要消息，以撤职威胁那些在报刊上发表不利于他的东西的主编。总书记—总统多次同外国政治活动家谈判，却从不向安全会议和最高苏维埃成员通报谈判结果。他宣布执法机关独立，却常就

某些案件的审理对总检查长指手划脚。戈尔巴乔夫要求取消行政命令管理方法，但却紧紧抓住各部委不放，由中央决定所有经济政策。他口头上宣布给地方放权，但却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既是苏共中央总书记，领导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党；又是苏联总统、国家首脑，主持内阁会议，实际上使总理有名无实；他还是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克格勃、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军工委员会等的直接的和唯一的主管人。

戈尔巴乔夫口头上衷心拥护精简管理机构的原则，实际上却不断扩充身边的官僚随从，千方百计利用他们的才能去反对政治对手。他认为自己是秩序和法律的化身，但是却不惜任何方法窥探自己的政治对手、战友及身边的人，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主张生活俭朴并以反对特权而闻名，但是却为自己保留停滞时期的全部免费的和优惠的待遇。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两面性行为数不胜数。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才如此艰难、曲折并发生倒退，实质上是遭到失败。社会生活的急剧变革不能在犹豫不决和没有信心的领袖的领导下进行。

在全面的社会变革时期，只有那些目的明确、善始善终的人才配做领袖。生活——这不是演戏，就是在戏剧中也不适合由乔装男角的女演员扮演统帅的角色，不然就会砸锅。

我怎么也忘不了一封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从各种情况看，写信人是一位年迈的妇女，她被迫丢下房子、女儿和外孙女离开中亚，而她的祖先在那里生活劳动了几十年，许多亲人都葬在那里。

她对戈尔巴乔夫写道，瞧你对我们国家干了些什么，漂亮的小米沙，你这样做是怀有敌意呢还是想以改革家扬名四海？我们这些被赶出家园的不幸之人，就像随风飘荡的风滚草一样，在广阔的国土上找不到安身之处。请回答我们，丧失了一切——朋友、财产和住房的人将如何生活。生活海洋的浪潮将把我们冲到哪里？我们这些今天已经被迫为三岁的孙女和自己乞讨施舍的人是否能活下去？请回答我们，如果你还有良心，为什么要人们流那么多的泪水和鲜血，你使人们失去了平静的生活和对明天的信念。请回答，我们将会怎样。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会因为你对我们和全体人民干的好事而永远记住你和你的子孙的……

这样的信苏联总统和苏共中央收到数十封，说起来让人痛心和可怕：被赶出家园和剥夺了一切的人们、解体的国家、衰落的经济、瓦解的军队、几百年和平相处的民族相互厮杀的鲜血和泪水——这一切都要求制止灾难，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于是，一些被授权的人试图在 1991 年 8 月防止无情地日益迫近的悲剧，他们只是希望人民幸福和全国和平，不是因为贪权，而是担心发生新的流血。但是他们没有采取严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的生命比所有改革都珍贵，所以不去违反人民的意愿。

70 多年前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看到俄罗斯在黑暗中。历史常常会重演。黑暗再次笼罩了我们伟大国家的广阔天地，人们又在流血、遭受痛苦。这一代人会看到我们国家的复兴吗？今天很难说。时间会作出公正的安排并对 20 世纪所发生的一切作出评价。20 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战争和革命、胜利与失败的世纪，是一个宏伟思想的实现和神话的破灭、天才的科学发现、辉煌的文化成就和对人的大规模伤害的世纪。

20 世纪正在以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的动荡和流血悲剧而告结束。这

个国家将会安定下来呢抑或这只是新的地震的前奏？时间会作出答复。

